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 索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深刻意涵、内在动因与现实进路
领导与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中的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内涵与塑造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挖掘可行吗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3. 2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3年3月

《探索》2023年主要栏目重点选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栏目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研究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
7.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政治学研究栏目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2.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研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4. 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5. 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6.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
7. 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

政党治理栏目

1. 政党治理视野中的大党难题研究
2.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
3. 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4.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5.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研究
6. 百年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7.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与经验研究
8.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研究

公共治理栏目

1. 共同富裕与治理现代化研究
2. 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治理研究
3. 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研究
4. 地方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5. 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研究
6. 新技术与公共治理创新研究
7.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究
8. 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栏目

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2.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弘扬研究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基层实践研究
4.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5. 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研究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7.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索

2023年第2期 总第230期
2023年3月15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金峰

副主任：张健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

孙凌宇 张志勇 陈剑 周学馨

杨杰 侯晋雄 黄建跃 谢来位

谢菊 谢撼澜

副总编：金华宝 王慧

本期执行编辑：赵超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地址：重庆市渝州路160号

邮编：400041

电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s.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 全年价：90.00元

目次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 齐道新 1
-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现状与展望 郑吉峰 14

探索笔会

-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挖掘可行吗? 王 刚 28
- 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
——兼论公共管理学发展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郑家昊 42

政治学研究

- 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内涵演进、多重张力与范式构建 杨 达, 熊雪晖 52
- 区块链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矫正：算法正义的一种可能之路 朱婉菁 64
-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深刻意涵、内在动因与现实进路 王红艳 76

政党治理

- 领导与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中的党群关系 苏 伟 90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内涵与塑造 蒙象飞, 单 鑫 103

韧性: 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维度 田旭明, 李智利 115

公共治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

——基于山东 X 村与广东 Z 村的案例研究 叶娟丽, 曾 红 127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

——基于关中平原 S 村的调查 李 斌 141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反思与优化路径 李文静 152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从互联网到 ChatGPT: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 卢 岚 163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实现路径探赜 栾淳钰, 刘颖敏 175

Contents

No.2 2023 (Serial No.230) (Bimonthly)

1. The Composition Pattern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QI Daoxin	1
2.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Jifeng	14
3. Is Mechanism Mining Feasible in Public Management Empirical Research?	WANG Gang	28
4.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Public Management——Also on the Security Risk and Governance of Public Management	ZHENG Jiahao	42
5. On Broad Green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s, Multiple Inconsistencies and Paradigm Construction	YANG Da, XIONG Xuehui	52
6. Blockchain’s Correction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 Possible Way of Algorithmic Justice	ZHU Wanqing	64
7. Profound Implica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Realistic Approach on Comprehensively Developing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Hongyan	76
8. Leadership and Joint Forces: Party–mass Relations in th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SU Wei	90
9.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NG Xiangfei, SHAN Xin	103
10. Resilienc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 “What Is Behind the CPC’s Success”	TIAN Xuming, LI Zhili	115
11. How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 A Case Study on Village X in Shandong and Village Z in Guangdong	YE Juanli, ZENG Hong	127
12. How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S in Guanzhong Plain	LI Bin	141
13. Reflection on the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LI Wenjing	152
14. From Internet to ChatGPT: Technical Remodeling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 Lan	163
15. Discussion on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Youth-oriented”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Discourse	LUAN Chunyu, LIU Yingmin	175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

齐道新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形成,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容,使其展现出多样化、层次化、系统化的构成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功能指向上呈现出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和路径方法话语相配合的构成样态,在外部形态上呈现出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价值性话语相协调的构成样态,在内在属性上呈现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统一的构成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这些构成样态具有话语阐释功能、话语整合功能、话语导向功能、话语标识功能,全方位地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景,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成样态的不断丰富与其功能的不断增强,既体现又推动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成样态;话语功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01-13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系统布局、接续发展,而且注重通过完善其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阐释,逐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的概念与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1][2]},同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要求、特征、路径、成就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题主线、核心范畴、价值内核,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趋于成熟。站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方位上,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1 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其话语体系的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多维图景式的话语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接续构建,不仅对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本质特征、变迁过程、实现机制、价值意蕴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话语体系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001),项目负责人:梅荣政。

作者简介:齐道新,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奠定了理论话语基础。

1.1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话语体系的主要研究内容

自“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对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对其基本内涵的研究。学者们从比较视角、历史视角、文化视角、哲学视角、整体视角等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2]、基本立场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3]、基本遵循即坚持社会主义性质^[4]、基本路径即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5]、基本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等内容,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二是对其内容体系的研究。从横向看,学者们一般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7]、人的现代化^[8]等方面来探讨其主要内容;从纵向看,学者们多从推进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导向^[9]、总体布局、动力机制^[10]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体系进行分析。三是对其价值旨归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西对比、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方案的示范作用和文明形态的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进行深入阐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参考^[11],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境界^[12],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3]。

学界除了对“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外,还对其变迁历程、基本特征、推进路径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一是对其变迁过程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史等为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过程开展研究,基于不同的历史坐标产生了“三阶段论”^[14]、“四阶段论”^[15]、“五阶段论”^[16]等观点,同时对其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二是对其特征的研究。学者们在“五特征说”^[17]上形成了共识。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领导力量、中华文化、国家治理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提出了“八特征说”^[18],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独有特征。三是对其推进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领导主体、指导理念、体制依托、建设重点等角度,即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推进共同富裕^[20]、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21]、推进乡村振兴^[22]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作了系统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但从话语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的专门性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其科学内涵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国道路的内容展示、经验阐释、思想呈现和价值显现”^[23],主要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总体布局、空间布局、内生动力、外部支持、本土特色”^[24]等展开。二是关于其历史演进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经历了初探期、孕育期、生成期和发育期四个阶段^[25],各个阶段都有其建构特点。三是关于其建构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从宏观与微观辩证结合的方法叙事中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性^[26],认为需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实现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的有机融合^[27]。

1.2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研究新问题的提出

总体而言,在为数不多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政治表达体系而进行概念史与思想史的历时性考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还需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意义上的研究,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现代化话语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视角和基本对象,“如果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既定的表达体系来分析”^[28],不揭示其内在构成及其功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难以充分发挥理论建构与思想观念引领的作用。作为构成性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不同语境与规定的问题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与价值功能,根据不同的功能指向、外部形态、话语属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系统化的构成样态,拥有话语结构化样态所释放的集成效能与社会功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呈现其构成样态,明确其特殊功能和构建价值,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着重要作用。

2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

剖析话语构成样态既是把握话语生成、转换和创新的基础,也是理解话语功能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向、多重要素的话语表达体系,既包括诸多概念、范畴、论断等,又基于不同的分型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构成样态。根据不同的功能指向、外部形态、话语属性,以“内容—形式—内核”为参照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构成样态。同时,三类话语又具有同一性,表现为主题一致性、目标一致性和面向互补性。从这个维度看,三类话语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2.1 在功能指向上呈现出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和路径方法话语相配合的构成样态

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功能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可划分为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路径方法话语等话语集合,并由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话语体系内部稳定的关系结构和要素良性互动的运行模式,组成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基于诸话语要素不同的功能指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结构并非平面化的关系,而是呈现出多圈层、相互关联的结构样态。其中,目标话语与本质特征话语在整个话语体系中处于核心圈层,是“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展示和理论确认,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对原则要求话语、路径方法话语起规制与引领作用;原则要求话语构成话语体系的中间圈层,是“何以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动力机制,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形态,对核心圈层和外延圈层起到衔接与支撑作用;路径方法话语处于外延圈层,是“现代化难题如何解决”的经验总结和实现方式,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形态,是对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的有效回应。四者之间纵横互动、相互联结,且各有所指。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话语在话语体系中居于统领位置,能够通过内在理念辐射其他话语,是话语体系中起目标指引性作用的话语总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与现代化意志。依据目标话语的作用范围和所处层级又可将其划分为总目标话语、阶段性目标话语和具体目标话语。其中,总目标话语是最高层次的目标设定,对其他各层次的目标话语起统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概括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既考虑到现代化的本质追求,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征。阶段性目标话语是总目标话语的具体化和阶段化界定,其话语形态表现为“新两步走”或“两个阶段”^{[1]24}等战略话语,为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程序化、规范化的战略方向。具体目标话语是对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精确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相继以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阶段性主题,为阶段性目标和总目标的实现提供明确的话语指引。

本质特征话语与目标话语同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核心圈层,共同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擘画其目标愿景和实践路向。本质特征话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特征为基本面向,形成了五个层面相互并列的话语单元,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五个本质特征分别从规模与难度、目标与价值、方法与布局、诉求与形态、模式与意义等不同面向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识,厘清了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现代化及现代化难题如何解决等核心问题,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原则要求话语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起规范、引导作用的话语集合,在话语体系中发挥规范与导向作用。其中,本质要求话语是决定事物状态和性质的话语。习近平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1]23-2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话语创新。重大原则话语是本质要求话语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坚持”^{[1]26-27}为基本面相,形成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在现代化实践中必须遵循的五个重大原则,规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前进方向。

路径方法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科学总结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方式的话语提炼,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运行图景和具体实践路向,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面貌和前途。在话语形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方法话语是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为主题和主线,在领导主体、价值追求、指导理念、体制依托、建设重点等方面对“现代化难题如何解决”的系统解答,其话语形态表现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等实践内容,彰显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路径方法话语与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础框架,为其他两种类型的话语构成样态奠定了内容基础。

2.2 在外部形态上呈现出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价值性话语相协调的构成样态

从整体意义上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充分发挥其理论效能、实践效能、制度效能、价值效能的必要前提。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性话语是在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经验总结,其目的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科学性、价值性、优越性的理论阐释,集中表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论断等形式,其生成的关键在于理论与话语的良性互动。例如,通过对现代化有效性的论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升华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性的理论阐释。理论性话语资源的充分挖掘是理论性话语生成的关键。从理论的属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性话语资源由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可借鉴部分共同构成。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是现代化实践活动投射到语言领域的表达形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实践成果、实践事迹、实践精神为话语资源,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模式的话语表达系统。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具体形态来看,实践性话语表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29]3}、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29]199}、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29]365}等话语呈现方式。作为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话语受时空制约,超前或滞后于现代化实践都是正常的,要实现现代化实践本质与其话语形式的统一,需要在推进现代化实践的同时推进其实践性

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实践性话语形态呈现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与精神。

制度性话语是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原理表达为相对固定的属性规范与发展规则的话语集合。制度是话语建构的基本语境,规定话语表达的场域与风格,二者之间能够通过话语主体的中介实现形态互换。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性话语以层级结构为基础,以空间布局为核心,构成其基本内容布局。从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层级结构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性话语由根本性制度话语、发展性制度话语和保障性制度话语构成。根本性制度话语表达为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方向与原则的话语;发展性制度话语表达为新型政党制度等政治制度话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制度话语;保障性制度话语呈现为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保障与依据的话语。从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性话语表达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经济话语、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话语等,梯次接续地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性话语体系。

价值性话语是表达主体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及其背后的根本目的和态度倾向的语言集合。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性话语是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立场与价值原则的话语资源集合,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支撑。这种物质性效用的价值话语表达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实践、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使命、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等具有人民性价值、民族性立场、世界性视野的话语表达系统。

2.3 在内在属性上呈现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统一的构成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面向的表达体系,兼具政治属性、理论属性、大众属性等多重属性,本质上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话语类别中,政治话语居于核心位置,统摄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辐射其内容与方向,三者之间高度相关,呈现交叉重叠、互构互嵌的紧密关系。就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而言,“其政治话语为其学术话语、生活话语提供基准和指向”^[30],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生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起衔接、支撑作用,生活话语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提供原始养分和可信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学术—生活”维度的话语,三者既高度相关,又各有所指。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立足中国实践,通过国家关于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制度法规等形式获得其根本规定性,旨在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与发展路线,在话语表达上具有引领性与规划性。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始终保持强大的在场状态,强调宏观维度上的表达,具体表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与战略举措。政治话语的生命力在于对人民群众的说服与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既强调其人民导向,也重视政治话语的学术化向度,即“用学术讲政治”。

学术话语以科学性、客观性为基础和前提,是关于叙事对象合乎规律的一种理性诠释和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力表征,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论证逻辑、传播渠道等方面与政治话语具有不同表现,二者是在知识上的互补和意义上的交融。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是中国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概念、范畴、话语、理论的学术性分析与阐释,旨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和政治话语进行学术性表达,构筑其内在学理支撑。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集中表现为学

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双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碳”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论进行学术性阐释而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建构和知识建构。学者们试图建构起兼顾知识理性、历史智慧与现实观照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生活话语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在感性层面的话语表达,具有朴实性、易理解性、易传播性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通俗表达,譬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想富,先修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活话语,整合了国家集体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微观诉求,实现了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与民族国家历史实践的有机融合,使中国式现代化从抽象的政治领域充分融入人民群众现实感性的生活之中,最终实现现代化大众话语从单纯个体性视角向整体性视角的转化。在人民群众这一庞大的受众中,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群体对现代化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需要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以各类群众易于接受的生活话语形式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从而达到中国人民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

3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功能指向

如果说话语体系是实践活动的体系化表达方式,那么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则是指这一表达方式的社会效果。话语体系始终以体系化的面向存在,具有大于单一话语要素功能的集成效能,因此需要从整体意义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承载着何种功能”,以明确其话语阐释功能、话语整合功能、话语导向功能、话语标识功能。这事关现代化实践话语的提炼、话语体系价值的发挥和话语内容的接续建构。

3.1 话语阐释功能上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话语体系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具,话语阐释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首要功能。建构话语体系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话语实践实现话语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道路自信、概念认知和理论认同。话语阐释功能发挥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厘清话语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话语体系之间关系的方式,全面呈现话语对象的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属性、范畴与特征、构成与结构,从而实现对话语本质的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话语阐释对象,其首要任务在于明确其鲜明主题、说明其核心范畴、呈现其实现方式、揭示其本质属性,以话语体系的方式全面地、立体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价值性和优越性。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性的话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概念厘清与概念体系的解剖、核心范畴的说明与本质特征的概括、中心任务的制定与实现机制的确认,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共产党执政规律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31]。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性的话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对时代主题的确认与基本矛盾的判断、对外部质疑的回应与内部疑虑的解答、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概括与原则要求的明确,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真理性与正确性,从科学社会主义高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级性与本质规定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人民诉求的本质一致性。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优越性的话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对中外现代化思想、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的共时性比较

和历时性反思,有力回击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西方模式论”等错误论调,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全面性与中华文明适应性。

3.2 话语整合功能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性与凝聚性

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话语资源的整合,话语体系效能的发挥需要主体力量的凝聚,话语整合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功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整合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话语资源的提炼和主体力量的凝聚两个方面。话语资源整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功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主要对三种话语资源进行整合。一是对直接性话语资源的整合,即对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话语资源进行整合,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来现代化相关话语资源的直接性运用、时代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对借鉴性话语资源的整合,即对国际现代化话语资源的整合,主要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话语资源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话语资源中借鉴其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益的话语资源。三是对转化性话语资源的整合,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不断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建构出民族特色话语,提高了话语体系的供给能力和本土适应能力。

主体力量的凝聚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本质追求,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凝聚社会思想共识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社会整合功能的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作用于主体力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话语为中国人民提供共同奋斗目标,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够凝聚各主体力量的现代化目标共识。二是原则要求话语为中国人民提供共同价值遵循和行动规范,具有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与行动共识的功能。三是本质特征话语为中国人民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现实和未来图景,为中国人民提供共同前进动力。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发挥着整合主体力量的功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共同价值观念、行动规范和精神纽带。

3.3 话语导向功能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性和实践引领性

话语体系不只是客观事物的对象化呈现,更是为了客观事物的对象化塑造而进行话语引导。话语导向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终极目的的功能化表现。话语之所以具有导向功能,原因就在于话语主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使话语必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同时在与不同话语博弈过程中逐步建构其自身的理论范式和价值追求。由此,话语体系必然依附于话语主体的价值倾向,具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其中,主观的价值表述构成价值导向性,客观的实践表达构成实践引领性。

话语价值导向功能的发挥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目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主要通过其话语辩护功能、话语引导功能、话语规范功能三个方面实现其价值导向功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一是具有辩护功能,即为指导思想正确性、道路选择合理性、目标设定可及性等提供话语支撑和科学论证,抑或辨识和调整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的思想观念偏差,实现对舆论秩序的整理;二是具有引导功能,即通过其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价值渗透和语言塑造对社会多元主体进行价值性引导,通过“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故事”对国际社会进行认知性和认同性引导;三是具有规范功能,主要体现为以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话语范式,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话语立场、社会成员的多向认识状态等不同层面的思想困境进行及时有效的规约和修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作为国家主流话语,一方面规约着现代化话语在国际交

往中的基本立场与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规束和引导。

话语实践导向功能的发挥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归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主要通过明确“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主题实现其实践导向功能。一是通过目标话语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和战略步骤,指明现代化实践方向。二是通过原则要求话语,明确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所要坚持的原则与要求,规约实践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运行规则和规范体系下进行正确实践,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走样、不打折、不变形”。

3.4 话语标识功能上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话语标识功能是将话语体系同其他话语体系区别开来的根本参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话语标识功能体现于,在东方与西方纠缠、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独特语境中,通过打造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质和观照新时代现实的标识性概念、范畴、理念,彰显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民族性标识和立足新时代的时代性标识。

民族性标识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的显性标注即为对这一民族性特质的本质标识。之所以强调“中国式”,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不同于其他现代化模式,是从中国特点出发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模式。同样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不是西方现代化故事的东方再现,也不是西方现代化话语的中国翻版,而是从中国特点出发的话语呈现。“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32][33]},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逻辑归宿是中国立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话语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体量与难度、价值和本质等方面出发对“中国样本”的话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了完全不同于人类过往实践的伟大创举,向世界宣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另一种现代性文明、另一种价值体系,突出了其民族性特征。

时代性标识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功能,彰显了其新时代特性。任何话语的建构都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从话语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的现代化”^{[33]164} 演绎而来,二者存在历史承继关系的同时,词义也有很大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是对后者的简单重复,而是时代性地赋予后者新的内涵。具体来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围绕发展的时代主题,指向“先把经济搞上去”^{[34]129} 和“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34]377} 的话语内涵;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围绕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课题,指向解决发展起来后的问题^{[35]833}。这些重大转换,体现了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涵的时代性跃升。从新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还在独特时代语境中生成了诸多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表述,如“新发展理念”“双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基于中国现实、中国问题进行话语创新,深刻体现了其时代性特征。

4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仅是对中国实践的系统总结与阐释,更是对中国方案的整体强化与现实助力,它以鲜明的实践性、坚定的人民性、深远的世界性、深邃的思想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接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发挥其集成效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实践价值、国际价值、理论价值。

4.1 展现图景愿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知

话语体系是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具,无论是推进现代化实践,还是讲好中国现代化故事,都以对它的客观认知与系统理解为前提。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础价值在于,全方位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与愿景,使人们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任务的制定与阶段性目标的确认、本质特征的概括与原则要求的明确、成功经验的总结与实现机制的说明,全面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任务、范畴与特征、规律与路径等核心意涵,对“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现代化”“现代化难题如何解决”等现代化基本问题作出深刻解答和理论确认,以理论的彻底性和话语的丰富性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面貌。

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一是有助于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性与真理性的正确认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命题与实践要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对现代化特征的科学概括与现代化成就的客观总结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出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共产党执政规律出发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有助于形成对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的正确认知。二是有助于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理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突出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对一般性规律的遵循。强调特殊性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新型现代化;强调一般性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全球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把握,既要突出其特殊性,也要强调其普遍意义。三是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性与优越性的内在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对其本质特征的概括和原则要求的明确,从科学社会主义高度出发阐明了其本质规定性、现代化目标与人民诉求的本质一致性,同时在中外现代化的比较叙事中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全面性、适应性与进步性、和平性,有助于增进受众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性与优越性的内在认同。

4.2 增进道路认同,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力量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话语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作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实践价值就在于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立体呈现,把对现代化的科学认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愿景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认知,能够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建设力量,进而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因此,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既是形成道路认知与认同的需要,也是凝聚社会主体力量进而将现代化方案转变为现代化现实的需要。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思想观念上的认可和赞成、在情感上的满意和肯定、在具体实践上的自觉支持和主动参与,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36]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实践为基石、以规律为依据、以民心为标准,通过其话语整合功能与导向功能,能够广泛凝聚民族智慧与力量,形成共识、增进团结,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识的形成提供充足的话语资源,为主体力量的

凝聚提供共同价值观念、行动规范和精神纽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力量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系统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优越性、价值性,有助于增进人民群众的道路认同与道路自信。一是有利于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利益认同。利益是道路认同的本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话语为呈现方式,有助于人民群众充分体察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的价值优越性。二是有利于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认同。通过目标话语的设定、原则要求话语的规范、内容特征话语的设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凝聚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对于增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有助于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情感认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蕴含着情与理的双重特质,为话语受众提供了共有的情感发生基础、共享的情感体验内容、共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从而坚定人民群众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4.3 呈现中国方案,丰富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9]123}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科学的解读范式和多维的认知结构,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展现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可能性,是对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有效解答。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一方面阐明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多重共性,即现代化是各民族前进发展的历史过程,都要以相应的物质文明作为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阐明了现代化只有同本国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以最适用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既“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展现了多样可能,也为西方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多样参考,从整体上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37]。中国式现代化在给世界提供全新的现代化方案与发展模式的同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接续构建和国际传播,不仅是如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既是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方案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同的内在需要。一是有助于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阐释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现代化阐释的垄断和固化,进而提升中国对现代化的自主阐释力。二是有助于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国际话语权既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以“中国”为方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现代化解读范式的变革,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以更加合理有效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国际话语影响力、国际关系塑造力。三是有助于打破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破除了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线性叙事结构,构造了时空共在现代化叙事模式,有利于形成全球现代化话语多元并举的传播格局,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4.4 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融合多种现代化理论资源,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行深刻总结,构建起具有时代性标识和民族性特色的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创新性地实现了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的有机融合,使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共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话语;创新性地诠释和表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实践基础,“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中创新了文明话语”^[38],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话语;在有效解答“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现代化以及现代化难题如何解决”等诸问题中,不断进行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有力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发展要求。作为多样化、层次化、立体化的表达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还在不同向度上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生态话语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革新、话语构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接续构建,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一套主题主线鲜明、逻辑架构清晰、内容完备丰富的科学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强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阐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强调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提升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坚定的人民性强调了人民主体地位,阐明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原则,彰显了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阐明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强调了“为了谁”的目标指引;阐明了发扬斗争精神的前进动力,突出了“依靠谁”的主体力量。再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以现代化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鲜明的实践品格,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总结,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南。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宽广的全球视野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呈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强化了我们对于世界现代化的认知,也有效提升了世界对中国现代化的了解,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样可能、贡献了中国智慧,从而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5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明确的功能指向和丰富的延展空间,呈现出多圈层、相互关联的结构样态。这种话语的内部沟通与交流机制增强了该话语体系的整体系统性和内部生长性,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同时,对这一独特现代化类型的正确性予以充分证明。作为一套阐释框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既担负着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经验和规律上升为普遍性经验和规律的话语使命,也反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实践和理论革新,有助于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独特价值转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动力和内在支撑。我们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多样化的构成样态及其特殊的功能指向,始终把握好不同话语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以此为线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与其话语形式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会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变化和理论认知水平的提升而接续发展。我们应始终立足于中

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处理好真理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回答好怎样持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彻底性、怎样始终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主导权、怎样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传播力等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尤琳,黄铭. 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保证生成的三重逻辑[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9-26.
- [3] 项久雨. 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5):1-9.
- [4] 张润峰.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J]. 探索,2022(2):13-26.
- [5] 唐爱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 哲学研究,2021(9):5-12.
- [6] 蒋英州,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3.
- [7] 岳伟,鲍宗豪.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五维向度——基于新中国70年历程的思考[J]. 探索,2019(5):5-15.
- [8] 乔玉强.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的现代化新发展——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23(1):9-17.
- [9] 李杰. 论习近平新时代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创新建构[J]. 经济学家,2022(1):24-32.
- [10] 于安龙.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论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22(5):67-76.
- [11] 韩喜平,郝婧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蕴[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2):102-111.
- [12] 付文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J]. 探索,2022(3):15-28.
- [13] 杨章文.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J]. 探索,2022(1):1-14.
- [14] 任剑涛.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1.
- [15] 董慧,胡澜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J]. 理论与改革,2022(1):10-21.
- [16] 徐建飞.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脉络与世界意义[J]. 江苏社会科学,2022(3):21-31.
- [17] 荣开明.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10.
- [18] 张占斌,王学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础、思想演进与实践逻辑[J]. 行政管理改革,2021(8):4-12.
- [19] 陆轶之,黄倩.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64-71.
- [20] 文丰安. 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与创新路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0-21.
- [21] 李军鹏. 面向2035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远景战略[J]. 中国行政管理,2020(11):47-51.
- [22] 吕方. 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特征、挑战及关键议题[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98-105.
- [23] 王慧娟,张琳.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J]. 理论视野,2021(6):43-49.
- [24] 俞祖华.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国家现代化话语的建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23.
- [25] 胡国胜.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J]. 教学与研究,2022(12):109-117.
- [26] 吕列霞,陈锡喜.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建构[J]. 学习与实践,2022(11):32-42.
- [27] 肖政军,杨凤城.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现实构建与未来展望[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2(6):1-16.

- [28] 杨彬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J]. 探索,2022(2):27-38.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0] 代玉启.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三重维度及其系统构建[J]. 求索,2023(1):40-47.
- [31] 周文,施炫伶.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广东社会科学,2023(1):14-24.
- [3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6]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12-30.
- [37] 王增智.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蕴及其意义[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3-20.
- [38] 李永杰,陈世宇.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0.

The Composition Pattern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QI Daoxin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practice and theory.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has been constantly formed during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particular,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demonstrating diversified, hierarchical and systematic composition. In the functional direc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combines target discourse, essential feature discourse, principle requirement discourse and path method discourse. It presents an external structure of coordinated theoretical discourse, practical discours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d value discourse. Internally, it demonstrates the unit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cademic discourse and life discourse.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integration, orien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re all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It describ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ites multi-subject force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demonstrates the new realm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ts functions not only reflect but also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composition pattern, discourse function

责任编辑:牟 怡 蒋英州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现状与展望

郑吉峰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利用 CiteSpace 分析 1998—2022 年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在研究重点方面,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逻辑、发展阶段、深刻内涵、实践价值、独特优势与历史经验等。在研究热点方面,主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色、目标使命、治理功能、价值意蕴等内容而展开。在研究特点方面,主要表现为考察现代化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且越来越关注现实、研究主题上呈现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制度建设的转型、研究范围上存在从整体性现代化到区域性现代化与领域性现代化的转变、研究视野上存在重视中国自身现代化到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的变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点、热点与特点,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当前实践及其未来发展来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科宽度和理论深度、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意蕴、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而从学理的层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与贡献。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现代化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14-14

“现代化”概念源于西方,20 世纪初期传入我国后迅速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现代化的认知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提出与实践,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63} 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命题^[3]。在党中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之后,学术界围绕相关问题从不同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可视化网络图谱的形式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在 CSSCI 数据库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 1998—2022 年,文献类型为期刊,对其中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进行筛选与删除之后,共得到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 3 452 篇。对文献进行数据格式转换后导入 CiteSpace6.1.R3 进行数据可视化与网络图谱分析,分别绘制中国式现代化的热点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以及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前者通过关键词共现情况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与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研究”(22YBQ029),项目负责人:郑吉峰;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变迁百年历程研究”(22B0096),项目负责人:郑吉峰。

作者简介:郑吉峰,男,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热点,后者则分析不同时间段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演变情况。在对重点、热点与特点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与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列重要讲话,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1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覆盖范围很广,但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的分析,以及对大量文献的梳理、总结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持续探索的成果,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产生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结果。在理论逻辑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遵循。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4]538},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前提。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仔细观察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贫富分化、破坏环境、人的异化等诸多弊端,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与自然和谐这一结论。这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不懈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救亡图存的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极大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更加清晰可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光辉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实践根基。在现实逻辑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克服前进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绝非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入推进的。在一些学者看来,1840—1949年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上构成了“器物—制度—文化”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现代化三部曲,但这些探索均未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的道路^[5]。因而这一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夜或者准备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探索阶段或开始阶段,实行现代化的主要战

略目标是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状态。“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二阶段是1978—2012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理论变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实现了重大变革。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明确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处在新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方位,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这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事业^[6]。同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1.3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定的生发逻辑,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从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很多特征,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7]。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开启不了真正的现代化;离开社会主义,就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8]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对它的超越,既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性质,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标,从而为人类现代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从现代化过程看,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现代化^[9]²⁵。因此,全面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相互协调发展的全方位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涵盖人民群众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多层次需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属性。

1.4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包括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两个方面。对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它“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深入推进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坚实基础”^[10]。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具有重大的世界价值。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11]。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正面示范和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12]。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是一种全新探索,因为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激发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新的思想活力”^[13]。因此,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加快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也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过程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

1.5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现代化虽然源于西方,但任何国家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现代化道路的自由,现代化模式也绝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可选。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式现代化陷阱”,在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优势。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是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产生的。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道路的人民性;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开放和创新,彰显了道路的时代性;与一些后发国家走依附性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自主性发展,彰显了道路的自主性^[14]。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先进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理论优势不断转变为实践效能。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实践优势:其一是现代化的规模大,是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现代化;其二是现代化的效率高,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其三是现代化的步子稳,与实践联系密切,其实践逻辑是基于实践、关照实践、指引实践的三者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现实力量^[15]。

1.6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牢牢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及其理论不动摇。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是对全球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才能更加坚决地防范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思维方式”^[16]。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的内在要求^[17]。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奇迹与产生的影响,根本上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独具的魅力、特点与优势。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其他现代化模式,明确了资本只是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8]。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探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继续走好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点

在文献统计分析中尽管包括许多热点词汇与主题,但结合关键词出现频次、中心性等参数对文献进行整体归纳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其本质特色、目标使命、国家治理功能和世界价值等方面而展开。这些研究热点既与研究重点紧密相关,也反映出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步转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考察方面。如果说研究重点主要是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那么研究热点则是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与价值。

2.1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色是社会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一说,归结起来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色展开了研究。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追寻的过程中形成的,落实在民族自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其发展不是一个随历史的自然时间推进就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有坚持这“两个结合”并顽强认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不为历史曲折所动摇,坚韧地守护现代化的初心与使命,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史才会凸显其历史基调,才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面目崭露给世人^[19]。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化”三个维度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中成功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生动结合。它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逻辑的同时,又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僵化、单一、失衡、集权等弊病,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20]。再次,社会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前进方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新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21]。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间的接续回答和继续探索。

2.2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使命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浸润下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便矢志不渝地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在此背景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使命。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第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使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2]。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仅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提供了奋斗目标。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奔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使命。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衔接,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接续奋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加人民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23]。

2.3 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和“四个现代化”一起构成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拓展到国家治理层面。其一,实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为应对现代化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挑战,要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使劳动成果、知识经验、管理要素和资本技术的作用得到彰显,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财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4]²¹¹ 这表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其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诉求和实际问题。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国家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基点,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本认识^[25]。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进程中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现代化过程举步维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依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便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遵循、价值目标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26]。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对维系社会稳定、法治平安、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进程平稳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2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

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和平稳定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同时也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同样也为世界人民造福。

2.4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化”“中国方案”等关键词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范畴。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新创造、新模式,虽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但其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价值意蕴,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现代化陷阱。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始终坚守中国立场,在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外的新产品。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中国是第一个不通过战争手段而以和平发展方式发展起来的国家,这就彻底地破除了所谓的“西方神话”,使得“人类未来的世界秩序因中国的崛起而富有中国色彩”^[28]。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架构下现代化的发展局限,形成了异于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价值导向,“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和对人存在的桎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案”^[29]。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致力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创新了现代化话语,也创新了文明话语,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30]。

3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随着时间变化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在不断变化。利用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展现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同时结合时间节点揭示研究主题的演变历程,来分析研究重点与研究热点的演进情况。在此基础上,将样本数据中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关键词突现图中的参数,以及将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与关键词突现分析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变化背后的特点与规律。这种特点与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着力方向和可能需要持续深化的方面。

3.1 考察现代化的时间逐步由远及近且越来越关注现实

根据“洋务运动”“小康社会”“改革开放”“新时代”“乡村振兴”等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顺序及频率高低,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内容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早期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实行现代化的原因及其早期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对既有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很少与国家现实发展即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理体系”“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词汇陆续出现,说明学者们着力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且这方面的研究占比越来越大。因此,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矢志不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后,聚焦于“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领域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也就非常丰富。此外,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之后,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迅速成为研究热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卓越成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有力驳斥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书写,它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境界。”^[31]这说明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分析总结,而是开始关注国家战略,与国家政策深度接轨,不断为国家的战略、策略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智力支持。

3.2 研究主题上呈现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制度建设的转型

通过分析文献关键词及其内容之后,发现近几年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陆续出现了“制度”“制度优势”等词汇,这些体现现代化重要特征的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关注点在转型。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学术界起初习惯于以“市场经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研究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长时间积贫积弱导致国家急需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这种特殊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决定早期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应首先抓住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2][35]}。因此这一时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有着时代性与合理性。但这也可能忽视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文化研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层次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以制度与制度优势为代表的深层次研究愈发增多。“制度建设不仅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提供有力保障。”^[33]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制度建设的体系化、集成化、协同化优势。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也逐步转向制度现代化研究。这种转变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已实现研究层次纵深化发展,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丰富拓展,研究内容也由经济层面转向制度层面,逐渐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越来越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3 研究范围上从整体性现代化到区域性与领域性现代化的转变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2005年以来诸如“乡村建设”“中国乡村”“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边疆治理”等词汇陆续出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这些具有地方性或区域性、领域性的高频关键词的出现,为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主题与视野转变提供了参考。早期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视野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即学者们多从全球化视野和整体性视野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和国家现代化作宏观分析。“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从欧洲开始,通过传播等途径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是传统社会,而所有的社会也都将转变成现代社会。”^[34]由此,在现代化研究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多从整体性视野出发,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共性研究,得出关于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从而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学者们结合中国国情开始对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行研究。这种宏观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奠

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5]。学者们一方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区域现代化与各个领域的现代化,逐渐将研究范围聚焦于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之一为乡村现代化研究^[36]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37]。“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的根本取向,意味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未来走向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治理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既有现代化治理模式的翻版,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目标与现实、国家与社会相互辩证作用的走向。”^[38]中国乡村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模式多样、文化差异显著等特征使得中国乡村现代化或区域现代化呈现复杂性,适用于此地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能适用于彼地。这种情况尤其反映在中国的县域现代化上^[39]。因此我们需要探求真正适合于中国乡村与区域的独特现代化道路。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范围逐渐由整体性研究转入区域性与领域性研究,或者从宏观研究逐渐转移到中观或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发现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走出的一条独特的现代化新道路。

3.4 研究视野上存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性到全球性的变化

学者们注重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维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很强的本土特色(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普遍性)。随着研究时间演变,学者们逐步从关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转移到既重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又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或者说,学者们早期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性或特殊性,现在既关注其特殊性也关注其全球性或普遍性。作为后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的道路上齐头并进,形成协调均衡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就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践样例,开拓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之路,为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走向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国情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20]。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贫困落后问题,因此反映在理论研究上就是学者们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性或者自身价值与意义。当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中国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就增强,同时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增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深入与广泛,这反映在理论研究上就是学者们开始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与世界意义。因此,从研究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逐步在从本土化向全球化转变、由个性向共性转变、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变,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最好的诠释。

4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现代化逻辑,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谬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这就需要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从目前的研究重点、热点与特点来看,结合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4.1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研究宽度

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历史学、行政学领域,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尤其是综合多学科或跨学科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少之又少。这说明在交叉学科日益兴起并大受欢迎的背景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科宽度仍然有待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已不再是仅限于经济领域的传统现代化,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复杂的系统性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各个领域,辐射政府、国家、社会、公民等各个方面,所以其研究不仅仅是政治学上的问题,更是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学术界热点问题之后,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不断快速发展,已经实现了由点及面、由单一领域到系统领域的扩展,已有学者开始尝试从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出发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加强跨学科联合研究、协同创新,注重加强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生态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此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研究宽度,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投入和努力,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研究。

4.2 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研究深度

尽管“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真正兴起是在2021年,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后^①。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提出时间较短,因此目前大部分学者着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作用、意义等方面的宏观分析,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以及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中观与微观研究着力不够。目前有一部分的研究还浮于表面,并未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理。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而不断丰富的内涵又表明其使命追求在不断拓展”^[40],因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研究对全面系统地阐释其内涵、外延、历程与价值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研究有利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而丰富目前的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特色与发展方向

① 习近平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

作了明确阐释,以此为导向,学者们应首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色与方向进行学理性研究,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规律性与适用性;其次,学理性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经验总结或理论概括的层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途径以及发展现状等问题上应加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不能仅局限于会议精神和政策解读,应大力开展实地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与案例剖析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状况与实践路径,从而丰富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理性。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转化为更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研究,以此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研究深度。

4.3 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意蕴

目前学者们主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类为经济价值、人类自身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三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要持续深化,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意蕴,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价值与世界价值、时代价值与历史价值及其四者相结合形成的复合性价值。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文明古国,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一方面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统筹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促进国内发展进步的同时坚持对国际社会作出新贡献。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重大,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价值意蕴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但目前的研究多偏重于现实的世界意义,一方面对国内意义的阐释还不够,另一方面立体式的价值意蕴研究也还不够,或者说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价值还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融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继续坚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视角、唯物主义视角、人类文明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价值意蕴同时,更应该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研究,在加强本土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增强世界意义的说服力,做到本土价值与世界价值相结合、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相促进,从而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时代、超越国别的时空价值。

4.4 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在重视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成就、经验与意义研究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7]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本质出发,根据其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进一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建构起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与价值,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特色、本质要求与主要原则等还未形成一致看法,即使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阶段划分上都还存在争论。除此之外,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相比有什么本质突破等基本问题同样处于争论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应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弥补目前中国式现代化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与不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要全面学习掌握,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16]。着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5 结语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了1998—2022年间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CSSCI数据库收录文献,分别从研究重点、研究热点、研究特点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覆盖范围很广,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因、内涵、特征和优势特点、实践价值、成功经验等。这从侧面说明学术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全面,“中国式现代化”学科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学者们的研究内容虽然各有差别,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特征、世界意义与文明形态价值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性观点,不仅为今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更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智力支持。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一方面存在需要持续深化和改进的方面,另一方面需要为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步而不懈努力,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理论贡献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的战略演进^[41]。不断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助于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力量。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在概念界定、价值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系统梳理,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注意多学科交叉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研究宽度;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转化到更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研究中,增强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实践性;做到本土价值与世界价值相结合、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相促进,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时代、超越国别的时空价值。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对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加强前瞻性思考,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有清醒预判,以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张润峰.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J].探索,2022(2):13-26.
- [6] 杜玉华,王晓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及实践转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 (3):14-20.
- [7]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
- [8] 张跃国.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J]. 开放时代,2022(1):12-2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0] 段妍.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J]. 思想理论教育,2022(9):48-53.
- [11] 吴晓明. 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2022(9):1-8.
- [12] 于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5):64-73.
- [13] 王艺苑,蒋明敏.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征和世界意义[J]. 学海,2022(5):5-11.
- [14] 张浩,邹志鹏. 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J]. 贵州社会科学,2022(1):11-18.
- [15] 尤琳,黄铭. 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保证生成的三重逻辑[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9-26.
- [16]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 求是,2023(2):4-9.
- [17] 杨章文.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J]. 探索,2022(1):1-14.
- [18] 刘伟兵. 马克思对现代化进程的解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20.
- [19] 任剑涛.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1.
- [20] 董德福,齐培全.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超越性[J]. 思想教育研究,2022(4):57-63.
- [21] 孙正聿.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J]. 哲学研究,2022(1):5-11.
- [22] 文丰安. 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与创新路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0-21.
- [23] 殷晓元,彭静.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实践方略[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14-120.
- [24] 许耀桐. 中国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
- [25] 元光,魏凌云.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J]. 行政论坛,2021(6):21-27.
- [26] 陈黎梅.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四维解读——兼驳斥“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9-58.
- [27] 任保平,张倩. 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J]. 学术界,2022(6):33-42.
- [28] 杨光斌. 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6):8-10.
- [29] 韩喜平,郝婧智.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49-56.
- [30] 李永杰,陈世宇.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0.
- [31] 付文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J]. 探索,2022(3):15-28.
-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3] 马雪松. 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人民论坛,2022(17):46-49.
- [34] 谢立中. 现代化理论的去与现在[J]. 社会科学研究,1998(1):67-73.
- [3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2-07-28.
- [36] 陶珊珊,肖凡. 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机制、关键领域与经验供给——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44-49.

- [37] 方盛举,马元喜.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逻辑意蕴、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J]. 探索,2021(5):50-62.
- [38] 王浦劬.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18-24.
- [39] 徐娜. 合法性与有效性:现代化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双重目标导向[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58-68.
- [40] 蒋英州,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3.
- [41] 黄建跃. 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演进[J]. 探索,2020(6):5-18.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Jifeng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academia. By using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1998 to 2022, we can find out in terms of research focu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emergence logic, development stage, profound connotation, practical value, unique advantag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pots,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goals and missions, governance functions,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looking at modernization of the time span is relatively large and more attention to reality, and the research theme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mphas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mphasiz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scope transition from holistic modernization to 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d domain modernizatio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change from emphasizing China's own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to emphasiz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From the key points, hot sp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it maybe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the discipline width and theoretical dep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highlight the time and space valu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m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show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s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and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PC, Chinese peopl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挖掘可行吗?

王刚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机制挖掘是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研究兴起的内在要求,也是其“科学化”诉求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挖掘具有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机制提炼和机制结论两个方面。机制提炼的内在困境表现在:从微观个体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因果链条的隐蔽性和多重性,从具象到抽象脉络提炼的主观选择和判断;机制结论的内在缺陷表现在:理论结论的情景化被选择性删除,理论结论的条件约束被概推冲动所忽视,理论结论的周延性和饱和度无法测量。寻找化解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机制挖掘困境的出路并不容易,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谨慎理论概括,扎根结论情景,提炼约束前提。明确机制挖掘的不足及其化解思路,可以促进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质量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证研究;机制挖掘;因果关系;理论情景;假设前提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28-14

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逐渐兴起。相比传统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更注重方法多元、资料详实的论证思路,因此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可。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发展,将公共管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尤其是其对政府和社会内在机制的挖掘,发现了更多思想新颖、令人信服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但是另一方面,伴随公共管理实证研究大行其道,学界却鲜有研究对实证研究的内在不足展开系统论述,尤其是对其机制挖掘的深层剖析存在不足。机制挖掘是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内在灵魂”,也是彰显公共管理学科特性的标志之一。如果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要深入发展,要在机制挖掘方面更为系统、深入和全面,就不仅仅要认识到机制挖掘的内在价值,发展其系统方法,也要洞悉机制挖掘的内在困境。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推进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从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提炼出更具有影响力、创新性的公共管理理论。

1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兴起与科学化诉求

自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实证哲学”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科学中,并逐步成为主流。孔德主张实证的初衷,是鼓励社会科学学习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避免单纯从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问题^{[1]155}。孔德倡导成立“社会物理学”“社会学”,基本主旨是反思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方法、规律和观念,将其引入社会科学的相同问题领域。实证哲学的兴起,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孔德的同胞涂尔干率先垂范,将实证主义运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沿海特大城市风险的韧性治理研究”(21AZZ014),项目负责人:王刚。

作者简介:王刚,男,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到自杀研究中,研究不同因素与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实^{[2]149-150}。

伴随着实证研究的成功,以及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思潮,整个社会科学都开始转向实证主义,公共管理学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有的公共管理学者已经对公共管理是否是科学展开过深层的学理分析,并且认为实证主义的勃兴宣示了现代社会科学群兴起,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产生了分野,也意味着实证主义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学科标签。由于实证研究方法能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手段,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有学者统计发现,1995—2005年间刊发的公共管理期刊文章中94.5%属于规范研究论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特点^[3];而这一状况在近年获得了较大改观,侯志阳和张翔以《公共管理学报》为统计样本,发现过去15年案例研究文章从2004年的9.09%,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62.5%^[4]。这一变化说明实证主义研究越来越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范式。

与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研究兴起相伴随的是,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大行其道。不少研究者对实证研究中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利弊展开了激烈和深入探讨^[5],这对于深化公共管理研究大有裨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双方树帜立意的辩论均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不管是质化研究抑或量化研究,实证主义研究的初衷或目的都是挖掘社会中的运行机制。换言之,通过案例(质化)或者相关(量化)研究,实现社会的机制挖掘,或者得出有关机制的结论。

不可否认的是,实证主义研究的兴起,与社会研究的科学化^①诉求密切相关。科学的标签已经成为“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正如A·F·查尔默斯所言:“人们广泛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科学及其方法具有某种特殊的東西。说某种主张或某个推理或某项研究为科学的,就是想暗示它们具有某种价值或特别的可靠性。”^{[6]52}科学化诉求促使公共管理研究凸显实证主义:注重理论的概括或者假说的提出,并辅之以详实的案例情景或者数据证实,从而为后续的理论探讨或者证伪提供对话平台。实证主义秉承了通过假说(命题)检验、数据证实(或证伪)来发展知识的科学范式。在这一科学化诉求的过程中,进行机制挖掘或者提炼就成为核心要义。机制挖掘的重要性之所以不断凸显,就在于探求因果关系是科学化诉求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此,萨拉蒙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科学解释就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性和内在机制,阐明它在整个自然图景和层次结构中的地位。”^{[7]120-122}刘斯易-贝克也对此持相同的态度:“因果机制和因果力是根本性的,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到在经验上被证实的关于因果机制的理论和假设。”^{[8]100}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提出因果探求的重要性和复杂性^[9],但是力图概括影响“自变量作用因变量”的因果关系,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质和追求。而因果关系的探求,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追求稳定机制的范畴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探究机制和探究因果关系是一体的。

不管是机制,抑或因果机制,其重要性已经成为实证研究的重要内核。众多的实证研究者也对机制的内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剖析,赫德斯特伦与斯维德贝里认为机制提供了“可观察事件之间的假设性联系”^[10]。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埃爾斯特认为,机制对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为单个事件提供深入且令人信服的解释^{[11]457}。“机制就是通常由未知条件所引发的、后果不确定的一个因果关系”^{[12]43},这一定义无疑将机制归入因果关系之中。尽管赵鼎新认

① 目前一个更为通用和普遍接受的概念表述是“社会科学”。

为这一概念具有两个错误,并从一个更为系统的角度阐发了其对机制的认识,但是他同样不否认埃尔斯特将机制归类为因果关系的论断^①。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要找因果机制,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探究因果机制有利于挖掘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过程和环节,从而打开黑箱、增强解释力;因果机制更加强调能动的作用,更加适用于充满能动性的社会科学领域,并为分析和研究能动性因素提供一种途径。

鉴于因果关系探究在科学化以及实证研究中的突出地位,以及机制与因果关系的内在关联性,在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探究机制已经成为一个核心主题。尤其是在大量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机制研究已经成为能够彰显主题聚焦、研究创新的不二法门。诚然,“XX 机制研究”,相比“XX 问题研究”“XX 体制研究”,更能凸显研究的意义和深层机理。笔者对当前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从问题、制度研究,过渡到机制研究——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是当大量机制研究不加辨析地占据实证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机制研究本身的内在困境和缺陷不加掌握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机制研究滑向错误的方向。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关注到机制研究的局限性,例如赵鼎新对机制研究和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展开了深入探讨,对机制概念常见的误解、社会机制的关键性质和基本类型、机制解释的主要弱点做了系统阐述^[13]。但是其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机制研究的不足不仅在于机制解释,更在于机制挖掘。具体而言,还在于机制提炼过程和机制结论适用的不足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而立足社会学机制不足的探究并不能概推到其他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比如公共管理——依然有必要展开系统梳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科对机制的研究更为执着和深入,与机制相关的研究主题已经达到非常细化的程度^②。

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不断推进和深化,不仅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实证主义研究成果,而且使不少学者开始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本身展开了探讨。公共管理学界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是西蒙,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引入逻辑实证主义,以使公共行政学摆脱“行政谚语”的困扰^[14]。有的学者密切关注公共管理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探讨,并对实证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5]。尤其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反思引发了广泛讨论。2019年底,刘润泽、巩宜萱发表了对定量研究的批判^[16]。随后,于文轩和樊博对此进行了反驳^[17],双方的探讨超越了定量本身的视域,引发了学者们对公共管理实证主义局限性和价值的关注,随后的关注重点聚集到案例研究的内在缺陷。在案例研究中,数据集和过程追踪两种传统对于因果的理解都存在不足,尤其是中国公共管理的案例研究,在议题、应用、价值认知、指导方法和范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要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6]。而从案例

① 赵鼎新认为这一概念有两个错误:首先,引发机制的条件一般是已知的;其次,机制的后果也应该是确定的。从而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所谓机制,就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被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② 作者概括得出了公共管理学科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机制研究的关键词,包括:适应性机制、协调机制、组织机制、触发机制、耦合机制、影响机制、运行/动作机制、决策机制、处置机制、衔接机制、学习机制、推动/推进机制、驱动机制、解决机制、综合机制、话语机制、产生机制、长效机制、响应机制、应对机制、实现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矫正机制、作用机制、激励机制、督查机制等。诚然,这一概括还是不全面的,其他一些非标志性的机制主题,例如“心理机制”“文化机制”等,并没有纳入其中。

透明度的角度而言,案例研究的内在局限更为明显:“不充分评判”导致规范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张力、操作性方案缺失导致宏观理念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普适要求导致固定规范与差异性标准之间的张力^[18]。

不管是定量与定性的比较分析,还是案例研究内在局限的提炼与化解,其实都是在揭示实证主义研究中机制挖掘的困境。但是非常遗憾,上述研究还没有立足“机制挖掘”加以剖析,其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概括还是聚焦案例研究,与社会学界明确聚焦“机制解释”的不足概括具有差距。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问题展开探讨:首先,对机制提炼过程的内在困境进行分析;其次,对机制结论适用的内在缺陷展开讨论;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化解公共管理机制研究困境的对策,或者提供研究者需要注意的事项。

2 机制提炼的内在困境

赵鼎新归纳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五点内在缺陷:一是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过于就事论事;二是强调经验事实和归纳,造成知识的碎片化;三是忽视宏观结构条件的挖掘;四是追求即时效果,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五是貌似中立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无法排查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秉性甚至狭隘^[19]。这些概括都颇有见地,上述实证主义的不足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机制探究的内在缺陷。但是赵鼎新对实证主义不足的概括还没有触及机制提炼的内在困境。机制提炼是通过微观的数据、资料洞悉一般事实中蕴含的一般因果关系或者内在机制的推理过程,是实证研究中概括、归纳的典型体现。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机制提炼内在困境,既具有本学科自身的特性,也具有一般的机制提炼特性。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微观个体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因果链条的多重性和延展性、从具象到抽象脉络提炼的主观选择和判断性。

2.1 从微观个体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

当代逻辑普遍认为,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具有相同的地位,两者共同构成了形式逻辑大厦的两块基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发轫于培根的归纳逻辑,相比于具有两千多年发展史的演绎逻辑,一直受到传统逻辑学家的质疑,甚至诘难。传统演绎学派的逻辑学家认为,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逻辑,不具有演绎逻辑的周延性,是不可以被归于形式逻辑的行列,罗素曾经用非常知名的“归纳主义火鸡的故事”^①来展现他对归纳主义逻辑的嘲弄:无论归纳主义的归纳技巧多么炉火纯青,归纳逻辑自身的缺陷无法弥补它推理的漏洞。

另一个提出归纳逻辑缺陷的人是大卫·休谟。他早在罗素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展现了他对归纳逻辑内在困境的深入洞察。休谟认为,归纳推理所依据的普遍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只是

① 罗素的“归纳主义火鸡的故事”如此表述:在一个火鸡饲养场里,有一只火鸡发现,第一天上午9点钟主人给它喂食。然而作为一个卓越的归纳主义者,它并不马上做出结论,要一直等到已收集了有关上午9点钟给它喂食这一经验事实的大量观察才做出结论。而且,它是在多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雨天和晴天,热天和冷天,星期三和星期四……它每天都在自己的记录表中加进新的观察陈述。最后,它的归纳主义良心得到满足,它进行归纳推理,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主人总是在上午9点钟给我喂食。”可是,事情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乐观。在圣诞节前夕,当主人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的时候,它通过归纳概括而得到的结论终于被无情地推翻了。

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联想,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从个别的前提不可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20]95-148}。休谟对归纳逻辑的洞察力,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但是后来引发了康德、维特根斯坦等一大批哲学大师在此方面的思考,甚至促成了他们的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的思想中,就展现了自己对归纳逻辑的批判:“太阳明天会出来是一个假设,我们事实上不知道它是否会出来,因为没有一种强制性使得因为另一事物发生了这一事物就必然发生。”^{[21]119}

休谟等人对归纳逻辑的哲学思辨,实际上从哲学层面指出了从微观个体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但是从微观上升为宏观机制,确实是公共管理研究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抱负:没有哪个研究者,只是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罗列和呈现数据、资料方面。数据和资料的呈现是否全面、整齐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提炼出可以放大的机制。但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在实证归纳的过程中,不仅呈现出这种从微观个体放大到宏观机制的逻辑漏洞,而且其研究的思路更是放大了这一逻辑不周延。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绝大部分是遵循“文献综述—概括理论视角(或者分析框架)—嵌套实证数据(或者案例资料)—机制挖掘”的研究思路。因此,一开始所提炼的理论视角或者分析框架已经框定了分析的视野和维度,而后面嵌套的实证数据,更多的是提取与分析框架相契合的资料或者案例情节,而对于不契合这一分析框架的数据和情节,则舍弃不用或者视而不见,具有“削足适履”的典型特征。

这种从微观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不独为公共管理学所独有,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家已经有所洞察。例如马歇尔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粗疏和不诚实的理论学家们,就是那些宣称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的人,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选择和组织资料的方法藏在身后。”^{[22]120}另一个对此做出更为系统和深入研究的是科尔曼。科尔曼所构建的“船型”模式,提示着实证研究中微观到宏观(个别到一般)的转换问题,揭示出宏观层次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计划之间存在的固有缺陷^{[23]1}。毫无疑问,科尔曼的“船型”理论,展示了这种逻辑不周延的内在顽固性,它告诉实证主义研究者,在每一个“宏观—微观—宏观”的推演阶段,都存在可能偏离真理的地方。因此,需要洞悉这种逻辑不周延,并时刻心存敬畏。

2.2 因果链条的隐蔽性和多重性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机制挖掘力图呈现出因果关系的链条,但是因果关系的提炼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手到擒来的。恰恰相反,它非常艰难,尤其不为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所擅长。首先,因果链条具有隐蔽性。在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经常犯的两个典型错误就是,把联系等同于因果关系、把过程描述等同于因果分析。之所以容易犯这个典型的研究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因果链条具有隐蔽性,而且并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和归纳。联系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联系的多样性使得因和果的链条多样和多元,休谟就认为因果关系太难提炼了,休谟只是提炼了因果关系三要素——时空毗连、持续顺序、相伴而生,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时间维度上,因在前,果在后^{[20]135-136}。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哪怕这唯一确定的时间前后性也被打破了,也可能发生果在前、因在后^{[24]151}。

其次,因果链条具有多重性。因和果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果的对应关系司空见惯。诚然,实证主义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多重因果关系的存在,并尝试从研究方法创新的角度加以澄清。其中的代表者拉金依据多重因果关系的逻辑范畴创立了定性比较分析(QCA)研究方法,希望避免以往单纯定量和定性实证研究的局限。拉金等人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多重因果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采用 QCA 法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 QCA 法广受欢迎。但是 QCA 法所揭示的多重因果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在此方面有更清晰的认识,QCA 法只是揭示多种因果关系的可能路径,但是不同因果路径的权重和实质性影响并没有得到展示。至少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核心期刊发表的 QCA 相关文章,只是侧重稳定性检验,没有对不同路径的权重、影响程度大小进行比较。有的公共管理学者已经意识到 QCA 法的局限,并认为应从增加时间维度的角度加以优化^[25],但是对其机制提炼的不足还没有触及。QCA 承认因果链条具有多重性,但只是更为明确地呈现给我们,并没有化解因果链条多重性对我们认知造成的困惑和迷茫。

再次,因果链条具有主观建构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因和果的对应关系与人们的文化观念、主观感受息息相关,也与人们试图去解决和解释的问题高度关联。人们倾向于把长时间、多次出现“前一后”对应的两个现象归因为因果关系;古人能够把“闪电—雷音”归因为因果关系,不外如此。这意味着在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中,单纯的不掺杂主观动机、观念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这种状况使得“解释”替代因果性说明开始出现。科尔曼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在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当中,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事件之间的有意义联结来作为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工具^[26]。因果链条的主观建构性将公共管理机制提炼的内在困境展现出来:实证研究的本质是追求不加主观建构的“实然”呈现,是排斥“价值”层面的理性追求,但是实证研究的机制提炼的核心—因果关系—具有主观建构的成分,无异于给公共管理机制提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得公共管理研究者需要重新反思其实证研究的“客观”性。

2.3 从具象到抽象脉络提炼的主观选择和判断性

上面提到的因果关系具有主观建构性。实际上,实证研究的主观选择和判断性并不局限于此,在从具象上升为抽象的提炼过程中,同样具有明显痕迹。传统的认知哲学告诉我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方式,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认识的升华。当认识从表象上升到概念的时候,感性认识就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但是这种将两种认识人为划分和对立的观点,已经为最近的认知科学所否认。人们意识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纠缠在一起的,感性中有理性的成分,理性也无法完全排除感性的干扰。因此,看似客观、理性的理论归纳,其实都蕴含着感性和主观的成分。这种机制提炼的主观选择和判断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人们的理论归纳具有主观选择性。上文说明了案例资料的嵌套具有“削足适履”的典型特征。实际上,不仅仅案例资料的提取具有这样的特性,在理论归纳中同样具有主观的选择。实证研究中自认为是客观、中立的理论概括,无不受到宏观理论、心理机制的影响。

宏观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机制归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看似依据案例或者数据进行客观归纳,实则是隐含在心中默认为的宏观理论在起作用。例如在公共管理的定量回归分析中,残差项的定位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宏观理论对研究者的影响:当数据与既定的理论框架不相符的时候,如果认可理论框架,则将其作为残差项,认定为偏差;如果不认可理论框架,则将其作为重要变量视为证伪。

实际上,不仅仅理论创造者受到这种主观心理、潜在宏观理论的影响,理论的传播与壮大的

过程也深受这种宏观理论、心理机制的影响。这是心理学的一个著名机制——阅读即猜测,阅读是读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与阅读文本进行比对的过程——的特殊表达,它的背后还蕴藏着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机制:人们在阅读一个文本或了解异域文化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框架与该文本或文化进行比对,并把自己头脑中的框架作为理解该文本或文化的基础^[15]。无独有偶,苏力也进行了相同的表达:一个理论之所以能够被传播和接纳,重要的不是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而在于理论与传播中的文化相契合的程度。他以社会契约论的产生、传播和接纳为例,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7]。这种理论产生、传播过程中的主观建构性已经为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人们的左脑具有阐释功能——一种能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来解释事件的机制^{[28]844}。阐释机制编织或者挑选了与情况相配的故事,让人觉得是自己有意识采取了表现出的行动。

二是理论建构表述中深嵌情感的成分。公共管理实证主义者一定深信自己的研究是理性和客观的,超越了传统规范研究单纯宏大的理论叙事。但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中同样深嵌情感等感性、主观的成分。福尔加提出情绪浸润模型,即在个体学习、记忆、注意和联想等一系列认知过程中,情绪有选择性地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甚至成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个体认知结果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29]。情感可以使某一前提凸显出来,从而使个体更偏好这一前提所得出的结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研究更进一步,他指出概念的心理效价对我们的认知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30]。这就是法律经济学上普遍所认为的“确认偏见”——即使证据不支持偏见也将其解释为支持偏见^{[31]52}。笔者在前期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非常有趣的现象:情感的认知和影响甚至浸染在概念的语词选择上,环境保护主义者之所以放弃“滩涂”和“沼泽”的概念表述,而代之以“湿地”,主要是前者包含着太多负面的情感因素,而后者则与我们希望倡导的环保新理念联系在一起,不会触发我们既有认知中的负面情感^[32]。因此,只有理性与情感共同作用,才能产生完整的或者说正确的意志行为。

3 机制结论的内在缺陷

机制提炼中的困境意味着机制挖掘的过程已经被“污染”了,其中蕴含着不全面、不客观甚至不正确的成分。而公共管理实证主义机制挖掘的危机远不止于此,机制结论也具有内在缺陷,这种机制结论的内在缺陷对机制挖掘而言,同样需要我们警惕。

3.1 理论结论的情景化被选择性删除

绝大多数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者都试图提炼出一种更直接、更简约的结论性知识或者理论。这是因为在结论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简约性的结论更感兴趣。而如果结论附加了复杂的情景说明,这种“拖泥带水”的呈现则在传播过程中毫无优势可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之所以被演绎学派打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前者太注重历史情节和结论的叙述氛围,而后者则提炼出不加约束的模型和结论。简约的理论和模型更有利于教授、传播,也便于人们的记忆,更便于人们思考的惰性。公共管理知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框架、理论、模型三者做了区分和界定,哪怕更为系统和详实的模型——“对一套有限的参数和变量做出精确的假定”^{[33]254}——也仅是在理论的基础上注重参数的解释,极力避免自己陷入情景化的描述中。

因此,最终呈现出来的机制理论结论是不展现情景的。为我们广而周知的“行政发包制”“锦标赛理论”“项目制理论”等公共管理理论也概莫能外。近年来,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等公共管理学科核心期刊上的实证文章,更愿意用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概念作为主标题,从而彰显自己的理论发现。在机制理论的传播过程中,也会刻意剔除理论提取的情景。但是当我们拿着一个剔除了情景化的机制理论结论时,我们无法洞悉这一理论是在何种情况下获知的,从而也就难以把握这一机制理论结论在何种情景下是最适用的、在何种情景下是难以普及的。张静对实证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情有独钟,指出案例研究的优势之一,是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从而实现从故事中获得知识^[34]。但是不可否认,哪怕是基于案例情景提炼的机制理论结论,人们在接受和使用后,也很少有人返回去重温机制理论获取的案例情景。案例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从故事中获得知识”,获得一般性的、能够套用一切情景的机制理论和知识。机制理论结论的情景化一旦被剔除,实证主义所津津乐道的、自鸣得意的高于规范研究的地方,也就岌岌可危了。因为两者最终都指向了教条化的、没有任何伸展柔性的刚性理论。本特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概括了案例研究的五个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一般性的理论知识(不依赖于情境)比具体的实践知识(依赖于情境)更有价值”^[35]。这使得公共管理实证主义所安身立命的机制挖掘面临质疑甚至否定。

3.2 理论结论的条件约束被概推冲动所忽视

将自己的研究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刻意限制自己研究的适用范围,是每一个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者的学术抱负。以往的案例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案例概推的逻辑问题,并对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探讨,但是概推性难题依然“就像一团乌云永久地盘旋于每一项案例研究之上”^{[36]164}。这种机制挖掘中结论运用的概推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实证研究的案例分析之中,同样涉及所有的研究类型。案例分析的概推问题仅仅是关注“个别能否到一般”的归纳逻辑问题,而机制结论的实用性,还涉及条件约束的问题。

在传统的逻辑中,主要的辨析对象是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形式逻辑受到一股反思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认识到单纯依靠形式逻辑进行论证的不足,从而构建了一种与之相对的逻辑认知:非形式逻辑^①与形式逻辑局限于演绎与归纳不同,非形式逻辑增加了引导。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逊对演绎、归纳、引导三种推理进行了归纳并阐明了背后的逻辑^{[37]311-331}。

不同于演绎和归纳,引导所强调的论证重在凸显结论的条件,即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或者错误的结论,我们对结论的正确认识是,将结论成立的前提(假设)明确出来,并探究哪些条件的变化使得结论得到加强或者削弱。非形式逻辑也称为批判性思维,其明确提出了结论约束条件的类型主要包括四种:假设、加强、削弱和评价。“假设”的本质是机制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它最为基础,关涉机制推理和结论的适用范畴和前提条件;“加强”和“削弱”则让人们认识到任何的机制推理都不是对理论结论“非黑即白”的“审判”,它至多增加或者减少结论的可靠性,因此我们对机制结论应该秉承一种开放的心态;“评价”实质上是“加强”与“削弱”的整合,它使

① 当然,非形式逻辑并非这一逻辑认知的唯一名称。批判性思维、自然逻辑、实质逻辑等都是对这一逻辑认知的指称。

得人们能够寻找到机制推理和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的关键点。

实际上,鲜有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者对机制结论的条件加以考量,往往秉承演绎逻辑的思路,将机制结论作为一种完全理性、不加条件约束的理论予以采纳和运用。换言之,对于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研究者而言,重点是提炼理论概念,至于理论概念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则往往被认为无关紧要甚至忽视了。这对于我们更为系统和深入剖析机制结论并不有利。

3.3 理论结论的周延性与饱和度(排他性)无法测量

机制挖掘的结论指向一种可能的结果或者路径,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其他的可能结果或者路径。然而在适用机制结论的时候,不管是研究者,抑或接受者,都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作为唯一的结论而加以认知。实际上,很多机制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仅仅指出了一种可能,其目标是启发人们关注一些忽视的因素以及路径。例如赵鼎新在评价库再用伪造偏好理论来说明苏联垮台时,就指出了机制结论运用的这一症结:库再仅仅是关注了组织内部集权带来的噤若寒蝉给予组织的打击,但是忽视了苏联的垮台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严重的民族问题、僵化的经济体制、衰退的军事实力、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沉重负担、戈尔巴乔夫的失误都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库再的因果机制研究难以服众。库再研究的意义不是在于确定了某种确定的原因,而是启发了人们思考的新方向,确定了一个新的思想分析维度,或者将一个大家忽视的因素呈现在人们面前^[38]。

但是,机制结论的这种周延性或者饱和度、排他性无法得到检验。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者在得到基于自身推演逻辑的结论后,并不关心这一结论是否是唯一的,是否还存在其他竞争性的结论,而更关心自己这一结论的内部逻辑自洽性。从整体上而言,大量的机制结论共生带来以下的困境:在公共管理领域,随着对各种社会机制了解增多,我们对整个社会和政府运作的了解不但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提高,还经常会因为学者们放大符合自己个性或者价值观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而影响对政府、社会的整体理解。这可以被称为机制研究的高度灵活组装性。实际上,每个机制结论的不周延不仅带来上述困境,还使得机制结论越来越“盆景化”。实证研究的机制挖掘,聚焦微观视域与中层理论,放弃宏大的理论叙述,使得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部分的机制结论都呈现出“盆景化”的特性。

4 化解机制挖掘困境的出路

诚然,机制挖掘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研究应该完全放弃机制研究,而转向单纯的宏大理论叙事,或者进行不包含理论概括的微观描述。默顿的中层理论尽管在西方社会科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是它依然不失为一种“最不坏”的研究范式,也是公共管理研究区别于哲学研究(注重宏大理论叙事)、历史研究(注重微观情景描述)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标志。因此,我们总结、概括公共管理研究的机制挖掘困境,是为了深化机制研究、弥补机制挖掘的研究不足,从而使得公共管理的机制研究更为系统、深入和富有智慧。那么,如何化解机制挖掘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尽管公共管理研究的机制挖掘困境需要从机制提炼本身和机制结论运用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但是其困境的化解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机制提炼过程中的谨慎理论概括,反对僵化适用机制结论的扎根结论情景,以及更富有智慧的提炼约束前提。

4.1 谨慎理论概括

如上所述,与侧重单纯注重资料梳理和情景描述的历史学、人类学不同,公共管理的实证研

研究者更注重从资料中进行理论概括和机制提炼,从而得出一个更为一般性和广延性的理论结论。如果失去了理论概括的特性和内源动力,公共管理研究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性。但是在机制提炼过程中存在“从微观个体上升为宏观机制的逻辑不周延”“因果链条的隐蔽性和多重性”“从具象到抽象脉络提炼的主观选择和判断性”等多种困境。这些困境要求公共管理研究者应该对深以为傲的理论概括秉承一种更为谨慎、更为敬畏的态度。实际上,公共管理的众多机制研究,其问题的致命之处往往不在于没有理论概括,而在于充斥着大量不严谨的、随处可见的理论概括。案例研究者对概推问题的探讨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或个例)的回应和担忧,但实际上案例概推问题仅仅是机制研究中理论概推的一个代表,在所有的机制研究中都存在过度理论概括的问题。

质言之,在以往的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大家更多的是关注有没有进行机制提炼、理论概括的问题,但是对过度理论概括缺少应有的关注。过度的理论概括存在从微观资料到理论观点的逻辑不严密、从微观资料到理论观点的跨度过大、从微观资料到理论观点的信度效度不高等问题。过度理论概括的问题需要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者以谨慎和严谨的态度对待理论概括,要洞悉从微观资料到机制提炼的理论之间存在众多的沟壑,这些沟壑的存在很可能使得自己的机制挖掘失去应有的理论价值。有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开始前便注意到谨慎概括的问题,因此注重通过理论与案例之间的对话使机制分析更加有血有肉,也通过扩展性案例、总括性案例实现多案例的理论概括。因此,在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机制提炼过程中,坚持理论概括的宗旨,应该对理论概括时刻保持谨慎、心存敬畏,唯有如此,才能将理论概括的“污染”降到最低。诚然,我们无法排斥完全的理论概括“污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任这种污染横行。诚如格尔兹做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使不存在完全无菌的环境,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下水道里做手术^{[39]89}。

4.2 扎根结论情景

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机制挖掘,目的是提炼出简洁、简约且易于传播的理论。当人们注视某个实证场景的时候,人们提取的是场景的意义或要点,而不是其中大量变化着的局部细节^[40]。但是一旦这种理论被简单化、教条化、模式化,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机制挖掘的深层危机,结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学问在公共管理中大兴其道。

当然,完全剥离了情景的模式化机制结论并不可取。社会学的一些实证研究者也指出,即使是叙事社会学或叙事实证主义推崇的讲故事方法,也需要对情景及其效用进行挖掘。实际上,近年来案例研究开始在公共管理研究中逐渐受到推崇并大兴其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案例研究方法的长处正是在于其可以解释复杂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假定存在的联系,可以深描所处的现实生活场景^{[41]18}。这也说明公共管理的机制挖掘者们已经意识到,需要结合结论的情景去普及和认识机制结论。

诚然,扎根情景将使得机制结论显得臃肿而不具有理论冲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也许是公共管理研究彰显自己学科特性和学术智慧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社会异质性愈发凸显。因此,不管是给予研究者还是实践管理者,其重要之处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简约的理论结论,而是这一理论如何推导出来的案例情景,将机制情景呈现给理论接收者,让接收者洞悉这一理论概括背后的现实情景和推演逻辑,这可能使得机制研究

更富有学术智慧。

扎根结论的情景将使得机制挖掘的过程和结论更富有可讨论性、可辨析性。将实证分析的每一个过程、资料、案例情景都呈现给读者,可以使读者对机制的因果关系、结论适用提出自己的质疑甚至否定,从而也有利于理论创造者和接受者开展更为深入的对话,也使得两者处于一种更为平等的对话平台。当然,扎根结论的情景,也意味着打破了公共管理实证研究单纯注重自己内在理论分析框架的惯习,对其内在的分析逻辑周延性提出了挑战。它需要研究者将一些更为“枝叶”甚至无关紧要的案例情景资料一并呈现给读者,可能打破以往案例分析中强调分析框架与案例情节在逻辑上的丝丝入扣。这将使公共管理实证研究的思维和范式得到重塑。

4.3 提炼约束前提

与扎根结论情景一脉相承的是,将机制结论的约束前提呈现给理论接收者。实证研究的机制提炼有赖于具体的案例情景,也蕴含着特定的约束条件。质言之,聚焦于机制挖掘的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与侧重宏大理论推演的规范研究相比,更注重自己理论的微观视域和推演逻辑的相互嵌套,从这个意义上看,实证研究的机制挖掘本身就蕴含着约束自己的适用范围。诚然,一个再严谨的理论概括者也渴望自己的研究结论能够适用更多的范围、范畴和类型,这种诉求无可厚非,甚至是激发理论创造的原生动力。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来自理论概推的动力和适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所有的错误也都来自理论概推,来自力图建立在某一个范围、范畴、领域的理论结论概推到它并不适用的地方。因此,在不能完全否定理论概推的前提下,减少理论概推错误的出路就在于将理论成立的前提概括出来,一并呈现给理论接收者。

毋庸讳言,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理论的臃肿性、损害理论的简约性,相当于设置了快速传播理论的门槛甚至障碍。我们认为这种设置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对于理论创造者而言,它时刻提醒自己需要约束理论概推冲动,要明确理论的适用边界,从而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甚至和自己观点相反的理论)置于一种可以对话的状态;对于理论接受者而言,它设置了必要的接受门槛,也增加了思考的成本和必要性,将使其在理论接受时更富有智慧、思考,而不是机械和教条的接受。

提炼机制结论的约束前提,不管是对理论创造者,抑或理论接收者,都需要秉承这样一种批判性思维:在结合理论案例情景的基础上,概括出自己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即自己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概括出哪些因素的增加(或者减少),能够加强(或者削弱)自己的机制推理链条或者结论本身;概括出哪些因素或者节点是评价自己的理论成败的关键点;概括出自己的理论和其他理论相冲突的地方。当这些约束条件被设置和提炼出来的时候,机制结论的适用范围、内在逻辑甚至天生缺陷也就随之呈现出来。

5 结语

随着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界。近年来,公共管理的案例研究也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案例研究在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中再度兴起并得到新发展,为机制提炼和检验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方法支撑。反过来,案例研究的兴起也助推机制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得以不断拓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案例研究拓展了机制研究的相关方法和路径,例如小样本案例分析中的过程追踪法已经成为挖掘因

果机制的重要手段^[42]。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机制提炼成果,例如张海波等从应急管理的目标、结构、过程三者共同作用挖掘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从而构建了目标、结构、过程三者各自的作用机制,进而呈现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关系^[43]。可惜的是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公共管理的很多研究冠以“机制”之名,但是并没有进行机制挖掘,更遑论能够洞悉其中的深层机理。另外,哪怕是带有“范式转移”的优秀实证主义机制研究,在助推公共管理研究深入的同时,也需要我们把握其内在的不足,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入、系统和富有智慧。

诚然,机制挖掘、机制解释的社会科学分析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思,比如赵鼎新对社会学的机制解释局限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3],这是近年来社会学界的实证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思。相比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公共管理学科还处于一个从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过渡和完善的过程,其机制挖掘还在成长,因此,公共管理学界也鲜有学者对机制挖掘本身的局限性和系统性缺陷展开深入探讨。但是这并不妨碍公共管理学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机制挖掘和解释的反思,从而在推进实证研究时使自己的研究更严谨、更富有智慧。上述公共管理机制挖掘的内在困境具有多元维度:既有机制挖掘本身的症结,也有因研究者的不规范而放大问题的症结;既有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通行性,也有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不管如何,将这种困境降低到最低,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的课题。因此,可以建立两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范式对公共管理机制挖掘进行反思。

第一,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机制挖掘,需要统筹实证主义和其他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研究是公共管理研究至关重要的研究范式,但是它一定不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四种不同的哲学观: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后经验主义^[44]。随着实证主义逐渐推广,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开始对其不足展开反思,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等其他研究范式实际上都是对实证主义的反思甚至否定,尤其是后经验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倾向。其他研究范式的兴起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科价值多元化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考,同样也时刻提醒我们:以机制挖掘为核心的实证主义一定不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唯一出路和归属。

第二,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机制挖掘,需要统筹理论简约和理论适用之间的关系。一个简约的理论更具有传播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论相对于现实(事实)的魅力,就在于对现实(事实)的抽象、提炼和简约。简约的规则被“奥卡姆剃刀”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已经成为所有理论概括和研究的“金科玉律”。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论的简约也影响到了理论的适用性、解释力,以及对人们智慧的启迪。谢宇概括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三个基本原理: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景原理^[24]。这三个原理对于公共管理机制挖掘同样适用,尤其是社会情景原理,与本文所提出的机制约束、扎根情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机制挖掘在追求理论简约的基础上要建立另一个与之相反的约束原理,从而实现平衡。

诚然,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实证研究而言,有关机制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力推进机制研究,探究因果关系,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聚焦和推进的主题。笔者对此予以支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亟需对机制研究的内在价值、内在缺陷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探究。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公共管理机制研究深入发展,促进中国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研究健康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为构建“中国话语、中国学派”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特·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黄建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M]. 冯韵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3] 何艳玲. 问题与方法: 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 政治学研究, 2007(1): 93-104.
- [4] 侯志阳, 张翔. 作为方法的“中国”: 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4): 126-136.
- [5] 沃野. 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J]. 学术研究, 2005(4): 41-47.
- [6] A·F. 查尔默斯. 科学究竟是什么(第3版)[M]. 鲁旭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7] SALMON W C. 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 [8] BECK L M, BRYMAN A, LIAO T F.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M]. Washington D. C.: Sage Publications, 2003.
- [9] 邱德钧. 为什么聚焦于因果关系?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4): 37-43.
- [10] HEDSTROM P, SWEDBERG R. Social mechanisms[J]. Acta Sociologica, 1996(3): 281-308.
- [11] 乔恩·埃尔斯特. 心灵的炼金术: 理性与情感[M]. 郭忠华, 潘华凌,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HEDSTROM P, SWEDBERG R.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3] 赵鼎新. 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J]. 社会学研究, 2020(2): 1-24.
- [14] SIMON H A. 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6(1): 53-67.
- [15] 李文钊. 因果推理中的潜在结果模型: 起源、逻辑与意蕴[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1): 124-149.
- [16] 刘润泽, 巩宜萱. 回顾与反思: 定量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滥用[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1): 152-158.
- [17] 于文轩, 樊博. 公共管理学科的定量研究被滥用了吗? ——与刘润泽、巩宜萱一文商榷[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1): 159-166.
- [18] 臧雷振, 徐榕, 陈香妤. 从规范化理念到规范化实践: 透明度视域下案例研究方法新突破[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5): 100-113.
- [19] 赵鼎新. 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J]. 社会学研究, 2018(1): 17-40.
- [20] 大卫·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1]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韩林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2] CARL M.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Menger[M].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ress, 1934.
- [23]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4] 谢宇.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2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5] 蒙克, 魏必. 反思 QCA 方法的“时间盲区”: 为公共管理研究找回“时间”[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1): 96-104.
- [26] COLEMAN J S.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6): 1309-1335.
- [27] 苏力.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42-55.
- [28] M·S. 加扎尼加. 认知神经科学[M]. 沈政, 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 [29] FORGAS J P. Mood and judgment: the affect infusion model[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1): 39-66.
- [30] KAHNEMAN D.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Review, 2003(5): 1449-1475.
- [31] 理查德·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第7版)[M]. 蒋兆康,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 [32] 王刚. 环境治理新概念引入的价值与限度[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146-151.
- [33] 保罗·A. 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M]. 彭宗超, 钟开斌,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34] 张静. 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8):126-142.
- [35] FLYVBJERG B.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 research[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6(2):219-245.
- [36] FEAGIN J R, ORUM A M, SJOBERG G.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M]. *Pembrok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 [37] JOHNSON R H.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0.
- [38] 赵鼎新. 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J]. 社会学评论, 2020(6):3-18.
- [39]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40] BERBERIAN B, GINHAC C S, CLEEREMANS A. Action blindness in response to gradual changes[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10(1):152-171.
- [41]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M]. 周海涛, 史少杰,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4.
- [42] DESSLER D. Beyond correlations: toward a causal theory of wa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3):337-355.
- [43] 张海波, 童星. 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4):64-82.
- [44] 殷杰. 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3):26-38.

Is Mechanism Mining Feasible in Public Management Empirical Research?

WANG G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mechanism mining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rise of public manageme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ts “scientific” appeal, which means a great progres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However, mechanism mining has congenital defects, 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wo aspects of mechanism extraction and mechanism conclusion. The inherent dilemma of mechanism extrac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logical inextensibility of ascending from micro-individual to macro-mechanism, the concealment and multiplicity of causal chain, the subjective choice and judgment of abstraction from concreteness to abstraction.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mechanism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is selectively deleted, the condi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are ignored by the impulse of generalization, and the ductility and satu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cannot be measured. The way out of mechanism mining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lies in cautious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aking root in conclusion scenario and refining constraint premise. It is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public management to clarify the shortcomings of mechanism mining and solve them.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 empirical research, mechanism mining, causal relationship, theory scenario, hypothesis premise

责任编辑: 牟 怡

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

——兼论公共管理学发展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郑家昊

(陕西师范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学的恢复发展,公共管理学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治国理政之学,天然地具有对安全的关切,其安全担当因治理的复杂性而不断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体现在“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内向安全涉及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身份认同问题,外向安全涉及公共管理学的治理功能发挥问题。发展至今,公共管理学依然面临“身份危机”,同时也要应对“西方中心主义”诱致的教育安全风险。要化解身份危机必须校准认知和注重创新,充分认识公共管理学是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要推进教育安全风险治理必须站稳“中国化”的原则立场,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法,采取“大历史观”的研究视域,推动“安全教育”的全过程实施。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安全向度;身份危机;教育安全;西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42-10

学科是现代科学创新发展和知识演化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近代以降,现代科学因应社会发展与治理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出现了学科分化与丰富化的壮丽景象。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是现代科学创新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被誉为“治国理政之学”。回溯公共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学界前辈和同仁的不懈努力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共识及话语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公共管理学的高质量发展是以坚守“安全底线”为前提的,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必须得到重视。聚焦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对公共管理学的安全意蕴、安全担当以及安全风险进行系统化分析,将有助于公共管理学的安全观生成,进而更好地发挥治国理政之学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安全和稳定问题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进一步彰显,公共管理学的安全责任更为凸显、安全担当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对公共管理学的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安全风险进行学理性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内向安全”和“外向安全”两个维度建构诠释公共管理学安全向度的研究方式,识别其内、外安全风险并提出安全治理的建设性方案。需要说明的是,寻找和诠释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项研究可以看作是此项工程开工的“问路石”,希望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安全发展的共识更新,唤起更多学者对公共管理学安全向度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为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合作治理的逻辑理路及创新路径研究”(2022ZYRZ10),项目负责人:郑家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重大风险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及引导研究”(22JZD028),项目负责人:尚虎平。

作者简介:郑家昊,男,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发展和作用发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 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关切

从历史角度来看,“利害关系”在人类生存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着“元关系”的功用,“趋利避害”是人类生存、繁衍和文明演化的根本法则。如果在安全的战略意义上审视,“利害关系”可以表达为“安全与风险的关系”,“趋利避害”可以转译为“趋安避险”。自古以来,安全需要是人类最为基础的需要。人类对安全的渴求与追寻与日俱增,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所处社会的复杂性以及风险的多样性持续增加所引致的。当面对愈益复杂的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风险时,人类必然会通过化简的方式来应对复杂、运用防范的办法来化解风险。

无论在哪里,问题都是科学发展的动力^{[1]42}。为了将确定的环境与安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人类付出了许多科学化的努力。尤其是进入近代,研究者不懈探索中,基于问题意识、运用分析思维,促进了相关知识的积累、演化、传播和应用,促进了现代科学中学科的分化与多样化。从服务人类寻求确定的环境和安全的状态这一目的来看,现代科学中的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可以被归为“趋安避险之学”的行列。公共管理学也属于这一行列,它“是一门治国理政之学,是一门主要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2]。

在公共管理学的问题意识和知识体系中,始终包含化解风险、达成安全的内容,这些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涉及公共管理学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另一类涉及公共管理学维护安全的功能发挥^①。其中,第一类是公共管理学“内向”的安全,第二类是公共管理学“外向”的安全。公共管理学的内向安全是外向安全的基础,外向安全有助于巩固内向安全。相较于内向安全,公共管理学的外向安全更加为人所熟悉。因为,内向安全主要涉及学科存在的合理合法问题,大多只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才会关注和解答这一问题,而外向安全主要涉及安全治理(如治安防控、安全监管、应急管理),是公共管理学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方面,与人们日常生活与切身安全利益高度相关,故而备受人们关注。

从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国家安全”表述来看(见表1),以党的二十大召开为界标,在此之前,公共管理学承担着安全担当,安全问题一度被“公共管理化”。概括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至世纪之交,虽然“国家安全”主要被纳入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范畴,但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直是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实践旨归。自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政府职能体系的内容从“两位一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扩展为“四位一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

^① 公共管理学内蕴对安全的长期关注,但是以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则是一种全新尝试。笔者从安全的内外两相出发,将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分为内向安全(事关公共管理学存在之合理合法的安全形态,接近于“safety”所含的安全意指)和外向安全(事关公共管理学作用之发挥的功能性安全形态,接近于“security”所含的安全意指)。值得一提的是,安全就像光谱一样,本身是一种连续统一体,这也决定了内向安全和外向安全很难绝对区分,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叠加、相互作用、互相转化的关联关系。比如,根据笔者的界定,教育安全是公共管理学的外向安全的一种形式,但是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人的教育”问题也涉及育人的知识体系、学科定位问题,这些问题与内向安全息息相关。笔者认为这种质疑具有建设性,有助于人们把握“教育安全”的完整含义,但是笔者在本文中主张“教育是公共管理学育人功能发挥的体现”,因此将“人的教育”问题纳入外向安全的范畴,但是并不否认“人的教育”问题中的安全风险深刻影响到内向安全

后,直至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直属于“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范畴^①,是公共管理学重点关注的议题。

表1 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国家安全”的主要表述

历次党代会报告	“国家安全”的主要表述	归属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加强国家安全工作,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社会管理 (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管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	社会管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在“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论述“(七)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专章论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该报告的第11部分专章论述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明确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公共管理学的经典议题,同步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从而改变了过往将“国家安全”纳入“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情况,出现了管理问题“国家安全化”的趋势或迹象,公共管理学的安全意蕴变得更加丰富,未来很长时期公共管理学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更好地履行责任担当。

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世界格局剧变和社会治理复杂性陡然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安全涉及的领域十分庞杂,安全的达成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然需要多元学科交叉融合来提供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智力支持。每一个学科就如同一个“透镜”,“通过不同的透镜,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它们都真真切切地在那里,而每一种观察方式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尤其是当我们面临混乱不堪、纷繁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局面时,观察的方式越多,效果就越好”^{[3]13}。在国际时局日益复杂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公共管理学对安全的关切将有助于为国家安全提供智识指导,从而发挥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2 公共管理学的内向安全:身份危机及其化解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行政学的恢复,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行政学

^①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社会管理的表述更新为“社会治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是公共管理学的“根”和“源”,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公共管理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可以推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的意旨与性质应该是十分明确的,或者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学的认识已然达成一致。但是,当我们问及“什么是公共管理学”或“如何定位公共管理学”时,回答的声音却有些“嘈杂”,即使从事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对待这一问题时也持有不同的声音。当前,至少流行着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或观点:(1)将英文语境的“Public Administration”直接翻译成公共管理学^[4],将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等同于公共管理学(Public Management)^[5];(2)淡化或搁置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区别,突出公共管理学的“技术属性”,认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应用型学科^[6];(3)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进行区别^[7],承认或主张公共管理学是中国学者创造的全新学问^[8]。以上观点事关“公共管理学”的定位,是对事关公共管理学的本质、性质和身份等“元问题”的不同解答,只不过这些解答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很大,表现出“认识的不和谐”与“立场的不一致”,说明公共管理学的“身份危机”依然存在。

无疑,摆脱“身份危机”是公共管理学统筹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首要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从形成对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认知来着眼。如果理不清公共管理学的定位,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众”地“随大流”——悬置一些认识上的前提,甚至在错误的认知下前行,是不利于公共管理学长足发展的。其实,如果从语词比较、学科发展、学科认同等方面出发审视公共管理学,它的定位和性质还是比较清晰的:公共管理学是中国学者在推进行政学学科发展中建构的一门全新的学问,是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与替代。

第一,从语词和对象的比较来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有区别的,公共行政学是西方学者率先创设的,但公共管理学是中国学者学科创新的成果。在口语化表达中,“行政”与“管理”通常混淆使用、不做严格区分,但是在学术化或科学化的表达中,管理与行政之间是有差异的,管理泛指所有组织的活动,行政一般指的是具有权力势能的组织的活动,管理的外延比行政要宽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发展行政学的时候,行政组织的主体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政府”。政府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权力势能的组织,所以西方语境中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公共行政”就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and 制度问题。纵览西方行政学发展的历程,公共行政学从产生开始就蕴含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导向,因此政府不断地向企业组织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和方法,这种做法经由新公共管理运动达到极致,“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公共管理的问题,而且也有许多学者对公共管理问题做出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并未建立起来”^{[7]1(前言)}。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公共管理问题凸显,但是依然是在所谓的“新的公共行政学”的指导下开展的,并没有生成公共管理学学科。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公共管理”则与“公共行政”不同,是指包括政府在内履行公共事务治理职责的组织的行为与制度问题。“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来有效甚至高效地满足人民多元、多样的需要,是行政活动始终面临的重要挑战和课题。”^{[4]319}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重建行政学的时候,一方面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管理型政府独享治权的治理方式的弊端——这种方式难以实现以有限资源来有效(或高效)满足人民需要的目标,反而容易助长行政傲慢和深陷规模膨胀;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政府引导多元力量协同合作治理的重要性与优越性,开始探讨政府通过服务角色的履行来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合作治理”之学,逐渐形塑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合作理性”。

第二,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公共管理学是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如果以1996年为分界,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准备期(1980年至1996年)和成长期(1996年以来)两个阶段。在准备期,行政学的恢复和发展是在“行政管理”的名称下进行的,当时的“行政管理”与西方使用的“公共行政”意涵大致相同,行政管理专业主要面向党政机关培养人才。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增加了管理学这一新门类,下设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5个一级学科,行政学(行政管理)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学科的范围得到拓展,行政管理成为公共管理下名列首位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这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对成熟及其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6]。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得以启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开始生成。此时的公共管理学已经在汲取西方公共行政学营养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发展,旨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提供高层次、应用型专业管理人才。因此,“公共管理学是一门诞生于世纪之交,综合运用社会治理知识来对公共管理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科学”^[7]。

第三,从学科认同上来看,不能将公共管理学简单归入“跨领域的应用型学科”。相较于政治学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属于新兴的学科,而且因为“管理”的应用性与复杂性,使得公共管理学的应用性及跨领域的特点格外明显,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对公共管理学的认识偏见,习惯性地从“器”与“用”的角度出发将公共管理学看成是应用型的学科,而忽视了公共管理学的“道”与“体”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实质上,真正的问题所在并非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理论科学之争,而是属于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还散化在各种事实之中,而未能得到一般化的建构,公共管理学科消除学科形象被误解的根本之策,恰在于回到基础理论之境,在学科一般化问题建构上取得里程碑般的突破。”^[8]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既紧密相连又有十分明显的区分。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产生,离不开公共行政学提供的知识学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在借鉴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学不再像公共行政学那样限定于对政府的专门研究,而是要把一切参与社会治理行动中的因素都纳入自己的视野,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切新生的、对社会治理有影响的因素,都加以认识和分析^[7]¹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看待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区别与联系时,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两者的联系,进而淡化两者的区别,甚至基于中国行政学向西方“补课”的经历,而判定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学者创设的,这是深受“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影响的错误认识。中国高校正在加快发展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需要辨清这种错误的认识,摒弃以公共行政学发展公共管理学的思维,拒绝简单移植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操作方案,进而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场景来推动公共管理学创新发展,让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成为世界话语体系中富有影响力的创新话语。可以说,扎根中国治理情境的创新发展是公共管理学的生命线,也是公共管理学摆脱“身份危机”的不二法门,当然这种行动的科学性也离不开行动者对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认知。

3 公共管理学的外向安全:以教育安全为视角

公共管理学的外向安全涉及安全治理的各种各样应用场景,“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

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9]⁸。然而,以上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是人的安全问题。“要解决‘人的安全’问题,最关键的是教育问题。因此,应该关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教育安全……因为在对各类‘安全’的关注中,人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需要在‘国家安全’的各种问题上更重视人的问题和人的教育问题。”^[10]

教育安全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既与传统安全联系在一起,又和非传统安全联系在一起。“教育安全概念本身即包含所有因各类教育因素和教育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制约国家或地区安全的问题。”^[11]教育安全的重要性也是因教育的特质及其重要性所决定的,“教育的实施通常会在无形的、模糊的、思想意识深层的、甚至是危险的状态下发展,如果没有危机感和安全意识为警示之钟,则因教育的失误而铸成的大错将在所难免、难以挽回,并会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10]。公共管理学培养的人才多从事治国理政的相关管理事务,所以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较之其他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安全”是公共管理学学科自身发展与安全所要实现的目标,同时也是其治理功能的结果体现,事关政治安全。

在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对公共管理学术研究进行反思的文献,但是鲜见对“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的专门研究。为了识别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风险,笔者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分析。因为,从现行高校教育体制来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可以综合反映出研究生培养质量以及该生在校期间接受的教育水平,尤其是从论文“理论基础”的选择及使用方面,可以窥探出公共管理学教育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

鉴于此,笔者以中国知网的学位论文库为数据源,以“学科名称=公共管理”开展检索(截至2022年6月30日),选择学位授予年度为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①,共检索得到论文9743篇,剔除主题词与“公共管理”无关、留学生论文以及缺少理论基础的论文,共获得有效数据7950篇。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基本上都聚焦于中国问题,共使用了6432种理论,使用频次排在前100的理论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直观地分析出:只有“服务型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余的理论几乎均为国外的理论。通过对以上理论之于研究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还存在如下问题。(1)理论与研究“两张皮”的现象。比如理论基础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仅作为论文呈现的必要“摆设”。(2)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现象。比如对西方理论直接拿来主义,在不辨清适应前提的情况下来分析中国现实。(3)对理论认识和表达方面失准。比如“新公共管理”作为理论更多的是“理论集合”而不是某一种理论,但是研究生在使用它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笼统地将其归为一种理论。可见,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教育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2016年至2021年期间毕业的部分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开始习惯以西方的思维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尝试以西方的标准评价中国实践。

^① 这一时限包括“十三五”期间以及“十四五”实施第一年,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规范、水平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且与当下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水平相近。

表2 2016—2021年公共管理学(学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基础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1	新公共服务理论	737	26	政府职能理论	96	51	应急管理理论	50	76	公共管理理论	35
2	新公共管理理论	560	27	协同理论	89	52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50	77	财政分权理论	34
3	公共产品理论	499	28	双因素理论	87	53	风险社会理论	48	78	有限政府理论	33
4	治理理论	423	29	善治理论	75	54	资源依赖理论	47	79	区位理论	33
5	协同治理理论	283	30	税收遵从理论	75	55	无缝隙政府理论	47	80	公平正义理论	33
6	可持续发展理论	276	31	社会支持理论	73	56	公众参与理论	46	81	扎根理论	32
7	委托代理理论	259	32	公共服务理论	71	57	公共财政理论	46	82	政策执行理论	31
8	人力资本理论	254	33	制度变迁理论	70	58	议程设置理论	45	83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31
9	公共治理理论	230	34	计划行为理论	69	59	博弈理论	45	84	网络治理理论	30
10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208	35	政府失灵理论	66	60	政府规制理论	44	85	社区治理理论	29
11	公共选择理论	204	36	危机管理理论	66	61	推拉理论	43	86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28
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184	37	绩效管理理论	64	62	合作治理理论	42	87	社会嵌入理论	28
13	利益相关者理论	179	38	教育公平理论	63	63	系统论	41	88	积极老龄化理论	28
14	多中心治理理论	178	39	目标管理理论	63	64	社会冲突理论	40	89	政府监管理论	28
15	公共物品理论	175	40	政策工具理论	63	65	社会保障理论	39	90	胜任力理论	28
16	需求层次理论	165	41	责任政府理论	62	66	流程再造理论	39	91	多元治理理论	28
17	服务型政府理论	160	42	生命周期理论	62	67	协商民主理论	38	92	集体行动理论	27
18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138	43	社会治理理论	62	68	公民参与理论	38	93	资源配置理论	27
19	市场失灵理论	130	44	期望理论	59	69	交易成本理论	38	94	社会网络理论	27
20	整体性治理理论	129	45	产权理论	57	70	公共利益理论	38	95	政府管制理论	26
21	激励理论	125	46	福利经济学理论	57	71	社会公平理论	38	96	政府绩效评估理论	26
22	社会资本理论	105	47	博弈论	54	72	顾客满意度理论	37	97	增长极理论	25
23	外部性理论	101	48	政府干预理论	54	73	寻租理论	37	98	三螺旋理论	25
24	风险管理理论	99	49	公共政策理论	51	74	府际关系理论	37	99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25
25	公平理论	97	50	系统理论	51	75	社会交换理论	36	100	福利多元理论	25

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风险主要是由“西方中心主义”诱致的。西方现代性政府理论话语中蕴含“西方中心主义”，它试图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实施观念、价值、思维和话语等方面的规训，进而阻碍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地建构和创新本土化的政府理论话语^[12]。在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准备期，中国行政学经历了向西方行政学学习借鉴的过程。在这一时期，西方行政学论著通过译介形式被大量引入中国，后来成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文献。我们不否认这些译作的借鉴与指导价值，但是译作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为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带来了“向西看”“理论不自信”等很多不利的影响，使中国公共管理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面临有“众声喧哗”却没有中心音调的困境。

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文明互鉴，推动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国际化交流发展，但也使“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由于西方学者的立场和自恃为‘强势文化’的代

言人,在相对客观的论述和自省中,他们观点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仍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如果在研读上述文献时不注意持有一种时时反思的精神,很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陷阱之中。”^[13]¹³“西方中心主义”诱致的对西方理论的“迷恋”,使得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似乎很难摆脱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思维惯性,而陷入原创性理论不足、习惯于选用可能引起“水土不服”的困境,传递到公共管理学的教育环节,则体现为学生对西方理论的推崇、对中国本土化理论的忽视。虽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上述情形的危害,并做了一些消除危害的积极尝试,但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依然存在,且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风险治理已经刻不容缓。加强公共管理学中的教育安全风险治理,必须站稳“中国化”的原则立场,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法,采取“大历史观”的研究视域,推动“安全教育”的全过程实施。

第一,“中国化”的原则立场。中国化体现的是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治理情境之中的主体性建设过程。中国化的含义体现在两个层次:理论创新的中国化和国外理论的中国化(亦即理论借鉴的中国化)。一方面,在扎根中国治理情境推进研究时应该超越将公共管理学作为“形而下”的“器”学,而应该在“道”的意义上推进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要善于在国际话语系统塑造中国化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同时,避免中国的本土知识和理论成为自说自话的体系从而形成国际沟通障碍。另一方面,在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应当审视国外理论的适应前提,推动国外理论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与发展规律来看,国外理论的本土化越早,越有助于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主体性的彰显。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行政学发展找到印证。“美国行政思想和行政学初期建构阶段,是以引入欧洲尤其是德国行政法学为驱动的,但行政学的系统化则是美国知识界‘操心公共行政研究和思想’的结果。”^[8]伍德罗·威尔逊被尊为“美国行政学之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he 提出了“西方(主要是德国和法国)行政学研究理论的美国本土化”问题——“它(行政学)的目标、事例和条件,几乎都是以外国民族的历史、外国制度的惯例和外国革命的教训为根据的。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与我们的目的相符,必须对它进行调整,使之适合于权力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如果我们要应用这种科学,我们必须使之美国化,不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14]可以看出,威尔逊是在反思法国和德国理论适应性前提与美国的情境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来自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相关理论应该实现全方位“美国化”的主张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贡献,让美国行政学在发展之初便找到了主体化的方向,实现了快速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启示:文明互鉴有助于理论创新,因此要坚决反对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但是以开放的姿态开展文明互鉴时必须守住本土化原则,国外理论的本土化有助于形塑公共管理学的主体性。

第二,“批判性”的思维方法。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批判性的思维方法。“批判意味着反思过去,从而向前走。”^[15]³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批判性的理论建构。前文提到的公共管理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理论基础选择和运用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著文者缺乏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批判性的思维方法,在现实中体现为通过反思某一知识、理论的适应前提

或条件来修正认知。比如,在认识“新公共服务”的时候,就需要围绕“新公共服务是不是一种理论”“提出的背景是什么”“适应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基本的观点是什么”等问题开展反思,这样能够有助于科学化地审视西方理论的适应条件,从而真正立足于中国情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如,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创新时,立足中国情境,反思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产生前提、优势属性等,将有助于把握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意涵及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战略意蕴。

第三,“大历史观”的研究视域。“大历史观”就是在纵深历史长河和宏阔空间背景下开展历史叙事和评价的方法。公共管理学的建构是需要放到人类文明史中去审视的。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视域,就会发现西方的公共行政学仅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朵理论“小浪花”,从而看清它被替代的必然逻辑,也就不会过度将其神圣化或迷信化。在人类文明史的意义上审视公共管理学,也能看到公共管理学产生的历史逻辑,辨明其中国特色,有助于矫正对西方知识和理论的过度依赖。美国行政学者德怀特·沃尔多曾经在演讲中指出,公共行政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为人类文明提供舞台”^{[16]50}。应该说他做出这一论断就具有一种历史的和文明的视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超越简单、机械和片面的科学主义,要认识到公共管理不仅是科学,不仅不能和价值、历史、传统等完全分开,而且在本质也是包含了科学、价值、历史、传统等在内的更大范围和更为整体意义上的文明”^[5]。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审视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也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的王朝治理时期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我们应该挖掘和重视古代中国历代王朝治理的思想精髓,这是西方推进公共行政学发展所不具备的文明优势。

第四,推动“安全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加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安全教育环节有助于实现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安全,因为安全教育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知识与原理的传授,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公共管理学的安全教育包含“国家安全”相关知识的教育,同时也不止于“国家安全教育”。公共管理学学科的课程质量建设应在维护教育安全的前提下展开,加强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专门课程部署,而是要融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培养各环节。

4 结语

如前文所述,公共管理学是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是中国学者做出的重要理论创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必须确保内向安全和外向安全,其中公共管理学实现自身发展与安全是诠释好安全关切和履行好安全功能的前提。当前,几乎任何一门学科(学问)都特别强调研究中的理性精神。一项好的研究必然能够实现基于问题意识的精致叙事和基于反思批判的知识创造。这似乎已经成为一项共识。然而,一项好的研究最为本质的特征不止于理性精神的彰显,更在于爱国精神与责任担当。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生命力或其安全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者的爱国主义和责任担当。未来,我们依然要坚守爱国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初心,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陷阱,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图绘并诠释好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 卡尔·拉伦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M].赵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2] 鲍静. 百岁夏老的光荣与梦想——读《夏书章与中国公共管理学》[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7): 151-152.
- [3] 德内拉·梅多斯. 系统之美: 决策者的系统思考[M]. 邱昭良,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 [4] 李瑞昌. 行政精神: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5] 杨立华. 开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明路径: 新时代的新任务[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9): 94-101.
- [6] 陈振明. 中国公共管理学 40 年——创建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公共管理学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47-54.
- [7] 张康之, 郑家昊. 公共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8] 孔繁斌. 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到核心: 公共管理学科再认识[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9): 16-20.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 [10] 程方平. 教育: 国家安全的基础——关于“教育安全”的思考[J]. 教育科学, 2006(3): 1-5.
- [11] 程方平. 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J]. 教育研究, 2001(9): 35-38.
- [12] 郑家昊. 中国特色政府理论话语创新的历史向度——兼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J]. 行政论坛, 2022(2): 47-53.
- [13] 罗希明, 王仕民. 教育安全论——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域[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 [14] WILSON 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2): 197-222.
- [15] 查尔斯·詹克斯.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 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 [M]. 丁宁,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6] WALDO D. 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view[M]. California: Chandler & Sharp Publishers, Inc., 1980.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Also on the Security Risk and Governance of Public Management

ZHENG Jiahao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School of Politics, Law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ublic management (P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PM is a science of governance, which naturally has a concern for security, and its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is increasing in response to complex governance.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PM is reflected in its “internal security” and “extroverted security”. The internal security involves the subject identity of PM, and the external security involves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PM. Up to now, PM is still facing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has to deal with the educational security risks caused by “western centralism”.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dentity crisis, we must calibrate cogni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realize that PM is the subl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security risks, we must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sinicization, adopt a critical way of thinking and a grand historical view,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security education.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 security dimension, identity crisis, educational security, western centralism

责任编辑: 牟 怡

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内涵演进、 多重张力与范式构建

杨 达,熊雪晖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广义绿色治理包含当前对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等核心价值的关切,在此基础上也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边界。人工智能则伴随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逐步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介入将绿色治理对“人地关系”的思考拓展到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状态的寻觅。人工智能嵌入广义绿色治理的过程中面临“智能代理”的行为责任归属与提升人类行为效果之间、人工智能运用限度与人类自我实现价值之间、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封闭运作”与他者“开放诉求”之间三个方面的张力。面对这三方面张力,需探索可开源治理主体、可持续治理过程、可多元治理手段、可共生治理客体、可分享治理结果的广义绿色治理系统范式构建。

关键词:绿色治理;人工智能;人地关系;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52-12

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新能源汽车、元宇宙、“双碳”等在各大社交媒体屡见不鲜的高频词汇近年来已成为政商学界关注的热点,诸多科技风口元素背后均可凝练交织出绿色发展和人工智能两大重要主题,绿色发展也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创新的关键方位。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推动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工智能在国家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国家理论研究”(20AZZ006),项目负责人:黄其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珠江上游民族聚居区生态振兴与稳定脱贫良性互动机制研究”(21CMZ034),项目负责人:张琳杰。

作者简介:杨达,男,博士,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员,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熊雪晖,女,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研究人员。

略推进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各产业变革,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3]

由此,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绿色发展日益深度耦合的历史进程中,能否从更高维度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绿色治理创新,即能否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绿色治理范式构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如何破解传统意义上西方以科技发展作为主要推动力的资本主义外向侵蚀所造成的“人地关系”张力加剧乃至撕裂。着眼绿色治理或人工智能的某个单一维度,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而将两者结合的交叉思考还不多。一方面,就偏重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的研究而言,庄存波等人把以人为中心、绿色环保可持续等界定为工业 5.0 的核心内容,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应用背景下,如何从保护数据隐私、研发可回收和再利用产品等技术维度来实现上述目标^[4];冯媛媛等人关注到大数据和信息技术革命如何推动治理变革,塑造当下的数字政府治理^[5];张伟等人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可带来环境精细化管理,依托其构建的生态环境智能监管体系提升了跨区域监管效率,以落实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6];加纳(Ghane)等人引入反向概率法来识别河流中污染源的位置和释放时间,并探索其在河网污染源识别中的广泛作用,从而形成提升环境治理能力的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接口^[7]。另一方面,就偏重实现绿色治理的研究而言,师傅认为,人工智能可带来创新和技术外溢并彰显社会领域的绿色治理,即通过催生和加速绿色消费与智能消费,在社会消费环节贯彻绿色协调发展理念^[8];王文军等人认为,人工智能引发的绿色技术革命彰显经济领域的绿色治理,即形成产业发展的低碳化等效果^[9];欧阳康等人认为,高科技智能化技术工具彰显生态领域的绿色治理,即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环境治理实效,以治理技术的智能化助推环境治理现代化,促进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平衡^[10];日本学者立川雅司在日本刊物《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不同领域研究动向(人新世)》则从人与自然及科学技术联动的本源视角,基于关涉“人地关系”的“人新世”这一前沿概念来思考绿色治理,围绕重新审视自然和社会间关系、可持续和治理的再联动、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认知变化三个维度进行讨论。

立足前人研究,本文在定位于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不仅探索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狭义绿色治理,而且着眼“绿色”涉及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等核心价值,探索涉及更宽领域的广义绿色治理,从而尝试拓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边界。也就是说,在注意到科学技术尤能彰显治理现代化的同时,更考虑其应该是彰显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等深度内涵的广义绿色治理。这样的绿色治理不仅关注生态环境,而且布局各个领域,特别还可以通过中国内部良善治理提升、外部治理经验分享的内外联动,形成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与中国道路必将更有吸引力的关键,从而也提升绿色“一带一路”在沿线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参与度。

2 人工智能时代绿色治理的内涵演进

有关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时代的绿色治理,可遵循从狭义到广义的内涵渐进透视。狭义绿色治理可界定为传统意义上关涉生态环境的“人地关系”应对,广义绿色治理则在包含上述核心思

考的同时涉及更宽泛的内容。人工智能时代的绿色治理探讨可着眼前沿科技元素如何进一步革新“人地关系”。围绕科学技术进步、“人地关系”演进,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于2000年首次提出“人新世”(Anthropocene)的概念,意指人类在地球已然进入的新地质时代处于主导地位,且在整个地球,包括从大气到地壳的环境恶化、能源匮乏、物种灭绝等问题上都留有人类的深刻足迹。此概念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成为思考应如何构建绿色治理范式以让“人地关系”更加和谐的重要背景。

2.1 绿色治理的核心关切:身心二元论视角的人地关系透视

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绿色治理,聚焦的关键内容都涉及“人地关系”的本源思考,而从“身心问题”视角加以透视,则能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绿色治理提供新的思考范式。“身心问题”意指人的心灵与身体、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应该呈现何种关系的问题。“身心问题”以二元论为前提,将心灵与身体严格区分,假设一方是被动的身体、物质或客体,而另一方是驱动身体的精神和主体。日本学者大塚善树在《被扩展的心身问题:人新世和人工智能社会的伦理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身心问题”的思考一直存在矛盾之处,即身体和心灵本质上属于不同的实体,那从心灵向身体发出命令如何成为可能?当然,也许恰好可借助上述矛盾逻辑来透视“人地关系”的不和谐根源。

人类与大自然客观处于地球上同一个共生系统,但按照“身心问题”范式来对标考察“人地关系”,便可发现“人新世”背景下所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人类长期以来都将作为“心灵”的科学技术,作用于作为“身体”的大自然及世界。而这会产生心灵和身体的优越性排序问题,发生着从以“身体”为优越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向以“心灵”为优越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反转。以此视角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也可概括为从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这一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向运用科学技术而随心所欲地“榨取”自然、资本化自然这一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变。当然,上述认知的转变可能还涉及更具体的社会伦理或者说更深刻的人类认知问题,即人类对于客观自然如何界定将决定其在“人地关系”中如何借助科学技术得以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地域内的人类主体几百年来与自然的接触,其最初只考虑经济发展而不考虑生态保护便一定会带来“负外部性”。不过,当下的一些介入行为并不能单纯地预知将会带来何种“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这也带来了应该如何准确研判的疑惑。

与此同时,针对介入行为本身而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肯定人类对自然的介入,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则持相反态度。所持立场不同便决定不同群体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伦理冲击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并非所有领域都能“非黑即白”式地简单厘清。比如,会存在通过气候工程来控制气候变化、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旨在修复“人地关系”却可能恶化“人地关系”的案例和认知争论^[11],乃至以减排为目的的环境政策可能反而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的“绿色悖论”也逐渐引起更多关注^[12]。在此,人类中心主义下肯定技术干预、反对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然相悖的观点流派被称为生态现代主义。美国的一个环境研究组织“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发布的《生态现代主义宣言》表明,通过科学技术的介入可以实现“好的、良善的人新世”的目标^[13]。这种介入也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客观世界中已经不存在纯粹的独立于人的大自然,所以从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出发来思考介入自然是可行的。但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研究技术哲学的学者支持的非人类中心

主义观念则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与其他生物物种和无机物共生关系的一个结合点,这是一种认识的极端,即人类和自然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将这种论点命名为生态后人道主义(Ecological Post Humanism),批评人类低估了其自身压制人类以外物种的事实^[11]。无论怎样,“人地关系”内部虽然存在人类依托科学技术介入而产生的矛盾,但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对大自然介入的“人地交互”已成常态,只是尽可能弱化矛盾节点以较充分实现“人地耦合”的动态平衡还尚未实现。而上述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状态的寻觅,便是狭义及广义绿色治理探索的终极治理效果。

2.2 广义绿色治理呼唤:“人地交互”中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趋势

“人地交互”中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意味着人与自然还未达成动态平衡状态的社会系统又增添新的变量,这便需要创新绿色治理系统以有效应对。在着眼“人地交互”时,有学者曾进一步拓展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思考边界,强调科技不再只是人类能力的延伸,其日益发达使自身超越人类并将人类吸纳成为科技系统的组成部分。例如,就汽车运输系统而言,驾驶员只不过是该系统的分支元素,而整个汽车运输系统所涉及的能源采购、基础设施完善、废气排放等环节,都依据其在全球经济框架中自身的再生产和效率提升需求而发生变化^[14]。当然,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认知,即人类完全处于系统之中而无法改变技术系统的自我循环运转,于是系统为了再生产和提升效率则可能不用顾忌废气排放等“负外部性”冲击,甚至通过牺牲自然环境而获取利益。

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很可能让上述极端情况变为现实,“人地交互”会变得更为复杂。具体而言,有关科学技术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可归纳为两种情况。其一,自然 \supset 科学技术(“ \supset ”符号指前者包含的内容范围大于后者),即自然涉及的领域超过了科学技术的边界,人类借助科学技术能够介入的自然仅限于整个自然的某个部分。也正是按此逻辑出发,人类因为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或者借助科学技术所思考的环境对策都是不均等和不平衡的。其二,科学技术 \supset 自然(“ \supset ”符号指前者包含的内容范围大于或等于后者),即科学技术已足够强大而使其涉及的领域完全包含整个自然,或者说已将整个自然同质化,这种变化与生态现代主义所追求的通过科学技术来管理自然是一致的。

就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可能带来深度嵌入人类世界及整个大自然的可能。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是以超级计算机算法为中心、以大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系统,是使用大量数据的算法集合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已得到持续关注,如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旗下的自主与智能系统伦理全球倡议项目于2017年发布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第2版,强调人工智能是智能自主的技术系统、有自我改良能力的技术系统、通用的人工智能、人工超智能等属性^[15]。换句话说,目前人工智能实施行为的目的依然由人类决定的情况在未来很可能由人工智能自我完成。此前人们讨论的更多是人工智能虽可执行程序员的诸多工作指令,但很难依据人类伦理常识加以“道德判断”,即程序员很难给人工智能写出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函数。不过现在不仅涉及如何恰当写出数学公式的问题,而且要更进一步讨论人类最终能否恰当地掌控人工智能行为的问题。

依此逻辑,便可看到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即若将人工智能界定为“使用数据运行的算法”,其运转则是从现实世界收集并输入数据后,人工智能机器通过运算再输出学习、

优化、整合的结果,以实现程序员设定的任务目标。决定数据收集、输入、运算、输出的算法最初是由人类(程序员)在各个领域编写,有了算法之后人工智能便可自主地进行数据收集,当然其并非简单地收集现实世界中已存在的所有数据,而是根据算法收集特定范围中那些可以数据化并作为数据加以运算的内容。质言之,客观世界存在着“海量数据”,而某个领域的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只是搜集了其中部分的“块数据”并加以运算。就目前情况而言,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世界并非完全已被数据化,或者说人工智能当下只是影响了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类依赖物联网的领域正在迅速拓展,“数据化了的世界”对人类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因此也有学者担忧,未来有可能构建出由人工智能控制的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没有控制人工智能的方法,而且人类也没有访问将自己数据化并整合的“元数据”的权限,于是人类世界便出现了“从自然 \supset 科学技术”到“自然 \supset AI”再到“AI \supset 自然”的演化。

由此,中国彰显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及实践正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探索“人地关系”绿色治理更优路径的典型方位与重要尝试。回到上文提及的身心二元论,人地关系的矛盾源于从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身体”优越性向运用科学技术而随心所欲地“榨取”自然、资本化自然的“心灵”优越性的转变。而朝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努力,能真正弥合心灵与身体间割裂,特别从构词法的视角出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可真正探索实现对“主动语态”“被动语态”的摒弃,以探索“中动语态”的平衡。当作为心灵的科学技术对作为身体的自然及世界施加作用时容易产生生态环境问题,也即形成了作为主体的科学技术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伴随人工智能时代深化后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变,上述主动、被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强化。而若真正实现最理想、最彻底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那便需要彰显一种“中动语态”,即不存在主动与被动,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的运用不再是对自然环境实施动作影响,而是真正探索实现“人地关系”绿色治理的共同发展、共同生存之道。

也正是着眼于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及实践的话语体系重塑,本文所思考的广义绿色治理,除着眼狭义绿色治理聚焦的“人地关系”本源思考,还针对广义视域下的“绿色”,将其内涵界定为涉及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等核心价值,外延则包括技术层面的集约化运作、应用方面的可持续推进等,旨在助力国内外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创新^[16]。

3 人工智能时代广义绿色治理的多重张力

如果说狭义绿色治理主要着眼传统意义上生态环境的“人地关系”问题,那么广义绿色治理则可进一步拓展上述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特别是透视中国“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对内绿色治理实践,以及内部经验承载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治理尝试,便可看到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体系。其一,就治理主体可开源而言,建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其二,就治理过程可持续而言,让治理方式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要符合区域禀赋条件,以确保治理方略具备政策延续性;其三,就治理手段可多元而言,结合大数据、融媒体等前沿科技和宣传手段,通过环境、人文、教育、旅游等多元渠道来丰富治理手段和创新治理模式;其四,就治理客体可共生而言,要着眼于实现治理对象的共荣共生;其五,就治理结果可分享而言,引导发展成果应带来合作主体的共赢效应^[17]。广义绿色治理不仅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人地关

系”问题,还思考系统的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形成跨越国界而实现国内治理经验与全球治理的多方联动,同时也探索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进路。

而伴随人工智能从纵向深度和横向广度两个层面对全球社会的嵌入,人们已在思考如何系统地应对各类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创新,也许正是人类通过技术层面的集约化运作、应用方面的可持续推进等赋能方式,来确保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的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有效路径。立足已构建的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体系,可首先定位其需要应对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三个张力所在^[17]。

3.1 AI“智能代理”的行为责任归属与提升人类行为效果间的张力

广义绿色治理需彰显可开源的治理主体。传统意义上涉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基本单元都归结于人类个体,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非人类”的人工智能可逐步代替人类成为治理主体。伴随人工智能代替人类从执行简单工作任务到代替人类作出更好判断的技术深化,其在人类社会所涉及的不同行业中越发彰显“智能代理”功能。同样地,在社会治理领域,当面临棘手舆情冲击等复杂社会挑战时,人工智能基于海量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数据分析,可能比人类更快作出更优选择。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人类依托人工智能的“智能代理”功能,已极大拓展行为边界从而得以更优质地完成各项任务,人类社会也呈现出运用人工智能的群体越多,整个社会的运转便越高效、人类工作越能产生更好效果的趋势。

在此,当人们思考于何种领域发展人工智能的上述功能、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的上述功能、如何将上述功能带来的治理红利推广到更多群体之际,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行为主体的责任归属界定。作为“智能代理”的人工智能在代替人类作出行为决定且造成不良后果时,责任归因是否就不再存在?当进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超出人类的理解和控制范围,上述情况便容易出现。同时,对责任归属问题的担忧不仅存在于自动驾驶汽车导致死亡事故等引人注目的情况,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人工智能运用领域。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作为行为主体应占据多少“成分”?人工智能占据的行为主体“成分”越多是否就意味着所能完成的任务效果越好?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人类应该将多少行为主体“成分”委托给人工智能系统?对此,无论从实用角度还是从伦理角度出发,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人类能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深思熟虑”研发,那么人工智能就能更好提供改善人类行为所能实现效果的可能。若能通过在人工智能系统授权的系列功能中嵌入一个“促进框架”,且该框架被设计成更有可能在伦理道德维度产生良好引导,那么人类行为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时便会得到更好支持、改进和扩展。

人工智能提供了无数机会,可以改善或增大个人和社会的系统能力。无论是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还是在运输和物流的优化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可通过从根本上增进人类集体的能力而发挥系统效能,从而为社会的再投资提供机遇。更多领域的人工智能可能支持更持续的治理效果,但也可能会因为上述技术如此强大而造成混乱。特别地,当以错误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人类的能力时,便意味着人类可能把重要的决策权交给一个自主运转的系统而无法把控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需要确保人类继续控制人工智能的演进方向不变。

3.2 AI运用限度与人类自我实现价值间的张力

广义绿色治理需彰显可多元的治理手段和可持续的治理过程。人工智能技术拓展了人类

的治理手段,但人工智能运用的程度、速度及广度也可能导致其与人类自我实现价值间的张力,进而影响可持续的治理过程。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形成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技术支撑,即人工智能可助力人类从一些此前不得不对接的劳动、工作中释放出来而去探寻主观意愿更加偏好的领域,从而提升自我价值。正如扫地机器人等简单的技术创新就能将人类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样,人工智能对人们日常生活多领域的融入会让人类获得更多的“被解放的时间”,以追求自己更想做、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很显然,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可减少花费在重复机械劳动上的时间,从而过上更加“有人情味”的生活。值得防范的是,新技术的出现可能带来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出现“断点”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源于新旧技术轮替的客观状态,毕竟重大科技创新在引爆人类经济社会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可拓展治理手段的边界,关键的风险点在于新技术新陈代谢的速度,以及可能导致的技术红利和技术成本的“不平等波及”。从年龄结构分层来看,技术红利虽能惠及绝大部分中青年群体,但总会存在不熟悉电脑、手机的老年群体,即便中青年中也还存在很多不熟悉运用APP的“数据弱者”。除此之外,即便是对能够熟练运用APP的中青年群体而言,“旧技术”价值的迅速消失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关联社会及国家稳定的就业状态将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然,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其背后蕴含的风险要素也较为多元。如就个人层面而言,职业往往与个人认同、自尊和社会角色等因素紧密绑定,被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替代的人类群体会出现何种心理状态的转变,以及如何又能获取新的工作岗位,相关问题值得跟踪和解决以确保社会整体的持续发展;就社会层面而言,在医疗、航空航天等对人工智能技术要求极高且存在危险性的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除了会影响在相关领域从事工作群体的就业状态,且当人工智能自主深度学习出现问题,或者某国相关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受到敌对势力恶意攻击时,还可能出现极端危险的后果,甚至造成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阻断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运用人工智能这一新的技术治理手段的界限在何处?如何弱化其与自我实现价值间的张力?一方面,从治理手段多元层面思考,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带来技术红利并推动“红利普惠”以探索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绿色共荣共生;另一方面,从治理过程持续层面思考,要努力探索减弱人工智能替代旧技术并提升人类自我实现价值时所可能产生的技术成本。

3.3 AI系统自主“封闭运作”与他者“开放诉求”间的张力

广义绿色治理需彰显可共生的治理客体与可分享的治理结果。人工智能系统的高效运转助力人类更好实现与各类治理客体对接以处理复杂问题,若操作恰当还可协同人与大自然等治理客体的共生,并带来持续分享治理结果的良性循环。但人工智能运转的高科技性和该专业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其一定程度呈现出不易被大众理解的系统“封闭运作”状态。人类往往对未知事物存在恐惧或排斥心理,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封闭运作虽能以超越大部分群体认知的速度、深度、广度完成关键客体的治理任务,但也存在与人类对系统开放诉求间的张力。

当前,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治理、跨越国境的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同时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领域往往多元交织。这意味着只有从更宏大的系统视角出发,着眼广泛联动的不同治理客体,通过寻求共同规划、共同协作和共同分享以生成解决方案,才更易于从根本上形成国内外问题的善治效果,真正实现面向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趋势迈进。对此,人工智能时代虽然带来了更加复杂的人类社会,但从属“数据密集型”分类的人工智能,能

够比人脑更快更好作出反应以解决国内外各类复杂问题,并支持形成更多的社会联动和协作。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跨境治理问题,不仅需找到全球范围内针对温室气体、污染物质排放等的治理方案,而且要探寻从区域性气候治理结果可分享到更广区域乃至全世界分享的可行路径,确保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最终实现持续共生。鉴于人工智能是一个基于算法的系统,其根据世界各地的数据搜集和计算,可助力人类找到更好的治理方案。当然,因专业信息不对称性而呈现的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封闭运作,也可能会带来人类未能预判的结果,上述结果偏离还会伴随技术的深度成熟而日益扩大。

人类对于未知事物会存在天生的恐惧,于是人类社会进一步搭载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可共生治理客体与可分享治理结果的绿色持续状态,便需要在公共信赖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技术治理优势。也许从人类对冲风险的微观个体行为选择进行对标便可发现,“保险赔付”等风险管理方式更易于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接受度。与此同时,虽然人工智能涉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但也有必要通过引导更广泛的人类群体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讨论、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功能方式等途经,来转换人工智能运转的“封闭”状态,提升其透明度,并尝试建立一种可被更多人理解、可供广泛人群使用的监管和矫正机制。

4 人工智能时代广义绿色治理的系统范式构建

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应对方位探究,可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联动中进一步嵌入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通过治理系统范式构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AI 社会”。

4.1 人类主导下治理主体可开源

立足保持人类的决策权限形成可开源的治理主体。生命伦理学中的经典原则之一是自律原则。比如,在医疗领域规定患者可自行决定自身是否接受治疗,不过在实际医疗状况中,上述原则有时会因患者处于无法对外界反应的情况而被打破。类比人类社会中的上述情况,人工智能的介入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即人工智能是否在相关领域可凭借大量数据的“科学判断”而替代人类作出决定?广义绿色治理需要更加开源的治理主体,为了实现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使用者以及规则制定者从最开始就进行合作以保证人工智能回应社会的诉求。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最初本是人类依托的重要前沿治理手段,但其特殊性还在于人工智能也可逐渐演化为具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治理主体。人类引入人工智能至今,已在逐步将本来由人类加以决策的很多内容部分地转交给智能机器,这里较为重要的事项便是人类必须在为自己保留的决策能力和交给人工智能的内容之间取得平衡,即平衡人的决策和被机器引导的决策。人工智能系统不应具备超越人类设定规则的权限,也不能被赋予伤害、破坏、欺骗人类的力量。在此,不仅需要强化人类的自主性,同时需要限制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一定程度而言,需要守住的底线是任何事项的最终决定权需要掌握在人类手中,或者是“委托决定”模型中人类要永远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人类持久保持最终决定该做什么的根本权限。就此而言,无论人类向人工智能转让何种治理能力以及无论开源主体中人工智能如何介入,原则上都应随时可以被人类的控制颠覆,即多元的治理主体必须持续以人类自身为主导^[18]。

具体就可操作的构建路径而言,可在法律等既存制度中探索并不断完善纠正人工智能系统所制造错误以及由此产生伤害的规定,同时尝试系统评估相关规定的效果,以前瞻性地完善机构设计、制度设计,确保未来对于人工智能的控制可从制度层面有一个可持续性基础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同时,为了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价值能更好回应公共诉求,需要探索通过使用相关科学方法来深度评估及研判人类的哪些任务和哪些决策功能可移交给人工智能系统,且评估过程应考虑到既有法律及正在不断完善的规定,并应反馈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持续关注。

4.2 技术规制下治理过程可持续

通过彰显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形成可持续的治理过程。人工智能技术的设计存在着专业人士的“放大效应”,专业人士出于好奇等原因而导致技术设计和发​​展所产生的微小变化,都会极大影响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非专业人士通常看不见或者不易理解人工智能的运作机理,由此可通过提升人工智能运作的透明度,或设置人工智能的问责制,或提升人工智能运作的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决策过程的接受度。在此,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尤其重要,因为其是建立对新兴技术的公共理解和公共信任的决定性要素。与此同时,也唯有在更清晰了解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基础上,人类也才更易将人工智能向带来更多利益和更少危害的方向进行引导,以确保治理过程的长期持续。

具体而言,可尝试在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试点建立增加人工智能系统可解释性的运行框架或者规范制度,助力人类作出更具有社会意义的决定。上述框架或制度的关键是以反映人类社会的治理过程本身为事实基础,直接和清晰地解释人工智能助力人类主体实施治理相关行为的决策过程,并提前规避不良后果的出现。这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为不同的行业发展设立单独的框架或者解释逻辑,特别是同步联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一并完善框架的搭建以增加人工智能系统的可解释性。特别地,还应深度探索能与技术发展相协调的立法框架,以评估现行的规则是否有足够的伦理道德基础,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及运转的伦理道德约束。通过制度完善以彰显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伦理价值极为重要。鉴于人工智能催生的一些行为暂时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难以被社会接受,伦理道德约束便可让人类社会预判、规避或者最小化新兴技术手段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冲击,同时尽可能激活人工智能蕴含的正向社会价值。

4.3 结果矫正下治理手段可多元

为降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需要形成可多元的治理手段。引入人工智能的多元治理手段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获取及福利共享,但治理手段的扩展也需警惕过度或错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产生的潜在负面后果。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工智能侵犯社会个体隐私,到人工智能在各国军事技术中深度运用所带来的“AI军备竞赛”“AI自我循环式升级博弈”,人工智能的能力上限似乎深不可测,故其带来的冲击也需提前防范。也正因此,作为多元拓展手段的人工智能的运用,需要探索安全约束的操作环境,并降低责任主体误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还需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于,到底是作为治理主体的人类,还是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本身,对人工智能产生效果的影响更大?或者说应该重视规避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可能产生的危害?在此,人类意图显然至关重要。一方面,人类怀抱善意意图过度使用技术而可能导致对社会的偶然危害,这种负外部性源于“机器不可预测行为”的人工智能治理手段本身;另一方面,

人类怀抱恶意意图使用技术而可能导致对社会的有意危害,这种负外部性源于人类的蓄意为之。

就可操作的构建路径而言,可形成针对人工智能造成不公正结果给予补救和补偿的矫正机制。在此,可针对研发并运用人工智能的人和组织建立全面清晰的问责制,同时基于对制度效能的评估以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例如,可设置监督人工智能是否公平且恰当运用的“AI 监察专员”“AI 产品研发主体责任绑定机制”以及能对相关责任方提出指控的正式规定程序等,以确保人类社会得以持续降低人工智能引起的负外部性,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手段得以更好耦合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这也是培养公众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关键举措。

4.4 理念发展下治理客体可共生

围绕促进福利、维护尊严、延续地球等理念形成可共生的治理客体。人工智能的研发及运用应该促进所有人的福利获取,即便无法将 AI 红利平均分配于所有个体以实现“技术牵引下的共同富裕”,也应尽可能造福更多人及所有可能的治理客体,以彰显人类尊严,并探索实现包含大自然在内所有治理对象共荣共生的共同之善。特别就广义绿色治理涉及的“人地关系”而言,不仅强调的人类尊严而且强调可持续发展应得到进一步联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地球万物生命的基本条件、人类持续繁荣与为子孙后代保存良好环境相协调的可行路径。

就可操作的构建路径而言,可探索形成从国家内部到跨区域再到全球尺度的测定基准,以形成立足使用者的反馈而对所有市场化的 AI 产品、AI 服务等人工智能关涉事项的可靠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还可尝试构建“AI 可靠性指数”,以促进公众对更安全和更有社会效益的人工智能加以理解,并引导相关企业围绕更可靠的人工智能形成产品研发竞争,确保更安心、安全的人工智能服务。与此同时,还要为构建可持续性社会奠定更长远、更广泛的系统而重塑逻辑闭环,如依托人工智能衔接治理客体的具体进程,针对走向市场的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设立监督机构,实时科学评估和监督人工智能系统、软件、产品、服务等。引导人工智能在运用中同步着力守护作为治理客体的人类的社会公共福祉,引导其对作为治理客体的大自然形成正外部性影响,确保人工智能的社会价值和环境友好。除此之外,也可探索建构人工智能观测机构及讨论其发展方向的半官方性大众论坛,让作为治理客体的人类群体来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治理效果进行讨论反馈,以对人工智能整体的未来发展形成一定认知共识。

4.5 正义循守下治理结果可分享

恪守促进繁荣等正义原则形成可分享的治理结果。治理结果可分享被视为着眼资源分配问题的正义原则,而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伦理原则的正义内涵可界定如下:依托人工智能纠正不平等的歧视及相关不正当行为,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可创造共享的利益,防止诸如破坏现有的社会结构等新危害情况的出现^[18]。人工智能在促进上述正义原则中的作用极为显著,其可以促进治理结果的共享。具体而言,尊重所有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对象的利益,依托人工智能尽可能为每一个社会个体在心理、情感和经济上都带来可分享红利,引导人工智能为全球正义作出贡献,确保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果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开花结果。在此还值得深度透视的问题在于,人类不仅是开出人工智能“处方”的“医生”,同时也是接受人工智能“治疗”的“患者”。在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二元关系中本就存在自我螺旋式互构过程,“治疗”的效果也便是治理结果,只要人类把握好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才能实现“有效治疗”的可分享治理结果。

就可操作的构建路径而言,为了识别不公平的偏见等不良结果,应该发展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督机制,建立并不断完善集中应对人工智能关联风险的部门。上述风险应通过多利益相关者的早期努力来缓解,正如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在与人类深度接触时所展现的经验和教训,前沿创新在给人类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曾在很长时间带来信息泄露、版权侵害、电子诈骗等既有法律法规无法及时应对的问题。鉴于修改并完善社会制度以追赶前沿技术发展,并将其带来的问题纳入规制范围之内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使用者和政府相关部门越早介入并提前协同布局,就越能针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判,并在风险爆发时形成及时的对冲,以形成可分享的治理结果。

5 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人类对大自然的可及性,人工智能对社会的融入则为人类探索治理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新的可能。当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为人类带来新的治理挑战,其包括传统的科层制治理结构可能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长久以来建立在人类行为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规制体系可能难以适用于以算法、数据为主体的应用环境,以及针对受人工智能发展冲击而引发的新的社会议题可能还未构建新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新的治理工具等问题^[19]。在此背景下,人类更需系统性地把握当前绿色治理的框架,从广义维度思考治理环节中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时前置地识别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规避治理风险,进而提高科学技术发展的边际效益,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更好融入中国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18-11-01.
- [4] 庄存波,刘检华,张雷. 工业 5.0 的内涵、体系架构和使能技术[J]. 机械工程学报,2022(18):75-87.
- [5] 冯媛媛,黄其松. 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发展历程与研究议题[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44-53.
- [6] 张伟,李国祥. 环境分权体制下人工智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21-129.
- [7] GHANE A, MAZAHERI M, SAMANI J M V. Location and release time identification of pollution point source in river networks based on the backward probability metho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6(180):164-171.
- [8] 师博. 人工智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诠释[J]. 改革,2020(1):30-38.
- [9] 王文军,李琪,刘丹. 论人工智能时代绿色发展的挑战及应对[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1):30-36.
- [10] 欧阳康,郭永珍.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J]. 江苏社会科学,2021(6):26-33.
- [11] HORN E, BERGTHALLER H. The anthropocene: key issues for the humanities[M]. London:Routledge,2019.
- [12] 陆建明,王娟. “绿色悖论”内涵、产生机制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3-32.

- [13] NORDHAUS T. 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EB/OL]. (2015-04-01). <https://thebreakthrough.org/articles/an-ecomodernist-manifesto>.
- [14] HAFF P K. Being human in the Anthropocene[J].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017(2):103-109.
- [15] The IEEE global initiative on ethics of autonomou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EB/OL]. (2019-04-17).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12524-0_2.
- [16] 杨达,林丽.“绿色联动”:日本数字政府转型的战略透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138-144.
- [17] 杨达,李超.“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路径创新——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为例[J]. *探索*, 2019(5):184-193.
- [18] FLORIDI L, COWLS J, BELTRAMETTI M, et al. AI4People—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a good AI society: Opportunities, risks,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J]. *Minds and Machines*, 2018(4):689-707.
- [19] 贾开,蒋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选择[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10):40-45.

On Broad Green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s, Multiple Inconsistencies and Paradigm Construction

YANG Da, XIONG Xuehui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Green governance in a broad sense encompasses the current concern for core values such as ecological harmony,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n this basis it also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en gradually and deeply embed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long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xpanded the theories of green governance on the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to the search for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technology into green governance in a broad sens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 are still some tensions between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ehavior of AI “intelligent agen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behavior, between the limits of AI use and the value of human self-fulfillment, between the “closed operation” of AI systems and the “open demands” of others. In the light of the three tensions, we need to explore the paradigm of a broad green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ncludes open-source governance subjects, sustainable governance processes, multiple governance means, symbiotic governance objects, and shared governance results.

Key words: green govern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gree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赵超

区块链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矫正： 算法正义的一种可能之路

朱婉菁

(温州大学法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算法激化了数字劳动在经验发生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张力,这一结构性冲突要求对数字劳动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注意力,需要集中到对算法正义的实现策略上。数字劳动在“算法神话”的加持下被构建为一种超越工业劳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陷入了劳动异化的困境,而从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技术中寻求解决困境的可能性成为一条值得期待的重要道路。区块链能够以规则内嵌与监管外控两种技术进路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并通过价值共享、主体性复归以及监管与自主的平衡这三种策略,实现数字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数据生产关系的重构以及劳动情境的透明化。这不失为一种既“下通”技术演进的社会选择,又“上达”技术政治规则顶层创新的治理之道。最终,作为一种“负责任的中介”,区块链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矫正推动算法正义的实现。

关键词:数字劳动;算法正义;区块链;劳动异化

中图分类号:D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64-12

1 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劳动世界。以电子商务、网约车、外卖、内容付费、短视频、灵活用工等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劳动逐渐兴起,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劳动和生产组织形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进程加速之时,以网络百科、软件开源为代表的劳动模式就已拉开了数字劳动的序幕。而今,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联结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和开放式的组织生产模式更是实现了数字劳动的规模效应,由此奠定了数字经济的生产基础。而伴随规模和影响的扩大,数字劳动引发的争议也日趋激烈。2019年,美国学者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在其《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一书中敏锐地指出了算法控制下的自然劳动状态是如何被扭曲的。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社交网络,掀起了一股莫让算法“算计”人的讨论热潮。2021年7月16日,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全国总工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包括督促企业修订涉及劳工权益的平台算法。算法正通过其日益强大的“代理者”角色来表征、窥视和监督人们的生活实践,自然也包括劳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行政管理体制体系创新研究”(17ZDA105),项目负责人:高小平;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的路径研究——以温州为例”(21JD20),项目负责人:朱婉菁。

作者简介:朱婉菁,女,博士,温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诚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早已对数字劳动习以为常,但依旧很难对它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的文化生产》一书中,将数字劳动作为免费劳动的一种类型,并将其范围限定于网络用户的在线虚拟劳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被认为是在传播和文化研究的资本热中关注到了劳动盲点,他主张“应该扩大数字劳动一词的含义,将所有形式的有酬和无酬劳动包括在内,这些劳动是数字媒体生存、生产、传播和使用所必需的”^{[1]296}。在这一研究旨趣下,网络零工、脑力劳动者,甚至在富士康从事零件装配的工人都成为数字劳工中的一员。虽然二者对数字劳动的范围界定有着不同看法,但对其演化过程的内在逻辑保持着高度的共识,即数字劳动“体现了资本主义攫取价值而进行的基本的制度设计”^{[2]4}。人们对于数字劳动的种种称赞或批判,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新的理解和讨论:算法自然不可能“赤手空拳”造成当下数字劳工的全部窘困,但算法在增值数字剩余价值的同时日益凸显其与资本合谋下的不正义,而数字劳动异化自然成为资本逻辑下技术非正义性的映射。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有关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生产了大量重要且具有批判性的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大量的批判性话语本身遮蔽了重建数字劳动的可能。有人主张从法律和制度入手,希望能够重构被异化的劳动;技术乐观主义者则寄希望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向善。尽管二者都有可取之处,但难以让人满意。因为对于资本而言,追逐利益就是目的本身,而强化规制始终伴随着可能阻碍创新的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被算法“围困”?实际上,人们早已意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策略,即拥有更强的数据平台和智能算法就能打破自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的格局,实现新的均衡^[3]。以技术的加速发展克服技术失范,不失为一条可选择的道路。回归数字劳动本身,其一出场就天然地倾向于将技术作为不需要讨论的先验性前提,这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为技术创新预留充足的位置,亦没有观照到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后技术的正义性诉求愈发激扬的现实需求。因此,基于对现实真实性存在困局的关切与承认,我们试图以超越性的论辩与话语逻辑探索数字劳动是否存在根本性变革图景的可能。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处理、数据防篡改、多方共识等技术特征,具备去中心化的信任建立、保存和传递能力^[4],使得区块链技术与过往的旧技术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即它为反思平台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根本性技术力量^[5]。“与其对抗技术力量去寻求人类的自主性,不如寻求发展一种负责任的中介形式对这种影响进行调节而不是消除。”^{[6]7}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最有可能成为驱动算法自觉追求正义价值的技术,将人类从算法异化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完成新时代的自我救赎。

2 视域开启:“算法神话”与数字劳动异化

学界普遍认为算法实现了劳动的再造,并发展出一套“算法神话”的话语体系,其流行自然也反映了技术元叙事在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地位。诚然,技术进步释放的红利已然彰显,算法神话亦催生了劳动生产领域新的潜力,但随着“算法失范”“算法牢笼”等问题被提出,有必要重新审视算法与人之生存本质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关涉人类生存实践方式和社会价值旨趣的正义问题是聚焦点。其中需要明晰的严峻问题自当包括对算法神话的解蔽,并从算法与劳动的关系中开启正义问题的基本视域。

2.1 技术祛魅: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神话”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更多机构和个人直接将日常实践委托给算法,算法延伸的社会后果也日益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为,基于大数据运行的算法技术提供了一种更高形式的智识,也意味着一场认知意义上的革命,使得数字时代由于算法的出现和普及产生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新规律与新特征^[7]。这种新规律新特征日益将算法打造成为某种神话。也许它难以理解,却能够通过分类、治理、塑造或其他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成为备受追捧的现代技术神话。而当算法进入劳动场域并深刻改造劳动生态及实践时,也建构了技术理性与劳动客观性相融合的“算法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正在取代以往以公司为中介的“生产—消费”模式,而算法扮演了新生产力的角色,将劳动者纳入庞大的数字劳动体系之中。这也决定了算法不得不依赖于平台作为交易撮合者和劳动管理者的角色,实现其技术功效,而平台企业也借助多层次多类型的算法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取得竞争优势。创立于2009年的优步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全球的快速扩张,谷歌则凭借庞大的搜索引擎算法独占鳌头。

算法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时代对新科技推广的活力与热情,更大程度上与资本逻辑追求不断扩大的市场效应密切相关。无论是IT界的鼓励主动超长加班,还是优步将司机美化为共享与助人精神的体现,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在这套话语背后,是技术本性与资本逻辑的殊途同归。而一旦技术的应用显现出可观的利润趋势后,就容易出现同业复制以及技术加速的现象。算法的生产力神话以及技术合理性也变成资本逃避劳动者权益保护责任的工具与托辞。统而言之,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神话不仅为劳动实践开辟了新的“战场”,也为之后有关数字劳动的种种争议迎来了重新理解技术的契机:在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而是“资本—技术—劳动”的三角结构。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对算法的统摄是有效的,也是缔造算法神话的内生性力量,但算法毕竟只是一种“人造物”。算法生产和创新的过程中必然要嵌入相应的政治价值和文化模式,进而可能扩散至整个社会,助推大规模技术系统的革新,因而即使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对算法的正义性寻求亦是可行且有效的。

2.2 正义缺失:“算法神话”下的数字劳动异化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大众批评算法的敏感点在于资本利用技术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监管。这将我们重新引向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说,劳动异化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非正义性的理论切入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异化劳动划分为几种:其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其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还表现为人与人相异化^{[8]2-3}。借助逻辑推演的方式,马克思“复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本主义制度毁灭了的人,从而超越传统的劳动者权利范式论证了劳动应得的正义。而今,劳动被搬上了平台,劳动异化的经典图景借由算法再次浮现,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时空泛在化下的劳动价值异化。无论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是游戏产业从业者,这些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职业,自我雇佣成为他们最鲜明的标签。但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工在入场平台时不得不接受内嵌于算法设计中所要求的时间同步性。例如美团骑手调度机制正是通过把时间“离散化”的按组排班而非按人排班的方式应对外卖业务需求的“峰谷效应”,

实现更为精准的预测^[9]。而城市空间也在算法系统的建模设定中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相应的等级则被具体化地嵌入劳动者的行为之中。对于处在后台的管理者而言,骑手只是地图上移动的一个点,骑手的工作轨迹是显示在地图上的一条线,勾勒空间中的点与线所呈现的图景便是劳动者的全部劳动过程。劳动时空泛在化是算法控制下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算法社会拥有更强大的控制力量,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于技术进步能够解放生计束缚的幻想,也日益消除传统的公私边界。可以说,一旦数字劳工进入算法构建的劳动时空之中,“困在系统里”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结局。当技术在生产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显著时,技术对劳动力产生的抑制就会立即显现出来^[10]。亦如美团日送 3 000 万单的成功往往被归功于美团超脑配送系统编织的“智慧之网”,但骑手对日益精进的算法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更遑论因此获利。

第二,情感参与商业化下的劳动主体性异化。情感作为人的主体性资源被看待已经具有广泛共识,并伴随劳动主体被纳入生产秩序,而情感也日益被视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形式。网络直播领域是一个典型,即主播通过生产与粉丝之间的情感从而吸引流量。从当前的网络平台劳动力市场来看,在平台资本的增值过程中,平台劳动者的情感参与是否足以自控,或者劳动主体性力量的释放是否自主值得商榷。正如主播看似自发主动地劳动,其实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即“人设”成为数字劳工的“无形枷锁”^[11]。这种无形的枷锁使人们在科技进步的物质享受中逐渐消弭自我创造性和超越性,劳动者可能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因此,如何在资本主导的算法规则下保有劳动者的自主性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生命政治议题。

第三,智能监督场景下的劳动过程异化。早在 20 世纪初期,亨利·福特就通过雇佣打手和间谍对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实施全方位的监督,而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劳动监督因此也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2]。美国学者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提出了“控制界限”的概念,他认为资本应当选择不同的管理策略来应对工人抵抗,包括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进入智能算法时代,这两种策略不仅能够交汇通融,甚至很多时候对于劳动者有限赋权形成的责任自治能够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直接控制,特别是在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功能加持下对劳动过程的监督得以建构。而算法实时的监督也使劳动者发展出一套自我追踪与个体量化的生存方式。事实上,当“未来传统的劳动关系及组织形态被打破,劳动者以液态形式自由流动结合,成为‘液态公司’”^[13]时,劳动过程也必然被置于全方位监督之下。

在数字社会,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本质上是技术进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显化并加剧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进而让技术陷入一种非正义性的历史语境中备受指责。但正如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4]493}。在算法社会中人们应当如何区分二者之间的界限?当算法阻碍社会发展时,人们是否还有能力改变它?答案是肯定的,它就蕴含在对技术问题的反思和追问中。

3 技术追问:区块链何以规制算法

以技术为支撑的劳动异化引发的新一轮劳动抵制与反抗,很可能也同样会以“技术化”的方式发生^{[15]8}。近年来,程序员们通过在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创建开源项目来表达他们对“996 工作制”的不满便是一个例证。诚然,技术前进的方向受到资本生产特性的约束,但技术的发展

可以成为资本生产的稳定器,“在任何社会关系是以现代技术为中介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入更民主的控制和重新设计技术,使技术容纳更多的技能和主动性”^{[16]2}。沿袭这一思路,有学者提出“代码即法律”的设想给我们如何重新设计控制算法带来了启发:以代码架构的改变影响算法的演化进路或许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规制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算法的一种规制方式,它不应当压制算法在释放劳动者创造力和主动性方面的潜力,而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数字架构在整体上提供支持和保障,保护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17]。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区块链规制算法开辟了一个较之“技术对技术的治理”更深刻也更为关键的维度:跳出将算法简化为资本逻辑下逐利工具的狭隘框架,在正视算法作为数字经济中的关键组织管理要素的基础上,对区块链作为一种“代码治理术”进行界定。在有关具体规制进路的设计上,技术发展史揭示的人类在机械自动化设计上的选择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一种是由管理层对机器产生直接的控制,即初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程序;另一种则是被称为“记录—回放”的方法,高度依赖熟练工的主动性以及之后的不断调整^{[18]97-101}。

3.1 规则内嵌:以代码共识重构算法规则

早期算法规则的构建依赖于算法设计者在算法领域的价值观,通常考虑道德规范、实用价值、社会公约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的价值诉求等,其中算法设计者自身的道德价值判断至关重要。“如果一些算法本质上是具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如果设计算法的人无法避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做出道德判断,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软件设计师对他们设计的算法负有道德责任。”^[19]但将规制算法的责任加诸某个个体身上,既不明智也无成效。正如算法共谋已经被证实普遍存在,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设计者或实施者之间在初期就达成了某种合谋,而是当前算法所嵌入的端对端的网络架构加剧了平台之间的竞争与合谋。这也就意味着区块链对平台算法的规制必然是要建立在“规则即代码”的技术基础之上,即在设计代码环节就负前瞻性责任。重塑规则的过程需建立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协商和博弈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的主体应包括政府、立法者、社会分析师、数据分析师、编码者、算法的使用者以及广泛的被影响者,如此才能促进整个社会就如何实现算法的规则制定进行重新思考并达成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区块链内置多样化且具操作性的共识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算法系统与社会共识的结合,推动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回圈”的形成。而关键就在于区块链革命性地变革了互联网的底层协议,正如比特币的成功之处正是从协议层面融合了激励机制和限制条件,促使用户及参与者执行特定的、有利于整体的行为,“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20]1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技术足以支持多种形式的自组织,包括“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

3.2 监管外控:以主体能动性防止算法失当

从平台算法运行的过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数据输入—机器学习—算法模型—结果输出”这一路径进行的,而最容易引致价值偏离或责任违背的阶段就在于数据输入端、算法本身模型以及结果输出端。相应地,区块链规制算法的路径也可以区分为三类。

从输入端来看,关键在于防止不正义数据的输入。不同于传统互联网架构无法遏制偏隘数据的流入^[21],区块链技术严格执行数据验证机制,或许能实现有学者提出数据正义的三大核心,即可见性、事先约定以及防范不公平对待^[22]。具体的做法是,以不同利益相关方为网络节点,收集和验证上链的数据,并对照预定义的标准清单,从数据结构、语法语义、伦理规范等各方面勘

验数据,从而能更有效杜绝无效或者恶意数据在网络中传播。

从算法本身来看,鉴于算法黑箱的客观存在,如何能够发现算法违规以及及时要求平台作出调整至关重要。作为以释放利益相关者自主性以及强化参与为目的的赋能型算法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而这高度依赖作为中介的平台能够吸收来自参与者的有效反馈以及具备互操作性。区块链基于去中心化结构及共识机制,可自主地实现节点同步,其实现机制可被描述为“竞争+协同”。在这个意义上促进正向良性反馈效应的形成^[23],即利益相关者不仅能够全面获取信息,而且能够真实地进行价值评判并予以呈现。虽然破除算法推荐下的“信息茧房”在短期内会降低平台的利益收成,但良性的内容生产机制从长远看将产生极大的虹吸和蜂巢效应,增强平台用户的忠诚度。

从输出端来看,区块链能够实时固定任意关键数据,不容篡改且可回溯的特性为穿透式监管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有助于推动形成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审计。当然,引入区块链对算法实施控制与监管,不仅仅是针对数字劳动问题或某个单一的经济关系,创新的监管工具也使得科技公司的技术应用之路更为畅通。简而言之,在平台算法的架构中嵌入区块链技术,具有受到既有制度和资本双重鼓励的现实可能性。

4 技术的正义性寻求:区块链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矫正

对区块链何以规制算法的技术追问,正是考虑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的正义性诉求愈发激扬的现实需求。就此而言,谁编码、如何编码以及如何使用编码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正义问题^[24]。依马克思主义之见,技术的正义性应该到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现实中去寻找。也正是由于劳动之于技术的逻辑先在性,才引致我们思考区块链作为“代码治理术”对算法的规制应当回归并深入劳动实践场景的各个具体环节之中,在对技术的正义性寻求中实现资本与劳动的辩证统一。

4.1 价值的共享:平台合作主义下的数字剩余价值再分配

劳动时空泛在化下的劳动价值异化,本质上是平台借助算法具备了全时空、多边性的获利机制,进而吸收超额剩余价值。更准确地来说,精密的算法将数字劳工的行为数据制造为“预测产品”,依赖于平台开发的APP对无数个体进行数字身份勘校、分析和拟合的聚合累积效应^[25]。据此形成庞大且精准的系统性获利机制,进而侵占数字资本价值体系内的总体剩余价值。大量的劳动者在实践的过程中看到了互联网的连接能力以及开展线上合作的潜力,而合作主义也是西方国家针对劳资矛盾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主流思想主张。但互联网发展史证明,仅仅依托端对端的开放式网络架构难以带来真正的社会正义和经济解放^[26]。究其根源在于日益中心化的网络流动空间是典型的以效率换公平的发展模式^[27]。平台企业的生长历程不仅没有产生想象中的涓滴效应,反而加剧了对数字劳工的压制。2018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82%的优步用户希望司机能得到更好的权利保障^[28],可见构建新型平台合作主义具有现实可能性。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已经在全球兴起,呼吁由平台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和管理平台。与现有的平台企业不同,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大众生产”的理念,坚持参与式民主和经济激励,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而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互联网驱动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不

同的是,它本质上是有别于平台驱动的“社群驱动”,即以价值集聚和经济激励的方式联合认可其创新价值的群体,通过构建分布式可信内容价值协议(Decentralized Trusted Content Protocol),确保平台的利益和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形成人人受益的社群平台,最终从资本聚合走向劳动联合,为数字劳动剩余价值的共享提供了新的路径。具体的实现机制如下。

一是价值锚定机制。这一机制主要通过平台开源实现个人数据锚定劳动价值。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储存和传输系统具备支持社会化编程的技术条件,能够实现平台的开源建设,并于开源平台之上构建包括政府、平台股东/管理层代表、技术开发者代表、数字劳工代表和用户消费者代表在内的民主协商委员会,共同参与平台算法的设计,包括制定如何修改代码的开源规范。这为个人数据转换并进入劳动价值范畴奠定了基础。二是价值选择机制。算法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数字劳工的价值创造,以及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如早期的打车软件通过平台快速实现价值增值,却没有承担维持相应的公共责任。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选择机制旨在推动平台企业更为自觉承担并实现社会公共价值,关注平台的服务质量、可及性、全面性以及劳工权利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以计算机的自动监管替代传统第三方监管的角色,记录保存并全网广播平台侵害劳动权益的行为及处理结果,有效约束平台企业的价值选择行为。三是价值分配机制。基于区块链的价值分配机制旨在为平台系统创建多边市场,通过区块链的点对点传输模式打破以往由平台企业垄断的集中生产与分发模式,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平台对定价权的操纵。而更为宽松的定价协商和个人服务定制,不仅能提升现有互联网用户与整个互联网经济体的活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偏某些社会歧视问题。例如定制化服务交易鼓励消费者支付女性骑手更多配送费,为女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鼓励老年群体的再就业等。

概言之,区块链支持构建劳资共建、共享、共商、共决的开源式合作平台,满足数字劳工的情感需求,增强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在智能时代让剩余价值从机器体系中挣脱出来,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此,诸如信任、善意、认同等社会资本仍具强大的生命力,而区块链能通过区块化的共识机制,将这些活生生的基础设施作为生动注脚纳入平台之中,克服无意识的算法非正义,打破数字劳动的价值存在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认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合作主义是重塑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的重要命题,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谁来托起平台,以及谁来拉动平台,也就是谁来做,谁来用^[29]。亦如公共池塘资源带给我们的启示:没人能拥有它,那么谁会有动力去建造它呢?^[30]¹⁹²这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尝试解释这一悖论。

4.2 主体性复归:数据控制下的生产关系重构

劳动者的情感作为商品被管理虽自古有之,但进入数字时代后愈发缺乏正当性。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数据日益成为平台的核心资产时,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神话将不再从主体角度,而是从可数据化的客体角度强化它的尺度意义,据此度量作为数据来源基础的每一个人。此时,劳动者的主体性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劳动者需要将自己的“过量价值”生产出来^[31]。要矫正这种导致劳动者主体性异化的关键,不是要杜绝劳动者主体性要素的商业化,而是拒绝纯粹服务于资本关系再生产的数据化。当平台成为数据的“钻井”,作为数据来源的劳动者想要实现主体性复归的必要前提就是遏制算法对数据的无限追逐。但其中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资本总不断强化数据垄断的倾向,数据生产又具有路径依赖和蜂聚效应,即越在一个平台上使用和贡献

数据,用户就越容易依赖于这一平台,进而继续使用和贡献数据;另一方面,数据又只有最大化地共享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32]。这种悖论引向了另一个奇特的结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激化并不必然招致劳动反抗;相反,资本会进一步强化其扩大劳动生产的能力。如何消解这种悖论,恩格斯早就已经给出答案:“工人阶级除非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否则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33]494}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的主体性复归必然要回应和数据要素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如何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问题。尽管目前能够以柔性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审判来消除数据产权上可能存在一物多权的矛盾,但劳动主体依然难以作为数据生产者存在并获得体认。例如外卖平台公司拥有极为精准完备的用户地址数据,甚至打通了从社区大门到单元小门的“最后 100 米”,但骑手对此的贡献并不能为其获取等价的回报。诚然,分配领域的权利赋予不可或缺,但是依靠物质生产领域的彻底变革才能真正重构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区块链有望通过重构以数据控制权为核心的数据生产方式保障劳动主体对数字劳动成果合理的享有。

当然,之所以是以数据控制权而不是数据所有权为核心,原因在于控制数据才是摆脱数字资本主义压制以及获取数字收益的关键。对数据的控制权而言,区块链技术因具备去中心化、多方共识、难以篡改、公开透明、可追溯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数据的多源性、非现实性和可复制等困扰提供了一个相对可信的解决方案。至于具体的过程,则需要遵循从数据权属的分层、适用规则的选择以及应用机制的创新“三步曲”。第一步是数据权属的分层。数据与劳动在时空上的结合以及结合的程度,决定了数据产权的不同层次。最常出现的场景和问题就是,用户在平台上产生的数据归谁所有?司法层面通过设定用益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数字劳工现实的生存状况来看,更为关键的是让用户能够依据自身行为关联数据获取生产性权利。而前提是每一个用户具备可勘验的数字化身份,并关联其一系列活动、交易等数据信息。区块链在可信数字身份的创新应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身份管理框架,在不同平台、机构之间进行自主可信的身份授权与信息共享。第二步是适用规则的选择。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必然会产生新的权利人以及不同权利人之间在处理权利关系上的规则适用问题。由于数据存在可复制、可共享等特性,数据的生产者、投入者、使用者以及受益者之间大多都是分离的,继而弱化了数据权利的排他性,因而在数据流通过程中尽可能制造出可识别权利边界的“排他性装置”至关重要。当然从国家立法层面设置边界、建立规范是基础,技术层面的支持则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利用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通证化(Tokenization),即将作为新型资产的数据转化为权属明确、可公开透明交易并公平合理享受收益分配的权益凭证,据此形成广泛的利益联结以及各方相互协作的网络生态系统。同时,根据区块链系统内的层级规则,不同权利主体能够对特定对象主张不同权利及进行处理。第三步则是应用机制的创新。鉴于数据要素的生产特点,规避数据闲置下的“反公地悲剧”是重点。可尝试搭建“数据信托”“数据银行”等受信第三方管理平台来探索如何控制个人数据作为劳动对象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块链无疑是为其提供信任背书的理想工具。在数据的生产关系中,数据的增值和收益不完全是一个正比例函数关系,其中涉及制度安排、公共选择、合作博弈产生的剩余价值分享等,其中自然涉及对收益的分配,而区块链点对点的价值传递为数据收益权的分割提供了技术支撑。

事实上,把平台如何塑造数字劳工深度抽象为数据权属的分层、权利边界的界定以及创新应用的过程,至少能在机制层面设计出更为有效的劳资定位与制度安排。也正是由于技术范式的重大转向,要求政府、社会、企业和劳动者有必要重新审视数字劳工的主体性问题,共同通过数据反演,引导平台生产关系的优化。

4.3 控制与自主的平衡:劳动情境透明化下的劳动过程自治

算法已经把人类的劳动场景置于监管之下,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成功激活了劳动过程的无限延展,而且借助算法的流动布控,使劳动者的心智从被规约转向自我规范^[34]。因此,数字劳工如何避免退化为算法的执行人就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生命政治议题。从算法的应用实践过程来看,算法透明也许是破解其隐秘布控最好的“密钥”。但作为一种事前规制,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多数情境下算法透明原则既不可行,也无必要^[35]。因此,对抗算法在劳动领域的监管,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许并不是算法的透明,而是身处其中的劳动情境透明化,据此得以实现劳动过程的自治,其中关键就在于劳动者应具备抗衡算法控制的自主性。不同于劳动者掌握数据控制权,劳动者的自主性与更为日常化、结构化的社会运行逻辑紧密交融,使数字劳工重新找回在“算法神话”下被蚕食的就业体面与工作自尊。而支撑劳动情境透明的技术框架关键要具备超越监督资本主义的“可见性”,即意味着实施算法监督所涉的具体数据项有哪些,实施特定监督的主体是谁,使用何种手段或技术,达到何种目的,监督对象的倾向性如何,评分、排名、违规等的内在评价规则是什么?诸如此类事项都应在具体劳动情境中向特定作用对象公开,实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自我的可见、可控以及自治。区块链自治系统所表现出的开源性、开放性,超越一般等价物的流动性以及各区块间的强关联性特征均契合对于“可见性”的要求。

平台中的用户,也即数字劳工有资格有能力,也应当作为某一时间和事件中的中心节点,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区块链社区中形成劳动共同体。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会引发团结失效,因为缺乏共同在场的经历^[36]。但不同于传统的网络论坛、线上职业社区等,区块链的嵌入以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等形式从根本上创建一个基于共有网络协同生产模式的平台合作社,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创造潜能^[37],并最大限度地支持这种创造力的价值可偿与公平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无法形成滕尼斯理想中的共同体,也能够模拟空间上共存、精神上亲近、需求上一致的体验感。例如在区块链上建立骑手网络社区,骑手之间不仅能够通过送单、配送路况等信息分享增进彼此之间的体认与情感交流,同时可以就平台治理、设施配备等提出建议。言外之意,当平台能够容纳用户选择“遵守—应用”和“不遵守—退出”之外的其他选项时,劳动者的自主性便也得以凸显,亦有能力平衡算法的控制。区块链多样化的共识机制在同步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的基础上驱动数字劳动过程转向一种新的范式,由此劳动便具备了作为“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可能性^[38]³⁶⁴。

另外,劳动情境透明化还有助于建立风险识别机制,维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通过将劳动合同数字化并部署于区块链之上,成为全网共享的资源和信息,不仅有助于相关部门及时审查上链的劳动就业信息并予以监督,而且系统能够自动匹配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推送给劳动者,营造数字经济时代良性的劳资生态体系。论及于此,我们需要检视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资本有动力在平台算法中植入区块链技术进行自我束缚?这也回归到了本文的落脚点,即理论的实践意义。换句话说,相比公司和市场,为什么人们选择在区块链构建的商业秩序之上进行交

易? 显然, 答案是经由区块链所构建的合作秩序能带来同等甚至更优的商业模式和利益回报^[39], 其关键就在于区块链技术支持构建一种新的内容创作激励机制, 全面激发网络生产力^[23], 真正实现数据繁荣下的劳资利益共享, 实现社会正义。

5 结论与讨论

从劳资对抗到劳资共谋再到劳资平台合作主义的设想并不是乌托邦,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归根结底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维度上, 是劳动力所有制的属性发生根本性的转变^[40]。而促使这种转变的一个根本力量来自技术的进步, 因而算法正义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与算法设计师对代码的直接修改不同, 区块链以规则内嵌和监管外控两种方式对平台算法进行设定和规制, 有望打破传统网络技术强者恒强的赋权效应, 以普遍的生产可见性和价值可偿性实现数字劳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长远来看, 利用区块链矫正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更像是一场群体革命,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1]200}

事实上,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让我们意识到, 不应当止步于在技术层面规划区块链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矫正之路, 更应当审视技术的政治使命到底为何。从全球视野来看, 中国数字劳动的发展模式既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其中关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当前批判多于建构的理论导向下, 既要意识到技术与资本之间仍保持着一种利益型的关系结构, 同时更要达成技术进步依旧是消解技术工具理性偏隘性重要手段的共识。因此, 拓展数字劳动研究的想象, 不仅仅将其作为技治主义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续写甚为重要。而这需要在深刻理解资本二重性以及技术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行有益的反复尝试。无论是学界不断呼吁给算法技术的发展加入鼓励机制以及设定阈值, 还是实践中骑手与平台的劳动争议纠纷, 都警示我们在驾驭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责任培植一种具有合作包容性的算法正义秩序, 是打破当下数字劳动困境的重要出路, 而区块链无疑是在这场技术加速主义赛道中最值得期待的技术。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只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第一, 不能涵盖有关数字劳动的全部议题, 一些研究问题也未必局限在一种向度内。譬如, 在算法与数字劳动的互动关系上, 当前的研究更倾向于将算法视为平台的工具, 继而限制了算法在政治、文化等多维度视角下对数字劳动内在机理的更多洞察与揭示。再如, 在算法平台的研究中劳动者一直是影响算法的重要力量, 其身份与行动策略在不同情境下也存在着摇摆与波动, 特别是劳动者对算法的抵抗、规训等问题都有待讨论。第二, 以区块链技术矫正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更像是一种抽象经验主义, 虽然容易招致实证主义的批评, 但需要承认的是技术本质上具有两面性, 伴随着技术范式的重大转向, 技术的想象力应当扩容为整合了历史、批判和未来的三重感知力。由此, 通过对技术的批判、重塑来拆解数字资本主义隐秘而复杂的劳动过程和权力关系, 不仅没有溢出传统数字劳动的研究范畴, 还带有修正其中误读和偏见的理论意涵。第三, 在数字劳动异化的语境下, 不应当仅局限于批判技术的资本宰制, 而要试图去寻求技术的正义性, 探索算法正义重塑数字劳动的理论曙光。劳动之于技术的先在性, 意味着在生产劳动场域翻译和转化技术的本质更为清晰也更为深刻, 而从中找到有价值的“问题域”并以技术反身作用于技术的实践路径重拾人之尊严是当代人类的必然使命。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2] 姚建华. 数字劳工: 产消合一者和玩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3] 蓝江. 智能算法下人的数字异化与生存变革[J]. 人民论坛, 2021(21): 20-22.
- [4] 冯鲍, 张左敏. 区块链赋能与平台型供应链金融优化——基于成本视角的博弈分析[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10): 110-121.
- [5] 高奇琦. 区块链在智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意义[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08-115.
- [6] VERBEEK P.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7] 贾开. 算法社会的技术内涵、演化过程与治理创新[J]. 探索, 2022(2): 164-178.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蔡润芳. 技术之上的“价值之手”: 对算法“物质性”的媒介政治经济学追问[J]. 新闻界, 2021(11): 32-42.
- [10] 吴玉龙.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 一个基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理论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4): 49-56.
- [11] 栾轶玫, 张雅琦. 人设奴役与数字劳工——异化理论视角下的直播带货[J]. 传媒观察, 2020(10): 19-26.
- [12] 罗毕·瓦林, 邓肯·麦肯, 姚建华. 数字经济中的权力和责任: 数据、算法与劳动监督[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1(9): 77-84.
- [13] 袁文全, 徐新鹏. 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J]. 政法论坛, 2018(1): 119-130.
- [14]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姚建华. 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 [16]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胡凌. 合同视角下平台算法治理的启示与边界[J]. 电子政务, 2021(7): 23-30.
- [18] 戴维·诺布尔. 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M]. 李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闫坤如. 人工智能的算法偏差及其规避[J]. 江海学刊, 2020(5): 141-146.
- [20]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1] 林曦, 郭苏建. 算法不正义与大数据伦理[J]. 社会科学, 2020(8): 3-22.
- [22] 张三萍, 金阳. 阿马蒂亚·森正义论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2): 89-97.
- [23] 臧志彭, 张雯婷. 价值共创与利益共享——区块链对网络文化空间数字劳工劳动图景的重塑[J]. 文化产业研究, 2021(2): 25-39.
- [24] 董青岭, 朱玥.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正义与秩序构建[J]. 探索与争鸣, 2021(3): 82-86.
- [25] 唐林垚. 算法应用的公共妨害及其治理路径[J]. 北方法学, 2020(3): 51-60.
- [26] 贾开. 数字未来的多重技术路线[J]. 文化纵横, 2021(6): 8-11.
- [27] 石超. 区块链技术的信任制造及其应用的治理逻辑[J]. 东方法学, 2020(1): 108-122.
- [28] 贾开. 算法可以中立吗? ——“零工经济”的新可能[J]. 文化纵横, 2021(4): 117-124.
- [29] 吕乃基, 雍歌. 论摩尔定律和技术范式[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7-10.
- [30] 凯文·韦巴赫. 区块链与信任新架构[M]. 杨东, 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 [31] 夏莹, 牛子牛. 主体性过剩: 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性特征[J]. 探索与争鸣, 2021(9): 148-158.
- [32] 杨虎涛. 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J]. 经济纵横, 2020(11): 1-11.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34] 蓝江. 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

- 会科学版), 2019(4): 10-19.
- [35] 沈伟伟. 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算法规制理论的批判[J]. 环球法律评论, 2019(6): 20-39.
- [36] 邓智平. 数字赋权与劳动关系转型[J]. 南方经济, 2021(9): 11-17.
- [37] 黄再胜.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危机、资本应对与数字劳动反抗[J]. 探索与争鸣, 2020(5): 124-131.
-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9] 臧志彭, 崔煜. 嵌入社会网络的技术: 区块链在著作权交易中的应用再检讨[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52-60.
- [40] 朱婉菁. 区块链作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风险挑战与政策因应[J]. 探索, 2020(4): 76-87.
-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Blockchain's Correction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 Possible Way of Algorithmic Justice

ZHU Wanjing

(Law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algorithm intensifi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abor. This structural conflict requires critical and empirical attention to digital labor to focus on the realization strategy of algorithm justice. With the blessing of “algorithmic myth”, digital labor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a product of the era that transcends “industrial labor”,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fallen into the dilemma of alien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dilemma from technology as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 has become a “alternative road” worthy of expectation. The blockchain can realize the regulation of the algorithm through the two technical approaches of rule embedding and supervision and external control, and realize the redistribution of digital surplus value,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ta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labor conditions through the three strategies of value sharing, subjectivity reversion and the balance of control and autonomy. This is not only a social choice of “down to”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but also a “governance” of “up to” the top innovation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rules. Finally, as a “responsible intermediary”, blockchain realizes algorithmic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correcting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algorithmic justice, blockchain, labor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赵超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深刻意涵、内在动因与现实进路

王红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党的二十大作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决定,有必要对其深刻意涵、内在动因和现实进路进行深入研究。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在意涵上强调的是覆盖渠道、层级、主体、领域的全面性以及制度程序和实践参与的完整性,这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的领会、贯彻和细化表达。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内在动因包括:协商民主不但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乃至成就后者;协商民主的发展状况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而面对新征程上出现的新风险新挑战尤其需要发挥好协商民主促进团结奋斗的“效能优势”。这是内在机理、政治要求和客观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实践中,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持续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及工作体系,积极发展“横跨两个领域、兼顾两个重点”的基层协商民主,扎实围绕公共服务推进民主协商,并将提升协商主体的意识与能力作为工作重点。

关键词: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76-14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并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重要部署,将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四个方面的内容列为工作重点^[1]。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二十大还明确了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作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决定,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协商平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等要求和任务^[1]。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提出和实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3]。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到“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再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不但折射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的推进取得实质性成效,而且昭示着协商民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新征程上,协商民主的发展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进展和质量直接影响全过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21&ZD006),项目负责人:王炳权。

作者简介:王红艳,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民民主的进展和质量,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事关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决策部署的实现。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且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其他八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互作用,进而合力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和质量。

深入系统研究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既有相关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阐释性研究,包括阐释协商民主的合理性、重要性和优越性。关于合理性,有的通过追溯中国历史上的观念和实践寻找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文化资源^[4];有的论述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5];有的尝试探讨中国政治生态与协商民主的耦合关系^[6]。关于重要性,有的阐释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7];有的论证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8]。关于优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理论的实践性、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协商形式的多样性、协商目的的公共性、协商制度的规范性等几个独特特征^[9];有的从标准、条件、效能视角分析中国协商民主的真实性以及建基于此的显著优势^[10];有学者从政党协商切入讨论优越性,认为政党协商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1]。这类成果聚焦“是什么”,但未触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意涵。

第二类是实践创新性研究。这类成果侧重于探讨“怎么做”。多数成果为基层协商的实操规则、机制和办法的提炼分析,例如探讨如何将选举和选择、精英和大众、代理和委托代表模式等不同的代表有机结合起来^[12]。有的成果则从宏观层面探讨协商民主制度的创新,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条件和法治路径^[13]。有学者认为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制度存量和主动创新制度增量,既要将协商民主嵌入既有制度框架内以“激活”既有制度的运作,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与新挑战不断开拓创新^[14]。整体而言,中观层面的研究显然偏少。

第三类属于历史性研究范畴。这类研究主要聚焦协商民主的制度变迁历程。例如,研究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15]、中国农村社区协商民主的理论演进和实践逻辑等^[16]。这类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总结历史经验,但时代性和前瞻性略有不足。这三类研究成果见仁见智,对开展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启迪。然而,这些研究既没有回答什么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也没有讲清为什么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更没有分析如何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综上,对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意涵、动因和进路展开探讨,并尝试通过制度、理论、实践视角的融合来提升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2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意涵

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7]⁹⁷ 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相比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而言,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不但有扩面和增量的指向,而且有提质和增效的期待,对新征程上推动协商民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设定了新目标,同时也彰显了鲜明的系统观、整体观和协同观。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出发,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意涵至少包括协商民主覆盖渠道全面、覆盖层级全面、覆盖主体全面、覆盖领域全面、制度程序实践参与完整五个方

面的内容。

2.1 覆盖渠道全面

协商渠道是开展民主协商的必要组织载体,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语境下,覆盖渠道全面大致包含五层含义。第一,民主协商渠道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每一种渠道的建设都得到扎实推进。第二,各类协商渠道的“亚类渠道”建设也得到扎实推进。从“亚类渠道”概念看,政府协商中的“政府”包括政府所有的组成部门和派出机构;人民团体协商中的“人民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商联等各种类型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协商中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等各种类型。第三,每一种协商渠道均依法依规向相关利益主体开放,并且建有一套畅通的工作体系,可以名副其实地开展协商实践。第四,各类协商渠道将民主协商贯彻到全部的履职过程中。例如,人民政协除了抓实抓好政治协商外,还将协商精神贯穿到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中。第五,各种协商渠道之间和单一协商渠道内部存在必要的衔接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协商资源的浪费,依法依规、正确充分使用协商结果。例如,从2022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看,政治协商包括两种基本方式,即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18]。这两种政治协商,在协商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协商对象交集较大,而且协商活动的筹备涉及多个主体,建立健全纵横衔接的有效合作机制尤其必要和迫切。

2.2 覆盖层级全面

如果说覆盖渠道全面是对协商组织载体在横向分布上要求的话,覆盖层级全面则是对协商组织载体在纵向分布上的要求。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不再满足于协商民主的多层化发展,而是指向全层化目标,即民主协商在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市、区)、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六个层面得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推进,不存在“上热下冷”或者“中空”的问题。调研发现,中共中央定期举行民主协商会,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等展开协商,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但一些地方政党协商工作的温度和力度还有待提升。这显然与全层化要求有一定距离。还需注意的是,结合协商组织载体横向分布的要求来讲,全层化还强调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各级各类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发展协商民主。资料显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分期分批建立3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设立509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近5000个设区的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19]。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做法基本践行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为做实立法协商和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2.3 覆盖主体全面

协商主体多元是协商过程和协商结果合法化的必要条件。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求协商实践覆盖所有类型的相关利益主体或者其代表,不允许滥用权力将某个、某些或某类相关利益主体排除在相应的协商活动之外,而且所有的协商活动都在平等公正、团结和睦的气氛中进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

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7]97-98} 从更理想的角度讲,小范围集体性事务的协商,所有相关利益主体都要参与;大范围公共性事务的协商,所有相关利益主体的代表都要参与。调研发现,浙江温岭集体工资协商之所以能在当地延续 20 多年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始终坚持做到了行业工会、行业协会、企业、职工、销售商等各类协商主体的全覆盖,能够找到各类相关主体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达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最大共识。

2.4 覆盖领域全面

协商领域指的是协商内容及其边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协商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框架中,覆盖领域全面可从四个视角加以把握。一则要覆盖“五大领域”,即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积极作用。二则要覆盖国计与民生,既要依法依规就改革发展稳定大事开展民主协商,也要就如何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进行民主协商,不允许滥用权力将需要协商的事宜排除在工作议程之外。三则要覆盖共性问题 and 个性化合理诉求,既可就如何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和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开展协商,也可就如何帮助部分乃至个别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开展协商。四则要覆盖国内国际两个场域,在国际事务中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开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局面。中国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安全、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强烈诉求,与有关国家共同发起设立国际调解院,正是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的长效机制^[20]。

2.5 制度程序实践参与完整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直接结果应当是相关制度和实践的全面发展。首先,协商民主的发展,既要体现为相关制度程序的建设,也体现为直接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参与的展开,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17]96} 其次,制度程序本身应是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实践参与本身也有相对完整的链条,制度程序和实践参与相互作用,合力做实做深协商民主乃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丰富多彩,很重要和关键的一点是上有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顶层设计,下有各层级各部门制定的协商议事规则等作保障。反过来,丰富多彩的协商实践又为进一步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指明重点和积累经验。但是根据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对照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要求,无论是从制度或实践看,还是从制度和实践的呼应性与联动性看,协商民主都还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空间。

协商民主覆盖渠道全面、覆盖层级全面、覆盖主体全面、覆盖领域全面、制度程序实践参与完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之要求的细化表达,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原则和精神的具体践行。协商民主渠道的多元性和层级的贯穿性解决了协商的可及性和便利性问题,主体的全纳性解决了协商成果的共识性和有效性问题,领域的广泛性解决了协商内容的多样性和供给充足性问题,制度程序和实践参与的完备性和统一性解决了协商的真实性和可持续

性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协商权利借此得到充分保障和扎实落地。

3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动因

新时代突出强调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首先是因为协商民主对于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至关重要,充分彰显中国式民主的独有特色和优势;其次是因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面对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尤其需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

3.1 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乃至成就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民主政治建设的配置逻辑上看,主要是因为选择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17]99}这一重要论断精辟地概括了协商民主之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功效。协商民主为什么会有如此功效?关于这点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而这三个方面的阐释也尝试合力回答一个核心命题:协商民主一定程度上支撑乃至成就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是民主协商的不可或缺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的全链条人民民主,而民主协商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区别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并非一次性、周期性的实践参与,积极推进民主协商使得民主避免沦为“一次性消费产品”,从而有助于后选举时期的民主实践得以持续,充分展现民主的工具性作用或者说治理属性的一面。其次,区别于民主决策,民主协商一般发生在决策前和决策中,参与人员在范围上可以更广、数量上可以更多,协商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协商的地点和形式可以更灵活,因而协商结果运用的回旋空间更充裕。再次,区别于民主管理,民主协商是更多人员、更加直接的实践参与。最后,区别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是完全的参与式观察和沉浸式体验,实现了参与者与观察者双重角色的叠加和统一,而非独立于局外的单纯的观察者。

二是民主协商的广泛兼容性。民主协商不但可以贯穿其他四个民主环节,而且贯穿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在民主选举实践中,在候选人提名等环节依法依规引进民主协商,有助于提高候选人的合法性、代表性和共识性;在民主决策实践中,在决策前和决策中依法依规开展民主协商,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民主管理实践中,在选择管理主体、管理方式以及划定管理权责等环节中依法依规进行民主协商,有助于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益;在民主监督实践中,在确定监督主体、对象和监督方式等环节中依法依规开展民主协商,有助于提高监督质量并使得监督关口前移。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协商既是一个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也是一个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的过程,较好地实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衔接和统一,因而其本身即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监督方式——协商式监督。

三是协商民主的深度嵌入性。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及匹配性,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一则,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势必推动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健康发展反过来又为贯彻群众路线创造更加长效的实践平台;二则,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建立、维系和发展的基础及机制,而统一战线又是协商民主的直接来源;三则,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的正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又是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保障;四则,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该制度又是实现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有机统一的重要制度载体^[10]。这种深度互嵌,正是协商民主得以生根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内生动力,同时也赋予协商民主强大能量,使其具有激活各级各类政治和社会资源,进而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显著优势^[22]。

3.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基于主客观因素条件,更加需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以更有效地应对新任务新挑战、更顺利地达成新目标新要求。

其一,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1]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更加明晰的界定和部署。一则,赋予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的定位,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二则,确定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三则,提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对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等作出具体决策部署。这不但基本平息了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关系的争论,而且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作为其重要实践形式的协商民主的高度重视,同时为新征程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锚定了方向、找准了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了系统深入的阐释:“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7]336}新征程上,必须以此为根本遵循,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及作为其重要着力点的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对于促进人民民主以及党内民主建设的独特优势,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其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见图1)。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道路方向的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领域提出的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提出的要求。各项本质要求在具体的发展实践和治理实践过程中相互作用、彼此成就,而落实了上述八项要求也就意味着水到渠成地实现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基于这些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是没有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有缺憾的和不完全的;另一方面是缺乏全面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其他本质要求的落实进度和效果必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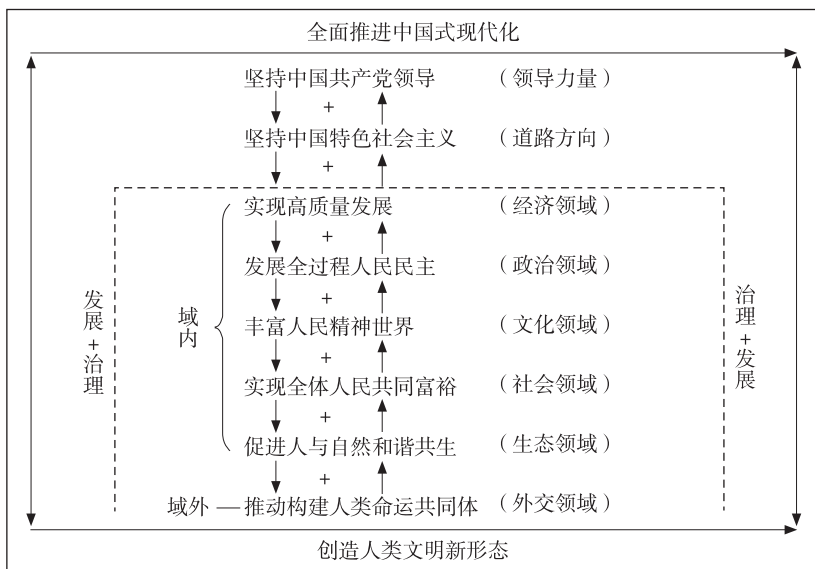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体系

其三,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应对新征程上各种新挑战新困难的科学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国内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任务繁重复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从国际看,来自美国等国家对我国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来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不断增强。内外因素使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业变得更加艰巨。“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23]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达成目标,而积极发展着眼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着力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全面保障人民权益、最大限度激发人民创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无疑是促进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科学方略和有效举措。

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民主尤其需要受到高度重视。民主协商因为具有不可或缺性、广泛的兼容性、深度的嵌入性等特征而呈现强大的效能优势,在促进人民团结奋斗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17]101}

4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进路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具体进路包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积极发展“横跨两个领域、兼顾两个重点”的基层协商民主,围绕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切实提升协商主体的意识与能力。

4.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包括在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协商民主等具体工作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于这一点至少需要从两个视角加以把握。

一是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可以概述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具体而言,首先指的是领导职能的全面性。强调一体推进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等各项工作,科学有效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次指的是领导对象的全面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4]强调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的领导要覆盖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民主集中制,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真正实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二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所需条件的全面性。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7]100}“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5]综上,落实好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意味着推进协商民主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当然,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夯实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即是为了让党和政府在新征程上看问题更全面、作决策更科学,为了做实做强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进而规避脱离群众这个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与此同时,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政治工程,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创造和提供全要素支撑。首先,发展协商民主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协商为民、协商于民,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这一原则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确保协商民主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其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涉及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包括制度建立健全、工作体系完善、渠道开发畅通、平台建设维护、能力培育提升、手段方式创新、社会良好氛围营造等系

列工作,唯有拥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权威、能力、经验和资源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有效统筹、整合和创造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所需的各种条件。

4.2 系统化推进协商民主体系建设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不但需要不同要素的融入,而且需要全要素的体系化支撑。综合当前情况看,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过程中,要强化系统观念,着力从两个方面入手补齐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短板弱项。

一是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制度既是规范行为的社会结构,也是实施行动的稳定保障。体系化的制度建设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必然要求,没有体系化的制度支撑,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目标难以达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一套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该体系以《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为管总性文件,其他主要制度文本包括:针对城乡社区协商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导人民政协协商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涉及政治协商、政党协商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其中《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是党中央专门规范政治协商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是做好新时代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遵循。现行制度体系为我国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但是,对照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要求,制度体系建设尚有短板弱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制度资源分布不均衡,目前的制度资源主要集中在政治协商、政党协商上,缺乏指导和规范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的专门制度;其次,指导和规范基层协商的制度还不够全面,目前只有针对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制度,推进县域、乡镇(街道)等其他基层组成部分的协商民主建设的专门制度还是欠缺;再次,既有专门制度中也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在此不做赘述。上述三类问题是未来制度体系建设的发力点。还需注意和补充的是,制度建设之后还有一个制度落实问题,例如针对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的专门制度基本完备,但从一些地方和基层看,因重视程度不够、民主党派类型不多或会员(党员、盟员、社员)人数较少等缘由,政党协商的随意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完善协商民主工作体系。工作体系是制度体系的物化表达,强调的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象化、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协商民主工作体系基本反映了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发展水平,大致囊括三种情形。其一,稳健成熟型。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因为工作制度比较健全,成立运行时间已超70年,工作体系相对成熟。2022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进一步界定了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边界与范围,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工作重点及其工作体系变得更加清晰。其二,无固定模式但有章可依型。城乡社区协商没有固定工作体系,但有构建工作体系的规章制度。其三,便宜行事或“草台班子”型。实事求是地讲,无章可循的情形目前仍然存在,其中社会组织协商工作体系的建立健全问题尤其突出。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毫无疑问需要一套建基于完备制度体系之上的完备工作体系。基于全

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目标和要求,协商民主工作体系建设至少应该满足和包括四种情况:单一协商渠道内部的同一层级相关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体系,单一协商渠道内部的不同层级间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不同协商渠道之间有机衔接的工作体系,线上协商与线下协商无缝对接的工作体系。有鉴于此,在完善协商民主工作体系的实践探索中,应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践行查漏补缺原则,坚持“按需而构”导向,并及时将经验成果转化为制度法规。以下三点对于拓宽完善协商民主工作体系的思路富有启迪。

一则,依托常态化重点工作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工作体系。例如,在加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和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工作中,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工作体系的建立健全工作。二则,围绕数字化工作平台的开发利用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工作体系。例如,围绕如何妥善处理和运用“接诉即办”平台收集到的线上集体性公益性诉求,构建线下民主协商体制机制,推动协商民主扎实发展。三则,因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重大项目需要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工作体系。例如,在实施河长制和推动跨域河流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来自不同地区、行业、领域、层级的多元相关利益主体开展协商的长效工作体制机制。在探索构建协商民主任何一种工作体系过程中,坚持并做实做深党的领导是始终必须贯彻的原则。

4.3 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科学的理论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方面,基层协商民主,既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一维,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整体发展具有深层次、基础性作用。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不但有助于呈现和丰富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而且有助于夯实和筑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另一方面,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大量直接利益冲突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治理任务艰巨。而民主协商具有不可或缺性、广泛兼容性和深度嵌入性等特点,基层协商民主是一体化保障落实基层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为直接有效的形式和路径。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既能体现对坚持以人民群众为协商重点之原则的贯彻,也能彰显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及其作用的发挥,可以最大限度用好民主的治理属性,为促进基层社会和谐有序、焕发创造活力以及巩固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深刻领会和深入贯彻,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不但强调要全面发展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协商民主,而且强调要积极发展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的基层民主。基层协商民主横跨上述两个领域、兼顾上述两个重点,积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对上述两项重要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

需要从扩面提效和推进创新实践入手,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全面优质发展。所谓扩面,强调的是准确理解基层的意涵,统筹规划和部署基层协商民主工作。一则,建立健全基层人大协商、基层政府协商、基层政协协商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常态化规范化推进县(市、区)、乡(镇、街道)层面的协商民主工作,不断丰富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二则,切实加大关注社会组织的力度,或开辟专门的社会组织协商渠道,或增加社会组织代表在基层人大代表、基层政协委员中的占比,或在有关工作流程中作出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与的刚性规定,实质性地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因事制宜培育好发挥好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和促进公益的积极作用。所谓提

效,主要强调两点。首先,用足用好城乡社区这一平台,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驻社区单位等协商主体的作用,切实提升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其次,切实实行“两代表一委员”进驻城乡社区制度,加强相关联络站(点、室)的规范化建设,创新下沉到社区的工作方式,发挥好这一群体桥接国家与社会、激活基层政治及社会资源、贯通基层各界面协商民主体系的作用,为基层协商民主全面发展提供高质量、长效化动能。

4.4 突出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

突出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首先是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进入新时代以来,改善公共服务被摆到更加突出的重要政治和政策议程。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强调公共服务是自己的重要职能之一,并推出了包括“放管服”改革在内的系列举措。同时,人民群众对作为美好生活重要内容和实现载体的公共服务的期待变得越来越高,而现有公共服务在便利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等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综上,改善公共服务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现实难题。党和政府唯有认真倾听民众呼声才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具体需求,唯有汲取民智才能探寻到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的路径方式,唯有凝聚民力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而这正是围绕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的初衷。

突出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有其理论基础。公共服务涉及内容广泛,指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多重目标;同时,涉及主体类型广泛,涵盖政党、政府、企业、社会,囊括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各行业、各环节。因此,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开展民主协商的协商内容丰富,卷入的主体多元,有利于达成多个理想目标:一则,避免民主空转,促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推动民主与民生相互促进;二则,减少基层及社会治理的压力,创新寓治理于服务中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与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协同高效;三则,妥善长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对政府的信任,形成相关利益主体共商共建共享工作格局。需要补充的是,突出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开展民主协商,并非忽略其他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而是一种尝试以支点撬动整体的策略性选择和安排。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特点和要求之一是协商内容广泛全面,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善用“弹钢琴”工作法,抓准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问题,争取达到以点带面、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体到实践层面,围绕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协商民主,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聚焦公共服务中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开展协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直接、具体、现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二,聚焦公共服务下沉开展协商,不断提高便民服务中心在城乡社区布点的科学性、事务安排的合理性、服务的规范性和便捷性。第三,聚焦缩小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开展协商,从抓实抓好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服务入手不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第四,聚焦改善公共服务与推进共同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环境污染整治等各项重点工作的交集,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助力攻坚克难的作用,生动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效。

4.5 切实培育提升协商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影响协商民主制度程序设计质量以及实践参与落地效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人,更具体地

讲,是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这一点不难达成共识,但是提升协商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工作并未得到系统、深入、持续推进。新征程上需矫正这一现象,在弄清弄懂关键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前提下,结合相关工作统筹推进协商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提升。

一是准确理解协商主体意涵,因事制宜地把握主体构成特点,切实提高协商成果的代表性和有效性。首先,广义上讲,政党、政府、企业、社会以及人民群众个体无一不是事实上的或潜在的协商主体。其次,从利益相关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看,协商主体既包括代理人主体也包括当事人主体。再次,从主体的组织化程度看,大致可以分为以党和国家机构为代表的机构型主体、以新型经济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群体性主体以及人民群众这类个体化主体。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语境下,协商工作不但需要覆盖所有类型的协商主体,而且需要弄清每次具体协商活动的主体构成特点,充分考虑不同主体在风格做派、思维习惯、核心诉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不但是协商活动能得到顺利进行的前提,而且是协商成果能得到各方接受和执行的保证。

二是以全面增强协商意识为目标,因需制宜推动协商意识提升工作,切实提高协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语境下,全面增强协商意识强调的是,协商民主绝对不仅仅是人民政协或者其他某个部门的事,增强协商意识不仅是要增强某个或某些专门协商机构的意识,而是要提高所有相关主体的协商意识,真正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氛围和“有事多商量”的习惯。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不同类型协商主体的协商意识强弱不等。就机构型主体而言,“想起来才协商”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问题有待彻底解决;就个体化主体而言,政治冷漠者并不鲜见,支撑协商意识的权利意识、公共意识、参政意识等有待增强,一定范围内甚至还流行着“协商无用”的论调;从群体性主体看,在协商意识方面兼具机构型主体和个体化主体的问题,新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等在协商民主中的角色有待定位、作用有待发挥。唯有针对不同类型主体所存在的“个性化”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才能有效推动协商意识提升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意识的真正提升事关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但常态化开展协商活动、规范化运用协商成果被反复证明是增强协商意识的有效路径。

三是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能力要求,因类制宜地增强协商主体的必需能力,切实提高协商成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过程中,不同类型主体在协商中所承担的功能和相应责任各有不同,他们各自必须掌握的能力有所不同。机构型主体的能力结构大致包括制定协商制度的能力、广泛听取意见的能力、实现正确集中的能力等;个体化主体的必需能力主要包括发现问题的能力、理解公共利益的能力、理性表达意见建议的能力等。如果群体性主体拥有上述两类主体的能力,协商民主的质量必将大幅提升。因此,要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能力需求制定提升方案,并结合相关工作加以统筹推进。例如,当前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结合乡村振兴的任务要求和人才振兴的计划安排,实施农村社区以及广大农民的协商能力提升工程不失为良策。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智能化在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所有类型协商主体均需切实提升数字协商能力,即运用信息化技术创新协商手段、加快启动民主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加大协商结果利用力度的能力。而数字协商能力的全面提升必将助推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跃上新的台阶。

5 结语

对上述若干基础性问题的分析表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确是一项复杂系统的重要政治工程。所谓重要政治工程,一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则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所谓复杂系统,是因为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它不但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乃至成就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缺场的现代化既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也是活力难以为继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协商民主的发展情况深刻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正因如此,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任重道远。新征程上,我们可根据不同时段的特点和要求调整修订协商民主发展的具体规划,但一方面需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另一方面需要一以贯之地践行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不断探索发展协商民主的科学有效路径。有此两点,协商民主全面发展,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2-11-18.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
- [4] 何包钢. 儒式协商:中国威权性协商的源与流[J]. 政治思想史,2013(4):1-21.
- [5] 林尚立. 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N]. 人民日报,2016-08-31.
- [6] 孙照红. 政治生态与协商民主的耦合关系及其效应[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6-10.
- [7] 林尚立. 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N]. 联合时报,2014-09-30.
- [8] 王洪树,张茂一.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J]. 探索,2019(5):42-50.
- [9] 陈家刚. 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J]. 新视野,2014(1):20-26.
- [10] 王红艳. 中国协商民主为什么真?——以标准、条件和效能为视角的分析[J]. 政治学研究,2022(2):92-102.
- [11] 周少来,贺凯. 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党协商的历史经验考察[J]. 治理现代化,2022(3):38-48.
- [12] 谈火生. 混合式代表机制:中国基层协商的制度创新[J]. 浙江社会科学,2018(12):35-42.
- [13] 张师伟. 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条件和法治路径[J]. 学术界,2022(5):5-13.
- [14] 陈家刚. 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1):60-65.
- [15] 黄敏璇. 渐进性调适: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22(2):117-124.
- [16] 张锋. 中国农村社区协商民主:理论演进、实践逻辑和发展趋势[J]. 理论视野,2022(9):59-65.
- [1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8]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2022-06-21.
- [19] 王晨.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N]. 人民日报,2022-11-03.

- [20] 王毅向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成立仪式致信[N]. 人民日报, 2023-02-17.
- [21] 王红艳. 党的领导: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J]. 探索, 2022(3): 61-72.
- [22] 郝川, 袁瑞, 时晨珂. 拓展基层人大工作平台推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12): 88-97.
- [2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 人民日报, 2014-01-24.
- [24] 中国共产党章程[N]. 人民日报, 2022-10-27.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7-02.

Profound Implica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Realistic Approach on Comprehensively Developing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Hongyan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 to comprehensively develop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explain its profound meaning,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Developing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meaning, it emphasizes comprehensiveness of covering channels, levels, subjects and fields, as well as integrity of procedures and participation. This is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and detailed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for the motivation logic, this i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mechanism, political requirements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Namely,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m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ich resulted i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quality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le facing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new journey,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iciency advantage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uch as promoting unity and struggle. In the practice, the systematic concept and problem-oriented method should be adhered to.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we should continually improve system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ctively develop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hich spans two fields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wo priorities, solidly promot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round public services, and really focus on improving negotiator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Key word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赵 超

领导与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中的党群关系

苏 伟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重庆 402160)

摘要:在中国语境中,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被组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真正主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才能具备历史的全面性。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离不开人民。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体现在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组织和教育下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合格主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必需的核心价值原则即集体主义原则及其支撑体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构建起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政治利益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实现其总目标等。这也说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也离不开党,党与人民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走向全面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历史合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090-13

“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是邓小平的著名论断^{[1]266}。这个论断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党离不开人民的道理,毛泽东早已用“鱼水关系论”讲清楚了^①,学界也有许多阐发;人民离不开党的道理,也深刻蕴含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关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述之中,对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有重大特殊意义,但学界对此还阐发不够。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2]的论述,对“人民离不开党”的道理作了更明确地阐述。以其为指针,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视角对“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种党群关系的道理进行阐发。

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已有学者明确提出^[3]。本文进一步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只有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被组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真正主体,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具备历史的全面性;否则,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只能是片面的。因此,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是把现代国家治理的最基本主体——人民群众,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结合起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良性运转和健全完善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人民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仰信念教育重要论述的‘红线’研究”(2020YBMK006),项目负责人:苏伟。

作者简介:苏伟,男,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教授,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思政课程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

^① 毛泽东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47.

群众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就会被实质性地隔离,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片面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才会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党的领导的这一特殊历史意义,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1 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与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主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4];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5]。习近平阐明的党的一贯主张和他给“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关系。从党的领导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关系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统一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人民群众由国家治理的单纯客体向名义主体、再向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的转变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反思,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离不开人民与人民离不开党的逻辑依据。

1.1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学者们多是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方面加以论述,并引用习近平相关重要讲话来强调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虽然肯定了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权,但认为这种领导权只是“由中国的国家结构所决定的政治定势”,“是中国政体所要求的事情”^[6]。这种看法所给出的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领导权的根据,只是“过去时”的“打天下”的历史惯性,只是作为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现实存在,而非作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相贯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因此,有必要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一上,探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问题。

从“过去式”来看,作为我国国家制度“集中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党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1949年,就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规定了共和国的国体,明确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规定了共和国的政体,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后来的1982年《宪法》更明文规定了“坚持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更加明确。

从“现在式”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上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加强国家治理”^[7]的问题,尤其是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8]。这就更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关系,揭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3]。

从“将来式”来看,正因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所以才能够实现

优越于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学者对此作了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治理能力升级的关键推动力量。”^[9]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融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导和核心地位^[10]，把党的领导为首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总纲领”^[11]。

1.2 人民群众与国家治理体系

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8]。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来之不易。从我国历史来看，人民群众有一个从革命主体向治理主体转变的发展过程；从世界历史来看，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有一个从单纯客体到名义主体，再到真正主体的发展过程。后一过程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人民由国家治理的单纯客体到名义主体的转变，是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现的。然而，西方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从开始建立时就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人民的主体地位是抽象的、是与这种治理体系相分离的。这种实质上的分离，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上讲，就无法让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就无法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上讲，就是其现代化因人民实际缺位而呈现出历史的“片面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领导人民持续建设民主政治，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12]，从而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真正主体。这一本质集中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理念核心是群众史观、制度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所有代表直接代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中的规范化运行，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及其诉求，从而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西方议会的理念核心是视群众为群氓的“英雄史观”、制度核心是围绕议会党团竞争的单纯票决制，所有议员都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政党的代表，因而议会只能成为“多党”零和博弈的场所，人民群众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根本无从反映和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又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弘扬了巴黎公社的重要精神——“议行统一”，国家的行政、监察、审判、检察等机关都在人大会上产生，并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群众既能行使国家主权，又能行使国家治权，实现了人民自身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结合，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效率最大化地治理国家。而西方的议会则与行政、司法分立，成为让人民“让渡”治权后，与人民相分离的国家机器。而让这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动力源和润滑剂都主要是金钱，所以“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实际上限制了民众的参政权利”^[13]。

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它们构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人民不但拥有了选举投票权，还拥有了广泛的政治参与权；不但参与着制度和法律的制定，还监督着这些制度和法律的执行；不但参与着国家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的制定，还监督和制约

着国家权力本身。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与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统一,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了历史的全面性。

1.3 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离不开人民与人民离不开党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离不开人民”的原因,毛泽东的执政权力来源论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4]581}离开了人民,党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这就是习近平强调“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5]的意义所在。因此,党离不开人民,同时,人民也离不开党。

对于人民与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西方的民主理论有两大观念,即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洛克的“人民同意论”。全面梳理了这两派基本观点的萨托利将前者归结为“民主的统治”,将后者归结为“统治的民主”,并且认为“民主的统治”即人民治国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萨托利等西方学者给出了三点主要原因。第一,人民无能力治国,“民主的统治”行不通。第二,“民主的统治”会导致“多数暴政”,不能行。第三,“民主的统治”无法解脱一系列困境,难以运行。罗伯特·达尔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统治”将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包括“难以达成公意”“多数规则的局限性”“偏好一致的困难性”“偏好强度的差异性”“政治目标的多元性”等^{[16]31-56},因此“民主的统治”至少会是低效率的,是会经常陷入泥沼的。这些原因使萨托利等人认为,“人民主权充其量是个正当性原则”^{[17]124},人民必须将治权“委托”给“精英”,让其进行“得到同意的统治”^{[17]253}。

西方的民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逻辑的自洽性,但不能依此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与正确的。以萨托利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所论述的“民主的统治”不可行的三大原因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人民都处在“自发”的状态,即没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状态;如果这个先决条件改变了,即如果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处于“自觉”的状态,则上述三大原因就会完全改观乃至反转,成为真正的“民主的统治”即人民民主切实可行的基本原因。

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正是因为有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民群众能够(也才能)成为国家治理的合格主体,能够(也才能)形成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能够(也才能)整合“政治目标的多元性”而确定理想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目标。这些都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离不开党”的重要政治性理由。

有了代表人民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政党领导这个重要条件之后,萨托利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憧憬——“多数可以变成少数和少数能够变成多数”^{[17]172},才能真正实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及其代表中的“多数可以变成少数和少数能够变成多数”的现实路径,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集中体现——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以民主为基础,实践路径就是“从群众中来”,人民中“多数”和“少数”的诉求和观点,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讨论;民主集中制又以集中为目的,实践路径就是“到群众中去”,即将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群众的诉求和观点加以集中和升华,形成体现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教育群众,使群众统一思想,主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离不开党”的又一条重要政治性理由。

2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来自对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扬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来自对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片面性的历史性克服。马克思的“两次革命”和“两次解放”论,对认清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逻辑有重大指导意义。从现实逻辑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集中体现为人民群众自身与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统一,从而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主体。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全面性的制度基础视角看待党领导人民创建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逻辑。

2.1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生成及其现代化的全面性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8],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19],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治理体系产生与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规律时,马克思既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政治解放”,又揭示了这种“政治解放”对人民大众徒具形式的虚幻性,强调在“政治解放”之后还必须通过人民革命来实现“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0]46}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非常重要,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特点:自觉地将人民群众每个个体由社会化生产和民主潮流所赋予的“固有力量”组织起来,并使这种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亦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与人民自身相统一。这种统一实质上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与作为客体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统一,就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那么,人民群众怎样才能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由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所赋予的社会力量呢?怎样才能把每个人“固有力量”“组织起来”并使这种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与人民群众自身相统一呢?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把每个人自身的固有力量“组织起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光辉思想的早期表达,所以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明确为:无产者和人民群众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怎样才能使无产者和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并使这种联合产生的社会力量与人民群众自身相统一呢?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17-18}。这个“哲学”,就是恩格斯后来讲的“我们党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①。而这个“我们党”,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中国,这个“我们党”就是既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自身与由人民群众自身“固有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社

^①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会力量,即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统一,由此成为真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本主体。正是因为如此,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片面性相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的全面性。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更是这种全面性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2.2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现实集中表现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国家治理体系由“人(人民群众)的空场”变为人(人民群众)的真正在场,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其与由人民群众自身“固有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统一,使“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21]39-40}。对于这种历史性的统一和历史性的设定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如果再回顾一下马克思揭示的人民群众由“政治解放”再到“人类解放”这两次解放的规律,探讨一下这两次解放带来的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的两次质变,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第一次质变是资本主义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使人民群众从“治于人”的单纯客体变为参与“治人”的治理主体之一。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个体力量”被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成为与人民群众自身相脱离的“政治力量”。就是说人民群众成为名义上的治理主体,而在现实中人民群众仍然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他们拥有的仍然是孤立的个体力量,无法发挥治理主体的作用。第二次质变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人类解放”,使人民群众从“治人”的“名义主体”,变为真正的现实主体。这其中的关键,正是马克思多次强调过的人民群众各个孤立的“个体力量”被“组织”成为与人民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

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成功,又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使人民群众真实地并愈来愈全面地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拥有了与其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就是党领导人民创建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依托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权力机关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行政体系、经济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等。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国家治理意志,正是通过这些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体现出来的。由此,人民群众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被组织起来的整体——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发挥国家治理主体的作用。这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的最主要表现。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仍然能够作为一个个体,发挥其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作用,丰富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还形成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新样式。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一方面,从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来看,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拥有了与其自身相统一的社会力量,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就使得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制、机制基础。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22]这种“完整的制度程序”,正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提供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制度上、机制上解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问题,极大地促进着人民

民主在质的飞跃基础上的量的扩张,这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全过程民主中的“完整的参与实践”,又会以自己在国家治理体系各个环节的始终“在场”,促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重要环节的民主选举机制、民主协商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的健全、完善,并促进这些环节相互衔接与贯通,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集中表现。

2.3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全面性的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现实的国家治理主体,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人民群众被我们党系统地组织起来了。与代表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西方政党截然不同,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人民衷心拥护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根据,也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全面性的根据。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实现。

党的先进性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能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固有的力量”,使他们觉悟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从“自在”的“固有力量”组织成为“自为”的联合力量。

党的先进性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作为“三个代表”引领着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3]4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这种引领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科学的纲领,使之成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24]415},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用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将科学的蓝图变为辉煌的现实,不断地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党的先进性在实践上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共产党人始终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模范,是“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25]394}的模范,是“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模范^{[26]330},“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27]522}。共产党人靠着“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靠着“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26]245},将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将每个人的固有力量组织成为磅礴的社会力量。

党的先进性在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26]346}和“铁的纪律”^{[26]246}。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27]24}。党还领导人民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我国国家机构必须实行的原则,使之成为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在根本一致基础上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的政治和法律保障^{[1]175-176}。党和国家这种组织上的先进性,就能使人民群众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中,把每个人“固有力量”组织成为现实的社会力量。

3 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深刻表明了二者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两大主体的紧密关系。而这种紧密关系将二者各自的力量形成历史合力,推动着国家治

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完善。从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系列实践需要——需要合格的治理主体、需要合理的价值原则引导、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需要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等方面,更深刻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更具体地彰显出国家治理最基本主体的人民群众离不开党、党也离不开人民。

3.1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真正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本主体。然而,人民群众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合格主体。

首先,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片面性或全面性而言,如果人民群众只是作为个体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则这样的主体是不合格的主体。与不合格的主体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只能具有片面性。只有使人民群众不但能够作为一个个体,而且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国家治理主体的作用,这样的主体才是“合格”的主体。只有合格的主体,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全面性。可是,人民群众是难以系统性地自己组织自己的,只有在独具强大组织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才能被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真正主体。

更重要的是,即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已经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格主体之后,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其“合格性”也会消失。因为,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就不复存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蜕变为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蜕变为多党争斗和政治争吵,统一战线将荡然无存,民族区域极易在内外势力的作用下走向分裂,等等,人民群众又将成为“一盘散沙”,重新成为国家治理的虚幻主体。所以,只有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个关键作用,才能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治理的合格主体。

其次,就国家治理体系处理社会利益关系这一重要功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能够科学化、制度化、机制化地明确和规范社会利益关系,能制度化、机制化、高效化地协调和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其重要前提是要形成和运用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正确阐明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并科学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人民群众自身是难以形成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并运用它正确认清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这需要我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中国,能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并武装给人民群众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国家治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正是在党创造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才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具有全面现代化新特质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备各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18]。坚持不懈用这

些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引领、教育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能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合格主体。因此,只有发挥好党的领导对于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治理合格主体的关键作用,才能形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合力。

3.2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必需的核心价值原则及其支撑体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构建起来

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28]现代社会是利益多元因而价值观亦多元的社会。西方国家将个人利益的价值观表现——个人主义价值原则抬到其社会核心价值原则的高度,形成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已成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之一^[29]。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利益多元因而价值观亦多元的特点也愈来愈明显。如果不能有效地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国家治理体系本身就难以系统地构建和完善,更谈不上现代化的问题。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原则及其支撑体系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来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呢?答案是明确的:只能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条红线——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及其支撑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绝不能是个人主义的价值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自身并不能自己产生、形成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因为,从现象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有相通性,即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压迫会使每一个市场行为主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其自发产生个人主义价值倾向。在西方,其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在现象与本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同一的,所以,其思想家就自然而然地将个人主义价值倾向从感性的“社会心理”层面上升到理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层面,形成个人主义价值原则,并以其为“利己的人”作辩护。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益关系在现象和本质这两个层面上是不同的:在现象层面、在局部中,利益关系是矛盾的,仍会自发催生出个人主义价值倾向;而在本质层面、在整体上,利益关系是一致的,能够成为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牢固“社会存在”。

可是,人民群众中的单个个体,或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团体,是难以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现象把握其本质,并在其基础上升华出集体主义价值原则来的。同理,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概括出来,与时俱进地发展为切合实际的理论形态,并输送给人民群众。如果离开了党的价值引领,市场经济自发的价值倾向与西方处心积虑地向我们进行的价值观渗透,就会合成扰乱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破坏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乱流”,同时严重毒害人民群众的价值观,甚至使人重新沦为“利己的人”和“孤立的个人”,使社会重回“散沙”状态,使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难以进行。所以,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引领上来看,也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以形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合力。

3.3 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政治利益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既是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成为最根本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由此,金钱成为“第一”政治资源的制度性安排被彻底废除,利益集团操纵政治的“管道”被堵死。这样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一方面就真正实现了政治资源的净化优化和公平分配——金钱及金钱运作下的利益集团政治操作、舆论

影响等被清除之后,人民群众拥有的“政治资源”的主要成分就被“净化”为国家平等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就能够使人民群众平等拥有的政治资源直接转化为他们的政治利益——经由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制度性安排,有效地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参与。

然而,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单靠人民群众自身,并不能保证社会政治资源的净化优化和公平分配。因为,如果抽掉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个我国根本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最核心的内容,脱离了能够将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会名存实亡;而脱离了党的领导的人民代表自己,也只能代表其所在地区和人群的利益,成为人民群众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代表,就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博弈。各种利益集团又会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展开竞争,最终会使金钱又成为“第一”政治资源,国家治理体系又会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最重要的政治利益——政治权利的实现。所以,从人民群众的根本政治利益上来看,也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以确保人民与党形成合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走向全面现代化。

3.4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才能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与重要内容。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也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要求之一,是按照人民主体作用最大化和国家治理效能最大化的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各种治理主体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更加巩固、主体作用才能全面发挥,国家治理效能才能全面提高。

处理好国家治理各类主体关系的关键在于“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0],形成“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31]那样的局面。这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18]。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作为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就被抽掉,国家治理的各类主体就会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无法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效应,国家治理效能就不但无法提升,而且会受到极大削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就会荡然无存,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巩固、主体作用也就无法得到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会化为泡影。所以,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要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角度看,也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以形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合力。

3.5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只有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持续努力,才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的现代化,并体现其全面性。然而,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单靠人民群众自身,并不能有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讲,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全面深化改革是这个基本点的与时俱进,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党的基本路线的另一个基本点的核心,只有坚持这两个基本点的结合与统一,才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偏离航向,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会落空。因此,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方向和道路的正确性,实现其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体现出其全面性,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上讲,对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规律、运行规律的要求更高、更全面,对把握社会各方面深层次利益关系、解决深层次利益纠葛的要求也更高、更全面,更需要“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2]。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单靠人民群众自身难以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制度安排层面,也难以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复杂关系。因此,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推进,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上讲,更需要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攻坚克难、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有组织的磅礴力量。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单靠人民群众自身难以激发出这样强大而持久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群众这种历史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需要他们的“先锋队”的动员、激励尤其是带动。如果没有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蓝图和行动路线图的动员和激励作用,如果没有党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极具潜能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就难以被激发出来、难以形成有组织的磅礴力量。因此,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实现其总目标、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也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党与人民共同形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历史合力。

4 结语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这四点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样适用。而“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这个论断,与马克思关于“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论断是一致的,共同揭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具有的全面性——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固有的力量”,将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使之与人民群众自身相统一,从而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本主体。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党与人民形成历史合力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走向全面现代化。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6],但“总的来说,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尚待深化”^[10]。尤其有两点尚待深化。第一是如何祛魅,即祛除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魅惑力。要对它祛魅,需要揭示其大前提的谬误,即指明西方国

家治理体系早已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因此不能作为我国要建设的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蓝本,尽管它们包含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共性要素我们也需要学习、借鉴。第二是如何正本,即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更深刻地认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全面地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内在关系,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性,更深刻地认识党的领导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更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更自觉地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
- [3] 邓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J].中国高等教育,2022(12):4-5.
-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 [5]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
- [6] 任剑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基于近期顶层设计的评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2-12.
- [7] 颜晓峰.“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时代回答[J].红旗文稿,2020(2):12-15.
- [8]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 [9] 文丰安,段光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历史变迁与发展进路[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3):105-116.
- [10] 李景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义、内涵和实现路径[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4):21-29.
- [11] 唐任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总纲领[J].人民论坛,2019(32):60-61.
-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N].人民日报,2021-12-05.
- [13] 美国民主情况[N].人民日报,2021-12-06.
-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 [16]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顾昕,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 [17]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 [18]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4-13.
- [19]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J].求是,2022(13):4-19.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2]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人民日报,2021-10-15.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14-02-18.
- [29]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
- [3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31]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J]. 求是,2020(14):4-17.

Leadership and Joint Forces: Party-mass Relations in th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SU Wei

(Tea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s that 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people are organized to become the real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have historical comprehensiveness. The main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people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determines that the Party cannot leave the people. The key role of the CPC in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can the people become qualified subjec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re value principle tha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 and its support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only be realiz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an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be better translated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an the people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achieve its overall objectives. This also shows that the people can't do without the Party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joint forces formed b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re jointl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Party leadership,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责任编辑:王 慧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内涵与塑造

蒙象飞¹, 单鑫²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83; 2.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政党品质是指政党的行为和作风所显示出的相对稳定的思想、品性、认识,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百年风雨沧桑,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情怀、勇于自我革命的大智慧、推动政党国际合作的大格局、肩负建设美好世界的大担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大党品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指导的历史必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浸润的精神必然,是中国同国际社会达成良性互动的理论必然,是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实践必然。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塑造不会一朝功成,只有遵循固本培元与理论创新相统一、教育引导与制度规范相结合、品质彰显与形象建设相一致、话语阐释与实践推动相协调的方法论原则,方能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创造历史新伟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塑造;方法原则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03-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63}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在永葆屹立时代潮头的强大自信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而铸就了属于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大党品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塑造与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品质能够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精神支撑,对于向外生动诠释大党形象、大国担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 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所谓政党品质,是指政党的行为和作风显示出的相对稳定的思想、品性、认识,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近年来,理论界关于政党品质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品质特质的基本分析。商志晓将表达中国共产党品质特征的方式分为两种:一为具体描述,一为抽象提炼,两种方式互为补充、交相辉映,而其通过抽象提炼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品质特征归结为先进性^[2]。其二,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品质的具体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构成了目前理论界研究的主体内容。其中,何克祥从坚持独立自主、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22BKS049),项目负责人:蒙象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方法论研究”(2021BKS004),项目负责人:蒙象飞。

作者简介:蒙象飞,男,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单鑫,男,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展全党整风、推动不断学习、深刻反省自身历史问题、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不懈严惩腐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具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宝贵品质^[3]；王小鹏立足政党类型学的视角，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内力塑造型政党，从而探究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自我”进行党的建设何以可能，并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独特逻辑^[4]；李海青则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入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价值理念、政策领域、制度体系、组织原则、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公共性，为解读中国共产党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5]。更多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之中，包括但不限于对于“坚持敢于斗争”“以人民为中心”等品质的叙述。其三，关于塑造政党品质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依托党的自我革命久久为功、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提高党性修养等。

以上研究对我们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内涵、生成逻辑的系统性剖析尚显不足，尤其是研究视野多停留在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经验与现实举措的解读上，无法在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世界历史进程所共同构成的双重坐标中切实把握大党所面对的独有难题。事实上，政党品质是建构政党国际身份以及政党形象的内核，是政党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这种软实力和无形资产对于政党与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互动交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内、国际双重视野，探究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具体内涵、生成逻辑及其塑造的方法原则，以期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地锤炼大党品质提供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核心内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50多人，发展到如今拥有超过9600万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的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仅用了百年时间。无论是从时间存续，还是从发展规模上讲，中国共产党都无愧于大党的称谓。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政党时所言：“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他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6]196} 大党之大，不在于时间存续和发展规模，而在于内在品质。在当今世界现存的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敢称“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在于其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主要源于自身具备的情怀、智慧、格局、担当等品质。

2.1 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情怀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7]与资产阶级遵循资本逻辑并将资产阶级政党作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不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坚持人民逻辑，将自己作为解放人民的工具。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不仅将“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8]14}作为自身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实现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最彻底的决裂，更是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并为最终建立保障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情怀。“中国共产

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9]570}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作为中国人民实现自身解放、追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将人民视为“水之源”“木之本”,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在百余年时间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逐渐引领时代的跨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自觉以及“人民政党”的大党品质。

在现代政党政治发展中,“作为组织基础的大众利益很少与已经被人格化了的官僚机构的利益相一致”^{[10]339}。如何维系与大众的联系,进而保持政党的代表性与先进性,成为各类政党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今中外的铁律。中国共产党以“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1]理念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困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形成了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也以百年奋斗重大成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带领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新世界。

2.2 勇于自我革命的大智慧

先进的政党是在不断自我革命、自我纠正中形成的。列宁曾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2]167}人无完人,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党亦是如此。因此,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走向成熟、强大的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敢于承认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百年强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强大的自我革命、自我纠正的勇气和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曾一度照搬俄国革命道路,导致年轻的党组织遭受打击。随后,广阔的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新天地,然而面对敌人的围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与尝试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伴随着迷茫。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及时纠错、调整路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使其成为“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3]。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中国共产党深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14],过去先进并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并不代表永远先进。为此,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极大提升。概言之,“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15]70}。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包括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品质,“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16]590},也是中国共产党继“让人民监督政府”之后找到的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百年存续,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剧烈的时局变动中变大、变强,一直是一些海外观察者的疑问。近年来,随着海外观察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特点、运行机制、发展动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规律等领域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从最初预言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崩溃,到鼓吹中国共产党只有实行政治自由化改革方能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再到在无可辩驳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

党一直都是成功者和胜利者,海外观察者逐渐被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自我革命、自我调适能力所折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和祛痼治乱的方式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智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2.3 促进政党国际合作的大格局

政党国际合作是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建设美好世界的必然选择。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作为维系社会过程与政治过程运转之间的重要纽带,政党不但以结构化的共同利益整合个体之间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为国家的平稳运行提供了制度化防护手段,而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合作与交往的基本走向,政党已经成为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新型行为主体。然而,在当今国际社会非传统安全危机加剧的严峻现实下,世界政党政治普遍面临多重发展困境。其一,西方国家选民对于政党集体的认同感呈现离散化趋势,传统政治价值观无法有效凝聚民众;其二,资本主义世界原本引以为傲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素人政治、强人政治的持续发展更是考验着西方传统政党政治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其三,环境保护、人权问题、南北贫富差距、恐怖主义等问题凸显,督促各国政党和跨国政党组织将关注点从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全球治理上来。随着世界政党政治进入新一轮调整重塑期,“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17]成为各国政党不得不回应且必须要回应好的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与其他民主党派保持了良好的政治协商与合作关系,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自觉肩负起促进世界政党沟通、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凝聚党际共识的时代责任。中国共产党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与世界政党广泛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推进互通互鉴,努力化解文明隔阂与文明冲突,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和增加确定性、稳定性。比如,通过举办全球性政党峰会,展示中国共产党的高远之志和战略胸怀,向世界政党分享发展经验与执政智慧,同时以开创性的方式搭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探索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塑造政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大党之大,格局须大。诚如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所言:“一个真正的全球观念似乎正在影响全球化向以人为本发展,关注危机人类未来的全球问题。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全球化,而旨在为公众造福,不仅有利于各个国家,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中国做了许多事情,引领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18]6}显然,在世界政党政治调整重塑的关键时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开展党际合作,将为中国共产党形塑大党品质创造历史机遇期。

2.4 建设美好世界的大担当

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使人类社会通达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愿景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源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实质是将全人类的命运逐渐关联起来的历史,其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抵达真正美好、和谐的世界。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其“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2],并身体力行投身于建设美好世界的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事业作为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援助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自己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19]514},帮助他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自身的伟大奋斗成就贡献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是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案、新路径。一是提供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了当下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等提供了思路,勾画了世界经济社会美好发展前景。二是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案。与固守传统全球治理格局、零和博弈思维甚至如今诉诸逆全球化浪潮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大国、大党责任,引导人类社会朝着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美好世界方向发展,回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三是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自身伟大实践破除了西方模式中和平与发展相悖的现代化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向世人昭示了开创适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可行性,为引领共同建设人类美好未来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

3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塑造的逻辑必然

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对内抑或是对外塑造大党品质,有其自身的逻辑必然,这种必然包括了源自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指导的历史必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浸润的精神必然、发轫于中国同世界达成良性互动的理论必然、直面于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实践必然。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是内在驱动和外在要求合力的结果。

3.1 源自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指导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生成与塑造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情怀、勇于自我革命的大智慧、推动政党合作的大格局以及建设美好世界的大担当,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与延续。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411} 作为以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而实现人类解放为根本旨趣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以追求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价值遵循,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在追求未来美好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毫不隐晦地面对自身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21]274},而是始终依据实践条件的变化推动理论创新,并将自我革命视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要求。面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性扩张而带来的对于人类解放事业的阻碍与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选择偏安一隅计较一时得失,而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也纳入其理论考察的范围,在恪守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决定性地指明“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0]413}。同时以“自由联合”“自愿联系”为原则,尊重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革命道路,“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22]549}。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生成与塑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在于其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依循现实情况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广阔的全局视野、深厚的世界情怀,产生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如果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考察,它实质上隶属于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从最初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到积极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3]127},进而开启中国快速发展的全新格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广阔的格局与宏大的世界视野。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带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性,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同时,中国不仅以自身的发展引领世界其他落后民族与地区挣脱资本主义单一发展模式的桎梏,鼓舞其选择适合自身文明传统与社会发展实际的现代化之路,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3.2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浸润的精神必然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形塑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24]318}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封建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将传统中处于弱势一方只能寄希望于君主拯救的人民改造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彻底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带领中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科学态度,坚持“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的方法原则审视自身,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64},全面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与水平。在与外界的合作交流中,中国共产党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交往理念,与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开展合作。此外,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向往,不仅契合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5],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而活力依旧的精神滋养。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是一味沿袭与照搬,而是着力挖掘与弘扬其中“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26]25},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7]。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还需以刀刃向内的坚定,以优良的品质、高超的政治能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行稳致远。由此,如何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中汲取精神滋养,孕育符合时代要求、经得起现实考验的新风貌与新风范,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18}的科学方针。诚然,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以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28],是进一步形塑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精神必然。

3.3 发轫于中国同国际社会达成良性互动的理论必然

从起于微末到屹立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于外部世界发展与变化的理解与把握。在由“被动卷入”到“主动参与”再发展为“引领变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国际体系“局外者”到“局内者”再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其大党品质的生成与塑造也体现着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思索与解答。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并没有为世界带来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却日渐构筑出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等级结构。与此同时,世界普遍交往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的矛盾性愈加凸显。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对现有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引向了逆全球化的深渊,试图重走保守主义的老路,更试图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国家以逃避自身责任。

与之相反,于满目疮痍中崛起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对外开放中积极主动适应、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从理念构想到实践方案的历史性飞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更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审视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62},为世界发展摆脱资本扩张的无序性与破坏性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时,也在向世人彰显着自身的大党品质。此外,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达成的共识,是人类价值观中的“最大公约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而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天下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双重超越。诚然,打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固有偏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突破口,寻找同国际社会达成良性互动的理论基底,“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9],在塑造与彰显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4 直面于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实践必然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百年奋斗重大成就,迈向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同时自身也面临着许多独有难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警示全党同志“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着党员数量巨大和组织规模庞大引致的教育管理难的问题、存续时间长引致的以永葆政党初心使命为核心的政党自我调适的难题,以及长期执政引致的以“四大危险”为代表的执政积弊的难题等。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需要塑造大党品质。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品质是解决其大党独有难题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这是因为,其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历史也早已证明,人心向背事关政权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无产阶级政党,离开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无本之木”。只有依靠人民参与和监督政府管理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中国共产党才立于不败之地。未来征程,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也只有展现自身的大党品质,才能赢得人民、赢得历史。其二,勇于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有效路径。苏共“亡党亡政”的例子警示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一项永恒课题,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因此,“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30]191}。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破解长期执政引致的以“四大危险”为代表的执政积弊难题的有效路径,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其三,推动政党国际合作、建设美好世界是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的根本之道。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和增加确定性、稳定性,如何在人类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找到正确方向,需要各国和各国政党提供智慧、承担起应有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展示世界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责任担当、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以及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以自身的世界大党品质、形象和理论积极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难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塑造的方法原则

政党品质的塑造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还是一个关系范畴和认识范畴,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情况,还需要依循科学的方法论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坚持”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征程中形塑自身的大党品质提供了根本遵循。除此之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品质,增强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同,还需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4.1 注重固本培元与理论创新相统一

所谓固本培元,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定无产阶级政党信仰信念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生成和塑造的理论之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也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使命与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创举中,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来把稳航向,需要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推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中考验着广大党员干部应对未知风险的能力与水平。在此种境遇下,需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坚定的理想信念滋养大党品质,增强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与政治素养,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广阔舞台中干事创业的能力。

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生命活力,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屹立百年而不倒世界大党品质的内在生成。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在于坚持独立

自主,坚持自信自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面对时代与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7}重大理论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的认知,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锤炼与塑造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着力点,发掘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进而为指导自身实践提供价值遵循;二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增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文化心理认同,从而坚定自身的发展方向。

4.2 推动教育引导与制度规范相结合

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从延安整风确立“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学习方针与集体组织学习的教育模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整风整党运动将“思想教育”与“纪律教育”相结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立足现实问题将理论准备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依靠严肃认真的教育学习,平稳地度过了一次次转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一步实现了党内教育引导从运动到活动再到主题教育的转变。自上而下的集中教育引导,有效地重塑并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与此同时,党员的组织认同与革命性、纯洁性也得以强化。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推动党内学习制度建设,以定期性、长期性、针对性的教育引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和知识修养,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锤炼和塑造大党品质不仅需要教育引导的“软约束”,还需发挥制度规范的“硬约束”作用。作为长期执政、全面执政的大党,维持自身肌体健康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筑牢制度的笼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尤其是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托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愈加完善。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刮骨疗毒的姿态、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清除影响政党肌体健康的一切固瘴顽疾,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得以进一步彰显。毫无疑问,面对外部严峻考验,只有坚持教育引导与制度规范相结合,以党内法规净化党员心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切实保障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展现求真务实的处事态度,增强敢于斗争、善做善成的工作本领,进而使党员通达“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理想境界,方是涵养政党优良品质的长远之策与根本之道。

4.3 坚持品质彰显与形象建设相一致

政党品质的彰显,需借助特定的形象塑造。将政党内品质具象化,有利于增强政党品质认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进一步加强“大的样子”建设的自觉性、主导性,重视多元主体同向、协调发力,以增强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影响力。

首先,明确党的主导性作用以坚定方向。党的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大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建设目标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大的样子”的形象建设需要有清晰的认知与明确的规划,把握形象建设的主导性,围绕形象建设久久为功。

一是把握建设主体上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统一整体,是自身形象建设的核心主体,形象建设的主导权不能旁落他人。二是把握建设方向上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认可,但在惩治腐败等一些方面,中国共产党仍遭受着质疑。对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保持政治清醒,以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三是把握品质塑造上的“内外统一”。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的国内现实、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分享功能突出的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使得信息公共化、国际化不断消融“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的界限。国内民众对党的品质的认知成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品质的重要渠道,国内民众也常常通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来建构党的形象、理解党的品质。彰显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要增强问题意识,及时聚焦、回应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整体上应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统一。

其次,激发多元主体的主动性以形成新动力。要特别注重党员个体以及民间传播力量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讲,党员个体的形象尤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就是人格化了的党的形象,是社会大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最直观窗口。因此,每名党员都要以高标准严以律己,遵循言行合一的品德操守,培养维护、塑造、优化党的品质形象的行动自觉,为党的整体形象建设增砖添瓦。此外,民间的传播力量可以更好地拉近与国外受众的距离。因此,应鼓励包括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文社科学者、熟知网络传播技术的自媒体达人、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群体以及知华友华亲华的国际友人等在内的多元化力量,参与到讲述中国故事、党的故事的行动中来,以包容且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党的形象来诠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质。

4.4 强化话语阐释与实践推动相协调

古语云:“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对于政党来讲,“言”主要体现为政党理论的阐释,“行”主要体现为政党的具体实践。政党理论与政党实践是彰显政党品质的主要来源,也是外界认知政党品质的重要窗口。塑造和彰显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必须依赖话语阐释与实践推动的协同发力,做到“言行一致”。

一方面,话语阐释赋予政党品质以感染力。这方面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和故事叙述方式不一样,要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本质、内涵,就需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此外,在对内阐释上,要注重话语表达的创新和提炼,重视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特别是向生活话语、情感话语的转换,用老百姓耳熟能详、容易理解的话语阐释党的治国理政的理论、理念,增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提升话语阐释的穿透力。

另一方面,实践推动助益政党品质以新活力。一是治国理政实践。要塑造大党品质,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认可,就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实际成效,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二是全球治理实践。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秉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三是传播实践。主要包括提高对外传播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变革回应—反击的被动传播模式,抢占国际话语权高地;积极开展党际间合作,扩大自身“朋友圈”;抓重要节点、关键问题等设置议题,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展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果,阐明未来走向,以开放赢尊重、以透明获支持等。

5 结语

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使命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大党品质。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大党品质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的重要基因密码。当下,中国正处在时代的交汇点上,与以往被动融入世界不同,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了世界大党、大国的时代责任,展现了其作为世界大党的情怀、智慧、格局和担当,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与众不同的大党品质提供了最好注解。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品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以及与国际社会的百年互动中锻造和形成的。塑造和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品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奋斗实践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在奋斗实践中进一步释放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和意志,在国际交往互动中进一步释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与各国政党、各国人民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共建美好世界的善意和决心。当然,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塑造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战略上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战术上的科学谋划,还需要策略上的有效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商志晓. 由“先进性”演绎出的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品质特征论析[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14.
- [3] 何克祥.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宝贵品质[J]. 探索,2022(2):103-115.
- [4] 王小鹏. 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类型学分析[J]. 探索,2022(3):95-107.
- [5] 李海青.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公共性——对中国共产党特质的一种解读视角[J]. 社会科学辑刊,2022(5):5-14.
- [6]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一九四五)[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0] 罗伯特·米歇尔斯.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 任军锋,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1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 人民日报,2013-08-21.
- [12]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12-19.
- [14]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1-09.
-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7]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7.

- [18] 马丁·阿尔布劳. 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M]. 严忠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9]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1]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0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5]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 人民日报,2014-10-16.
- [26] 列宁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7]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
- [28]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2022(14):4-8.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 人民日报,2021-06-02.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NG Xiangfei¹, SHAN X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quality refers to the stable ideology, character and understanding shown by the behavior and styl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which is a distinction from other parties. Over the past centenary years, the unique q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ng a large party is its people-oriented feeling, wisdom in self-revolution, pattern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its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Facing the intertwined background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the shap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i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it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spiritual necessity of the long-term infilt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necessity of reaching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sobriety and determination to solve problems. Only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unific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 as well as manifestation and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promotion, can we create a new historical caus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quality of large party, formation, principles

责任编辑:王 慧

韧性: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维度

田旭明,李智利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素养、品质和能力,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分析视角。从内在表现看,坚守原则和边界的底线意识、强大的因时应变和环境适应能力、卓越的自我革命与改革创新本领、强大的耐挫抗压与转危为安能力、恒定的奋斗意志和稳定的执政根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是坚定的人民立场、卓越的理论思维、真实有效的民主制度、开放包容的政党胸怀和气度、中华文明韧性基因的涵养等要素共同铸就的结果。面对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严密和优化组织体系、强化忧患意识、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是增强和维护党的韧性,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关键之举。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韧性研究,阐明党的韧性的主要表现、生成机理及其维护路径,既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的理论视野,又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中国共产党走向百年大党强党的内在基因和密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韧性;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15-12

历史和现实表明,强大的韧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党之治、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成就时指出,尽管我们面临“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的严峻形势,但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这一伟大实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党能力,同时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显著韧性标识。卓越的韧性品质、禀赋和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考验、屡克难题、屡办大事、屡创伟业的重要密钥。回顾过去百余年历程便可发现,中国共产党用实践,在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呈现出韧性特质并持续维系自我韧性,这是百年大党走向成功的奥秘所在,更是确保其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实现长期执政的坚实保障。迈上新征程,历史之变、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特征凸显,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各类风险更加难以预测,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维系和强化韧性品质、智慧与能力,依靠韧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党的政治形象和凝聚力,从而确保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走得更加坚实有力,始终成为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基于此意义,本文试图在阐明中国共产党韧性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剖析党的韧性生成的内在机理,探寻维护党的韧性的有效路径,把握韧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和理解。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课题“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ZDWT08),项目负责人:田旭明。

作者简介:田旭明,男,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智利,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韧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开放性与包容性、适应性与回应性、刚强性与柔韧性等品性的综合体现。近年来,韧性逐渐被引入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等领域,展现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思维和话语自觉。本文将韧性与政党相联系,旨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品格,展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屡遭挫折仍能图强奋进的精神密码,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外历史经验表明,衡量和检验一个政党成熟和强大,韧性是重要指标。缺乏韧性的政党,难以保持持续奋斗的决心,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瞬息万变,也难以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更遑论能力强大和长期执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2]这种政治品格就包含韧性。无论是历史上遭遇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还是今天“两个大局”交织和激荡下面对各种突发危机,中国共产党都准确把握了“变”与“不变”、“危”与“机”、“势”与“能”的辩证法,在保持定力的基础上主动调适和积极有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之治”奇迹。在这一系列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超强且恒久的韧性能力与品质得到了彰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团结奋斗,凭着龙腾虎跃的干劲、敢入虎穴的闯劲、坚忍不拔的韧劲,书写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3]。

将韧性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话语建构。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进行关注和思考,主要涉及党的韧性的内在含义、主要表现、生成之源及维护路径等方面。从含义上看,容志以现代社会重大风险为背景,认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抗击风险打击的能力和性质被称为“韧性”^[4];卢静、赵彦云通过总结国外主要观点得出,政党组织的韧性是指在经历变化时具有的一种能够抵抗干扰并进行再组织,从而保持其本质上相同的功能、结构、身份和反应的能力^[5];薛俊丽、黄欣荣基于系统观点,认为政党韧性本质上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的稳定和适应机制^[6]。

从主要表现上看,吴波认为,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主要由斗争性、适应性和牺牲性三方面构成^[7];李君如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韧性时,强调这种韧性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功能,能够主动适应实践与时代变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执政党^[8];康晓强指出,中国共产党韧性是一种强大的弹性、抗逆力、复原力,对外能及时适应瞬息万变的客观形势,对内能克服自身懈怠、自满等不良状态^[9];范嘉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韧性包含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维护内核、保持政治定力以稳定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以调适外围三种内在构成^[10];朱正威、吴佳则基于党的治理语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曲折进程中表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治理韧性^[11]。

从生成之源上看,金一南立足党史和军史视角,认为中国共产党韧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表现为一种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12];薛俊丽用“两仪”互动模型为视角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共党政党韧性是由政党韧性基因与政党韧性响应在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不断反思的学习精神促进下循环迭代生成这一结论^[13];余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韧性是党的适应

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这种韧性的直接来源是党抵御和化解风险的实际能力^[14];邹祥勇认为,中国共产党韧性源自崇高的信仰、鲜明的立场、严密的组织、主体的自觉、革新的能力^[15];周荣程则从根源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韧性是革命精神、科学理论和组织制度三者有机统一的必然结果^[16]。

从维护路径上看,张怀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守初心使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优化国家发展外部环境,构成了保持自身韧性的基本策略^[17];唐皇凤、李要杰在分析党执政韧性的科学内涵、基本表现和生成机理基础上,认为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政、党群、党际关系结构的开放性、成长性和柔韧性,是增强党执政韧性的关键^[18];李忠杰则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强大历史韧劲,应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19]。

总体来说,上述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参考和借鉴,但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主要呈现、生成逻辑以及未来持续性维系等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将围绕韧性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的表现进行揭示,并从政党文化、政党价值观、政党组织、政党制度、政党格局、民族文化等角度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韧性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党韧性的持久维系。

2 中国共产党韧性的主要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共产党领导及其政治体系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学术观点将共产党执政体制视为开放程度较低的体制。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没有出现体制性危机,反而在保持自身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创造了稳定和发展奇迹。巨大的历史反差不仅有力回击了“共产党国家衰退论”,还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和执政道路的独特优势,于是西方以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能动性、变革性、调适性为考察对象的研究逐渐增多,代表性学者如沈大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经发现自身“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20]5}。其实这些问题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韧性。纵观历史主轴,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与其坚守初心和使命、因时因势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的韧性品质与能力有着深刻关联。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固然很多,但始终保持强大且鲜明的韧性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一种柔软而坚实的优良品格,是强而不脆、刚柔并济、主动变革、灵活适应、遇危不乱等品性的集中体现,在辩证法视角彰显了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等对立统一关系,蕴含着在保持底线刚性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做出动态调适、灵活应变、柔性调节的智慧。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而言,面对当今社会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都要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制度架构、执政方式、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和化解转型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强自身韧性。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淬炼并形成了显著的韧性品质,主要体现为党在遭遇复杂多变环境、突变危机和严重困难时自觉调适、积极回应、动态修复、灵活应对、主动革新、迎难而上的意愿、禀赋和能力,蕴藏着刚柔并济、遇挫有为、愈挫愈勇的智慧和力量。

2.1 坚守政治原则和边界的底线意识

一个政党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其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丢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阵地,

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褪。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不是“任性”和随意化,而是始终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有约束、有边界、有底线。《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1]411-413}。这不仅界定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还用“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政治方向、目标、立场和担当方面的韧性品格。

中国共产党韧性品格体现在时刻坚守政治原则和边界的底线意识,这也是其柔而不断、遇危不乱的根源、前提和保障。底线意识强调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是“有守”和“有为”、底线和顶线、基准线和高标准、稳定思维和进取思维的有机统一。其中,原则和边界是分界线,讲原则、守边界就是有底线意识。坚守原则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必为”,强调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坚决性和斗争性。这些政治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任何违背政治原则的行为都只有弹性的一面而没有刚性的一面,都是在损害党的政治韧性。恪守政治边界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必不可为”,强调绝不能触碰最低界线、最低限度。这些边界主要包括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等。边界是红线,碰不得、踩不得、越不得。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始终坚守政治原则和边界,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善于将底线思维运用于治国理政全过程,确保了在任何变局环境中都不会丢弃政治初心和立场,展现了强大的政治韧性。

2.2 强大的因时应变和环境适应能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唯物史观,“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386}，“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22]139}。在保持定力的基础上展现适度弹性和张力,及时根据时代形势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作出灵敏反应、自我调适和积极斗争,以维系存在和发展的应变性和适应性是政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韧性特质的最典型体现。世界政党发展史证明,凡长期执政的政党往往具备较强因时应变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能根据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适时、灵活、有效地调整政策,进而有效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时代在前进,能否踏准时代节拍,适时而变、因变求进,及时适应时代需求,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同时也考验党的韧性程度。

亨廷顿认为:“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而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年代越久,适应力也就越强。”^{[23]11}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是针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及时认清动态走向,并通过自我调整、自我吸纳、自我革命来顺应时势的一种灵活应变能力,是韧性的体现,也是韧性保持的基础。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人民呼唤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摒弃僵化封闭,善于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展现出强大的反应、适应和调整能力。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变局时表现出的灵活性、调适性等韧性品质。

2.3 卓越自我革命与改革创新本领

一个强大且有韧性的政党必然是遇失误而反省、遇不足而修正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

能力。”^{[24]589} 正因为时刻保持自我反思、自我净化、自我变革、自我超越的高度自觉,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先进性和变革型政党本色,进而维护政治和组织的持久韧性。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曾遭遇各种阻挠,还面临一些腐败问题的侵蚀以及一些突发危机事件和局势的考验,但可贵的是我们党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及时反思、学习、调整和提高,与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对自身不足从不讳疾忌医,对腐败问题从不手软,对危机局势从不消极被动,对各种“赞歌”从不迷失自我,始终以鲜明的定力和勇气保持自我革命和破旧立新的精神,“敢于直面问题、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校正偏差”^[25],彰显了变革性和超越性的韧性政党形象。也“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6]541-542}。所以拥有强大韧性的政党,必然是善于自我革命和改革的创新的政党。

2.4 强大的耐挫抗压与转危为安能力

韧性除了坚实有力、刚柔并济之外,还包括在困难逆境、挫折失败或压力冲击面前的主动应对、有效适应、持久耐挫、快速恢复和化险为夷。对于政党来说,这是考量政党韧性最鲜明的指标。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应对并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时的抗压耐挫、闯关夺隘、绝处逢生,在挫折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是我们党历史韧劲的重要表现^[27]。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韧有为,在挫折困难和突发危机面前表现出强大的耐挫受挫、抗压缓冲、转危为机和转危为安能力。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斗争力量对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我们党顶住压力、坚持斗争且愈挫愈勇,彰显了顽强持久的坚韧精神。特别是面对一些“左”倾教条和盲动主义造成的损失,在经历湘江血战之后,党中央及时召开遵义会议,纠正错误思想路线,确立新的正确路线和领导核心,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特大洪水等重大灾难和危机事件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号召力和思想引领力,成功抵御了危机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展现出惊人的抗压荷载能力和转危为安能力。这种富含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耐挫抗压与转危为安能力是展现活力与韧性的“中国力量”,是党经受内外压力仍能持续生存生长并走向成熟强大的关键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的重要根据。

2.5 持续恒定的奋斗意志和稳定有力的执政根基

考量一个政党是否有韧性,还要看其是否能将其执政初心转化为实践恒心,能否围绕执政目标和政治理想而接力奋斗,能否始终保持稳定的执政基础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以攻坚克难的顽强奋斗力、坚韧忍耐力和深厚凝聚力为理想目标持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韧性的鲜活体现。

众所周知,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我们党从未淡忘,但也深知实现共产主义是理想性与现实性、阶段性和过程性的统一,所以在实践中以阶段性目标和量的积累来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实践积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接力奋斗,以新成就去实现理想目标。可以说,无论是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还是眼前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葆初心、凝心聚力、接续奋进、不畏艰难的韧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都得到了彰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党的执政基础从未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的根基和底气。中国

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工作宗旨,通过惠民利民政策吸纳更多优秀人士加入党组织,巩固扩大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并依靠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赢取民心。这一初心使命使我们党始终具有强大的民心感召力和稳固广泛的执政基础,任凭风吹雨打不惧任何风险挑战,始终能汲取营养、智慧和力量,从而保持强大的执政韧性。

3 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生成机理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能力和品质,是在历史和现实的锤炼与斗争中形成的,是其政治立场、理论思维、制度优势、政治胸怀、文化传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韧性生成的根本源头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一个政党形成并保持韧性的根本动力,尤其是“为了谁”这一根本价值导向直接决定了政党是否会保持韧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形成之初就怀着为人类幸福和解放而奋斗的崇高道德自觉,蕴含着鲜明的平等性、公共性、人民性、普惠性等品格。马克思说过,过去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1]411}。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1]413}。这种以无产阶级大众利益为宗旨的政治属性与所有剥削阶级政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革命、建章立制和创设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始终传承和弘扬这一政治立场和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8]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政治底色和本性。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任何困难挑战、危机挫折时都能赢得民众“舍小我保大我”的协力支持,及时汇聚民情民心、民智民力,形成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和最大精神同心圆,确保化危为安,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韧性。可以说,人民立场、人民性政治本色是党的韧性之根源,党的韧性是党的人民性之明证。

3.2 卓越的理论思维是中国共产党韧性生成的坚实支撑

理论思维是一个政党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政党韧性的维护和巩固,需要从理论上打开思想的闸门,让富有时代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理论观点倾泻而出,在延伸正确方向中引领韧性长久保持。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之所以历经风雨而淬炼成钢,经历多重磨难仍能突出重围,展现愈挫愈勇的强大韧劲,其秘诀就是具备卓越的理论思维。一方面,注重先进理论武装。列宁说过:“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9]2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致力于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不仅被历史所证明而且将会被未来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排除各类其他“主义”和思潮的干扰,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自身的思想坚定性、政治韧性和领导力也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有力彰显。另一方面,坚持推动理论创新。掌握了先进思想理论,但若不懂得因时因地因势创新,陷入教条主义机械思维,那理论的生命力就会窒息,理论的指导力和影响力也会涣散。中国共产党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但深知“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

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0]562}。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时代特征为考量、以历史为借鉴、以重要制度为依托、以科学方法论为支撑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且保持强大生命力与政治韧性的宝贵经验。每一次理论突破和创新,都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都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石,增强党的政治应变与回应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一直是相伴而行,理论创新前进一步,理论武装便紧跟相随绝不滞后,确保党的理论创新产生价值和实践效力。二者的合力促使我们党能时刻站在时代前沿,敏锐观察感知世事和时势变化,对存在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的问题能及时回应并提供对策方案,从而增强社会发展变迁中党的韧性。

3.3 真实有效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韧性的有力保障

世界政党兴衰史表明,只有真实管用的民主制度才能维护民众权利,最大程度上凝聚意志、汇聚共识,确保从社会系统中源源不断汲取鲜活执政资源,赢取特定支持,从而提升政党执政的科学性和生命韧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始终将民主作为立党和执政的重要基石。与近代以来各种旧的政治势力相比,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将自身民主的精神和真谛予以传承和弘扬。延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1]729}这段经典的“窑洞对”道出了民主对政党生命韧性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和发展,始终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用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这种民主样板和智慧“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32]。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和发挥这样的民主制度优势,才铸就了超强政治能力,开掘了能不断提供政治养料和智慧的活力源,形成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广泛参与的高效应对危机的应变机制,锻造了能有效凝聚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的“聚力型政党”形象和海纳百川、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政党格局,从而确保党始终拥有强韧的群众根基,遇危能迅速汇聚力化危为安,进而保持恒久的执政韧性。可以说,民主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韧性维系的坚实保障。

3.4 开放包容的政党气度与胸怀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韧性的活力支撑

是否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姿态是体现政党韧性如何的重要维度,也是政党维护韧性的活力支撑。只有保持开放包容的格局,才能善于吐故纳新,进而保持韧性生机。

中国共产党虽然具有原则性和边界性强的韧性特质,但并不意味着僵化守旧甚至与世隔绝。相反,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有大党的境界、气度和胸襟,是一个胸怀天下、“百川汇海,有容乃大”的开放型和包容型政党,始终以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这种兼具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的精神品质是坚定立场、原则和底线基础上的一种豁达、从容和自信,具有尊重差异的气度、包容不足的胸怀、开放合作的眼光,善于在求同存异中谋和、在聚同化异中汇力,对内能促使党

组织接受新的积极思想观念,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接纳优秀分子入党,借鉴新的体制机制。对外能扩大开放,消除偏见和歧视,尊重不同文明的交流借鉴,实现取长补短、包容共济、互利共赢。回顾党的历史,无论是革命时期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双百”方针、改革开放决策、“一国两制”制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开放包容的政治胸怀。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变动不定的环境中汲取一切有益文化成果、精神财富和新的元素进行自我调适、提升,保持革新性和超越性,进而在错综复杂环境中做到“游刃有余”,保持自身强劲的政治韧性。

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韧性形成的深厚滋养

政党的生成必定源于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的品性直接影响着政党的品质。具有强力韧劲的民族文化,其强大而无形的韧性之力往往能够赋予政党任何外部力量都压不垮的特殊韧性。“韧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基因的历史传承。”^[7]“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33]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基因不变、饱经风霜神采依旧,足见其内在韧性。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党的许多优良品质、精神和作风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与现实传承。中国共产党韧性既是党自身独有政治优势和内在禀赋的外在折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韧性基因滋养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韧性基因为党的韧性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坚实的精神支撑,赋予其虽柔却坚、至柔至刚的品格魅力。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张弛有度”“刚柔并济”“内外调和”的协调互补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为公”的担当和进取精神等,共同铸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韧性品质,凝结了坚韧有为、居安思危、慎独自省等韧性因子和智慧。这些鲜明的文化韧性基因赋予植根和成长于其中的中国共产党韧性气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韧性生成和强化的文化之源。

4 中国共产党韧性的持续维护

强大的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性,也是其百炼成钢的内在法宝,但这种韧性并非天然存在,也非自动维系,而是需要加以滋养和维护。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中国共产党更需要练好“内功”,提升抗压耐挫能力,增强调适性、变革性、超越性等韧性品质,这样才能进一步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

4.1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保持党的韧性本色

信仰是政党韧性品质和力量的深层支撑。缺失信仰的政党,其韧性也将失去灵魂和根基。“一个组织的韧性既包含有弹性的一面又包含有刚性的一面,后者是韧性生成的根基和关键。坚定的信仰作为刚性要素为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生成提供了坚硬的内核。”^[7]只有在信仰信念上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才能拥有战胜艰难险阻的智慧、勇气和魄力,进而为保持和提升韧性提供思想驱动力。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理论,其本身具有的思想体系、真理魅力、理论张力和开放品格决定着其生命和活力韧性。

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已有170多年,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今天仍然不过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的强大生命韧性和发展韧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淬炼出强大政治韧性的基因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韧性本色的根本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缺失或弱化,共产党人就犹如缺“钙”,缺乏政治定力和坚韧品格,一旦遭遇诱惑或危机,极易丧失党性原则和斗争意志。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信念动摇,造成党的韧性面临挑战。为此,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涵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培植精神家园,确保核心思想不变质、信仰不动摇,为维护党的韧性提供强大精神感召力和信念引领力。同时,要激励他们发扬斗争精神,与一切削弱、歪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作坚决斗争,捍卫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思想之舵稳固,在逆境、困境和险境中不摇摆、不偏航、不迷失。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决捍卫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才能挺起脊梁,守得住立场和底线,经得住考验与诱惑,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从而保持强大的思想定力和政治韧性。

4.2 严密和优化党的组织体系,巩固党的韧性基石

考量政党韧性程度,需要看政党组织体系是否严密有序、团结高效、刚健有力和应变自如。如果政党组织僵化守旧,必然会缺失韧性。所以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夯实韧性根基,就需要在自身组织体系及其资源配置上发力,提高组织的执行力、应变力以及开放性、调适性和回应性。

首先,维护党中央领导权威,强化核心意识。邓小平说过,“中央要有权威”,“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34]277}。党中央权威源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拥护和法理的支持,是党组织坚韧有力的“定海神针”。维护党中央权威、向核心看齐,与党中央步调、方向和节奏一致,可凝聚人心,保证党的意志得到有效贯彻,进而确保各级党组织在应对各类重要事项上的高效执行力,形成上下齐心、内外协调、高度聚合、刚强有力的强大组织体系,所以增强党的韧性就必须维护、捍卫党的领导核心并铸牢维系党的韧性的主轴。

其次,培育更多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组织力量。党组织能否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保持韧性,要看各级组织体系内的党员和干部是否具有勤政务实、信念坚定、敢于担当、善于应变的现代政治素养。如果党员干部懒政怠政,缺乏担当和斗争精神,在危机和困难面前就会容易失去战斗力、应变力、回应力和创造力,所以维护党的韧性就必须培养更多政治定力强、适应本领显著、变革能力优秀、担当精神突出的现代政治主体。

再次,增强组织运行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政党组织的开放和包容程度是影响政党韧性的重要变量和参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其组织形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政党的核心力量向各种经济、社会精英开放,使自己适应改革所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35]。今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增加、国家治理任务的日益沉重和治理要求的日益多元化与精细化,客观上要求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开放包容,政治体制的公平吸纳性进一步增强,民主决策和协商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对社会自组织的赋权和主体性也就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有利于减轻党的治理压力,提升社会治理活力,还能为党的组织体系输入更多鲜活的优秀资源和智慧,增强自身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的柔韧性与包容性,促使党组织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保持敏锐的变革性、适应性和超越性,进而维护组织韧性。

4.3 强化忧患意识,提升党的韧性能力

回眸历史,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危机中求生存、逆境中求发展,忧患意识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战胜困难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也成为党保持韧性的重要主观要件。

在新征程上,“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能否始终保持积极的忧患意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立解忧之志、践去患之行,成功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直接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能力。为此,要坚持底线思维。越是顺境,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所以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善于分析和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的风险、国内改革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以及党内消极腐败等政治生态问题,提升风险预判和见微知著能力,做到居安思危,打好防范抵御风险的有备之战;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刚性与柔性结合、守正与创新统一,敢于出击、迎难而上,提高应急处突能力和科学应变能力,确保对隐秘的潜在风险或突发性重大危机做出前摄性感知、应激性反应、前瞻性应对和持续性调适,打好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战。总之,保持和强化忧患意识,能促使中国共产党常怀斗争自觉,提升应变能动性,确保遇外力冲击应对自如有力,从而维护党的韧性。

4.4 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韧性禀赋

中国共产党韧性是党不断自我革命的结果。回顾党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6]⁵⁴¹。自我革命是党保持韧性的内生力量和根本保证,能为韧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意志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落细落小落实全面管党治党,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党的韧性得以有效保持。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需要持续发力。为此要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善于刀刃向内深挖伤疤,切除“毒瘤”,根除“病原体”,破除腐败这一威胁党的韧性的重要症结,不断纯洁党的肌体,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要勇于自我纠错、自我调适、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练就事前感知、事中适应、事后恢复的研判力、适应力和修复力,克服本领不足、恐慌和落后,更好地回应与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要健全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和长效机制,形成内力塑造型政党以内为主、内外联动的“引领机制—回应机制—执行机制—保障机制”有效运转的动力体系^[37],构建行之有效、高效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权力监督体系和执纪执法体系,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总之,中国共产党只有持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对内净化组织体系“内生态”,对外优化组织与社会互动的“外生态”,并保持“内外和谐联动”,这样才能够增强自身韧性的持续性和生命力,将自身锻造造成刚柔兼顾、应变自如、刚健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5 结语

在百余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展现了超强韧性,构成了党不断推进自身建设、战胜无数困难挑战的关键支撑。从本质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韧性源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源自党先进的政治品格、觉悟和素养。在新的长征路上,党的韧性只有越发坚固,才能使党在任何风云突变和危机挫折面前坚实有力,及时适应环境变化并根据变化动态调控、主动变革,保持顽强持久的战斗力,从而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以强大政党韧性保持党的基业长青。因而从韧性视角揭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品格,解读百年大党能够在重要关头转危为机、百炼成钢、铸就辉煌的内生性力量,构建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伟大而艰巨的目标任务、难以预测的风险挑战、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难题,都将考验党的韧性。中国共产党唯有坚定政治初心和使命,驰而不息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增强自身战略定力,做到遇变化积极调适和灵活适应、遇危机保持坚强镇定和从容应对、遇挫折保持总结反思和顽强斗争,充分保持和深化韧性这一内在基因和特殊潜质,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和执政能力、活力,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韧持久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3] 习近平. 在二〇二三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3-01-21.
- [4] 容志. 组织应变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理论解释——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 探索,2021(3):69-81.
- [5] 卢静,赵彦云.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际认知与传播[J]. 国际问题研究,2021(5):37-54.
- [6] 薛凯丽,黄欣荣. 政党韧性与稳定适应:中国共产党基业长青的系统机理分析[J]. 系统科学学报,2023(2):117-122.
- [7] 吴波. 韧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4):21-30.
- [8] 李君如. 历经考验却始终压不垮折不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韧性[J]. 理论导报,2015(6):12-14.
- [9] 康晓强. 中国共产党保持恒久韧性的奥秘[N]. 学习时报,2018-10-10.
- [10] 范嘉祥. “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J]. 理论建设,2021(3):45-52.
- [11] 朱正威,吴佳. 理解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语汇与韧性[J]. 中国行政管理,2021(7):30-36.
- [12] 李庆英,宋磊.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答问录[J]. 理论导报,2017(7):16-19.
- [13] 薛俊丽.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韧性:生成机理及其时代诉求[J]. 领导科学,2022(6):15-18.
- [14] 余玥. 百年大党的强大韧性[N]. 贵州日报,2022-01-19.
- [15] 邹祥勇. 韧性:百年大党走向成功的内在奥秘和品质[J].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1(4):24-28.
- [16] 周荣程. 浅析一百年来党的组织韧性的三大来源[N]. 中国文化报,2022-01-14.
- [17] 张怀东. 从百年辉煌看中国共产党的韧性[J].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21(5):1-5.
- [18] 唐皇凤,李要杰. 中国共产党执政韧性的科学内涵、基本表现与生成机理[J]. 探索与争鸣,2021(10):34-45.
- [19] 李忠杰. 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韧劲[J]. 北京社会科学,2021(6):9-11.
- [20] 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 吕增奎,王新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2] 列宁全集:第2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3]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5] 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新时代实践与重大意义[J]. 探索,2022(6):26-32.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7] 王珍. 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历史韧劲——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N]. 解放日报,2021-02-23.
- [2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
- [29]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第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2] 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2022(5):4-13.
- [33]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09.
-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5] 唐皇凤. 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9-27.
-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7] 王小鹏. 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类型学分析[J]. 探索,2022(3):95-107.

Resilienc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 “What Is Behind the CPC’s Success”

TIAN Xuming, LI Zhili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Resilience is a special political q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and also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What is Behind the CPC’s Success”. In terms of internal performance, the bottom line awareness of adhering to principles and boundaries, strong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excellent self-revolution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skills, strong ability to withstand setbacks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constant will to struggle and stable governance foundation demonstrate the resilience of the CPC. This resilience is the result of a firm stance of the people, excellent theoretical thinking, a real and effective democratic system, the openness and tolerance of a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esilience gen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face of today’s highly uncertain complex society,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and maintain the resilience of the Party,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of the CPC on the whole and clarify the main express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aintenance path of the Party’s resilience, which will not only help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research, but also help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genes and codes of the CPC to become a century-old big party and strong par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责任编辑:王 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

——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

叶娟丽, 曾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规则;治理效能;乡村治理;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27-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31}。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中央深化农村改革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因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具有多元化的目标价值取向,既可盘活农村的要素资源、加快经济增长,又能增强民生福祉、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和谐,还有利于践行党和国家意志、巩固基层政权。基于此,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于一身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所具有的上述功能与作用,使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多种模式。但从乡村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集体经济发展并未按照预期自发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甚至出现集体经济增长但治理效能弱化的悖论。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种不同形式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探究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逻辑机制,进而探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1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学界也对这一乡村振兴实践形式给予了极大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2BKS172),项目负责人:袁明宝。

作者简介:叶娟丽,女,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红,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展开。其中,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1.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三层关系

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得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结论。

一是集体经济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财力支持。学者普遍认同,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为乡村社区公共财力提供了基础和支撑^[2],进而能够在实现村庄公共物品供给^[3]、提升乡村社区的福利水平、突破农村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开展民主活动和民主管理^[4]³⁸³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最终有利于建设村落共同体以及维系乡村社会秩序。

二是集体经济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主体支持。主体支持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提升村庄精英的领导能力来影响乡村治理。具体来说,集体经济有助于吸纳精英进入乡村治理队伍,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村干部权威声望^[5],增强村干部奖惩能力、强制能力^[6]。另一条是通过增强普通村民的归属感来影响集体行动,包括提供分红、福利和公共物品,直接增强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与支持^[7],以及通过村干部领导力间接增强村民归宿感^[8]。

三是集体经济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组织支持。学界对组织支持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由经济学和法学学者提出的“政经分离”。他们认为,“政经不分”会导致集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非专业化、内外部监督双重失效、无法实现集体资产优化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只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才能在厘清组织关系、明晰组织职责的基础上,有效避免政经边界不清与侵权越权的现象^[9]。另一种是由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提出的“政经合一”。他们认为,绝大部分村庄可能仍要沿用原有的“政经统合”治理模式^[10],同构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组织,通过制度供给、治理资源输入、新型治理权威塑造等途径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11],能够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乡村治理成本^[12],提升治理效率与效能^[13]。

1.2 案例选取与问题提出

总体来说,既有研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物质基础、主体培育、组织建设等视角进行了集中讨论,其内容侧重于分析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正向作用,并不完全契合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现实关系。根据《2021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总体上呈持续增长态势,但是经济进步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14]⁷⁷。这与笔者团队的调研发现高度契合。笔者注意到,具有相同表象的集体经济发展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果,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比既有理论揭示的要更加复杂,集体经济发展形成的治理资源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有成果并未对此进行充分研究,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逻辑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本文拟以山东烟台X村及广东广州Z村为例,比较两种不同形式的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集体经济同样发达的村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治理效能?发展集体经济形成的经济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从乡村治理效能的视角出发,究竟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择了两个表象相同但治理效能不同的农村集体经济案例。这两个案例的相关资料均为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山东烟台及广东广州开展田野调查所得。

2 治理规则: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分析视角

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很多学者关注到了治理规则这一可贵视角。如狄金华等指出,传统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正在实现“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从注重“谁在治理”到“如何治理”“怎样治理”的转向^[15]。治理在本质上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依据一定的规则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中配置公共资源、建构基本秩序的活动。因此,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具有两大优势。一是“实践”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证据^[16]。在一个不可分割与辨明的真实治理场域中,对以实践为中心的“深层结构”的研究能真正把握基层治理实践的内核。二是“解释”构成经验分析的核心方法。围绕基层治理领域中不同要素的组合形态以及诱发治理实践机制的讨论,能够形成对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立体化和多向化理解。

2.1 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规则—治理效能”的解释框架

基于“规则”在理解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本文建构“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再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治理规则重构的全过程,抽象出经济资源的生成、使用与分配作用于治理规则的机制,以帮助理解集体经济现实发展中的治理效能悖论。这一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一是资源。吉登斯认为,“不能脱离资源来概括规则”^{[17]16},而“资源,指的是这样一些模式,转换关系可以借助它们真正融入社会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性特征也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17]16}。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也就是权力生成过程中的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结合议题性质,本研究中的资源主要指配置性的物质资源,尤其是以集体经济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公共物质财富或集体经济资源,同时也包括权威性的非物质资源,即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一些关系对另一些关系的支配力量。

二是规则。对规则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从“组织制定”以及“行为规则或游戏规则”的意涵来定义规则(制度)。如奥斯特罗姆认为规则即“有关什么行动(或结果)是必须的、禁止的或允许的,以及不遵守规则时会受到什么制裁的规定”^{[18]39};诺思认为,制度主要指“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19]。而另一类理解则侧重从“约定俗成”和“实践意识”的内涵来认识规则。如吉登斯就认为可以将“社会生活中的规则看作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以加以一般化的程序”^{[18]20},而这类技术或程序定位于记忆痕迹中实践意识的部分;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结构来运作的结构^{[20]256},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它不是一种内在力量,而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使人在特定情境出现时自觉遵循规则。总体而言,规则既包括宏观结构上的制度设置,又包括微观结构中的实践原则。本文从广义上理解与使用“规则”一词,认为规则是在基本原则之上调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需要遵循的例行化规定。而治理规则是指基于共同目标的多元主体在对相互竞争或冲突的情景中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所遵循的那些制度规定和实践原则。

三是治理效能。治理效能是指多元主体将治理目标转化为治理成果的能力及其所取得的治理效果^[21],其评价维度至少包括效率与公平。其中,效率维度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涉及治理是否有效解决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

是否保证治理的各层面、各领域、各环节能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否保证治理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与防范化解风险等问题;公平维度关注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救济公平等多个方面,涉及治理资源是否得到公平分配及治理过程是否彰显社会正义的问题。

2.2 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的两重逻辑

“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即资源、规则与治理效能。这三者之间存在至少两重内在的逻辑关系。一是资源可以转化为两类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工具,即通过权威性资源,控制与引导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通过配置性资源,在特定社会人群中分配与使用物品或商品。二是资源与规则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进而制约着治理效能。

资源转化为规则,进而通过规则影响治理效能,主要体现在利益、权力和意义三个维度。利益维度是指资源作为利益的物化形态,是一切社会联结的基础,而规则正是社会联结的产物,行动者首先是通过资源背后的利益博弈来生成规则的。权力维度是指资源既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同时也对行动者构成结构性的制约;权力既赋予行动者以行动能力,行动者又可以通过权力博弈产生规则。意义维度是指资源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义,而这些意义的构建与改变,最终会体现为规则的变更。在某种程度上,规则是在利益、权力的博弈以及意义的再构中不断生成与更替的过程,也是资源生成、使用与分配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资源制约建构了规则。在本文中,集体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就是一个资源生成、使用与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引发的多元主体复杂的利益、权力博弈以及意义建构,也是对乡村治理规则的重构。

2.3 农村集体经济影响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基于“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集体经济对治理效能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就利益维度而言,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利益分配方式会影响个体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具体样态,而这种利益博弈最终会影响村庄内部社会联结的公正或公平性质。其次,就权力维度而言,村庄集体经济的股权结构设置在集体经济成员与集体组织之间形成权力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会影响到乡村治理规则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状态。最后,从意义维度看,集体经济的组织与发展可以通过经营参与方式来形塑村民自身的意义认知,再构村民对村庄的权利、责任关系,进而影响村庄治理效能。

显然,在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庄治理效能之间,治理规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变量。农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目标是促使公共性在现代治理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建立公共性治理规则的政治实践即意味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22]。因此,治理规则或者说治理规则的公共性直接影响具体的治理效能。在这里,治理规则的公共性是指治理规则无涉于个别利益或专门利益的中立性质,其反义词并非私人性,而是指破坏这种法则的行为,是一种非公共性。在本文例举的集体经济发展案例中,治理规则的公共性主要体现为治理规则的能力,而非规则形式的建设,其最终指向的是对村庄秩序的维护。笔者在山东、广东两地农村的调研中发现,同是运营集体经济,但由于集体经济的组织与发展在公共性上的取向不同,最后会形成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形成迥异的治理效能。反过来也可以说,集体经济带来的不同治理效能,其根源在于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差异。而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差异,则又源于当地集体经济在原始资本获取、产权结构、运营过程和分配环节等发展全过程对规则的不同取舍。

因此,本文拟采用“资源—规则—治理效能”的分析框架,对作为乡村治理重要基础的两个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个案的发展全貌进行描述,具体分析集体经济如何通过乡村利益、权力博弈以及意义建构等对村民自身观念、村民与村民关系、村民与组织关系进行重构,力图厘清治理规则在村庄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探析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下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之道。

3 社区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性的治理规则与治理有效

合作经济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是今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强调社区性综合合作,即“三位一体”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建村庄治理规则公共性、培育农村集体社会资本,最终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山东 X 村即为社区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X 村位于 C 镇中心地带,距镇政府驻地 1 公里。全村共有 108 户,户籍人口 300 人,常住人口 201 人,耕地 508 亩。近年来,作为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村庄,X 村集体经济不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其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与村庄治理的良性互动,展示了集体经济发展向村庄治理效能成功转化的机制。

3.1 社区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依靠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富裕起来的 X 村,曾经一度是市重点扶贫村。村民间的关系矛盾重重,而且这些矛盾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被激化。基于此,X 村开始积极寻求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村庄整体治理的方式,壮大集体经济就是他们找到的发展之路。该村的集体经济壮大主要依靠 P 集团的建设。P 集团是一个集农业、工业、商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在农业方面,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业公司”的模式进行经营,年收入在 75 万到 80 万元左右,年利润在 10 万元左右。在工业方面,X 村成立橡胶和轮胎翻新有限公司,年营业额达 2 000 多万元,年利润在 400 万元左右。在商业方面,X 村成立商贸服务有限公司,主要通过出租 C 镇商业街上的服务楼获取租金,每年租金为 20 万元。X 村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在 430 万元左右,收益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集体经济再生产;二是投资村庄社会事业。集体经济的注入,使 X 村在经济和治理方面都体现出极强的发展性。

在经济发展方面,X 村的经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需要的市场思维与政策思维。在生产计划制定中,该村会根据当年的市场调研,针对原料成本、市场价位、市场风险等因素,及时调整任务量,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对于合作社来说,则是及时调整种植种类与种植面积。在生产过程管理中,X 村始终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X 村轮胎公司在实践中反复摸索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标准和生产规范;合作社则通过职业农民和规模种植等现代农业方式,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专业管理。在生产技术运用中,根据经验积累和市场需求变化,不断进行专利研发与技术改良。X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特别强调“讲大势”,即遵循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具体体现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保、安全与技术创新。

在治理的发展性方面,X 村集体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并且通过对村庄物质基础的再造,实现了村庄文化和价值的重塑,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提供就业机会,村办企业优先解决本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统计,在 X 村集体企业中本村员工占比约 66%。二是改善村庄居住环境,包括建设保障性住房、村内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和街面亮化等。三是重塑村内公共空间,如修建村广场、“夕阳红”养老院和公共陵园等。四是为村民的年

终分红和其他福利提供保障,村民每年都能获得村企的股份分红及合作社生产的农作物,年满60岁的老人还可获得老年金、免费午餐、免费旅游等。五是注重建设村庄文化。在X村内,随处可见各种反映村庄文化的载体,包括村墙上的党建标语、孺子牛雕塑、“忠诚”石碑、公共陵园中的“逸”字碑等。

X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其对市场与政策环境的主动适应。X村集体经济通过扩大生产为村民及村庄积累了物质财富,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集体经济参与过程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参与感和归属感,进而形成了村庄的善治格局。

3.2 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与村级产权的民主集中

产权和治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其中,产权作为一束权利,与作为权力的治权,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产权与治权又密切相关,如产权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意识,进而影响其对治权的认知与认同,从而作用于乡村治理,改变村庄的治理样态。

为确保村级经济产权始终掌握在村集体与村民手中,X村的村办企业全部实行股份制。如村办轮胎公司是股份制企业,村集体在集资入股时规定了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60万元,每股1万元,村民自愿入股。其中,村集体占股52.5%,主要以土地、厂房等生产资料以及技术入股;村民等其他自然人占股47.5%,其出资构成公司运营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X村合作社也采用股份制,注册资金为1300万元,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共同占股51%,其他外来资金、技术、人员入股占比49%;在村集体与村民个人的股权配置方面,村集体占比50%,村集体主要以水利、电力、机械、仓库等生产资料入股,村民则以土地入股(1亩地为1股)。

从X村的股权设置可以发现,无论是村办企业还是村合作社,无论是对村内成员还是对外来资本,村集体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这一主导地位在股权上仅有微弱优势,不会对其他成员构成排斥。这种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并非出于简单的物质利益考量^[23],而是有其更深的政治逻辑。中国农村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一独特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农村治理既不能采取行政制,又不能采取家长制,而只能实施村民自治^[24]。从国家的立场出发,有效的自治就是通过民主方式形成村庄秩序,通过内生力量动员达成治理目标。但现实中,村民自治发展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因此,基于村庄本位实现有效自治,一是要构建成员与组织间的关联^[25];二是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即处理好村民个体与村集体的关系。而X村的股权设置,正好满足以上两个方面要求。

3.3 劳动过程式的参与与村庄治理的权责统一

在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及小农经济背景下,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以及财政有限的制约,古代的封建国家政权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进入基层社会,因此在农村地区形成了自治的传统。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接续了社会自治的传统。直到21世纪初,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开启了资源下乡的时代;同时,伴随着资源下乡的是国家权力和行政规则的下乡,村庄的自主性空间被压缩,村庄治理责任也逐渐被顺势转移给了国家,村民的自利心态和“等靠要”思想凸显。这正是当前基层治理困境之一。

为了提升村民的责任意识,X村动员和鼓励村民通过自愿的形式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的生产和管理。作为股东,所有集体企业的成员可以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听取并了解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可以作为劳动者参与集体经济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全过程的劳动参与,不仅

增强了村民自身的生产与管理能力,同时也促发了他们对于村集体企业的责任意识,进而形成了有利于村庄治理的舆论氛围。X村村民通过劳动过程式的参与方式,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权责统一,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权利意识的制造,即让村民意识到参与村庄集体经济的生产与管理,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项权利。首先是就业优先权。X村规定,股东中每户可以有且只能有1人进入入股公司工作,从而将村民意识有效地从“我必须为村企工作”转换为“我取得了在村企工作的权利”。其次是信息知情权。不同于股东获取的信息,村民作为员工参与集体经济的生产过程,能获得更为全面真实的信息。这种信息权利使得村民有了一种区别于财务审计的全方位、长时段的对村庄治理进行监督的力量。

二是村民实质性的福利获得。村民加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一方面可以享受就近工作附带的好处,包括方便照顾家庭、节省通勤时间与成本、节省租房等生活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因此获得一系列福利,比如获得等于或高于在市场上其他同等企业就业时的工资性收入。

三是村庄责任生成。一方面,X村采用股份制增强员工为自己劳动的意识,进而生成劳动责任;另一方面,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是村民在劳动关系中获取社会认可的有利空间,个人努力工作促进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乡村社会的正向反馈,从而形成一种约束村民继续努力融入集体、服务村庄的责任。

概言之,伴随着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权利释放,劳动从单纯的谋生手段转化为村民自我实现的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获得感和自我实现感的双重提升。X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通过村民的劳动过程参与,将村民放置在职业管理情景中,使其重新进入社会学习过程。以权利作为中介,在村庄管理与劳动管理互嵌的设置下,生成村民对村庄的责任意识,塑造村民权责一致的认知,使得压缩的治权空间被重新打开,将国家和集体对村民的单向责任变成与村民之间的双向责任,从而促进村庄治理中的责任与权利平衡。

3.4 公有利益的分配逻辑与乡村社会的公正原则

公正作为人们永恒追求的社会准则,是一种由多要素组成的对社会现实的评价性反应。坚持公正应考虑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合理性,尊重并承认个体的差异与贡献,关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注重调剂原则的运用,缩小初次分配中的差距,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正常运转^[26]。基于人们对公正的渴望以及本村的现实,X村集体经济发展始终围绕“公共利益”展开。所谓“公共利益”,在法律上是指脱离了个人而存在、既不能实际分割为个人所有、也不能由个人按照一定的份额享有的利益,任何个人都不能成为公有利益的权利主体。X村的“公共利益”主要体现为集体收益除了投入集体经济的再生产外全部投入公共事业之中形成的利益。在X村,公共利益主要包括就业机会、经济适用房、良好的公共环境、社区文明生活、社会福利的发展等。

公有利益的分配逻辑有利于建立乡村社会的公正原则。如基于公有利益的村庄公共事业,村民开始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规则。一方面,在本为小亲族类型的村庄内部生成了集体认同感。小亲族类型的村庄通常会呈现出较强的面子竞争以及村内斗争^[27],但X村通过集体经济活动的参与,模糊了传统的关系边界和利益边界,“尤其是年轻一辈对门子的认识都较为模糊,感觉全村都是一家人,也不太能往上追溯祖辈们的关系”^①;另一方面,新型集体经济生活中

① 笔者于2019年7月15日上午对C镇X村LHF的访谈。

的忠诚教育和美德建设,塑造了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基于这种以开放、包容、认同等价值构成的共同体观念,进一步确立起乡村社会的公正原则。

“公有利益”本质上意味着某种不可分割、不可私人化的利益联结,与公共性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是基于公有利益的分配逻辑,X村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既确保了多数人的多劳多得,又保障了少数弱势人群的最高生存需求,从而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生活满意度。而这种获得感和满意度又给村庄治理带来了良好的正向反馈,个人在村集体经济生活中展现了个人潜能、实现了自身价值,村民互相之间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实现了合理化的再平衡、产生了新的社会联结,进而为村庄的良善治理创造了适宜的社会基础。

4 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基于非公共性的治理规则与治理失效

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也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为了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强调明晰的产权制度设置,致力于使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以提升农村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广东Z村为股份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Z村位于某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所在的N街道,全村由5个经济社组成,共903户,户籍人口2282人,外来人口4639人。该村于1980年分田到户,村集体无预留地,直到2009年整村征地以前,该村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Z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源于征地。为了解决在短时间内获取的大量土地出让资金的分配问题以及减少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争议,Z村采用股份合作方式对集体资源及收益进行了确权,开始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但Z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只是让村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在环境整治、公共事业发展等方面,Z村的表现都差强人意,经济发展与治理有效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实现。

4.1 股份合作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危机

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以股份设置为重心,以分红为结果,围绕股权建立起利益联结,更具有经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集体组织的经济属性以及乡村治理规则的非公共性。伴随这种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出现了“发展悖论”和治理失效。以2021年为例,该村集体经济的年收入约为3000万元,除了村内小型农贸市场和厂房出租、银行利息外,主要由预留地租金构成,其中430亩预留建设用地因办下了工业用地指标,以6.4万元/亩的价格出租给合作单位;另有75亩土地下放商业用地指标,目前正寻找意向单位;余下100多亩留用地处于返租状态。

虽然Z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远远高于X村,但在产业建设和村庄治理上呈现出无发展样态。在经济发展上,虽然Z村地处珠三角国家级开发区,有较为优越的外部市场条件,但该村的集体经济只能以土地的形式进入市场,集体发展产业的可能性被锁定。以Z村3亩有证土地“晒太阳”为例。该村在某次征地中,被征10多亩地,并因此获得3亩留用地。这3亩地获得了开发许可证,位置优越,但因为地块太小而无法招商,村委只得为其另找出路。有一种方案是在该地块上修建公寓进行出租。公寓修建的面积预计1万平方米,建设预算1500万元,虽然这笔投资的市场风险不高、收益也很可观,且村集体自有资金也能够相对轻松地负担这一笔支出,但是村民反对这一投资计划。根据调研中该村支部书记的说法,因为“(村民)只有个人眼前的利益,分少一分钱都不愿意;也别想拿我一块变十块,分红也只能提高,不然都说村里贪了”^①。在村民的反

^① 笔者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对N街道Z村党支部书记GRJ的访谈。

对下,这块土地从2014年到2021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村干部笑称其为“晒太阳”。

土地闲置“晒太阳”是Z村治理的一个缩影。虽然Z村村集体收入能够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该村治理状况堪忧。不仅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落后、村民居住环境较差,而且村庄文化建设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几乎所有的公共决策都难以达成共识。以公园修建为例。一方面,村“两委”想为村民提供一个健康集聚的公共场所;另一方面,村民也想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园。但就是这样一件于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在Z村并没有做成,因为公园的落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公园建成后,无疑是属于所有村民的公共物品,建设资金来自村集体或者大家集资。但公园只有一个,其落址只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必定只便利一部分人,而距另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相对较远。就这样,由于公园的选址无法保证距各经济社的路程完全相等,村公园最终没有建起来。正如调研中村干部所抱怨的,公园的“修建只能依靠政府批款,政府要是不批也就没有了”,除了选址无法达成共识,“村民也不想把自己的钱拿去用。目前村里的公共建设还是需要依靠政府的项目,没法动用村民的钱”^①。

4.2 个体主导的股权结构与缺少共识的形式民主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形式,多数是基于股东同质化的一股一权配置形式。这种股权结构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强化合作组织内部治理,避免双层股权结构那样的超级表决权^②;二是强化对控制权的外部监督,人人都有表决权;三是不存在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也不存在代理成本问题。Z村的股权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一股一权的配置形式。

自2009年整村征地以后,Z村形成了本村的成员认定、股份认定以及分红方案。这些方案包括:第一,Z村成立经济联合社,下辖5个股份制经济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实则为一个自然村,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征地前该村的土地分属各社,因此整村征地后的留用地也按比例返还给各社。各合作社实际掌握着本社集体资产及其社员的分红,而经济联社主要负责制定总体性规则以及管理村级集体资产和账目。第二,村级集体经济成员需要满足一些限制性条件:一是必须持有本村的农村户口;二是遵守村规民约,如回迁户、外嫁女、离婚媳妇、与第三人产生事实婚姻者,不能享有村级福利待遇。第三,本村股份按照年龄变动或生增死减的办法进行调整,如0~10岁可享有4个股份,每增加10岁就上调1个股份,每位村民上限为10个股份,每年进行一次股份调整。第四,集体与个人的股份比例,以隶属村委的机动地29亩为基准设定村集体股份,村级合作社的其他股份设置则以村民个人股为主。第五,依照股份,经济联合社每年进行两次分红,每半年分发一次。总之,Z村集体经济的实质管理权限在合作社一级,集体经济的收益主要用于村民个人分红,村经济联合社对于集体的人、财、物的主导权都非常有限。

从形式上看,Z村这种由个体主导的股权结构,清晰地界定了村民与村集体间的经济关系,最大程度地实现了集体经济中村民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激活了在中西部地区悬浮于村民的民主程序。比如,在Z村,村民会积极参与合作社的会议并定期查看村庄里的公告栏,也会在对村情持有疑惑时主动进入村委了解具体情况。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上,Z村严格遵循“四议

^① 笔者于2021年11月18日下午对N街道Z村党支部委员GYA的访谈。

^② 一种非常规的股权结构,在传统“一股一权”的基础上允许部分的“同股不同权”,以确保创始人及其他大股东在公司上市后仍然对公司保留有足够的控制权与表决权。

两公开”的民主程序,依照群众真实意愿作决定,所有需要村民参与决策的事项,都要经过每一位成员或村民代表签字画押以后才能生效。如果村内决策没有完全依照程序,往往也会引发村民对村庄治理的质疑,进而影响村庄相关工作的开展。此外,在财务公开方面,Z村集体的每一笔收入支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统一格式及时公布在村财务公开栏上,以接受村民监督。

Z村的治理不可谓不民主,但令人疑惑的是,Z村这种以村民个人为本位的“一股一权”、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并未带来相应的治理有效,村庄的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状况都令人堪忧。究其原因,Z村的治理民主只是一种无法达成共识的民主,它既有直接民主的优点,也有直接民主的缺点——无法作出决定。而且,集体经济活动激活了村庄传统的宗族性,使得传统宗族势力在房头的基础上聚集形成私利集团。在Z村,村民代表有时只是宗族小团体利益的代表。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心、对村庄集体生活的参与,很多时候是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宗族利益,因而成为村庄公共生活中撕裂性的力量,村民个体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时都只是特定的少数,并没有形成代表村庄集体利益的相对多数,使得村庄治理缺乏效率。

4.3 股东监管式的参与与村庄治理的权责失衡

在股份合作制中,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却并不承担公司经营方面的连带责任。Z村的集体经济作为典型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村民对于集体组织的责任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典型的地租型集体经济,Z村的集体经济收益主要依靠土地要素直接进入市场收取租金获得。由于地处土地资源稀缺的珠三角,该村能够获得稳定且较高水平的租金。Z村这种地租型集体经济无法生产出地租收益以外的关系,村集体成员都只能以监管方式参与到村集体经济当中。受较高利益的刺激,村民参与监管的积极性很高,且对村社的财务与决策程序公开有着较高的要求,比如每季度常规的村务公开内容^①就有数十项。除此以外,每次村务决策重要会议的通知、会议纪要、成员表决表以及涉及的文件等,也要全部公示。这种股东监管式的参与,形式上是村民对村务的关心,结果上也训练了村民民主参与的能力,但实质上是村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或者说是其股东权利的一种外化形式。

Z村这种股东监管式的参与,结果就是村民对村集体的有权无责。一方面,明确的股东参与规范和分红方案,是对村民个人权利的强化以及利益分红的保证。在利益的刺激下,村民积极参与监管,在增强其权利意识与民主训练的同时,也容易形成固化的福利观念,给村集体带来了“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分红压力。另一方面,围绕个人利益所形成的监管式参与具有理性计算后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倾向。在全村利益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人利益膨胀,自然会逐渐侵蚀公共利益。在Z村集体经济营运中,不仅责任、共识等村庄治理要素没有得到强化,集体利益反而被日益消解。以公共物品供给为例,长期以来Z村主要以集体统筹的形式完成土地调整以及修路、通水等公共事业建设。但从成立股份合作社以来,村庄公共事业的投入便再也无法获得股东的授权同意,公益建设开始陷入瘫痪,股东甚至要求将集体收入也划入分红范围。这种杀

^① Z村每季度常规的村务公开内容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情况公布表、债权(应收款)明细公布表、固定资产明细公布表、村务监督委员会意见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情况公布表、福利费来源(开支情况)公布表、干部及聘用人员补贴(工资)公布表、建设工程项目发包及建设情况公布表、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等支出情况表、征地款及建设用地流转收入使用情况专项公布表、土地企业和财产承包(租赁)项目公布表、说明等。

鸡取卵式的分红要求,尽管最后没有实行,但也暴露出Z村集体经济运营过程中的弊端,即“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随着个人利益不断侵蚀公共利益,该村对集体的索取远大于对集体的供给与建设,村民对集体有权无责,公共建设搁浅,村庄治理也陷入恶性循环。

4.4 共有利益的分配逻辑与个人本位的公平原则

与前述“公有利益”不同,在法律上还有一种类似的财产所有形式,即共有。所谓共有,是指某项财产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公民或法人)共同享有所有权,换言之,是指多个权利主体对一物共同享有所有权。这里,所有权仍然只有一个,但由多人平等或按约定份额共同享有。Z村通过地租型集体经济而形成的集体收益,就是一种典型的“共有利益”;而且,基于股权设计与分红方案,Z村在创造“共有利益”的时候,并没有为村集体留下多少“公有利益”。

从一开始,Z村通过股份合作制设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非常简单,收入全部来自地租,同时全部按照股权用于村民分红。在理论上,Z村集体土地租金收入,应当是Z村公有财产或者公有利益,主要用于村庄的公共物品提供,比如开办集体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公共生活娱乐设施等。但实际情况是,Z村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只是村民(股民)个人收入的简单加总,是一种临时性的共有利益或者共有财产,最终方向是作为分红按同等的出价分配给入股的村民。就这样,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出租收入失去了其公有的性质,而集体经济的公有属性就这样被消解了。

Z村的这种股权配置制度与分配方式,背后的逻辑是公平而非公正。这里的公平是指依照各实践主体所能接受的规则和标准,采取行动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作为个人范畴,侧重于工具性和客观性,强调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尺度,尤其关注成员的权利和人性的平等,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针对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利益方面的等同^[26]。

本质上,Z村分配逻辑体现的就是一种基于个人本位的公平原则。一方面,Z村集体资产分配过程中关注的焦点是收益平等,并围绕这一焦点设置了一系列制度、规则与程序,包括成员资格认定、股份设置、分红方案、监督程序等,以确保在相同标准下村民能够得到同等的分红回报;另一方面,Z村的分配始终强调个人本位,村民或股民个人对分配的评价和认同是其分配原则优劣的评价标准。当村民个人利益的满足主导村庄集体资产分配的评价时,集体经济的发展就将被个人私欲所裹挟,集体经济应有的治理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

5 结论与讨论

山东X村和广东Z村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这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对土地流转和集体资产清理等途径形成的资源和资产进行股份制确权,明晰村民个人与集体的权益,进而进行合作经营。其中,既有基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也允许某种程度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既有村庄内部的劳动联合,也有对内对外的资本联合;村庄集体经济收益既有按劳分配,也有一定程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正是由于所有制形式、分配机制等方面的特点明显异于传统集体经济,这种经济形式被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不同模式,既有山东X村这类集体主导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也有广东Z村这类个人主导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其中,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

运用股权量化等方式,促进村庄内外的多主体、多要素建立以农业生产领域合作为基础的其他行业生产和经营上的合作、生活服务和社区管理领域的互助合作等;而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通过将集体经营性土地折股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上,并通过土地出租等方式获得分红收益,以实现农民稳定的土地财产权益收入。两者在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在山东 X 村和广东 Z 村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效能。

山东 X 村在将整全性的集体所有权量化为村民个人的具体权益的同时,始终强调增强集体的占股比例,以提升集体的统筹能力,发挥集体在凝聚共识、方向引导、科学决策等方面的作用,在村庄治理中践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从而实现民主与效率兼顾。相比较而言,在广东 Z 村,基于其个体主导的股权配置结构、股东监管式的参与制度,村庄治理规则更加强调个人利益本位,并催生出新的宗族房头势力。村民看似通过集体经济凝聚在了一起,但其内部呈现出由私人利益主导的撕裂状态,并不利于建立一种公共的力量用以引导村民行为,更没有手段与资源纠正、制约和惩罚村民某些明显自利且有可能侵害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村集体并无统筹能力,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处于无序或者失效状态。

通过对比 X 村和 Z 村,可以发现,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与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带来的治理效能是不一样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因为兼具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重在在社区中“人”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性的培育,构建出村民的责任共识以及互联互通的人际关系,增强了集体的统筹能力,从而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共赢。而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仅仅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重在个人利益和福利的平等分配,导致个人与集体处于某种竞争关系当中,进而不断侵蚀着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村民个人、肩负多重中介桥梁作用的村集体还是对力图在村庄贯彻国家意志的基层政府而言,这都是一个双输甚至多输的结果。一方面,集体没有适当规模的资源,自然没有足够的统筹能力,既无法完成国家代理人的角色任务,也无法为村庄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对于村民个人而言,集体长期无法有效地推进产业发展与公共治理,终将使个人无法享受到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还有可能在集体收入难以维持既有分红要求的情况下影响社会稳定。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但发展什么样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发挥集体经济所具有的治理功能,是在现实中需要探索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中央投入大量财政资源进入乡村,资源注入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让农民满意^[28],反而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钉子户”索要超额利益,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困境^[29]。这种经济资源与治理效能之间呈现的治理悖论,或者说集体经济发展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发展悖论,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输入或者经济力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地激发村庄治理的公共性,而必须借助于规则这个中介。不同的治理规则,会给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以不同力度、不同方向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规则只是将村民作为直接的物质利益或者服务的被动接受者,或者说制度化地将村民分散化为一个个独立的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那么这样的集体是很难达成共识,也难以有成功的集体行动的,因此会导致治理空有民主而缺乏效率,或者民主效率双双缺失。反之,如果我们的规则设计,从一开始就兼顾了民主与效率,在确保村民个人权益的同时也为集体留下足够的“公有利益”,使村集体有适宜的统筹手段去激活村庄治理的公共性,那么集体与个人的双赢就会成为可能。因此,迈向资源分配型的乡村治理,无论是对国家财政资源

的分配使用,还是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的经营分配,都需要在资源的生成与使用过程中关注治理规则这个中间变量,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来实现村庄的持续发展与治理有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吕方,苏海,梅琳. 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来自豫鲁两省的经验观察[J]. 河南社会科学,2019(6):113-118.
- [3] 乔翠霞,王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大宁县“购买式改革”典型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20(12):22-34.
- [4] 项继权. 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5] 徐朝卫,董江爱. 资源型村庄治理中集体经济的多重效应——基于山西H村的经验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8(7):163-168.
- [6] 贺雪峰,何包钢.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002(6):46-52.
- [7] 陈家建. 新苏南模式与农村发展[J]. 社科纵横,2011(3):28-33.
- [8] 张立,王亚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21(7):44-64.
- [9] 胡肖华,陈潮辉. 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4-22.
- [10] 杨团. 此集体非彼集体——为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探路[J]. 中国乡村研究,2018(1):394-424.
- [11] 张书林. 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动因、要义与路向[J]. 探索,2022(3):108-119.
- [12] 李玲玲,杨欢,赵晓峰. “三治融合”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机制研究——以陕西省留坝县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00-109.
- [13] 衡霞.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J]. 社会科学研究,2021(2):137-144.
- [14] 陈雪原,孙梦洁,周雨晴,等.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报告(2021)[R].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15] 狄金华,钟涨宝. 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4(5):73-97.
- [16]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2005(1):83-93.
- [17]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李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罗伊·加德纳,詹姆斯·沃克,等. 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M]. 王巧玲,任睿,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19] NORTH D C.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3):359-368.
- [20] 皮埃尔·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M]. 高振华,李思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21] 黄新华. 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价维度与提升方略[J]. 国家治理,2022(1):16-20.
- [22] 王国勤. 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J]. 科学社会主义,2014(5):107-110.
- [2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夏英,袁崇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设置与管理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广东的调研[J]. 农业经济问题,2014(8):40-44.
- [24] 邓大才. 利益相关: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产权基础[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9-16.

- [25] 许明月,孙凌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路径与制度安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245-256.
- [26] 洋龙.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之比较[J].文史哲,2004(4):145-151.
- [27]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J].开放时代,2007(1):105-121.
- [28] 衡霞.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J].探索,2022(3):132-142.
- [29] 贺雪峰,桂华.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J].开放时代,2022(4):51-61.

How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n Village X in Shandong and Village Z in Guangdong

YE Juanli, ZENG H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wo cases in Shandong and Guangdong,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sources - rules -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due to the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 business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forms, differ in public governance rules, thu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mong them, Village X in Shandong activates the public nature of rural governance rules and results in considering bo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collective led equity structure, labor process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benefits distribution. However, Village Z in Guangdong has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dispelle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rules, and led to the rural governance only considering fairness but not efficiency through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dominated by individuals, the participation of shareholders' supervis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It can be seen that governance rules are important variables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building public governance rules that give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the key to bringing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to play as the multi-value goal of the public economy.

Key word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governance rul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rural governance, publicity

责任编辑:牟怡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 情感共同体建构

——基于关中平原 S 村的调查

李 斌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6;西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600)

摘 要: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载体。围绕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合对关中平原 S 村的调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探赜实现乡村振兴中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往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再生产情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发情感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和“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过程主要体现为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对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和“城归”的情感吸附;情感再生产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依托规则养成和参与深化促进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构成了相互联系、深入推进的整体过程,既从理论层面诠释了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在实践上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指引。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情感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41-11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1],把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等四大类村庄。集聚提升类村庄指“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1]。这类村庄“既无地利之便,又无特色资源,但聚集了最大多数农业人口,承担着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人财物外流造成的空心化问题,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2]。因此,只有构建起村庄情感共同体,促进人、财、物等要素在情感驱动下有效流入村庄,才能实现“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1]的发展目标。目前,学界对乡村情感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行动接续问题研究”(2021ND0168),项目负责人:李斌。

作者简介:李斌,男,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1 关于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主体的研究

共同体是指个人或组织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目标追求等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3]。凌烨丽、李浩昇^[4]提出要发展多元化村庄主体,把个体嵌入多重网络空间中,实现个人私利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统一基础上的情感共同体。刘祖云、张诚^[5]提出要以重构乡村内部治理体系和重塑公共权威性主体来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孙玉娟、孙浩然^[6]提出要把培育乡村社会组织作为核心主体,发挥村民自治基础作用来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郭倩倩、王金水^[7]认为农民主体性的提升是乡村情感共同体构建的关键。

1.2 关于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过程的研究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8]⁵⁴,这种“共同生活”建立在利益或情感的基础上。因此,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重在实现“以情感为逻辑和纽带的聚合”^[9]。从历史的视角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通过情感依托、情感连接、情感寄托的生活共同体^[10]。从现实的视角看,乡村社会变迁下,凝结在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中的人际信任不断削弱,情感基础在不断消解^[11]。村庄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削弱,传统乡村伦理文化也因此日渐式微^[12]。急剧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熟人圈子和社会关系,重建以情感认同为纽带的共同体成为人们的强烈诉求^[13]。从文化作用的视角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与西方文化依靠冰冷的契约来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不同,其主要依靠德行、仁礼等情感来建构社会关系。虽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独立化的个体情感表达越来越被尊崇,但在有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村庄,建立在情感、面子、人情基础上的村庄情感共同体依然是推动乡村振兴最深厚、最持久的文化基因。从建构路径的视角看,在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上,要以“共同在场”唤醒家乡同感,要以“共同担责”培育共同伦理^[14]。村庄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15]。

1.3 关于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结果的研究

情感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的升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果是充分实现利益共同体,在结果上体现义利统一、情理交融的特点^[16]。村庄共同体的情感属性使共同体成员能够步调一致、协同发力,开展村庄的治理与建设行动^[17]。实践中,村庄作为情感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在快速被重新发现和建构^[18]。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能够缓解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冲突问题,在乡村振兴中重建组织化互助的新样态。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美好图景是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17]的美好乡村。

既有研究总体上阐释了村庄情感共同体靠什么建构、怎么建构和效果怎么样等内容,揭示了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过程,为进一步探究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但已有研究鲜有关于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针对性分析,亟待有更微观的分析去拓展该研究的深度。基于此,笔者结合关中平原S村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剖析,呈现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洞悉其背后蕴含的内在逻辑。

2 分析框架与研究案例

2.1 分析框架

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村民价值判断与行为习惯趋同的村庄意识,是具有共情的情感逻辑与行动逻辑的统一体。这种情感有别于个体情感和人际交往互动情感,是一种村庄发展对个体产生共情的结构性情感,其不断内化于村民,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依靠“村庄感”“我们感”紧密联系^[19]。因此,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要以“共同在场”唤醒家乡同感,以“共同担责”培育共同伦理^[14]。在集聚提升类村庄,村民主体的分散、流动导致村庄情感支持无力、凝聚力缺失、向心力不足。但是,“农民公共精神的流变及乡村振兴现代化进程使村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虽具有个体化发展趋势,但其个体观的存在和建构仍处于情感连带之中”^[15]。因此,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通过村庄情感再生产重建各主体的情感认同,改变以往村庄发展事不关己的情形,建立村庄发展主体在场与不在场的情感联结机制,形成村庄发展凝聚力。本文试图从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主体选择、建构过程分析和建构结果呈现的角度,构建“主体重塑—再生产情感—情感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以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

首先,主体重塑是村庄情感建构的基础。村民是村庄发展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村庄主体经历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以地缘为边界的村落和以个体为核心的家庭的嬗变。与之相适应的是传统村庄里的集体概念所指涉的范围不断缩小,由村庄集体、家族集体向家庭集体演变,在此过程中,村庄共同体意识由强变弱,村庄情感不断异化。在宗族中,长幼有序,家族成员依据身份、地位享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权利和义务,具有一定威望的长者成为宗族治理主体,村庄情感共同体建立在严格的宗法制度和无形的伦理道德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自然地理边界为依据划分出不同的自然村落。在村落中,自然禀赋的多寡造成集体在占有土地、林业等资源方面的差别,也产生了不同村庄的村民在占有资源和分配产品方面的差异。集体成员以社员的身份平等参与集体生产,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的少数精英成为村庄治理的权威主体。村庄情感是建立在所有成员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协作生产性情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以前建立在血缘和共同生产基础上的强共同体逐渐趋于瓦解,家庭可以自由支配承包地等资源,家庭内部分工更为灵活。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走向原子化”^[20]。外出务工村民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收入,而较少关注村庄的发展。在大多数集聚提升类村庄,村民各自独立,家庭成员离多聚少,村庄共同体走向瓦解,村庄情感一定程度上被家庭情感所取代。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情感建构方面,相比村“两委”、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组织,具有以形成村庄各主体共同利益为纽带调节情感的明显优势。这一新型主体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在村村民为参与主体、“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

其次,再生产情感具有现实可能性。再生产情感就是情感的再次聚拢和整合的过程。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情感共同体建构场域,探赜其内在千丝万缕的情感牵连,需要从

在村村民和不在村村民这两个基本群体出发分析其牵涉的复杂情感要素。具体而言,在村村民由于长期生活在村庄,因共同利益和互助生产,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情感基础。不在村村民之间也会形成局部的共同情感,比如在外务工的村民因从事同类工作会结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情感共同体。同时,在村庄治理方面,在村村民和不在村村民都能通过村内事务交流、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决策等渠道关注和参与村庄发展,在交流和互动中建立起基本的村庄共同情感。也有曾经生活在村庄,经过多年历练,具有了一定影响力的“城归”,浓厚的乡土情感促使他们心系村庄、反哺村庄。这种复杂的情感脉络和现实需求使得再生产情感成为可能。

最后,情感再生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当前在大多数集聚提升类村庄,传统的集体情感在不断解构,而新型情感共同体还未形成。在这样的情感转换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村庄公共性生产经营单位,从成立到发展所传递的是一种集体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村庄以往各种利益牵连基础上的局部情感,建立的是新的集体情感依赖,形成维系村庄发展的规范性规则和表意性规则,为村庄情感再生产提供了持久动力。同时,村干部的入户走访使村庄治理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村民依据兴趣爱好广泛参与村庄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形成对村庄的文化认同,进而转变为村庄情感再生产的精神支撑。这些使参与村庄发展的不同主体将建立在村庄共同情感纽带上的情感依赖转化为情感支撑下的资源配置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引领和带动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向前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2.2 研究案例

S村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渭河北岸,土地平坦肥沃,是一个典型的以种植业为主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全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可耕地面积4136亩。截至2022年8月底,全村共有村民2200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唯一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有社员2196人。在村常住人口890人,家庭成员全部常年在村庄生活的仅有8户25人。2017年初,按照相关政策要求,S村开始筹备建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筹建过程中,S村抓住机遇,广泛开展村庄情感建构。经过几年的不断实践,村民的“村庄感”凸显,村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提升。在共同情感驱动下,S村取得了较大发展,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文明村”。

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在信息日益发达、单纯依靠经验治理已经不再具备优势的当下,单靠对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形成情感认同、树立村庄治理权威的情形已经不太可能。随着更多的农民流出村庄,村庄情感基础愈益脆弱。同时,村级自治组织因自身的福利生产能力、治理能力与农民期待还有一定差距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情感组织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村庄情感共同体就需要有新的主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其特有的优势赢得群众信赖,获得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能力和条件,实现了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主体重塑。在其运营过程中不断实现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村庄繁荣和村民收益增加,进而在在村村民、不在村村民以及与村庄有密切关联的“城归”等主体之间形成以情感聚集和整合为目的的再生产情感过程,实现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进而在共同情感驱动下实现村庄的物质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

3.1 情感主体重塑

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模式^[21]。因此,构建村庄情感共同体就是要在不同的村庄主体与

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共同情感、共同目标和共同行动的关系模式。情感主体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可以分为情感引导主体、情感参与主体和情感传承主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或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不仅具有以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目的的经济功能,而且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

3.1.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引导主体的“出场”

实现个体化的情感聚拢与整合需要强有力的情感引导主体。要成为村庄情感引导主体就需要在村庄事务中发挥主心骨作用,不断通过增进村民与组织间联系的方式促进村庄情感生成。公平公正的利益实现过程是增进联系的基础。近些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模式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单靠行政职能传导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民的话语权,村级组织往往成为行政事务的执行者而较少关注对村民意愿的回应,在情与理之间更多的是坚持行政理性而弱化了村庄情感。因此,部分村民对村级组织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声筒”“只唯上”的印象,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逐渐产生距离感。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农民利益一致基础上、自下而上的集体成员意志表达,以制度形式建立起了村庄共同利益形成和共享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充分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改善民生,实现村庄情感有效关联,不断增进村庄治理各主体之间的联系。

调研发现,S村2017年在进行股权登记和股民身份确认时,村里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上门摸排、公示通报、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会等。在召集第一次股东大会时,部分村民心存疑虑或不以为然,不积极主动参加。村干部多次登门耐心动员,在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时在村村民全部到场,不在村村民也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参与大会,线上线下同步投票和表达意见。“全体在场”改变了村民之间沟通少、各自情感独立的局面,拉近了村民距离,形成了村庄情感关联,进而使村庄形成较强的一致行动。之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涉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决策等事项时都采用此种“全体在场”的方式进行。特别是2019年1月25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首次举行的分红大会,每名股民分得200元现金。村民们感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好处,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建立了可信任情感,形成了村庄情感主体,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不断织密情感关联的网络。

3.1.2 村庄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返场”

村民是村庄情感参与的主体。有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情感引导主体的“出场”,更需要激活广大村民的“返场”。能够“返场”的前提是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得到不断满足、村民生活品质能得到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其机动灵活的优势能够高效便民地服务群众,获得村民认可,带动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庄情感生产。近年来,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特别是通过制度稳固了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的“一肩挑”,确立了党在基层自治组织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不断提升。但在有的村庄因集体经济无积累而“没钱为民办事”;有的村庄虽然“有钱”但因“村财镇管”,资金使用有严格的审批、监管流程,“合情但不合规”的为民事也办不了;有的村庄“有钱”“合情也合规”,但因各种程序过于繁琐又

不能满足群众急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为民办事缺资金的难题。因为作为特别法人组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按照公司章程机动灵活地支配集体资金,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在调研中了解到,2020年S村有一位留守老人因意外摔倒导致骨折,住院治疗急需支付3万元手术费,却难以联系到老人子女。紧急关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临时召开线上股东代表大会形成决议,老人住院医疗费用由合作社预支垫付。这样的做法既解决了实际问题,也激发了村庄老人对自己未来可能遇到的紧急援助充满信心情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而获得村民的广泛认可和积极支持,不断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

3.1.3 “城归”作为辅助主体的“进场”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这就需要通过村庄的感召力吸引“城归”回村发展。“城归”是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渴望回归村庄的新群体^[14]。这个群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曾经为农民,后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户口从村庄迁往了城市,但随着家庭老人过世后,在村庄已经失去了被认定为村民资格的基本条件,对于村庄这个场域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另一种是早年生活在村庄,后来在城镇参加工作,年老退休后又想回到农村生活。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营,在其主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村庄价值的主旋律。在价值取向上,村庄事务平等参与、协作互助、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在价值塑造上,倡导节俭消费、自立自强、文明成长;在价值评判上,崇尚德行孝心、集体意识、义高于利。在调研中了解到,S村建设王老九诗社,一方面是为了把农民诗人王老九歌颂党、歌颂人民的诗作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是想在村庄中涵养尊崇先辈、热爱故土的高尚情操。另外,S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资助村党支部每月评选“四好村民”“好媳妇”“好婆婆”“村庄好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这种充满正能量和情感味的乡村活动,能够弥补“城归”在城市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浓厚乡土情感,激发他们回村生活、建设村庄的热情。

3.2 再生产村庄情感

情感主体确定后,就需要组织各方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在集体行动中建立利益关联、再生产情感。再生产情感是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实现情感聚拢和整合为目的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在村村民和不在村村民、在村村民之间、不在村村民之间等各种复杂的主体情感回归村庄,形成建立在村庄发展共识基础上的情感共同体。主要方法是针对不同群体进行不同的情感再生产。具体而言,针对在村村民,重点是进行村庄共同情感培育;针对不在村村民,重点是对村庄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进行帮扶形成正向激励以引发其情感回归;针对非村庄成员,主要是依托对村庄发展形成的认同实现情感依附。

3.2.1 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

利益是在村村民情感培育的起点。“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的地方,往往是因为构筑了多元共享的利益共同体。”^[2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在村村民为重点,通过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共同行动,形成村庄整体利益和村民个人福利。在这一过程中,以集体为场域构建起对所有村民都能形成情感性束缚力的“强共同体”^[23],培育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在村村民利益协同、集体一致性行动基础上的村庄共同情感。调研发现,2020年8月,S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8万元在村里办起村民食堂,既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项来源,又作为培育村民情感的重要载体。关于食堂运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大会表决通过针对本村村民的两条福利制度。一是

60岁以上村民就餐,按照早餐1元、午餐与晚餐各5元的标准收取费用,伙食费与成本之间的差额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补贴;二是鼓励村民红白喜事在村民食堂举办,收费标准由食堂参照时令食材市场价格加最基本服务成本确定。正如S村村民王某所说:“我们这些老人现在确实享福了,一天不用烟熏火燎地做饭了。每逢重大节日,大家都会被邀请到村民食堂,热热闹闹吃顿饭,村上给每个老人还发一个红包。以前哪有这样的待遇啊!”类似的通过集体一致性行动培育村民情感的案例在S村还有很多。比如,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支持下形成了老年人互助生活、相互照顾的村庄养老模式;村民出行免费坐车;村内学生上学、放学统一派车集体接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组织在村村民赴咸阳袁家村集体旅游;在防疫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多方筹措口罩等物资向村民免费发放;村民社保费用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50%;村内路、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全部由集体配备到位;村内卫生室、老年活动室、文化广场、超市等便民服务场所高标准建设等。这些公共性建设使得在村村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形成他们对村庄的公共性情感认同。

3.2.2 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

村庄吸引力是不在村村民情感回归的前提。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产生活相比,集聚提升类村庄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显然难以对不在村村民形成强大吸引力。因此,只有依靠精神层面,特别是村庄情感牵连,才能形成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而情感牵连能够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脆弱的乡村文化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在村庄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理更能凸显自我优越感。当然,传统乡土文化中怜爱弱势群体的美德传承也很重要。无论是出于凸显自我优越感的需要还是怜悯之心,在村庄中都易于形成同情心。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庄弱势群体的及时帮扶非常容易获得正向评价。这种评价的累积构建起村庄关爱弱者、向善向上的文化氛围,并通过口口相传、媒体等向不在村村民进行情感反馈,形成他们情感回归的强大吸引力,改变以前对村庄“事不关己”的认知,从关注、参与到回归村庄发展。同时,情感回归带动的是人、财、物等资源的回村,改变了以往村庄因缺乏竞争力而引进资源难的困境。情感的内化与牵引实现了超越经济利益的持久资源回归。

一方面,村庄吸引力不断改变集体情感认知。调研发现,为了缓解村民大病医疗负担过重的问题,2020年S村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村大病救助基金会,向符合救助条件的村民患者提供额度不等的救助帮扶。一年多时间,救助基金会先后向符合条件的4户群众累计发放2.5万元救助基金,体现出依靠集体办大事、办难事的优势,也改变了部分村民对以前集体只取不予的认知。另一方面,村庄吸引力在个体情感回归上的作用凸显。在调研中了解到,S村四组村民郭某20世纪90年代离开村庄到西安经商,父母留守在村庄。近年来,父母的养老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自从村里的村民食堂开业后,老俩口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村老年协会经常对老人嘘寒问暖。自从父母享受到了来自集体的各种温暖和帮助,他终于能够在外安心做生意。2020年春节回家,郭某亲身感受到了村庄浓厚的互助文化,他随即做出要用自己的努力回馈村集体的决定。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帮助下,他在村里建立高品质黄桃深加工基地,形成集黄桃种植、深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延长了村庄农产品产业链,实现了一二三产业首次在S村的有机融合。这个产业目前带动在村村民22人就业,2022年贡献1.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3.2.3 “城归”的情感吸附

“城归”之所以渴望回村,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健全、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和乡风文明不断提升,能满足他们“慢生活”“安享晚年”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人到晚年产生的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乡愁”和对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村庄情感吸附。“城归”回村,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事实上,不仅仅是“城归”,在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回归田园往往成为很多城市居民面对“城市病”时的一种理性选择。“城归”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集聚提升类村庄人员“只出不进”的局面,形成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建立起村庄人员流动总体动态平衡。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私人情感的不断集聚能够转变为集体情感。调研发现,近年来,在S村主动返乡创业的“城归”多了。有情怀、有能力的“城归”常住村庄,在村庄共同情感的感化和个人情怀的支持下,他们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3 村庄情感再生产

村庄情感共同体作为一种内生与外化的集体意识,能生发出强大的推动力,实现情感基础上的村庄物质、文化等再生产。结合前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什么能成为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主体,以及怎样实现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分析,可以发现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一方面形成了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村庄规则,另一方面实现了村庄内不同主体对村庄发展的深度参与,两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情感基础上的村庄再生产。

3.3.1 规则养成保障情感再生产

如前所述,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在村村民、不在村村民、“城归”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建构。而情感的持久和情感驱动下的村庄持续发展,需要实现规则和情感的联动,因为村民往往注重情感而不太注重规则。具有刚性约束力的规范性规则和柔性情感的表意性规则相得益彰,为情感再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是依靠规范性规则实现治理有效。以情理为基础的熟人互助与以法理为基础的合作互助的有机整合是公共性生产的有效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遵循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公司章程。体系化的制度规范保障着股东、村集体等各方权益,同时也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这就使得依靠规则形成的村庄信任更可持久。S村在完成股权量化后,对于人头股、资金股和集体股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和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进行分配。在按户籍人口划定人头股后,不在村村民愿意回乡投资创业的可以按照出资入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确保集体收益的前提下双方按照持股比例约定相应的权责。在调研中了解到,2020年S村三组村民郑某回村利用村里闲置的校舍投资改建羊奶粉加工厂,当时按照董事会决议需要一次性缴纳三年的厂房租金,但是他考虑到当时村集体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坚持要求只缴纳一年租金。在郑某的技术支持和村集体的带动下,村里一年时间就发展了32家奶羊养殖户。村集体开始谋划集羊奶生产、深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融合发展,原本闲置的校舍因而大幅升值。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郑某仍坚持按第一年的厂房租金标准缴纳费用,但村内大多数股民持反对意见,当然也有人认为郑某对本村的奶羊养殖有贡献,租金可不变。面对不同声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召开两次股东代表大会,广泛听取意见,形成决议,最终驳回了郑某的要求。类似这种制度性规则为回村投资主体营造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形成了遵守规则者受益、违反规则者受罚的氛围。

二是依靠表意性规则带动生活富裕。“表意性规则是行动主体的价值观和思想共识,它作为一种软规则驱动着行为方向。”^[24]村庄是一个“照着别人做”“大家干我就干”的表意性规则盛行的地方,其表意性就在于靠部分村民先行示范,在产生带动效应后形成集体共识。S村在谋划举办门球赛事带动村庄民宿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做过一次集体动员,要求村民按照标准布置房前屋后和房间陈设,打造高品质的民宿服务,但是很多留守老人参与意愿不强,部分村民有做做样子、应付了事的心理。后来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家庭带头参与民宿建设。当门球比赛确定后,运动员和教练员走进村庄挑选民宿时,党员户以其优美的住宿环境成为他们的首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按照事先合同约定支付了每间客房每晚50元的住宿费分红。这样的示范效果显著,村民们认识到只有好的环境才能带来收入,纷纷主动开展自家院落环境卫生整治和高标准房间陈设布置。村庄作为一个容易产生情感带动的场域,在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推广等方面需要通过带动形成集体行动。

3.3.2 深度参与强化情感再生产

乡村振兴需要村庄不同主体深度参与村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村干部主动入户走访,能够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与文化活动,能涵养村庄文化,促进村庄文化再生产。这两种参与的有机结合强化了村庄的情感再生产。

一是村干部与村民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干群关系的和谐。村庄善治需要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但如何形塑出一个富有人情味、有温度的情感治理模式是实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三治”融合的重要方面。在村庄治理中,部分村干部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干群关系不够融洽,使村庄治理陷入信任性困境。按照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由村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村干部自然也就成为村内产业发展的领路人。村干部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常态化入户走访是了解群众疾苦和诉求、与群众建立亲密情感的重要方式。通过村干部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在群众中能够树立良好形象,形成群众有话可以随时说、干部说话谁都听、一动员就见行动的良好氛围。正是由于干群关系的融洽,S村近年来在事关村庄发展方面得到了所有村民的支持,大家同向同行、积极参与村庄建设。

二是村民的积极参与促进了村庄情感再生产。文化自信是最持久的力量,村庄文化是村庄长久发展的精神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针对不同村民的兴趣爱好设计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村庄人人参与、人人受益。S村每年利用节假日,针对不同的村民需求组织一系列活动。比如,针对老年群体,组织秦腔进村庄活动;针对外出务工的中青年群体,组织写春联、“村晚”、歌唱比赛、象棋比赛等活动。在S村,以前春节期间的赌博、酗酒等陋习已经慢慢消失,不诚信的现象少了,村民的集体意识、规则意识和集体责任感更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涵养出的是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村庄发展态势。

4 结语

凝聚情感是当前集聚提升类村庄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遵循主体重塑、再生产情感、情感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如何利用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村庄情感共同体培育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只有形成和壮

大这样的情感共同体,才能建立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内驱力,实现村庄人气的聚集和资源的流入,变“要我振兴”为“我要振兴”。S村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带动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成功探索,是一个符合集聚提升类村庄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样本,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振兴提供了一种方案。当然,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中的主体重塑、再生产情感和情感再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情感建构引导主体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充分发挥各方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过程的优化和提升。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在再生产情感过程中以村庄情感为基点,拓展情感培育、情感回归和情感吸附的广度和深度。

村庄发展与振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在村庄难以对资源、人才等要素形成较大吸引力的情况下,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来建构村庄情感共同体,在情感牵连下实现人、财、物等资源的回村,是一条比较有效的路径。但需要客观地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资源配置与村庄文化再造的过程,单纯依靠情感建立资源流动体系存在范围小、不稳定等不足。从长远看,乡村振兴要在情感驱动形成村庄发展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村庄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价值,吸引各种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将资源流入村庄,实现更高水平的再生产情感与情感再生产,以推动村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18-09-26).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 [2] 王德福.拓展乡村振兴的想象力[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3-40.
- [3] 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3):59-65.
- [4] 凌烨丽,李浩昇.农民公共精神的流变及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重塑[J].宁夏社会科学,2019(4):132-140.
- [5] 刘祖云,张诚.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2-48.
- [6] 孙玉娟,孙浩.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掣肘因素与行动逻辑[J].行政论坛,2021(5):37-43.
- [7] 郭倩倩,王金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困境及其纾解[J].江海学刊,2021(5):146-153.
- [8]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邹少芳,贾昊宇.情感共同体:中国家庭题材电影的当代伦理叙事[J].当代电影,2022(7):60-65.
- [10] 唐亚林.人心政治论[J].理论与改革,2020(5):115-129.
- [11] 湛礼珠.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8-129.
- [12] 张燕.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7(3):115-119.
- [13] 成伯清.社会意象与社会治理[J].社会科学研究,2015(1):109-115.
- [14] 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农业经济问题,2019(2):43-52.
- [15] 杨慧,吕哲臻.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2):89-98.
- [16] 康健.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5-10.
- [17] 程军.村庄共同体兼具情感与利益属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22.
- [18] 毛绵逸.村庄共同体的变迁与乡村治理[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76-86.
- [19] 鲁明川.村庄共同体视角下的农村现代化路径思考[J].天府新论,2013(2):101-106.
- [20] 徐京波.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05-110.
- [21] 赵晓峰.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基于理论资源、隐形陷阱与现实路径的思考[J].社会科学辑刊,2023(2):105-110.

- [22] 王春光. 乡村建设与多元共享利益共同体的建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15):48-54.
- [23] 高万芹. 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91-102.
- [24] 王辉, 金华宝. 连带福利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J]. 探索, 2020(6):156-168.

How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S in Guanzhong Plain

LI B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36,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600, China*)

Abstract: The emotional community in villages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carrier to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S in Guanzhong Plai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fluence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n explor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emotion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plays a domin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reproduction by relying o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is process, the emotional reproduction is stimulated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ultimately realized. In this regard,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ith their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emotion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rom grassroots, emotional identity developed naturally and emotional internalization guided by value, have reshaped a multi-structured emotional community in villages with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s the subject, the villagers as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city returnees” as the support;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reproduc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emotional cultiv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village, the emotional return of the villagers not in the village and the emotional adsorption of “city returnees” by relying o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motional reproduc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reflected on promo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based on the rule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participation. The three aspect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promote each other in depth, which not only explain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emotional community in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Key word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emotional community, reproduction of emotion, emotional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 金华宝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反思与优化路径

李文静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中国社会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对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进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工作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发挥了权责性福利功能与综合性支持功能。权责性福利功能凸显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综合性支持功能具有较强的本土化特征,为福利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当前,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有限。为进一步优化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应持续发挥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通过社工站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的重点领域并通过组织化和标准化建设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高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并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治理;权责性福利功能;综合性支持功能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52-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吸纳社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1]2021年4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提出要“把握专业化、高质量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方向,聚焦重点人群,发挥专业优势,加大人才培养,规范机构建设,强化督导支持”^[2]。社工站的建设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对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有必要思考高质量发展时期社会工作功能发挥的重点领域,优化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发挥的具体路径,以更好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

1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功能

近年来,社会工作广泛协助基层政府开展社区治理创新。基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改革的实践,方舒认为社会工作发挥了支持建构作用和服务治理功能^[3];徐选国认为,专业社会工作应在突破既有的基层治理体制方面发挥功能^[4]。上述研究要么忽视了社区之外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要么未能分析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展趋势。由于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能够广泛应用于社区治理的诸多领域,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发挥的功能超出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范畴,但其功能发挥具有阶段性,随着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研究”(FRF-BR-18-005B),项目负责人:邢朝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风险视角下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研究”(20CSH043),项目负责人:李泉然。

作者简介:李文静,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领域应当更加明确,以进一步凸显专业特色。基于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社区治理创新中发挥了权责性福利功能和综合性支持功能。

1.1 权责性福利功能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性福利功能主要是指能够体现社会工作科学助人学科属性的、被实践者及学术界认可的、为适应中国社会转型需求而必须发挥的福利功能。社会工作的权责性福利功能主要依据服务对象及服务领域来判断。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优化社区弱势群体救助服务。社区弱势群体救助服务既包括对贫困者的救助,也包括为困境儿童、残疾人、遭遇不幸的妇女、失业者、社区矫正对象、流动人口等群体提供的服务。社会工作能够为弱势群体救助工作提供更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提高救助效率。例如上海市实施的“社会救助顾问”制度依托政府和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实现对困难家庭的陪伴式、长效式、全过程救助帮扶;帮助救助对象链接生活、就学、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实现由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

第二,实施社区福利治理,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当前,社区的福利属性逐渐增强,有效提供针对性的福利服务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有学者认为,2016年是中国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福利体系建设的元年^[5]。这是因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规划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发布标志着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方面,社会工作者为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托育服务、青少年服务、妇女服务等提供了重要人才保障。

第三,调解弱势群体面临的社区矛盾纠纷。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工作在该领域的权责性功能体现为调解弱势群体面临的矛盾纠纷。社会工作的权利维护导向有助于化解弱势群体遇到的矛盾纠纷。例如,社会工作通过法律援助、政策倡导等方式维护弱势群体利益、赋权弱势群体合理表达诉求并帮助其与纠纷方进行有效沟通。同时,面对弱势群体的不合理诉求,社会工作也会运用专业方法与其沟通,避免激化矛盾。

第四,提升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能力。社会工作重视提高社区居民的治理能力,强调居民的参与,进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程度。社会工作的权责性功能体现为提升社区弱势群体的参与能力。具体来讲,社会工作通过提供专业服务满足弱势群体需求,保护其社会权利,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自助互助能力、社区参与能力、民主协商能力以及多元协作能力。

第五,提高城市边缘社区治理水平。社会工作已介入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治理,但城市边缘社区是社会工作重点关注的类型。城市边缘社区是城市居住隔离和阶层隔离的空间具象地带,一般为城市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聚居地,也是社会矛盾和风险的易感地区^[6]。目前,社会工作在村改居社区、城中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等城市边缘社区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2 综合性支持功能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综合性支持功能是指基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综合使用多学科知识,协助政府解决社区综合性问题的功能。这项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西方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具有明显的本土特性。一方面,该项功能不限于居民的福利服务需求,而是应用于诸多社区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综合性支持功能的发挥非常普遍,几乎覆盖了所有社区类型。概括起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综合性支持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助基层政府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社区居民,开展的

服务以公益性、互助性、服务性为主,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基金会等。社会工作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的过程是:社区工作者召集居民调查筛选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公益性原则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并在社工指导下设计社区服务项目;召集专家、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进行项目评选;社工与社区工作者协助居民成立自治组织并执行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社工协助社区处理自治组织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第二,构建和完善社区议事协商机制。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社区民主建设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除了培育居民自治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外,社会工作还鼓励居民以其他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如制定社区议事规则、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等。例如广州市番禺区通过“五社联动”推进居民议事厅全覆盖,开展城乡社区居民议事活动,共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

第三,多方链接资源,推进多元协商治理。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不仅依靠政府资源,还重视企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辖区单位等方面的资源,同时重视对社区内部资源的挖掘。社会工作者通过多方链接资源提升解决社区问题的效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重视社区治理相关主体的平等沟通和多方协商。

第四,开展社区自治服务。通过专题培训与项目实施,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给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居民组织、社区居民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进而应用于改善社区环境、维护社区治安、推动社区文化建设、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等公共服务领域。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主体是政府,社会工作协助构建治理机制、链接社区内外资源、依靠居民解决相关问题,从而弥补了政府职能在社区治理上的缺位。

第五,协助化解社区矛盾纠纷。社区矛盾纠纷的数量从侧面反映出社区治理的成效。社会工作在社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社会工作者赋权居民表达利益诉求,利用平等沟通、多方协商等理念和方法维护居民合法权利,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同时,社会工作者还通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优化社区不同主体间的关系,预防社区矛盾纠纷的产生。

1.3 社会工作两种专业功能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在专业发展早期,社会工作权责性福利功能为综合性支持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实践证明和信任基础。1996年,上海市社会发展局与罗山街道合作建立罗山市民会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受托管理,派出专业社工负责市民会馆的日常工作,策划教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儿童服务、老年人服务等,受到居民欢迎^[7]。1997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引进首批社工毕业生到社区和福利机构开展社会工作实务。这些社工实践活动发挥了其权责性的福利功能。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2003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通知》,强调了社会工作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提出要明确社会工作的职业范围,并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提出规划。正是社会工作早期在社会福利机构、社区、学校、医院等领域的有效实践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其福利功能发挥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综合性支持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为权责性福利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结构性基础。例如,弱势群体在一些领域存在困难,需要社会组织间展开合作并积极链接社会资源。为了解决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社会政策倡导。为此,社会工作需要在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由此看来,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与权责性福利功能相辅相成,当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和稳定后,社会工作的福利功能会成为社会工作专业需要重点提升的功能。从社区类型来看,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对普通社区是阶段性的,因为这项功能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基层党委和政府。而对于城市边缘社区而言,由于社区居民的治理能力较弱,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也是权责性的,应用于社区治理的诸多领域。

2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功能发挥的主要机制

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近年来,各地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形成了“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社会组织委托型”等多种形式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青岛、合肥、武汉等地还相继提出“四社联动”“五社联动”机制。“四社联动”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增加社区志愿者,“五社联动”进一步增加社会慈善资源,使社区治理基础更加扎实。目前,社会工作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功能发挥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协助基层政府搭建社区治理平台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重要一步是协助基层政府搭建社区治理平台。在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专业社工机构签订合同,由社工机构协助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孵化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在专业社工的指导下鼓励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志愿者承接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机构与基层政府再多方协调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企业、基金会等社会资源共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此时,社区治理平台主要在社区层面运行,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的服务载体。随着“五社联动”和建设社会工作站的提出,除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外,更多地区开始在街道层面建设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服务中心,也有地区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长期负责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领社区志愿者提供专业服务。这些实践标志着社区治理平台开始向街道层面推进并纵向延伸到社区,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将更加制度化,除了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外,也会有更多专业社工机构直接提供服务。

2.2 依托党建引领,促进多元联动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提倡链接社会资源,相关试点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实践中,辖区单位和企业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度不高,社会资源链接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工作需要依托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链接资源并促进多元主体联动治理。社区党建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促进多元治理主体为实现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而采取共同行动^[8]。目前,这些动员措施主要有:加强基层党建,保持嵌入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等联动机制促进区域内治理主体的协作;加强社区党建及在职党员进社区,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动员更多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在街道层面,北京市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得到广泛借鉴,街道党工委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区治理能力得到加强。此外,社会工作还通过行业力量链接社区外的人民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资源。社区基金会和社区社会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在深圳、广州、上海、成都、北京等地进行了诸多探索,取得良好成效。社区社会企业也是一种新兴的慈善资源,它由社区提供管理人员和启动资金,着眼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经营项目公开透明,运营收益进入社区基金(会),反哺社区发展^[9]。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区基金会和社区社会企业发展还不

够成熟,但仍是社会工作应着重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2.3 帮助提升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提升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是社会工作功能发挥的关键环节。首先,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理念和方法并得到认可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可以获得介入社区治理的资格。基层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又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居委会工作方式的改变。其次,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培训提升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相关培训既有理念引导、经验分享,也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传授。再次,社会工作者在实施社区治理项目时,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方式不断规范项目运行,提高了相关主体的治理能力,使其切实感受到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随着社会工作站的建设,社会工作者将长期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和权责性福利功能。社会工作需要发挥专业优势,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互相建构,在服务中不断提升基层政府、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的治理能力。

2.4 赋权居民福利表达和社区参与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居民的福利需求表达和社区参与非常重要。社会工作通过向社区居民赋权,拓宽居民的福利表达渠道,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维护弱势群体利益,重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基于居民需求开发社区福利服务,使居民在福利资源的使用中拥有决策权,增强责任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赋权,使居民意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并协助居民合理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社会工作者协助社区居委会制定和完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促进社区民主建设,依靠社区力量解决问题。例如山东等地通过完善社区志愿者制度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具体包括建立志愿者培育和注册登记制度、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志愿服务储蓄制度和服务效益评估制度。同时,通过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帮助提高社区志愿者的服务技能,提高居民提供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

2.5 从福利治理向社区治理扩展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致力于为全体居民提供福利服务,有效开展福利治理是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专业职责。在社区福利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帮扶和专业福利服务,同时重视居民能力建设,依靠社区居民力量和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基于社会工作在福利领域的实施过程,探索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应用于改善社区治理的方式。在解决社区问题的过程中,经过社会工作的陪伴式督导,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发生变化、治理能力有所提升。具有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基层治理主体往往更加积极地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将治理方法应用到社区公共服务领域。这是实现社会工作功能从福利治理向社区治理扩展的重要环节。

3 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区治理方式趋向多主体协商,社区治理更加注重公众需求,社区功能日益完善。但由于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不足、社区治理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其综合性支持功能与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均不充分。

3.1 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

社会工作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是指社会工作在协助基层政府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构建社区居民议事协商机制、链接多方资源、形成多元协商治理机制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第一,社区工作者的治理理念和能力有限。与专业社会工作者相比,社区工作者的治理理念和专业服务能力有限。在社工机构撤出后,社区服务项目的实施效果参差不齐,部分社区服务项目的居民参与程度不够,社区工作者在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建设以及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效果也有所降低。

第二,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虽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居民的参与能力有限,对社区参与信息的掌握不充分、不及时。同时,因缺乏专业社工的指导,一些新孵化的居民自治组织发展遇到困难,有的甚至解体。虽然各地正在创新和完善社区志愿者制度,但尚未形成成熟机制,志愿者数量有限。未来仍需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社区参与展开深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动员方案。

第三,社区外部资源难链接,治理主体难整合。为了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解决社区问题,除了充分挖掘社区内部资源,还需要链接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社会服务组织以及基金会等社区外部资源。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借助行业优势,能够有效链接一些慈善资源,但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织缺乏专业资源和资源链接意识,在链接社会资源时往往需要借助政府力量。近年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成为链接社区内外资源的重要方式,但部分组织和个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与社区的合作不够充分。

第四,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程度有限。目前,社会工作主要以三种方式介入社区治理:社会服务组织的方式、社区专业社会工作的方式、对基层工作者开展培训的方式。相对而言,以社会服务组织的方式介入能够较好获得第三方的身份,有助于保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但这种方式的介入程度有限,大部分地区尚未实现专业社会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常态化指导。社区社会工作者组织实施的社区治理项目往往专业性不足,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社会工作综合性支持功能虽协助解决了诸多社区问题,但该功能的过度发挥会耗损社会工作资源。在相关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短期内可以借助社会工作的力量解决社区面临的一些公共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仍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实施精细化治理。同样,社区矛盾纠纷化解以及社区民主建设等工作也不可过度依赖专业社会工作,而应在社区治理体系相对稳定后,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持续发挥协助作用。

3.2 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有限

当前,除了社会工作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社会工作的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也比较有限,难以满足社区居民、困难群体及特殊人群的福利需求。

第一,对社区福利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能够应用到社区治理的诸多领域,但提供福利服务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内容。福利治理是将治理理念和方法引入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种实践^[10]。社区福利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社会组织、市场等多元主体通过协作共同满足社区居民福利需求的过程。社区福利治理涉及居民福利需求调查、福利资源链接及福利服务供给等方面。当前社会服务组织数量和资源不足,社会政策与社区服务未实现良好衔接,社区福利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社会工作在提高社区福利治理方面的专

业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第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尚未形成,社区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目前,我国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缺乏协作,一体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尚未建成,无法针对弱势群体开展精准救助。以流动儿童为例,教育部、卫健委、民政部、共青团等多个部门均涉及流动儿童工作,但不同部门购买的社会组织服务缺乏整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作体系。在社区服务领域,社区居委会、学校及社会服务组织之间也缺乏合作,难以有效解决流动儿童问题^[11]。此外,专项社会服务组织的介入程度有限,社区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例如,社区矫正人员、残疾人、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特殊人群服务需要由专业性较高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但目前这类专业服务组织尚未广泛介入。

第三,对城市边缘社区建设的投入不足。当前,社会工作已经介入城市社区的治理,对社区治理方式及社区治理成效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专业属性出发,社会工作仍以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参与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聚居社区、村改居社区等的建设不够。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试点较多选择了社会问题并不十分凸显的社区,一些城市边缘社区建设水平落后,社区服务与居民的需求不匹配。

第四,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未受到应有重视。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及居民组织基于公共精神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功能。积极的福利社会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公民、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对福利的贡献,强调社区参与,注重社会资本培育^{[12]262-268}。社区正成为弱势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福利场域。然而,实践中对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重视程度不够,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具有低水平和不平衡的特征^[13]。

4 高质量发展时期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优化路径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社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14]。对于如何促进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一些学者强调社会工作的支持系统和民生领域社会工作同等重要^[15]。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要更好地满足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13]。这些观点强调了社会工作的福利功能和综合性支持功能同等重要。童敏认为:“在专业社会工作不断融入体制建设,助力基层治理创新和民生基本保障的过程中,愈加需要厘清自己的独特性,明确自己的专业性所在。”^[16]这一观点强调了社会工作权责性福利功能的特殊地位。根据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要求,结合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功能发挥的主要机制,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和权责性福利功能均需进一步提升。

4.1 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机制涉及社会工作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也涉及社工站、社会工作机构、社区社会工作者等不同类型社工之间的关系。为了形成完善的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以及纵横交织的社会工作分工协作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社工站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社区内部发展型”的社工介入社区治理机制适用于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项目指导型”是最广泛应用的机制。社会工作较发达的地区采取了“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和“社会组织委托型”机制。社会工作站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机制开始向“社工机构服务型”和“社会组织委托型”转变。长沙市形成三种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17],分别是:嵌入基层政府内部

的“内嵌式”^①、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下沉式”^②以及“桥接式”^③。“下沉式”有助于形成“社工机构服务型”治理机制,而“桥接式”则有助于形成“社会组织委托型”治理机制。上海市将街道社工站分为综合服务站和专项服务站。这种设置方式也接近“社会组织委托型”机制。内嵌式社工站建设模式虽然存在非专业化和非机构化的缺陷^[18],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街道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社会工作发展情况选择不同的社工站建设路径。社会组织发育水平高的地区可以借鉴上海模式或长沙的“桥接式”路径,发挥专业社会服务组织的平台作用,建设“社会组织委托型”治理机制。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较弱的地区则可以先选择内嵌式,再逐步向“下沉式”及“桥接式”过渡。在实践中也可以多种方式并存。

第二,社工站与基层党政部门沟通协作并明确职责。无论是哪种社会工作站建设模式,都需要处理好基层政府与社工站的关系。社工站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做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依托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将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为了发挥好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社工站与基层政府需基于社区治理任务明确彼此职责和互动方式,以制度化的方式开展合作。社工站的人才队伍需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以及从社区选拔上来的社会工作者,实现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结合。社工站应针对辖区实际问题开展专业服务,例如指导社区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社区自治服务项目;多方链接资源,依靠社区力量,协助开展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社工站也需要承接社区办、民政科等政府部门委托的专业服务,发挥好权责性福利功能。

第三,社工站与社会服务组织、社会团体及社会慈善力量进行服务对接。为提升社区福利治理水平,社工站应与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及社会慈善力量进行业务对接,构建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工站承担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及社区治理的任务。例如,《北京市街道(乡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试点建设实施方案》提出:“社会工作站要重点整合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慈善捐助、心理服务等社会建设和民政领域社会工作基层服务资源,协调各部门资源,共同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社工站应协助、监督、指导其他社会服务力量开展社区治理工作,逐步制定社工站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业务对接流程,使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更有效。

第四,社会工作服务站与社区社会工作者建立纵向分工体系。受人员编制、资金等因素的影响,社工站无法承揽所有的社区服务。因此,每个社区需要设置一定的专业社会工作岗位。社区社工在社工站指导下开展社区调研、服务项目执行、问题反馈及政策宣传等工作。社区社工重点负责社区青少年、老人、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的专项服务工作。同时,社区社工还要配合街道(乡镇)服务站及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开展工作。街道(乡镇)及社工站共同指导社区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自治服务项目,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伍,提升社区动员能力和资源链接能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① “内嵌式”参与路径是指社工站深度嵌入基层民政部门的管理与服务体系之中,成为基层政府内部的补充力量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② “下沉式”参与路径是指社工站从乡镇(街道)往下直接介入社区开展服务和治理。

③ “桥接式”参与路径是指社工站置于基层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之间,成为干群沟通、政社互动的桥梁纽带。

第五,对社工站及社区社会工作者进行持续培训。不同路径下社工站的专业化程度存在差异。在社会工作职业化不成熟、专业人才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社工站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持续培训。“中国社会工作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低,而现实中存在大量非科班出身的实际从业者。为了使社会工作实务体现本土化、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无论是科班出身还是非科班出身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加强继续教育和培训。”^[19]未来应加强社会工作专家团队以及省、市级督导团队对社工站的指导,形成纵向专业督导体系,更好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加快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2 明确高质量发展时期社区社会工作功能发挥的重点领域

新时期,社会工作将在更高层面持续发挥综合性支持功能,协助党和政府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体系成熟定型后,社会工作可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至社区福利治理、边缘社区治理、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以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第一,以福利治理促进社区治理。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向适度普惠福利模式转型。社会工作应在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过程中促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实现综合支持功能与权责功能的结合。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提供社区服务是社区福利治理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在社区福利治理过程中对社区其他主体治理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会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方式的完善。当然,此阶段的效果也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需要基层党委和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构建。

第二,完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为了对弱势群体等福利对象实施更精准的帮扶,需要构建一体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社工站、社区社工以及专项社会服务组织之间应基于弱势群体的需求,合理规划帮扶过程,科学制定服务方案,开展整合式服务,提高服务效果。各地可以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依据服务对象需求和福利资源情况,结合实践经验,制定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切实推动社会工作福利功能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强城市边缘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应基于社区调查,呼吁政府增加对城市边缘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城市边缘社区治理;提高流动人口服务,打造城市老旧小区新形象,提升老年人聚居型社区的养老服务,做好城市边缘社区居民与政府的沟通,预防和化解社区矛盾纠纷;加强城市边缘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功能。

第四,重视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社区参与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是社会工作的重点内容。相比普通居民,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除了常规动员策略,更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社会工作者应精准把握弱势群体需求,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积极落实弱势群体福利政策,为其社区参与提供保障;提升弱势群体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维护其自身权利;拓展参与渠道和形式,减少社区参与障碍;营造社区关爱弱势群体的氛围,提高其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

4.3 提高社会工作发展水平,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与社区治理体系双向互构,带来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以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持续推进。但从实践来看,专业社会工作力量还比较弱小,单纯依靠社会工作很难完成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任务。未来应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持续推进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为社会工作功能发挥、尤其是权责性福

利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一,促进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协同力量,可以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支持,完善购买服务政策,促进基金会、企业等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机构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是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截至2020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66.9万人^[20],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21]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仍需支持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开发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水平。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基于实践需要,应加强专科人才培养力度,同时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促进社区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第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专业社会工作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社会工作功能的发挥、尤其是权责性福利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具体来看,应进一步厘清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部门的条块关系;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协商制度,探索建立乡镇(街道)协商与城乡社区协商的联动机制,引导和动员居民及居民组织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加强社区治理具体领域的制度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法治化、精细化、信息化程度。

第三,提倡社会慈善和志愿服务精神,规范志愿服务制度,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慈善捐助行为。在社区志愿服务方面,可以推行志愿者星级认定和嘉奖制度,健全“爱心银行”“时间银行”等志愿服务回馈制度,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在链接社会慈善资源方面,社区应与辖区单位、企业或商家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探索社区公益慈善合作新方式、新路径;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需进一步推进社区基金会建设,推动成立更多社区社会企业,提高社区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1-07-1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EB/OL]. (2021-04-12). <https://xxgk.mca.gov.cn:8445/gdnps/pc/content.jsp?id=15159&mtype=>.
- [3] 方舒.“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J]. 中州学刊,2021(2):85-91.
- [4] 徐选国. 走向双重嵌入:城市社区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机制演变——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经验研究[J]. 社会发展研究,2016(3):163-180.
- [5] 刘继同,韦丽明. 中国特色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与幸福和谐社区建设[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2):102-109.
- [6] 史春玉. 城市边缘社区:一个关系性概念分析框架的构建[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1):37-45.
- [7] 杨剑飞. 社区服务的试验田——罗山市民会馆[J]. 社会,1996(5):14-15.
- [8] 孟燕,方雷.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J]. 探索,2022(6):85-97.
- [9] 原珂,赵建玲.“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J]. 河南社会科学,2022(4):75-82.
- [10] 钱宁. 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社会福利的新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2014(9):73-77.
- [11] 李文静. 适度普惠模式下流动儿童社区福利治理体系探析[J]. 社会建设,2021(2):75-86.
- [12] 钱宁.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13] 李文静,张越森. 弱势群体社区参与特征、影响因素与动员策略——基于北京、淄博市部分社区的调查[J]. 社

- 社会工作,2021(5):88-100.
- [14] 王思斌. 从发展速度向发展质量转变中社会工作的机会与角色要求[J]. 中国社会工作,2018(4):61.
- [15] 顾东辉. 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战略任务[J]. 中国社会工作,2021(31):8.
- [16] 童敏,周晓彤. 解决式问题导向思维: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审视[J]. 社会工作,2021(6):1-10.
- [17] 龙欢者. 乡镇(街道)社工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三重路径——基于湖南的实践[J]. 中国社会工作,2022(13):25-26.
- [18] 徐选国. 政社联结:发达县域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整合模式[J]. 中国社会工作,2021(31):9.
- [19] 张和清,廖其能,李炯标.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广东社工“双百”为例[J]. 社会建设,2021(2):3-34.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1-09-10).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 [21] 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EB/OL]. (2012-04-26). <http://www.mca.gov.cn/article/gk/ghjh/201204/20120415302325.shtml>.

Reflection on the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LI Wen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a's social work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flect on the localization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work has played the responsibilities welfare func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unction in our country's community governance practice. The responsibility welfare function can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 of social work, and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unction has a strong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 which lays a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welfare function.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s inadequate,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welfare function is limi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ocalization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we should continu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a higher level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stations; Further clarify the key areas of social work welfare function and build social work service system through organizational and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Final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work,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welfare functions, comprehensive support functions

责任编辑:陈卓 金华宝

从互联网到 ChatGPT: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

卢 岚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型构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并成为影响自我、与他者展开交往互动和审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信息技术发展与社会深刻转型等多变量合围,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形态,也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变革。我们考察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将信息技术作为赋能增权的工具,而是强调二者在深层问题意识层面的内嵌与整合,强调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互嵌的张力和能量的激活,进而使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逻辑上的对话问题拥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放在现代信息技术视野中加以考察,以周密的逻辑与直击本质的洞见俯瞰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场景,解析信息技术嵌入社会、衔接思想政治教育的机理。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在问题驱动与价值理念催生、系统进化与边界重塑、价值引领与技术迭代优化等多重维度与视域上展开理论聚合与分拆,以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关键词:信息技术;相互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念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63-12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社会机制、结构和关系的联动变革。信息技术俨然已经成为型构社会形态的一个关键性变量。信息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形态,也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且这种变革不是以明确的逻辑结构呈现出来,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它让思想政治教育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界面上,经由多变量合围,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之间关系逻辑的复杂性。加之,数字技术革命通过连接承载和构建了新的社会传播场域,增加了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炼的难度。尽管学界在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互建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纵观现有文献,大都拘泥于以单一的技术形态诸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来阐释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而带来的新机遇与创新路径。然而,现代信息技术经历了一个组合进化的过程,形成了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元宇宙乃至 ChatGPT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合。它并非以单一的技术形态嵌入社会,而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群的方式来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当然,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不是颠覆以往的思想教育结构并重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结构,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后引发的诸多要素间的竞争来展现的,其重塑体现在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嵌的张力上。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并非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的概念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22FKSB037),项目负责人:李双胜。

作者简介:卢岚,女,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接、与相关知识的空转;而是经过多项技术间的加速融合,彼此赋能、协同演化,向历史求索可能的经验、参与现实问题的发问、补足历史向度的思想资源,进而思辨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群接榫、转化、改造传统思想以建构周全可行的知识体系的过程。因此,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现实建构,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审视技术迭代情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经历的新旧范式统合、技术逻辑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张力、虚拟与现实边界模糊等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赋予更强的动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向技术与社会议题的延伸,进而诠释技术迭代演进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机理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1 问题驱动与价值理念催生的统一:技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源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整个社会信息容量日益丰富,各种社交媒体以其最急迫的诉求、最快捷的频率、最密实的覆盖率吸纳了弥散在社会领域中的信息与复杂问题,人为地建构了新的种类繁多、壁垒坚厚的圈层。如何在噪音喧嚣中传播正能量、在众生纷纭中凝聚共识等问题的压力能否变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驱动力,取决于创新意识、创新理念能否形成。说到底,它与我们在寻找解决既有问题的出路和办法时能否形成新的理念有关。因此,技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问题驱动问题,更具有观念、理念催生的作用。它既有问题倒逼时所产生的推力,也有笃定的恒久价值时所产生的拉力。

1.1 技术嵌入社会并衔接思想政治教育的图景描述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 等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数字思维、图像思维、视觉思维的形成。但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时,人类难以脱离技术的裹挟,在各种场所、活动中被技术量化甚至准入的困境也常态化。信息技术赋能所撬动的时代问题能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驱动力,取决于这些问题能否持续回应技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1.1.1 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勘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境遇

移动互联网、VR/AR 等网络连接重塑了社会的主要组织及其不同层面的深刻结构,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改造不仅表现在原子化、碎片化的断裂上,也日益凸显出对断链的再连接与整合上。这种连接重塑了关系结构,再造了众多信息传播场域。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秉持者趁机涌现并伪装成普通网民的身份,在信息发起者与参与者之间任意切换角色,包装、隐蔽其错误观点并误导民众,加大了我们的辨识和管控纷繁复杂信息的难度。这无疑让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问题,其原有边界进一步消解,角色发生重构,活动逻辑被改写,辐射范围不断扩容。

尽管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教育对象进行科学地分类,并对其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精准推送。但各种社会思潮也能依据技术赋能分众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精准推送携带错误观念与价值观的音频和商品等解构主流价值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跳出自身的思维定势,可以说,当我们从技术与社会互动角度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意味着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实现了从作为工具概念转向作为社会学意义范畴的飞跃^[1]。由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一是准确揭示技术引起的变量关系,即要将如何优化网络舆情收集、信息甄别、趋势研判、及时预警等机制,如何动态监测各种传播趋势和影响,如何精准化捕捉和识别错误言论并进行预警、过滤和删除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正视因社会结构嬗变引发的自身变革,即不仅要探索如何以交叉融合、多元理解的方式解读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还要把诠释现代人的生存境况、情感呼吁和道德诉求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共时性思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

1.1.2 从互联网到 ChatGPT 迭代升级的角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风险际遇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 等是现代信息技术依次演进、迭代升级的不同技术形态。从互联网到元宇宙乃至 ChatGPT, 由技术引发的科学测量、评估等技术手段裹挟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助长了技术劫持思想的底气。尤其是元宇宙赋能、VR/AR 增强技术将在纵横交错、关系型主导的社交场域中产生的思想、行为、感知转化为数据, 并成为连结的共同语言和彼此较量的衡量指标。因此, 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与赋能增权,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变革成为可能。它不仅适合数字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许, 更与数字社会运转和治理逻辑一拍即合。

一方面, 从互联网到元宇宙形塑的数字化场域, 早已通过嵌入的方式与人们的生活空间发生叠合, 更催生了人类空间感受和体验的革命性变迁。人们可以以“真身”“化身”随时“进入”“退出”和“切换”空间。如果说互联网实现了由“离线”走向“在线”, 那么元宇宙赋能则实现了从“在线”走向“在场”。它在促进人类生活方式迈向虚实结合时, 也推动了精神生活模式的深化与丰富, 实现了在虚拟空间里以“在场”“体验”来落实“面对面交流”和“心与心碰撞”。信息技术的这种非线性交互、超文本与个性化等优势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变革提供了全方位的赋能与革命性重塑。当然, 也可以将其错误倾向包装在文字、图像、视频等表层信息中, 诋毁和污蔑马克思主义, 阻断主流意识形态对受众的引导, 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2]。

另一方面, 互联网或者说未来的元宇宙及 ChatGPT, 能否搁置现实世界的问题, 重建一个新世界? 能否将人类进行数字移民, 或者利用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进行想象性解决, 以实现苦难的抚慰? 在虚拟空间中, 我们或许可以忘掉疲惫与焦虑, 获得当下片刻的满足。但当海量信息冲刷一切、我们把对未知物的探索全数交给搜索引擎时, 貌似探囊取物, 却都是两手空空。尤其是当生命本真的问题被挤满了膨胀的物欲和对不确定的焦虑时, 随着身体的隐退, 可能会出现真诚逃逸、责任飘零、良知隐退的窘境。换言之, 我们若对现实结构和问题置若罔闻, 元宇宙及 ChatGPT 等信息技术所蕴含的内在潜能和引发的变革也会有被变异的风险。因此, 当思想政治教育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发生变迁时, 矗立其上的意识形态亦应随之而动, 转化为催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精神动力。

1.2 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机理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由哪些力量与因素构成, 这些力量与因素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 当我们从问题驱动与理念催生二者在实践中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来诠释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时会发现, “问题倒逼”能否变成变革的驱动力, 取决于变革的理念与变革的意愿能否形成, 而变革理念与意愿的形成则和社会中的思想资源有关。如果说问题驱动立足于实用主义, 那么理念催生则根植于理想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变革是由问题驱动倒逼的结果, 而变革实践的落实是通过对人类理念的影响, 指引人类寻找更美好的生存之道。

1.2.1 问题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及其局限性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个体反思现实情况与目标之间的差异, 从差异中寻找问题, 进而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去驱

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实践活动。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是由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赋权增能引起的。那么,不同算法模型对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进行的“碎片化”重构,极可能消解原有文本的时空关系,甚至产生相反的知识结果,进而让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解构主义的泥淖,更谈不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驱动力。我们说技术充满着变革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呐喊,而是源于承载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现实给予我们的困难。

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含有灵动、情感与审美,是关涉生命体验、思想传递和文化认同的价值教育。它既是意识形态教育,又是人文感性教育。新一轮信息技术发展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目的在于激活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并更好地改变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情操。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技术、主流价值观与个人精神世界之间的逻辑关联,弄清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数据痕迹”来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弄清楚数据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影响。

当然,信息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种种难题是否能够成为倒逼其变革的动力,并不在于人们主观上所做出的选择。因为在客观上,我们已经无法抗拒地接受并顺应了变革潮流。由此,学界在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研究时,逐渐超脱出对实践样态的描摹,转化为对新技术形态下人与算法相处模式进行深入诠释,对算法的价值风险、公共性与正当性等问题进行批判反思上^[3]。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拓展,“是经由‘技术—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而产生的新形态,并且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转型升级中重获关注”^[4]。因此,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协调推进的整体性变革。

1.2.2 问题驱动与价值理念催生协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变革

如果说问题驱动具有现实性,那么观念变革、价值引导则具有超前性。当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问题紧逼的时候,是理念的催生与期望牵引着思想政治教育向着高层次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愿景也成为其实践方向。这让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从问题驱动的实践走向需要理念催生的智慧实践。就此而言,价值理念激活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刻认识与解决能力。质言之,问题驱动的推力和理念催生的拉力之间的“推拉”协同合作,共同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变革的走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动力源泉。

首先,观念、价值理念具有强有力的铸魂功能,社会变革无一不以观念的形成、信念的确立作为先导。无论是问题倒逼,还是技术外在的形塑,唯有通过价值内在铸魂才能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驱动力。而这一价值理念即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线要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一致。这一价值理念的时时在场,才能规避技术的互联网战胜人文的互联网,进而严防互联网技术引致人们用情绪宣泄来掩盖真正的问题甚至把人变成可统计的数字的窘境。也正是由于这一价值理念的力量强有力地塑造了当今世界与技术的赋能增权,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洞察时代问题,切中在技术浪潮蔓延过程中滋生的精神困惑和思想迷茫,聚焦数字社会的问题域,为其创新探寻突破口。

其次,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化是对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概括与反映。它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概括生活,具有高强度的抽象性。但技术从未在根本上动摇教育双方对话的关系构型。无论是传统面对面、一对多的教学模式,还是技术赋能形成的屏对屏的方式,皆离不开理念的催生与价值的内在铸魂,离不开用生命感动生命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效果不仅取

决于数量类别还取决于结构互联。这就需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观念、框架、方式和现实对接的桥梁与过渡带,找到解密思想政治教育复杂性的切入点、方向和利器,发现和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数字”生长点。因此,通过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测量价值观的高下,也能测试我们生活方式中包裹的尊严,进而用温暖与力量去滋养人性,丰盈彼此的生命厚度。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着丰富价值内涵和精神旨趣的实践活动,其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确立则需要理性的思考。因此,问题驱动仅仅激活了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价值指向潜能与预见未来走向的可能性,而理念则使得激活的可能变为现实,并产生新的思路、新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创生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用思想武装我们的行为,进而实现观念的改变,乃至命运的改变;二是思想能滋养丰富的心灵和厚重的人格。

2 系统进化与边界限制的统一: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建构的逻辑

科学技术的精细化、专业化、区隔化和碎片化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样态,而所有基于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而呈现出来的立场与主张都可以引伸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本身就是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连接的整体化行动,即借助技术赋能强化连接功能,在不确定中求选择、在选择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蜕变,从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优化和功能升级。因此,系统进化与边界限制的统一在于技术逻辑注重数据解析、智能推演、平台赋能并将其转化为可视、可感、可触、可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应用。但技术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各个要素及其内在关系的革命性重塑,必须携带价值以维持系统结构的良性运行,在动态平衡中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创新潜力。

2.1 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和衔接的互动机理剖析

尽管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技术不必然表现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而信息革命也未必一定会带来一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主导与日常权威的形塑,依赖于教育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型、制度的刚性与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教育体制化逻辑的共同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不是移植和复制现代化技术,而是找到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嵌与耦合的着力点,以人为尺度,从技术外部造型到价值内部铸魂将传统与现代的内容整合起来,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提供基石。

2.1.1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嵌入和重塑

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时会对其进行重塑,这种重塑体现在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形塑上(诸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形态),体现在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嵌的张力上,而不是颠覆以往的思想教育结构并重建新结构。当然,这种技术重塑,是通过诸要素的竞争来展现的,且这种剧烈竞争也可能由于技术过度嵌入而伤害了教育环境的自然品性。我们不能忽视因技术过度形塑所产生的破坏性冲动力,谨防技术对环境的过度塑造及其对主体的控制。

一方面,技术的嵌入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场域的同时,也会在技术与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交往互动中产生风险。面对杂乱、繁多、流动的信息时,人们对信息的撷取即便不全是趋易避难、去繁就简,也会因其纷繁复杂而分散注意力。诸如那些随时随地都能拿来的碎片化警句和宣言;那些取悦大众以获取流量甚至谋利的伎俩,更使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些被

切割片段包装成便携阅读的快餐与套餐,缺少了对片段间的连接和逻辑的推演与思维运动;图文传输、声音和视频交互以及场景建构与切换等使得传统一对多、面对面被一对一、屏对屏取代。它折射着生活中的善与恶,撞击着良知与隐痛。面对这些问题,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已然生成研讨的理论自觉,但尚未触及问题归因的实质,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的现象以及在其病灶的归因上依然含糊其辞。我们之所以对当下信息技术深感担忧却苦于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对客观实际世界的理解并不囊括人对世界的全部理解。尤其是当技术占据教育话语的主导权时,思想政治教育则可能演变成为没有生命感的知识加工过程。一旦技术裹挟思想政治教育,其后果势必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现代人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跨时空交流,其意图是奔着心灵的舒展和个性的张扬,而不是被自己人奴役、被网络奴役、被机器奴役。因此,不能把人变成可统计的数字,更不能把技术想象成万能的“灵丹妙药”。抵制技术陷阱的诱惑,找寻人类精神解放的智慧滋养,涵涉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命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实质在于它能推动“人类互动”。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强连接还需要强力互动。互动不仅使得虚拟空间具有生活世界的意味,有助于拓展和放大多元沟通与交流机会,而且它更具有一种解放性的潜质^[5]。当然,互动也需要质量,高质量的互动建立在个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与身体的频繁互动中,技术终将变得透明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但技术的扩张与侵入又有可能驱逐人的生命活动。其实技术只是辅助工具,真实世界中的共享情况、密切合作的激情传递,不可能寄希望于互联网中的信息与叙事。让技术接受生命的指导,让技术重新回归生命并为之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绕不过的问题。

2.1.2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形塑中的协调与整合

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时,不仅遵循人性和物性规律并保持了教育流动空间,而且也超越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基于技术与社会互构理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并非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被动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在技术与社会互构时的多种力量纠缠中寻觅最佳平衡点,探求维持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的条件。由此,我们基于技术与社会互构论角度,以人为尺度,将技术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立场引伸到思想政治教育论域来探讨。

首先,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是因为技术并非一种纯粹脱离社会之外的抽象物并以其自有的逻辑而运作,相反,技术总是“社会的技术”。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也不能独立于技术而存在,它总是“技术的社会”^[6]。当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型构社会形态的一个关键变量时,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关系的重构中也发挥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技术穿透社会时,其便内在于我们的文明机理。因此,技术重塑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上产生的一系列根本变革。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赋权不是一种技术上的拼凑或嫁接,而是基于技术与社会互构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场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信息技术的内嵌和耦合,使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要素深度契合。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面对面的线下教育,而且信息处理、传播和交流本身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要素。这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嵌与耦合表现为外形上共用、交互上共通、认知上共生。

其次,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性重塑不能简单理解为技术手段的变革,其是因技术赋能增权而引起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系统性结构变化。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被技术重塑的过程中,要警惕“技术将逐步代替我们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演变为教育变革的阻力”^[7]。技术不只是机器,也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和过程^[8]。技术并非指工具、机器、设备等物质性的实体技术,而是物质性因素与技能、观念、知识、理论、方法、策略等精神性因素的统一体。技术本质上“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9]172},既包含物质因素,也包含精神因素。由此,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逻辑不是由技术工具决定的,而是由技术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决定的。

当然,技术作为辅助工具,本身并不制造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和紧张。因此,要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在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相互依存、互激共进时,如何对真实存在的虚实场景、思想行为等关联逻辑进行数字化;二是如何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结构发生深刻转变并形成以数字信息和多维场景为驱动的新生态。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层面的内嵌与耦合,也体现了技术硬逻辑与人文软逻辑间的逻辑规则转换。它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又具有严谨科学的逻辑保障。因此,真实世界中的共享情况、密切合作的激情传递不可能寄希望于互联网中的信息与叙事。

最后,与技术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理论具有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先在性,是第一位的,教育原理“决定使用何种技术,而不是由技术工具来决定应用什么原理”^[7]。因此,单一的技术要想具备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需要一个组合进化的过程,即技术组合形成域。就此而言,技术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域’的更替、是新域代替旧域的重新域定”^[7],进而重新定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2.2 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边界限制

技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推进其数字化转型,即依据深度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基本形态、运行特点、特殊规律,推动其教育方式、沟通模式、交往环境等由传统思维向数字化思维转型。这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赋能革命,尽管有助于驱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域的拓展,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并不是无边无际的。

2.2.1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张力

信息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所引发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互联网、元宇宙、ChatGPT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及其打造的多维场景上,也表现为数字化技术所具有的交互性思维、关联性思维、情景化思维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适配数字化社会研究的主要思维方式。但是,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和数字化技术逻辑的不同,使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陷入“技术决定论”误区。信息技术赋能让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跨越数据、模型、算力等时代门槛,其目的在于以网络化、关系化为基本视野,将其实践活动放置在人和社会等更为根本的层面进行审视,进而能够以更加宽阔的视野、理性客观的学术姿态以及数字化思维方式的转变来变革思想政治教育,进而提升其实效性。当然,也极易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中。因此,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应保持一定的张力,不能任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化、方法运用、话语表达、情境打造以及主体认知都沉浸于数据依赖和技术替代中。也唯有在一定张力范围限度内,才能真正将数据转化成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2.2.2 规避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过度塑造

技术赋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以沉浸式体验、仿真性空间为核心特征的智慧化育人。它能够让主体存在于一种虚实结合的数字空间,让虚拟体验超越现有认知的感官刺激,但这也会带来技术对环境的过度塑造。如果我们一直处在技术所设计的人工化的教育世界中,我们直接经验的世界就会被颠覆,因而教育双方便会“生活在‘技术茧’或‘信息茧’中”^[10]。教育环境越来越人造化,受教育者的具身体验将会被剥夺。其实技术本身不仅没有尝试着去奴役人,反而一直在解放人。比如,技术取代了一些原本枯燥乏味、可替代性的工作,却提供了更多发挥天赋、释放才能的新机遇。AI、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领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新平台,让我们实现了从“缺场”到“在线”、从“在线”到“在场”的飞跃。因此,必须规避技术对环境塑造,维持他们的动态平衡。

此外,在信息技术场域里,我们要通过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特点,激荡心智、锻造人格、彰显个性。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里投射了我们的信念、态度和期望,它不仅是身体的栖息之地,也是精神的沉思之所。所以,要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技术场域中人们进行精神交往的首要实践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的功能,形成社会前进的引领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2.2.3 规避信息技术对主体的过度塑造

技术改造人际环境,是通过“重新组织了人类的感性生活,构造出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从而改变着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而实现的。现代信息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双方的交往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解构。教育双方之间的双向关系转变为“人—机—人”的三维关系。传统面对面教授的焦点在于教师本身,而现在却大量投入到呈现教学内容的技术媒介上,诸如腾讯会议、学习通等。这种技术软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技术对人机环境的再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师生之间有效对话。因为教师一旦大量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就必须遵循诸多固定的算法模式,否则将会无法呈现特定的内容,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技术异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功能的慢性丧失。

其实“技术时代带给人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技术性成为人性的一部分,人们看待人性的尺度,从此增添了技术的内涵。技术不断更迭使得自身越来越智能化和自动化,进而难以控制。不仅如此,它还通过自身的运作逻辑对人进行规训和奴役,使得教师对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11]。即技术一旦投入使用,极易变得不可替代,进而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那种带着理性、憧憬和对彼此心中的热爱与柔情的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被屏对屏代替;那种开启幽闭的思绪、放飞囚禁的情愫、唤醒着彼此心中的眷恋与期待被抖音网红挤占;那种向未来之镜开掘迈进的阔大与豪放,走向更为广阔、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成为冷冰冰的数字。一旦技术过度嵌入并使得面对面的真实交往替换成冰冷的人机互动时,受教育者的情绪和负面心理就会变得难以察觉。

3 价值铸魂与技术造型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建构

无论是从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中探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还是从技术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寻找化解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方法,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让技

术回归人文,其实就是从创造技术回归探索人性的过程。通过技术赋能激活、唤醒和弘扬人性中积极的、美好的潜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技术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造型是推进其数字化发展,而价值的内在铸魂则是教育者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观意趣。它蕴含着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并通过精神的唤醒、潜能的显发使得受众体内心得以敞亮、主体性得以张扬。所以,技术外在造型与价值内在铸魂的联袂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建构。

3.1 技术迭代升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

互联网将任意的两个位置或场所直接连接起来,构成虚拟空间。人们可以借助虚拟空间展开缺场交往、共享传递经验和制造新的认同等^[12]。元宇宙可以称为第三次互联网革命,是有生命力的、升级版的互联网。随着算力的进步,元宇宙的相关硬件设备正在加速发展。元宇宙的核心属性是与现实世界的同步性和高拟真度。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元宇宙,都是通过去中心化架构对真实场景进行镜像化的虚拟社会和社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元宇宙的三层架构是:基础设施、交互、生态系统。

第一,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的技术升级,形成了实体虚拟互补、立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平面信息交互为主的传统互联网教育相比,元宇宙“把点、线的交互层面扩展到立体、多维、实时的交互空间”^[13],还原和丰富了真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与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不仅重塑了教育主体间的关系,突破了主体在时间、空间和组织层面的限制,而且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态。主体进一步从单一走向多元,形成了“教师—同伴—个人—机器”多元混合交互模型。这种多元主体跨界协同与合作创新,有助于拓展人机双向反馈的智能应用场域,提高了教育双方在虚拟场景中的真实感。受教育者可以在不脱离原本真实场景的同时关注跨领域的动态行为,但其局限在于,学习者被通讯软件所绑架,容易陷于“技术茧”的窠臼中。

第二,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的技术升级,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与互联网相比,元宇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里,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客观性、自发性和多元性特点。如果说互联网技术将处于分散、隔离状态的用户有效地连接起来,那么元宇宙赋能则可以通过虚实结合、具身沉浸等技术提供一个交互更方便且更加立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场景。因为元宇宙不仅突破了传统互联网在时空、关系、交流及情感维度的边界,而且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性,且各种社会要素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时空边界的突破让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可以在多种场景、时间展开,在空间上也消除了既有教育资源孤岛的弊病,让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了与各类平台资源对接的问题。

3.2 用价值逻辑统合技术逻辑并使之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

技术赋能、关系赋权、情感能量的黏合是以非线性、互有交集的方式发生作用。我们用价值逻辑统合技术逻辑,是建立在思想与感受、观念与实体的联结、脑力震荡与知识建构的统一的基础上,框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范式,让思想政治教育场域里氤氲着对崇高价值的追求。

技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其数字化转型,这就需要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14],成为影响自我与他者展开互动和审视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赋能不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定性

分析较之以往更具客观性^[15],也使其精准化与智能化日益凸显。尤其是最近火爆的 ChatGPT^①,在量化、标准化、文献梳理、逻辑框架设计等方面大显身手,也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增智赋能”。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诸多质性数据,仅仅使用简单的可视化就能反映出重要的现象与规律。这无疑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决策的精度和信度”^[16]。因此,通过技术可以在方法论上摒弃传统对简单因果关系的找寻,在以量化逻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回应力和建构力的同时,从观念层面为数字社会寻求更多的确定性。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放力量在于“它能把我们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带上去看事物本质中最高贵的东西。同时,它又能温和地把埋在某一片外邦污泥中的灵魂的眼睛拉出来,引导它向上”^{[17]274-275},让我们对道德伦理的追逐、对崇高品质的渴求、对理想境界的眺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赖以栖息的背景。即便是技术外在形塑思想政治教育时,也离不开时代精神之烛的照耀,它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精神一致的品格与内涵。教育作为最深切地牵扯于个人和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文化过程,在今天就愈益紧迫地肩负着缓和、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冲突的使命,致力于培养人的主体性与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品格和能力,并使之成为具有智能社会特质的“时代新人”和合格劳动者^[18]。

因此,用价值逻辑统合技术逻辑并把每个人所感受到的理论渲染带回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生活中,可以提高生命境界与生命质量。质言之,正是价值的内在铸魂规约着技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才能确保技术赋能时以人为尺度,让技术形塑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积极敞开对生命的关注,培养完整的人,进而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3 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规范性建构的原则

技术进化是一个不断被选择、被发展、被强化的过程,起决定作用、掌握进化方向的还是人^[19]。其实,意义与价值不是现存的东西,而是人的投入。作为一种现实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尊崇,具有一种向生命过程的敞开和解放的旨趣。因此,我们从技术外在造型到价值内在铸魂的统一上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的路径在于,把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里,以找寻决定其可控制以及可预测的活动规律,通过价值引导在认知模式上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抽象的灌输与空洞的说教,而是让受众体在感悟与体会、自省与自察中滋润心灵,进而以敏锐的悟思、细腻的感受、以局内人而不是隔岸观火的姿态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题域。当然,理论灌输依旧是一种信息组织优化、条理化和有计划的途径。而技术与价值负载的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再组织与再现。它在遵循灌输逻辑的推导和演绎时,也携带着文化的浸染等真切和谐之美。它是在结构化受众体参与下对文化积淀的剪裁,是对知识价值的一种赋予与认可过程。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也体现着技术驱动与价值引导的统一。信息技术的硬规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软规则融合创新的核心问题,在于规则转换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① ChatGPT 是一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大型语言模型,俗称“聊天机器人”。在大数据、大模型和大算力的工程性结合下,它不仅能够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与人类进行对话,而且能够生成各种创造性内容,承担大量原本由人承担的工作。ChatGPT 之类的通用,说明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人的脑力劳动。

即解决不同规则之间的数字化联通、对接和转换问题,实现跨界、跨域合作,促进、引领交叉学科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键。当然,我们基于各科门类和知识体系分工侧重点不同,进行学科分类,对已有知识进行逻辑划分,目的是便于学术分工和协同研究。而多学科交叉配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观天地之大,趋近存在之核心,其意图也在于与世界建立一种深刻联结。其实,无论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与联结,还是人的综合判断和抽象理论认知的达成,皆倾向于科技与人文交叉研究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绝不是凭空的精神想象和纯粹的理论逻辑演绎,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尽管元宇宙为打造完美世界提供可能,但倘若就此将内心希望的理想寄托于元宇宙中,忽视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则无济于事。ChatGPT 在激发智慧、创造美好未来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虽然目前仍只是人类知识的搬运工,但是它仍会倒逼我们再次思考“什么是人”“人成之为人的固有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涉及人性的根本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他者、社会乃至人类的原则性问题^[20]。

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落实在技术造型与价值铸魂的双重统一中。我们致力以现实为导向,基于真实主体与镜像主体的交互方式,揭示真实世界与镜像世界的高度叠合,让虚拟世界为现实世界服务,实现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到数据的互补与平衡,让相对静止的教育场景更加动态化。也就是说,当数字时代太多的信息和欲望占据着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时,需要我们站在时间的长河中,真切地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进而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转换为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

总之,创新需要原创性、深刻性的品质。依靠单一要素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强化其整体性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既要凭借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充分调动一切资源,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有序,又要统筹好、协调好、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现代信息技术体系与社会发展系统的协同运行,积极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使其在空间上布局科学,各要素协同融洽;在时间上衔接自如,各步骤稳定有序。

参考文献:

- [1] 卢岚. 信息技术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场景勘定[J]. 探索,2021(6):177-188.
- [2] 冯刚,陈倩. 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 探索,2022(3):166-175.
- [3] 师文,陈昌凤. 驯化、人机传播与算法善用:2019年智能媒体研究[J]. 新闻界,2020(1):19-24.
- [4] 赵丽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2022(2):46-51.
- [5] 阎光才. 信息技术革命与教育教学变革:反思与展望[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7):1-15.
- [6] 戴宇辰. 传播研究与 STS 如何相遇:以“技术的社会建构”路径为核心的讨论[J]. 新闻大学,2021(4):15-27.
- [7] 陈晓珊,戚万学. “技术”何以重塑教育[J]. 教育研究,2021(10):45-61.
- [8] 梁林梅,郑旭东. 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先驱、智者和引路人:詹姆斯·芬恩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08(10):25-2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杜薇. 隐忧与防范:现代技术介入教育的价值审视[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1):32-40.
- [11] 李政涛. 为人的生命成长而设计和发展教育技术——兼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J]. 电化教育研究,2006(12):3-7.

- [12] 张兆曙. 互联网的社会向度与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兼论社会学如何理解互联网[J]. 学术研究, 2018(3): 51-58.
- [13] 翟雪松, 楚肖燕, 王敏娟, 等. 教育元宇宙: 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形态的创新与挑战[J]. 开放教育研究, 2022(1): 34-42.
- [14]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2): 1-4.
- [15] 刘宏达, 隆梅凤. 大数据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定性分析方法创新[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5): 137-141.
- [16] 刘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的现实困境与诉求[J]. 思想理论教育, 2015(9): 60-65.
- [17]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申辩[M]. 吴飞,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 [18] 孙伟平. 人机之间的工作竞争: 挑战与出路——从风靡全球的 ChatGPT 谈起[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3): 41-47.
- [19] 陈昌凤, 霍婕. 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 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 新闻与写作, 2018(1): 63-66.
- [20] 成素梅. ChatGPT 引发人机关系新思考[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3-06.

From Internet to ChatGPT: Technical Remodeling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 La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key variable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influence self, interact with others and examine daily social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have not only changed the pattern of communication in human society, but also promoted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We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t just as a tool for empowerment, but as a way of emphasizing the embedding and integration of both at the level of deep-seated issues and consciousness, emphasizing the tension and activation of energy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will make the dialogue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logic of the subject has greater research space. Therefore, we will stud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with careful logic and insight into the essence, overlooking the complex sce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embed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society and linking u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oblem-driven and value concept, system evolution and boundary remodeling, value-led and technology iterative optimization, to reshap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tu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concept

责任编辑: 陈卓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实现路径探赜

栾淳钰,刘颖敏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育新人”的重要使命任务。在“互联网+”蓬勃发展、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话语的自我革新,要求把青年作为战略对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明确话语作为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关系互构的有效媒介。通过学习内化、认同创造、实践外化、协调发展机理的运行,推动建立“立意”“筑巢”“善用”“增效”四位一体的话语体系。实现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要打造符合青年价值选择的话语意义系统,回应社会现实,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共同价值;要从话语对象、话语载体、话语传播的角度构建推动青年思想认同的话语认知系统;要强调话语风格适配驱动,增强说服力、提升引导力、彰显亲和力,创新青年实践的话语表达方式;要从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形成聚焦青年成长成才的话语评价体系,回应青年时代特点,促进青年、大众与社会共同发展。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按照“青年想接受”——“青年可接受”——“青年行真知”——“青年共发展”的逻辑进路,致力于推动面向青年群体的宣传思想工作提质增效,进而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引领青年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青年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2-0175-14

青年强,则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1]71},这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战略任务。“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339}因此,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工作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和使命召唤。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中央就在宣传工作上提出了“青年化”要求,即“反映一般青年生活及思想,并给以正确的指导”^{[3]575}。关于如何做好青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倾注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4]278}。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342}。《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分类开展青年思想教育和引导”^{[5]8}。可以说,自党开展青年宣传思想工作以来,无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中还是团的实际工作中,就已提出宣传思想工作需要“青年化”、对象化、分类型的要求。分类型和对象化统合于“青年化”,是实现青年宣传思想工作落地落实的重要要求。因此,紧扣宣传思想工作的话语媒介,运用青年视角、青年方式、青言青语打造“青年化”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探索关注青年、引领青年、发展青年的宣传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马克思主义新人观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CKS017),项目负责人:栾淳钰。

作者简介:栾淳钰,男,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颖敏,女,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想工作创新理论,能够助力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提质增效,进而团结、动员、组织广大青年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动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权建设要考虑对象化,进而通过基本理论的阐述和释义来达到特定的传播效果,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理解青年的本质、挖掘青年的特点、重视青年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重要启示,是掌握面向青年群体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权的核心要素。

1.1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研究基础

当前研究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积淀两个方面探讨了青年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建构的研究基础。在理论依据上,学界阐述了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关系互构的学理性和逻辑性。通过论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并肯定青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思想、观念、意识“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6]524}的现实揭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与青年塑造具有通达一致的科学与实践的学理进路。通过论述思想的转化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152}以及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9},明确思想理论转化的关键在于能否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实现话语宣传的大众化、话语说服的针对性以及话语交往的互动性,将抽象的学理转化为日常生活的逻辑。在历史积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的生成过程^{[9]2}、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的历史演变,阐述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通过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任务要求^{[10]155},论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发展^[11],推动青年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1.2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研究内容

学界主要从话语主体、话语机制、话语困境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话语主体看,包括宣传思想工作责任部门和青年群体。尤其强调青年群体的广泛性和层次性,包括广大青年、青年干部、青年学生等群体,还有青年教师、农村青年、机关事业单位青年等基于不同职业划分的青年群体^[12]。从话语机制看,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视角以个体与群体、过程和内容维度研究,认为个体主要受心理认同、需求强化作用影响,群体主要受社会助长、榜样示范、从众强化作用影响^[13];优化提升青年内化学习能力和外化实践能力的过程可以借助宣教机制、利益机制、长效机制^[14]。从话语困境看,一是“互联网+”的时代背景提高了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与时俱进的要求。全媒体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是话语主体分众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格局网络化、媒体管理相对滞后,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现实挑战^[15]。二是青年现实需求的变化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随之更新。网络社会话语的共享性、空间的积聚性、圈层的向心性使青年在语义内容、情感价值、表达方式上倾向于同质互动的圈层^[16],加大社会主流价值的融入难度。三是宣传思想工作形式需破旧立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单向说理、宏大叙事、空洞说教为主的宣教形式,使宣传思想工作存在“失语”状态,要在“变”与“不变”的规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守正创新^[17]。

1.3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方法策略

学界主要从渠道创新、要素赋能、群体聚焦等方面来提高青年宣传思想工作话语的有效性。

在渠道创新上,借助“互联网+”发展优势和媒体融合技术,以思维转换、对话转换、粉丝应用、数字拓展来实现话语转向^[18]。在契合青年需求的同时,通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自适力和阐释力^[19],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引领。在要素赋能上,依托现代科技与网络社会的发展为青年宣传思想工作效用的提升培植空间、场域与内容,通过话语符号、话语意义、话语表达等要素的赋能^[20],实现青年对宣传思想工作理念与价值的认同与践行。在群体聚焦上,以青年主体的中坚力量青年学生为主,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切入点,通过教学理念、方法、形式、风格的创新推进宣传思想理论话语对青年的引领。

总体来说,学界对青年宣传思想工作及其话语建设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对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进行理论阐释、历程梳理、经验总结等。同时,也正在逐渐深化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的内涵、要素、架构等研究。但基于对象化、分众化,尤其是“青年化”的研究成果不多。根据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要求,以及当前的青年宣传思想工作研究现状,提出话语“青年化”的概念,可以使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工作经由话语媒介达到理念契合、实践同向的理想效果。从话语主体看,对宣传思想工作责任部门来说,成为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需要基于对青年学习成长规律的了解,需要为青年搭建平台提供服务,需要在青年思想困惑中坚定立场并实现引领。对青年来说,基于对象分众化、需求多样化、思想多元化的特点,宣传思想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认同迷茫,有原则性地调节行为失范,有统领性地化解价值困顿,突出“青年化”的必要性。从话语传播看,是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以主流价值传递来实现青年思想引领的过程,也是青年学习、认同、实践、传续宣传思想话语意涵以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突出“青年化”的重要性。从话语特色看,是中国梦与青春梦在思想共振中永葆党的生命力、激活青年发展动力的生动话语实践,突出“青年化”的战略性的。

基于这一定义,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形成体系并有效运作需要经过一个机理作用与路径整合的系统过程。即责任部门与青年群体,围绕话语要素,通过学习内化、认同创造、实践外化、协调发展机理作用于话语意义系统、话语认知系统、话语表达方式、话语评价体系,以“立意—筑巢—善用—增效”的实现路径,形成引领青年成长发展的“青年化”话语体系,助力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2 “立意”:打造符合青年价值选择的话语意义系统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通过概念范畴、词汇词组、语句语段等话语符号表现出来。话语符号所具有的思想阐释作用使得社会教化所呈现的承载政治性内涵的概念、词汇、语句等话语具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力。同时,个体内化需要契合青年自身的需求,即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需要具备贯通话语双方主体的理解力。学习内化机理以供需契合的需求导向、以思想力和理解力作用于话语内容,产生互融互通的宣传效果,推进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第一阶段——“青年想接受”。“想接受”的关键在于结合青年的时代特征以及国家理念的贯彻,塑造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意义系统回应社会现实、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路径的形成引领方向。

2.1 去机械性,突破桎梏回应社会现实

突破桎梏既要以青年成长发展的非阶梯式特征为基础,又要以坚持主流价值领导地位为前

提,实事求是探寻能彰显价值引领并影响青年的话语共识。因此,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意义系统建构时需要去机械性以回应社会现实。

其一,尊重青年价值选择。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存在,即人是处于历史现实中的实践的人。在“互联网+”的社会,青年自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发展会导致青年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因此,需要通过主流价值的引导来帮助青年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历史的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这正是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存在的意义。因此,青年价值选择和话语意义系统在建构上具有同一性。尊重青年价值选择,即坚持共性与个性的原则,突出青年主体性自适与社会统领性协调的统一。

其二,遵循主流价值引领。与青年突破生命历程桎梏同向而行的,应是在社会主流价值引领的基础上,实现青年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重要的体现。法治保证行为的底线,是言行上不当为的设定。道德提高至善的要求,是言行上应为的设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同时,加以法律要求保证行为的底线,防止青年误入歧途。道德关注精神世界,法律调整外部行为,二者基点不同,但都落实于行为实践,以回应实际践行中的问题。因此,遵循主流价值引领,以普遍要求与底线意识的结合,在宏观调控与微观应用上优化主流价值的维度和内涵,能有效发挥引领作用。

其三,凝聚青年与社会共识。“青言青语”的言说方式可以避免过度使用政治话语所带来的入脑入心难的困境。讲到青年要找准人生方向时,可以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1]313};鼓励青年端正工作或学习态度时,可以用“撸起袖子加油干”^[22]。借用引经据典、讲故事的言说方式可以更好地传播党和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对青年进行正确引导。例如鼓励青年以执着坚守塑造自身良好职业道德时,可以借用“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最后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21]326}。除此之外,以摆事实、讲道理的言说方式宣传如何推进事关国家前途和百姓生活的国家政策和事务,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4]127}“不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21]422}这样的表达。因此,要树立为话语理念铸魂、为话语内容扎根、为话语方式置趣、为话语语境赋情的理念来最大化发挥话语凝聚青年与社会共识的作用。

2.2 去消费化,发扬传统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意义系统建构过程中是深厚且独特的思想来源,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张力。随着青年自我表达的愈加强烈,极易产生消费异化,因此,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意义系统建构时要去消费化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其一,从青年视角,以真实需求克服物化消费。互联网虚拟性所带来的遮蔽性隐去了青年的真实身份,容易出现“虚假消费”“异化消费”等问题。“话语体系是网络思想文化阵地的媒介内容”^[23],具有推动思想流动和各方沟通的作用。青年通过话语运用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自我表达以满足精神需求。当精神需求的满足由需要导向欲望,使用某种虚拟身份源于占有它所带来的虚假的平等,那么这种虚假的需求和平等将不以生产为目的,而以消费为目的,把人的价值的实现归结为单一的物化消费,必然导致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颠覆。因此,应帮助青年正视自身的价值立场,引导青年从“虚假需要”中甄别“真实需求”,做出凸显主体性原则的价

值选择,培养新时代青年所应具备的理性意识和辨识能力。

其二,从社会视角,以公序培植维护传承环境。消费文化的利益取向,仅凭价值理性的规劝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辅之以制度和规则的工具理性培植良好的公共秩序,能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奠定基础。互联网中的话语信息随着网络事件发生的不定性、信息传输的无界态呈散点状与聚合式爆发,话语传播随着青年网民的规模化、网络发展的多领域也呈现出裂变式传播形态,加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难度。因此,需要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发挥引导力和牵制力作用,帮助青年在多重价值观塑造的过程中反思和自省,确保借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保持其价值意涵和影响力,进而彰显宣传思想工作在青年价值选择上的引领作用和规范导向。

其三,从文化视角,以知识嵌入赋新传统文化。从代际传承的角度来说,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通过青年来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需要把握传承人和传承文化的主体性。因此,需要在明确主流价值引领性的基础上,以青年的知识性优势在继承中赋新传统文化,彰显其民族性、时代性特征。比如,近些年的《中华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依托央视这一主流媒体,为专家学者、知名人物架起一座通向百姓、深入青年的桥梁,从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还如,近年来,“国潮热”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体现着青年人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意趣。

2.3 去孤立性,以全球视界凝聚共同价值

从宣传思想工作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共同价值的凝聚,对内指向突破多元价值分化,构建意义共享的话语体系;对外指向获得世界认可的中国智慧。因此,要以共同价值的认同和实践彰显大国本色,宣传思想工作话语意义系统建构时需要去孤立性以促进价值凝聚。

其一,突破青年多元价值观念的分化。互联网时代出生的Z世代青年彰显出独立与张扬时又受制于技术与规则的多元价值观念。多元价值观念在圈层群体中不断被强调和分化,源于大数据的精准捕捉而形成个体聚合,也使得个体微小的差异被无限放大^[24]。因此,需要回归青年个体的“生活世界”,并以主流价值的统合重塑青年的“意义世界”,提升育人话语的意义。例如,“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4]274}“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2]155}等,以朴实无华、切中肯綮的话语透过价值分化的表象,让青年直面困惑和迷茫,鼓励他们在激情奋斗中铸造青春梦想。

其二,建设意义共享的话语体系。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体现在对不同时代发展要求的回应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改革话语体系^{[9]2},以及正在进行的新时代话语体系;同时,这些话语体系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追求、文化优势。因此,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内涵下建设一维多元的意义共享话语,如“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等话语体系,引导青年科技人才、青年志愿者、青年干部等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以“小我”融入“大我”的话语旨意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放飞青春梦。

其三,寻求价值共识的国际实践。就当前国家的时代定位而言,需要以全球视界来谋划自身发展。通过话语意义再造和重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例如,中国青年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围绕抗疫合作、国际赛事等主题,以中国青年的责任与

担当带动世界各国青年一道凝聚价值共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跨越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与各国友人“一起向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青年员工背井离乡,积极投身共商共建共享,都是中国青年以自觉担当和人类关怀铸就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坚实桥梁的光荣实践。

3 “筑巢”:构建推动青年思想认同的话语认知系统

青年在主流价值引导的语境中实现话语意义的有效性认同,是思想共振效应的体现,即通过认同创造机理的作用,青年在原有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对宣传思想工作所树立的榜样、营造的积极情感和确立的价值意蕴形成与自身角色相匹配的认知乃至形成新的社会角色的过程。这是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第二阶段——“青年可接受”。“可接受”的关键在于从话语对象、话语载体、话语传播三个方面构建推动青年思想认同的话语认知系统,即“筑巢”,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路径的形成优化结构。

3.1 聚焦话语对象的角色塑造

青年在主流价值引导的语境中实现对对话交往的有效性认同,既是话语认同过程中的话语主体,也是宣传思想工作过程中的话语客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需要明确话语对象的角色身份,助推角色认同的内在驱动来进行角色塑造并打造话语认知系统。

其一,以明确话语对象分众化为基础进行角色塑造。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年的年龄界定为14~44岁。以受教育阶段来区分,在我国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以青年业态来区分,有传统领域青年和新兴领域青年等。青年群体的对象分众化因社会变迁而呈现多样态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青年的发展呈现出突破生命历程的秩序,表现出交错甚至逆转的特点。因此,对话语主体角色的塑造需要对象化,要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进行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的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即强化思想认同的目标,要通过细致长效的方式,辅之以大数据的信息采集而有选择地投送教育内容来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例如,针对在校学生,主要依托学校和教师进行分阶段、系统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体系建构,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针对社会青年,依托单位、家庭、社区进行国家观念、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的引导约束,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角色认知。

其二,以创造角色认同驱动为抓手进行角色塑造。认同驱动的产生,一是基于话语语境设定的有效性。话语中政治信念的真实性、政治规范的正当性、政治情感的真诚性都是有效性的体现,指向社会生活中科学认知活动的客观体现、交流评价的公正体现和情感交融的关系体现^{[25]390},满足青年实现自我发展的本质追求,也符合社会对理想角色塑造的基本要求。二是基于青年现实特征的时代性。青年的对话交往呈现时代性特征,其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行为偏好等差异因数字科技的发展被透明化放大,因而实现角色认同需要通过个群差异类化和内群偏好形成两个阶段。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要以融媒体普及为抓手,灵活把控主流价值与青年喜好的话语互通点,根据同类别青年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不同类别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精准捕捉青年群体的话语偏好,利用圈层的优势灌输政治范畴的话语体系,为个群差异类化为内群体偏好奠定基础。青年既可以通过鉴别来获得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也可以采纳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资格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形成自我概念^{[26]210}。两个方面的特

性为青年形成角色认同积蓄动力。

3.2 推动话语载体的活力创造

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载体的活力创造,一是立足主流价值宣传,促进官方话语的权威成果转化;二是立足青年思想认同,促进宏大叙事话语向群众生活话语转化,因此,需要通过建设青年“教育+”智库和搭建生活化智库来打造话语认知系统。

其一,建设青年“教育+”智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1]33}的要求,同时,也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27]27}。开展青年宣传思想工作,关键要在工作中促成智库的理论话语研究向实践话语转化,以赋能的形式进行载体创新。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明确官方智库的权威性,聚焦青年特点、青年文化等话语内容进行青年“教育+”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通过话语的加工将理论学术话语转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话语,推进智库研究成果的有效应用和普及。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基于青年话语线索的精准定位,为智库研究明确议题设置;需要明确话语逻辑,基于智库话语体系的协调运作,即智库话语要与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形成频繁互动的表达体系^[28],以生成、确立、传播的过程逻辑来明确国家对青年培养的政策内涵,确保青年“教育+”智库的认知权威,同时搭建政府与青年之间的桥梁。

其二,搭建生活化智库。多媒体平台开放共享、多元文化并存,具有线下课堂、教材所不具备的传播张力和文化活力。主流媒体所打造的榜样与网络圈层中所崇拜的偶像在意义设定、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分化的特征。青年群体对二者的认识也存在机械顺从和自觉认同等差异。因此,需要打造生活化智库,既贴近日常生活,又能够把握青年流量,激发青年活力。例如,《“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栏目,将经史典籍中的华章佳句赋予新时代内涵,通过经典解读和思想释义将富有学理性、逻辑性的文字转化为大众化的语言并发挥教育引领的作用。再如,“东方甄选”的大热,从价值理念传播新生态来看,既有高度的立意,又有深度的思想,还有温度的体验,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青年随手可触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常识和经验,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为聒噪单一的直播文化降噪增值,实现了青年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双重满足。

3.3 完善话语传播的意涵发展

宣传思想工作面向青年进行话语传播实际上是通过话语媒介掌握青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叙事实践。话语传播的立场及条件是深化传播意涵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通过强化价值属性和应用属性来呈现话语传播的深刻内涵,打造青年认同的话语认知系统。

其一,强调话语传播的价值属性。宣传思想工作因其确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要求而具有价值主导的传播逻辑。宣传思想工作所使用的话语,作为媒介要凸显的核心逻辑是引领青年形成对国家理念、共同价值的认同,要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才能作为青年实现认同的目标,才具备话语传播的立场。因此,传播逻辑的生成,从宣传思想工作角度看,是基于话语权的掌握。这一话语权必然产生于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相统一的话语语境要求,又基于主流价值和青年需求的满足,使得这一话语权同时具备话语主导力和说服力。从青年成长发展角度看,基于预期社会化目标的实现。所谓预期社会化,主要致力于塑造适应于未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角色^{[29]95}。青年实现个体和群体认同,在主流价值文化中确认了自我身

份和社会身份,在主流价值引导下以自我提升和社会发展为目标指向,持续推进青年完成预期社会化。

其二,强调话语传播的应用属性。报、网、端、微、屏等媒介平台横向交融、纵向扩深,共同奠定了社会文化传播的全媒体矩阵。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的工程建设可以优化主流文化的大众化、立体化传播。借鉴吸收大众文化的媒介性、娱乐性、类别性特征,塑造可感受、可创新、可转化的主流文化。以数字网络、智慧智能的高科技手段融合媒体形成矩阵传播模式,创造精确化、模型化、思辨化的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例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立足全党服务社会的融媒体平台——学习强国 App。内容设置囊括党政军民学、科教文卫创等板块栏目,是集新闻报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道德教化于一体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为新形势下强化理论武装、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阵地。既彰显主流价值立场,又丰富主流文化内涵,再以融媒体技术手段迎合青年学习教育需求,塑造宣传思想工作的网络精品,盘活报、网、端、微、屏等宣传渠道,形成矩阵宣传态势。

4 “善用”:创造助推青年社会实践的话语表达方式

青年通过社会化完成角色赋予、促进个性发展、实现文化传承,每一个发展目标都需要将所内化的思想理念、价值规范、角色认知通过具体实践外化呈现。这是一个价值输出又反作用于价值生成的过程。内外转化作为个体社会化的动力,本身具有遵循发展规律的指向,即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和认识指导下的实践,形成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第三阶段——“青年行真知”。“行真知”的关键在于内外转化的推动力是否解决话语表达方式的风格适配问题,需要从说服力、引导力和亲和力三个方面创造助推青年社会实践的话语表达方式,即“善用”,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路径的形成打通渠道。

4.1 以主体沟通增强说服力

主体沟通指的是主体性彰显的话语表达方式。当今,仅局限于传统线下课堂、纸媒报刊等已无法完全满足话语主客体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主流价值宣传教育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其一,通过主体性赋予实现主体沟通自觉。首先,作为责任部门需要把控主体性,突出主导要求。这体现在以话语本源的潜在性来确保话语权的掌握,达到“万变不离其宗”;以价值内嵌的隐蔽性来凸显理念规范的渗透力,达到“日用而不觉”;以宣教内容的针对性来满足话语作用的实效性,达到“因材施教”。其次,青年作为主体的共识是话语沟通双方关系建构的基础,且青年在沟通中的自我内化过程如下:青年以最佳的身心状态使用着最优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具备理解话语所需的知识体系,达成认知;之后,青年理解并接受话语指涉的内容而形成政治态度,达成接受;进而,青年将所形成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内部思维,使其成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根植于个人意识当中,达成内化。再次,互联网、新媒体的“微特征”传播样态为宣教内容的主体形式生成创设空间,“内容为王”的需求表达为主体间的沟通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使得沟通更加自主和顺畅。

其二,通过多极框架搭建丰富主体沟通渠道。宣传思想工作责任部门和青年经话语媒介进行交流互动,是话语主体沟通交流的中心,二者缺一不可。传统视野中以单一主体性将话语对象置于主客两极框架中,青年极易因其被支配、被说服对象的身份而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宣传思

想工作的效果。“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打破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虚实界限,应从破界中把握互联网空间借以沟通的焦点——话语,因为这是网络空间里青年表达的媒介,承托着青年身份的改变,承载着青年交往的需求。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场域,青年入场与出场的自由基于其抽离与集聚的特征,这一特征为不同身份的青年提供话语呈现的平台并使其走进话语交往的中心。两极框架由此演变为多极框架。由此,经由互联网进行的信息检索、信息掌握、信息运用对于责任部门和青年来说都是相对平等的,可以自由且灵活地选择、使用、发布、传播,以平等的对话互动达成双方信息的交融互信,增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表达的说服力。

4.2 以话题牵引提升引导力

话题牵引指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在突破时空界限并以信息技术支撑的传播过程中,可以回应青年价值表达的全域贯通、全息呈现与破界融合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的诸多挑战。

其一,调和青年多元社会心态。青年青睐的话语,尤其是圈层文化中的网络话语呈现出独特性、多样态等特征。网络用语表现出“不按常理出牌”的多样化构词特点,如“orz”“2333”“打call”等^[30]。青年社会心态呈现出关注社会与自我指涉的表征,社会价值观形态分化、割裂、并存,充满现实性和矛盾性。责任部门引导力的发挥要基于对主流话语的准确把握和对青年发展特点、接受能力的清晰认识,有选择地筛选与传递主流话语中与青年适配的内容进行思想力赋能来强化话语内容的针对性,在引导过程中调和青年社会心态,使得青年可以预期社会化。青年既是作为个体的自己,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员,要成长为适应一定社会发展需要并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人才,一方面要接受主流话语体系的引领,认同并与社会主流价值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也要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的角色特质,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塑造和完善自身。

其二,掌握宣传思想工作主动权。宣传思想工作要想获得主动出击的成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要在尊重网络主体自主性和话语权的前提下,为青年在鱼龙混杂的网络舆论场中树立舆论“风向标”^[31];另一方面,也要借助全媒体传播的优势,扩大话语的影响力。全媒体本身是一个意义共享、资源互借、符码可编的公共话语空间。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青年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编码和信息转化方面更具有学习力和创新性,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内化宣传话语的深刻内涵。因此,可以在尊重青年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主动出击,以青年所思所想作为宣传教育的切入点,以话题引领规避错误站位,以此达到深切关怀广大青年成长成才问题、切实回应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目标。以引领性话语为例,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所学内容即为理念性引领;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如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既是宏观性、方向性引领,又是思想性、价值性引领;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述了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喊出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4]273}。可以说,通过把准青年群体的思想脉搏并给予正面有效的回应,能够有效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引导力。

4.3 以情感共鸣彰显亲和力

情感共鸣指的是话语主体间由符号表意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进行对话、沟通和交往,达到价值融合、视域契合而引发彼此在心理层面共通感的话语表达方式。

其一,营造互动模式的情感基础。情感基础的形成,一方面体现在责任部门与青年之间所建立的平等互动的对话模式,抛弃了“主客有别”的关系立场,青年“反客为主”,进而形成“主主共襄”这一协同并进的互动模式。也就是在对话交往的过程中,青年身份的主体性突出平衡了宣传教育带来的心理体验,不再是由高向低的强制压迫,而是平等对话,进而达到“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的效果。另一方面体现在青年群体之间所建立的归属与满足的对话模式。因空间距离的现实壁垒,网络互动更多地基于情感互递、兴趣共享而产生,青年愿意交流和分享则是基于归属感和满足感的获得。宣传思想工作所塑造的价值认同经由圈层内部和圈群之间通过情感体验的传播而扩散。基于这一路径,平等对话的宣传思想工作模式可以从单向线性的传播发展为多维复合的传播,且情感共鸣的基础是在青年主动参与的互动下所营造的共通感,能够增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表达方式的亲和力。

其二,形成亲和易近的表达情境。表达情境的塑造需要有让人产生表达欲的话语氛围、引人深思的叙事话术以及触人心灵的话语修辞。首先,话语氛围的轻松愉悦能够缓解青年的焦虑,使其投入思想交流的情境中,弱化“官方”与“民间”的情感边界,拉近主流与大众的心理距离。其次,情理兼备的叙事话术,将具有思想深度的政治话语大众化生活化,将具有情感交集的生活话语真情化朴实化,以此创造话语转化的通路。再次,巧妙运用文学修辞手段如排比、对偶等,呈现话语的张力和细腻,激发话语生命力,既是宣传思想工作者话语能力的体现,也是话语自身表现力的彰显。例如,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的一系列回信,其中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素简质朴又持之有故、觉知当下又观照未来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更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力量”^[32]。再如,《社会主义有点“潮”》《马克思是对的》等语言谈话类思想理论栏目的开设,以有思想有意义的时空对话、有趣味有情怀的故事创新转换思想宣传的样态和语态,以青年的话语发出青年的声音,彰显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表达方式的亲和力。

5 “增效”:形成聚焦青年成长成才的话语评价体系

青年社会角色的保持和存续、发展和完善需要协调发展机理的作用,以发展取向形成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的第四阶段——“青年共发展”。“共发展”的关键在于话语评价体系是否能够以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回应青年不断发展演变的思想多样化、对象分众化、需求多元化的特点;是否能够促进青年与青年、青年与大众、青年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需要从评价理念、评价指标、评价机制上构建聚焦青年成长成才的话语评价体系,即“增效”,为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路径的形成完善架构。

5.1 树立全面化、发展性、一体化的评价理念

评价理念从整体维度把握,要满足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的要求。因而需要基于全面化、发展性、一体化的目标形成话语“青年化”的评价理念。

其一,全面化的体现。全面化的评价理念基于横向结构要素和纵向逻辑关系的结合,每个子结构和子过程都包含话语要素的完整性和话语逻辑的正确性。在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话语要素的完整性通过符号、对象、载体、传播、表达方式的作用得以体现;话语逻辑的正确性体现在话语机理以学习、认同、外化、协调来构建话语“青年化”的实现路径,即通过“立意—筑巢—善用—增效”,形成话语意义系统、话语认知系统、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评价体系

的过程。既是宣传思想工作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的体现,也是遵循青年学习规律的体现。

其二,发展性的体现。发展性的评价理念立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导性、青年全面发展的可塑性和话语体系建构的时代性。从宣传思想工作角度看,主导性体现在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通过话语运作的内在逻辑和青年学习的内外转化规律,以国家政策调控、社会规范约束、家庭内部自律等规范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从青年角度看,可塑性体现在以青年主体身份重塑、青年圈层文化利用、青年话语表意再造等尊重差异的方式帮助青年规避价值选择偏差,成为符合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角色并服务贡献于社会。从“青年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来看,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贯彻国家重视青年工作重要战略的创新实践。三方结合张弛有度,凸显评价理念的发展性。

其三,一体化的体现。一体化的评价理念指向宣传思想工作话语“青年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将话语要素的作用融入“青年化”机理与路径的形成过程中。针对通过话语要素所呈现的话语内容进行过程评价、结果评价和增值评价。过程评价基于青年的阶段性成长,通过话语表达体现不同时期引领青年成长的要求,以彰显宣传思想工作的延续性;结果评价要通过青年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内化和践行的价值观来体现,以凸显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性;增值评价要从青年是否获得发展性需求的满足和话语引导是否取得实效的衡量中获得,以体现宣传思想工作的长远性。以此作为一体化评价的根本遵循,以评促进,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工作双向发展的实现。

5.2 设置价值性、结构化、逻辑性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既要体现评价体系的深刻意涵,又要聚焦其多元特征,还要理顺其逻辑关系,因而需要从价值性、结构性、逻辑性要求进行设置。

其一,价值性要求。价值性要求通过对话语符号的内化和实践来彰显。青年学习内化国家观念、价值理念、行为规范,从本质上看是价值传递的过程。价值通过知识进行传递,而知识通过具有表意特征的话语符号来呈现,包括概念范畴(如“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词汇词组(如“新时代”“共同价值”)、语句语段(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但是,在当今社会,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价值传递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单向度路径,即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而是人人都是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如何理解知识所传递的价值,如何掌握青年对价值的内化和践行,成了宣传思想工作话语评价要重点把握的内容。

其二,结构化要求。结构化要求以话语空间的主体、客体、语境三个要素为基础,核心在于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共同体。一方面,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青年被视为核心要素,其他要素如家庭、学校、监管部门等以青年为中心进行配合评价;另一方面,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为需求,强化责任部门和青年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所形成的互动结构,根据话语主体所处的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的现状,进行不同语境的话语评价。针对不同青年细分群体而言,学生接受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从业人员遵循国家政策调控与职业规范指导,网络用户成长于价值理念冲突与融合的实践及科学技术的激励和制约下。因此,要在不同语境下考量话语主客体的交互性,对各要素的评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其三,逻辑性要求。逻辑性要求指向在话语的生产、互动和传播过程中关注话语“青年化”

的效果是否实现面向青年的理性对话与回归生活的结合。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主导立场要求话语“青年化”必须具备理性特征,这也是话语合法性的体现。同时,要想让青年从传统宣传教育语境中完成身份转变,又能在新的话语互动中形成新的角色认知,话语“青年化”需要通过尊重青年主体需求、触动青年情感体验、激发青年求知欲望的表达方式来创造通达青年生活世界的道路,摒弃“一言堂”式的话语霸权,以日常化生活化的循循善诱来体现宣传思想工作的说服力、引导力和亲和力。

5.3 协调全过程、全要素、保障性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服务于整体理念和体系的运转,因此评价话语“青年化”从过程视角要明确全过程机制,从内容视角要明确全要素机制,从发展视角要明确保障性机制。

其一,全过程机制。话语“青年化”的机理以学习内化、认同创造、实践外化、协调发展的作用促成青年思想形成和实践的完整过程。在机理的运作下,形成话语意义、话语认知、话语表达及话语评价的闭环过程,是主体明确、内容完整、逻辑闭合的实现路径。全过程的评价机制既是过程视角的生成路径,又注重话语要素的协调运转。因而要摒弃“唯灌输”的单向宣传基调、“唯形式”的宣传工作考核、“唯结果”的宣传效果反馈。重视话语评价的时代特性,激发话语评价的场域融合。既凸显因过程性而产生的生成性评价,又凸显因发展性而产生的总结性评价。其中,以生成性评价为主,强调话语“青年化”的逻辑进路,促成“青年化”的增值过程。

其二,全要素机制。全要素由构成性要素和动力性要素组成,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引领。构成性要素是话语“青年化”的资源性要素,是话语符号、话语空间、话语过程的集合,话语空间中的主体、客体在宣传思想工作创设的情境中针对话语符号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进行交流互动,以话语生产、互动和传播的过程作用于话语“青年化”的体系架构。动力性要素是话语“青年化”的过程性要素,对青年来说是思想形成、实践外化并最后促成全面发展的过程;对责任部门来说是话语意义赋予、话语认同形成、话语表达运用和话语评价维护的整体过程。各要素设置配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是工作有效性的体现,而全要素的精准配合则能够保障话语评价体系的完整性。

其三,保障性机制。包括维护性保障和发展性保障,以此促成目标明确、逻辑闭合、协调运转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维护性保障以数据信息的采集、分析、转换实现信息交互共享。通过对主流价值宣传与青年文化传播现状的关注和分析,确保话语内容的时效性。通过触发、调节、追踪的分支式处理优化话语体系的环节,维护话语结构的稳定性。发展性保障通过建立报、网、端、微、屏等全媒体联动矩阵,为话语运用赋能增效,实现话语传播的可延展性。通过预设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规避网络传播能效的风险,确保话语过程的可预测性。维护性保障是发展性保障的基础,发展性保障是维护性保障的目标。

6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工作面临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总体而言,宣传思想工作对青年的有效引领可经由话语“青年化”而实现。通过话语“青年化”构建宣传思想工作与青年成长成才的良性互动模式。从整体视角审视,是话语体系由理念革新到实践优化的完整过程;从内在运行分解,是话语机理与实现

路径共同作用的系统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只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青春的光谱才会更广阔,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发。”^[4]²⁷⁴因此,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青年化”视角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的自我革新,增强面向青年群体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质效,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青年心田,带动青年,让青年信服,将广大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动实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8卷(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二六年七月)[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5]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邓伯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1] 孙晓晖.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兴文化”的三重维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2):147-151.
- [12] 魏彤儒,康旭.习近平关于青年担当的话语体系探究——基于NLP技术工具的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6):9-11.
- [13] 陈文,朱丽萍,蒲清平.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心理机制研究和路径探索[J].中国青年研究,2013(5):105-107.
- [14] 汪慧,谢作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化及路径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5(4):50-56.
- [15] 李礼.构建全媒体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格局探赜[J].思想理论教育,2020(2):100-105.
- [16] 张改凤.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共享:特征、规律、引导[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4):88-94.
- [17] 张传文,侯茂林.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73-80.
- [18] 郭光亮.青年化:共青团的话语转向与价值回归[J].青年探索,2016(6):33-37.
- [19] 李艳艳.增强网络空间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2(12):90-95.
- [20] 程丙,成龙.新时代高校育人话语青年化何以可能——从“网红思政课”现象谈起[J].江苏高教,2019(3):90-94.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17-01-01.
- [23] 孟宪平.网络思想文化阵地的型构表征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00-109.
- [24] 谢洋,王曦影.21世纪全球Z世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青年研究,2022(10):102-109.
- [25]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26] 乐国安.社会心理学理论新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2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8] 孙建军,裴雷,马亚雪,等.数据驱动下智库话语逻辑及互证体系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2):153-159.
- [29] 沈杰.青年世界的社会学洞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0] 冯刚,龙波宇.大学生网络话语的文化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8(6):79-83.
- [31] 王彬.互动仪式链视阈下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探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20-126.
- [32] 陈锡喜.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Discussion on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Youth-oriented”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Discourse

LUAN Chunyu, LIU Yingmin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CPC’s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In the era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edia,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youth as strategic target, firmly grasp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and make it clear that discourse is an effective medium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and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elf-renovation of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dis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ur-in-on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ntion” “nesting” “rational usage” an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mechanisms about learning internalization, identification creation, practice externaliz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youth-oriented”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discourse can be realized from the following paths. Firstly, we need to build a discourse meaning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value choice of youth, respond to social reality,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build value consensus. Secondly, we need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cognitive system to promote youth’s ideolog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object, discourse carrier and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irdly, we need to highlight the adaptation drive of discourse style, enhance persuasiveness, enhance leadership, highlight affinity, and innovate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mode of youth practice. Fourthly, we need to form a dis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youth growth from an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o respo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an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youth, the public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acceptance intention of youth”—“the acceptability of youth”—“practicing true knowledge by youth”—“common development of youth”,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further realize the CPC’s innovative theory to be kept in mind firmly, and lead the youth to consciously assume the era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publicity and theoretical work, discourse, youth, “youth-oriented”

责任编辑:陈卓

《探索》格式规范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结合编辑出版行业相关规范,《探索》杂志执行如下格式规范。请作者在投稿前对照要求调整文章格式(建议参考《探索》近年来已发文章)。

1.文章题目。新颖、简洁,一般不超过30个字。

2.文章摘要。须简明、客观地对文章进行概述,不对文章做评论、补充或解释;具有独立性,能脱离论文独立使用,具有与正文基本等量的信息;不使用“作者指出”“本文认为”等与之类似的词汇。400字左右。

3.关键词。一般3~5个,关键词之间以中文分号分隔。

4.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2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独立署名文章。作者署名之下注明每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全称及所在地的城市名、邮政编码。

5.基金项目。若有基金项目,请在文章首页页脚标明,格式如下:项目性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具体项目名称”(具体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XXX。

6.作者简介。标注在文章首页页脚。列出:姓名(出生年—),性别,学位,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7.文章各级标题编号采用“1 1.1 1.2 ……2 2.1 2.1.1 ……2.2…”标注。

8.注释。注释是作者对标题和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补充说明,须放置在当页页脚;注释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相一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

9.参考文献。引文出处采用文尾注形式。参考文献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一致,左顶格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注:[1]、[2]……每条参考文献最后均以实心句号结束。专著和汇编文献的具体页码标注在文中序号旁。同一处有多个文献出处的,只选一个。同一个文献在文中多处出现的,该文献标识序号不变,文献为专著或汇编的,文中序号后标注具体页码。

9.1主要文献类型及其标识代码。专著[M]、会议论文集[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数据库[DB]、电子公告[EB]、联机网络[OL]。电子文献类型标识说明:[J/OL]——网上电子期刊;[EB/OL]——网页信息;[DB/OL]——网络数据库。

9.2常用类型参考文献的编写格式:

(1)专著、汇编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用“YYYY-MM-DD”的格式表示).

(4)外文译著、译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中文译者.中文本出版地城市名:中文出版者,出版年或中文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5)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专著(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专著(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6)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网页日期).具体网址.

(7)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名.论文题目[D].学校所在地城市名:学校名,出版年.

9.3外文参考文献格式按照中文参考文献格式列出。当以英文著录作者名时,其姓要写全且每个字母都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且大写,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文献名首字母要大写,文献名中专用名称的首字母大写,其余都为小写字母。

10.英文摘要。包括文章题目、作者名、作者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内容与前面的中文信息一致。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2期（总第230期） 2023年3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net>

副总编辑：金华宝 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No.2 (Sum No.230) March, 2023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net>

Vice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39